

# 目 录

##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

……〔美〕谭精意供稿 阮芳纪 黄春生 吴 洁整理(1)

## 黄炎培致张元济遗札

……………张树年供稿 承 载整理(19)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52)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上)……………黄光域(68)

藏园笔记二篇……………傅增湘著 王会庵整理(112)

丙申黑龙江矿案原委……………袁大化著 魏长洪整理(116)

奉郭战争重要日志……………王贵忠译(121)

大江会……………侯菊坤整理(143)

重光葵手记——缪斌事件……………郑 基译(172)

《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李玉贞译(186)

## 国立清华大学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史料

……………陈兆玲整理(221)

· 史料发凡 ·

近代史料考证述要……………祁龙威(253)

# 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

〔美〕谭精意 供稿

阮芳纪 黄春生 吴 洁 整理

1899年7月，康有为流亡加拿大时成立的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亦称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是20世纪初年的一个重要组织，是迄今研究还很不够又很值得认真研究的一个组织。

我国大陆史学界在文革前，大多根据保皇会坚持保皇，义和团运动时期又主张“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的基本态度，对保皇会几乎都是简单的全面否定，很少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与此相应对保皇会的资料也缺乏全面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以致对保皇会的基本状况和一些重要活动还都不甚了了。文革后，情况开始有些改变，首先是资料的发掘有些进展，如上海文管会编辑的《康有为与保皇会》、《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等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时也有一些学者着手对保皇会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对保皇会不同时期的影响和作用加以具体的分析，海内外、国内外的研究也开始有了交流。

1990年11月，美国的谭精意(简·拉森)女士应邀到历史研究杂志社和我们合作研究保皇会。谭精意的外祖父谭良，字张孝，原籍广东省顺德县甘竹，是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弟子，后学中医悬壶美国洛杉矶，保皇会成立后他是洛杉矶分会的负责人，积极参与保皇会的活动，和康有为、梁启超、徐勤等保皇会重要人物有密切联系。谭张孝留下一份私人档案，包括同他往来的信札、诗文，还有文告、传单、帐目、字据等三百几十件，其中大部分是手稿，粗略估计有近一半和保皇会有关，有六、七十件是和康有为、梁启超、徐勤往来的信札、诗文。

我们这次历时20多天的合作研究，一是整理从谭张孝档案中选出的10件手稿，逐一进行辨识、断句、标点、考订、注释，同时帮助校订该手稿的刘崇纯和谭精意的英译稿；二是就保皇会有关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是从整理10件手稿中提出的问题展开的，也涉及海内外、国内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支持，分别和三单位有关学者座谈讨论保皇会问题。谭精意在北京工作告一段落后，我们又安排她到广东访问，她和广东的学者有过多次的讨论，还和汤志钧先生讨论过三次。在谭精意抵达北京前，我们就向汤志钧先生请教讨论过一次，汤先生和谭精意讨论过后还来函对我们的手稿整理工作给予指教。

通过这一段的合作研究，我们几点初步的认识：

1. 保皇会在成立之初是基本上继承了戊戌维新的宗旨，但在新形势下也有变化，而从总的趋势来看却是和历史潮流相反越来越倒退。保皇会在中国、南北美洲、东南亚、日本、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60余埠设有总会或分会。保皇会的会众，虽然康有为曾号称有数百万是不确的，但在华侨和会党中有相当多的会众是无疑的，和同时代的一些组织比较，会众更应该说是多的。保皇会的骨干分子，基本是康门弟子、维新派人物和华侨、会党的一些领袖人物，粗略估计不下数百人。张玉法先生1971年出版的《清季的立宪团体》列表介绍过庚子勤王的保皇会人物315人，应该可以把这315人的大部分看作是骨干份子，会众当比此为多，何况这只涉及庚子勤王之役，而保皇会的存在至少说有七、八年，如果不拘泥于会名、会章的一些变化，那么保皇会的历史就有十余年。保皇会筹集的活动经费和倡办各种公司的资金的总数，迄今未见有准确的统计，但可以估计为数也相当可观，这仅从保皇会在海内外设有160多个总会、分会，创办有一批报纸、学校、书局和公司，以及维持了康梁等一批流亡者多年的海外生活，就足可以看得出来。保皇会和清末十多年的众多的组织、事件、人物都有过关系。保皇会起初和革命派有过某种联合，后来分野日益分明，最终偃同敌国。保皇会最主要的公开活动是在海外华侨中间，在一些地方曾一度取兴中会而代之。这固然应该看到“名为保皇，实则革命”起过欺

骗的作用，但也还要看到，保皇会曾大力倡办商会，集股办各种公司，提倡保商，而且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反美爱国运动之类爱国和维护华侨利益的活动，热心办学，倡导和支持游学等等，自有其适应华侨要求的地方。保皇会在两粤和长江流域会党中，也进行过大量的活动，一度一些会党也被拉了过去，这恐怕也不完全都是靠“用钱收买”。保皇会除了武装勤王、发电上书请求归政、策划暗杀“贼党”外，和清政府的地方官员、驻外使节，乃至中央官员、王公贵族也都有广泛的联系，进行过许多活动。保皇会和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民间人士，也有广泛的联系。以上列举，难免挂一漏万，但是可以说明，保皇会是的确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2. 对保皇会应该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即以“保皇”来讲就需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保皇会认定保皇、光绪复辟，就可解决救种、变法的问题，这自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也应看到，这与戊戌时的尊皇，幻想借皇权达到救亡、变法，并无根本区别，或者还可以说这时的保皇正是戊戌时尊皇在新形势下逻辑的发展；再具体一点，保皇会是如何保皇的，起过哪些作用，产生过什么影响，如果对这些进行一番具体的分析研究，那么对保皇会保皇的认识就会深入一大步。类似的，如保皇会的“攻团匪”、反对革命、对外国帝国主义存有幻想等，也都需要作具体的深入的研究。又如，这时的康有为曾大力鼓吹“物质之学”，认为它是中国欠缺之最要者，是国之存亡视之的重要问题，这种认识是如何产生的？与戊戌时主张变革制度是何关系？与洋务派的洋务思想又有哪些区别？类似的，如主张地方自治、官制改革等等，也都需要具体深入的研究。一句话，简单的全面否定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对问题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认识。

3. 要具体深入研究保皇会，首先就要下大力气进行资料工作。以保皇会创办的众多报纸为例，除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已见有较多的利用，而其它许多的报纸则大都只见有零星的利用，这首先恐怕是其它许多报纸搜集起来有很大的困难，因此首先要解决搜集的问题。再以前面提到的《清季的立宪团体》所列庚子勤王保皇会人物表为例，在文中注里把315个人物的资料都标明了，这在当时应该说是广为搜求

了，但由此也可见上海文管会收藏的档案、谭张孝档案当时未能加以利用，而如果能够利用这两种档案，则肯定可以丰富和补充这个人物表。由此又可见，加紧搜集分散在各地由公私收藏的保皇会的档案、资料的重要性。

4. 保皇会作为一个研究的课题，本身就具有国际性，因此要想深入研究保皇会，就尤其需要各国各地区学者间的良好合作。为此，我们有个建议，这个建议已得到北京的许多学者的赞同，这个建议是希望由广东省社科学院和康梁研究会发起，在二、三年后，举行一次以保皇会为专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已有的研究成果，介绍各自掌握的资料，商讨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和资料工作的交流和合作。

附记：谭精意从谭张孝档案中选出10件手稿并作了英译是准备在美国刊物上发表，她也希望我们在中国刊物上发表和介绍，在一些单位座谈中也有学者提出同样建议。现在承《近代史资料》编辑部支持，我们将这10件手稿全文发表，目的是介绍谭张孝档案和推动对保皇会的研究。谭张孝档案现藏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方图书馆。为保持手稿原貌，整理中我们使用了一些符号：原稿夹注、旁注用（ ）、脱字用【 」、衍字用〔 」、待考用□、原误改正用〔 」。手稿的标题和注释是整理者加的。我们这篇短文只是提出问题，对手稿的整理难免有误，衷心欢迎指正。

## 陈国镛致谭张孝<sup>①</sup>

张孝仁兄足下：

日前连接两示，捧诵之下，莫名敬佩。第一函以一时失检，遗去来函之地步，故迟迟而未作复。至数日前，复得再函并汇票一纸，均照收领。今日救国之亡，全赖保皇一会。观海外人心之义愤，去腊因立嗣事，电争至百数十起，毋亦天之未绝中国，而

<sup>①</sup> 此信写于1900年5月19日，作者陈国镛（字侣笙）发自日本横滨。

故留此海外之数百万旅民，以为还兴汉室之用欤！保皇会数月以来，声势已大振，基础已渐立。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来示云：叶、张二君皆深通英文，张现习水陆军学，此人才诚不可多得。兄既与之亲交，可否劝其归国相助勤王，他日事成，厥功莫大。盖今日正人才发见之日，而且深通英文，又可为他日外交之用。我国人之旅居外国者，如此人才正自不少，兄当随时留心物色之、罗致之，激以义愤，收为我用，此长者所谆谆告诫也。至于堪马李其人，照来示所云，正自难得，今日办事不能不借外力。彼既知兵而且有此志，兄何不说以我党如有事时，彼能募集美兵相助否？如若事成，自当酬以权利（如矿物、铁路之类）云云。以此试之，彼如应允，则令其来游时，顺道往见长者，商办一切可也。但恐此函到日，彼已起程耳。现内地布置一切将已就绪，各处豪杰亦纷纷来归附，将见义师一起，如摧枯拉朽有断然者。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现各埠均开办保皇会，均极踊跃异常。而盛埠尚迟迟未举，不得不仗兄鼓舞之力也。尚乞从速举办，如办有头绪，亦望时赐惠书，藉慰悬望。夫凡有血气，具存忠愤，盛埠义士仁人热心君国者必多，夫岂肯甘居人后耶？乞兄常以忠义之言，激励【励】诸君，收一人即得一人之用，集一款即有一款之用。语云：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今日正合大群以办大事之时，无论如何其于宗国未必无少补也。至会中应办事宜正多，在海外则以如上所云筹款、选将二者为宗旨而已，责任正大，兄其勉之。大埠人心涣散，此间亦有所闻。一者领事恐吓之

故；二者任公未到之故，而亦以其举总理太多，而莫能统于一也。谭树彬彼处来信多攻之，大□其为人者是揽权，而且好自尊大。罗伯棠、唐琼昌二人近得雷维利来信，谓其前因家属被拿事（随即释放无事，谅亦闻之）亲往领事处除名洗身。来示谓会中得其维持，究竟如何？要之，无论如何究以维持使无散沙为主。兄处与彼相近，乞常以函鼓励【励】之可也。任公前以埠中疫症，不能他行，近已开埠，已往各埠□开办公事。美国之行尚须再酌也，檀山保皇会实为各埠之冠，几于无人不入云。本埠则冯紫珊为总理，此人极热心，义愤捐题会金二千余元，真不可多得也，现年为《清议报》总理。敬通①、云樵②俱已归国办事，麦君孺博③来接云樵之任，敬通之任尚未派有人来。今兄弟一人住馆，孺博则常住东京也。兹承命付来《东亚三国地志》一部、《验方新编》一部，并单一纸，到乞照察收。《华英字典》以过重违例，邮局不能寄，俟迟日再商量寄来事可也。时局岌岌，不尽烦言。专此敬候

旅安。

弟陈国鏞顿首 西五月十九日

盛埠诸同志义兄均安。冯君紫珊附名致候。

### 康有为致谭张孝④

张孝弟：

得四月三日书悉，知汝倡成会，可喜。美中各情可每水

① 敬通，即李敬通。

② 云樵，即欧桀甲。

③ 麦孺博，即麦孟华。

④ 此信是康有为于1900年6月27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亲笔所写，康有为，号更生。

详报我。堪马李<sup>①</sup>来助甚好，惜已泄耳。惟苦饷薄难供养，然到时或饷多，则有以济之。今西人来请从者甚多。星坡巡捕官亦愿从征也。顷邱君<sup>②</sup>再捐十万，共廿万矣。今仍患苦乏枪，而应接江粤诸路太多。今已刻期起，计书到久已动兵矣<sup>③</sup>。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此次北乱，中英开仗，吾得随意购械，真天赉也。惟津法租界全毁，英军八百全没，俄国三万人入京。北京必倾，中国大分，然或者复辟之事及中国自立之举，即在此乎？闻谭树彬将我书漏出赏报，罗省技埠<sup>④</sup>亦然，后一切书札切宜谨密。去年开会之事，实藉树彬一人不畏强御之力，其时各人皆无书来，但谭一人，故我不能不藉其力而复之。（何将此情告唐、罗、崔三人？）自十二月子肩有书来后，即归总会，谭树彬但□之复之。今唐琼昌、罗伯棠、崔子肩频书攻谭树彬，云其受何佑<sup>⑤</sup>主使泄阴事无所不至。究果然否？据谭树彬前后来书，乃一极粗人耳。若如此，则是奸人两造相攻，吾无从遥断，汝可密查复我。至马袁堂到大埠将一年，徒费公款，加拿大于彼极有□言，弟可达我意传令还埠，否则恐各人不理。此等小人，当时以无人渡美从权发遣，不知其无耻如此也。此复。

六月朔 更生

- ① 堪马李(Homer Lea 1876—1912)，又译作孔马哩，今译荷马李，美国人，早年入太平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学习。曾和保皇会合作拟为训练维新军，在美国筹办军事学校。后结识孙中山，与革命派合作。
- ② 邱君，即邱菽园(1874—1941)，原名德馨，字炜葵，自号星洲寓公。福建海澄(今龙海)人。光绪举人。1898年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宣传维新救国。1900年被康有为推举为南洋英属各邦保皇分会会长。同年捐款助币25万元资助自立军起义。后因康有为扣压华侨捐款，遂与之决裂。
- ③ 康有为、梁启超曾计划利用义和团运动时机在两广等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为此，康、梁发动海外保皇会捐助，并购买武器，联络国内会党。由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而导致两广等地的武装起义计划未能实施。
- ④ 即洛杉矶。
- ⑤ 何佑，1899年10月至1902年10月任清政府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 康有为致谭张孝①

张孝仁弟：

三月廿一、四月廿一两书收。孔马哩未知内情，其说不可行（有一西人摩近大攻孔马哩，以为西人之学不齿其人），凡外埠之人不知内情。试问今日之事为何事乎，乃秘密之事也，稍有疏泄，则办事者杀身无地矣。港、澳皆驻委员密查，我事同志数人知之。然今各事犹皆败于泄，至〔致〕使大款涂地，人才陨落。汉口之事②尤为大鉴。自秋冬来，每我辈欲为一事，地方官未有不知。知则即行戒严，即行捉获，险至万分。此岂若两国交兵，明修战具，明派将官者耶？而来书所言竟若立国者，何其矇于内事乃尔？明知大集众埠必得巨款，但办事两年，人情已知，稍有所失即行退沮。自汉败之后，罗、唐③被捉，捐款寥寥，然则即使各埠咸集所得亦无多耳。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在各埠一鼓作气之始已属无多。彼等不知，纷荐西人来，即孔马哩已费数千，而未收分毫之用。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孔马哩及容纯甫辈，皆纯乎西风，开口辄问我会千数百万，其军械宜买几百万，某轮船宜买几百。不知我会大如蚊血，小若蚁旋。即汝所经各埠所捐，多则千数，小乃数百，以众蚊之血而供大象之一啖且不足矣，如孔马哩所言，不类于梦话乎？外埠不知内地办事之苦，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岂不可笑乎？且观已捐之埠，即如加属之热心，亦无分毫加捐，盖财力有限，不能勉为也。澳局因各省委员常驻窥探，连捉吾党，屡泄事机。故我阳命暂停，并

① 此信康有为写于1901年7月5日（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廿日），发白庇能（Penang，即檳榔屿）。

② 指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起义。

③ 指罗伯棠、唐琼昌二人家属。

《知新报》<sup>①</sup>亦行停罢。此实不得已苦极之事，自外视停罢之后，乃再行密开。凡此办事进退机宜，皆不能告人，汝密知之以解众疑可也。故凡有言澳事者，皆自特造以为停局之计，实则避委员也。以此区区小局尚不能立，况如汝直视若立国乎？故有人凡言澳事者，皆勿信，但言因被委员被泄密掩可也。汝已知书札已被人拆阅，故一切来往之信不能尽告实情。观汉得书后杀二千余人，至今未已。大埠之捐款有限，而内地之被杀无穷，故近来各事皆在庇能我亲主持，澳局停与不停无关也。且可告各埠，言内地办事之难，死人之多，失事机之甚，令各埠释然。此后汇款通信，可直汇来庇能交我亲收可也。起用之说有之，乃皇上曾问过并电问张之洞我何在，惜所问非其人，不知如何答法。但一回銮亲政，可望召用耳。为君力<sup>②</sup>辩诬，甚好，后有此可照办。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君勉<sup>③</sup>现计已到，汝可与勉、力<sup>④</sup>二人合商开新埠、筹新款之事。此注望于汝。此间  
 动定。

庇 言五月二十日

### 康有为致谭张孝<sup>⑤</sup>

张孝仁弟：

五月、六月先后付寄各书想得收。徐君勉已释。何领事无端

① 《知新报》为清末维新派主办的报刊。1897年2月在澳门出版，康广仁、何廷光、徐勤等办。初为五日刊，后为旬刊。1898年12月停刊。

② 君力，即梁启田。

③ 君勉，即徐勤。

④ 勉，即君勉，徐勤也；力，即君力，梁启田也。

⑤ 此信康有为写于1901年8月22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九日），发自槟榔屿。

作孽，力攻保皇，前两月电粤督拿君勉家属。陶方帅<sup>①</sup>谓：“保皇亦捉，则保贼者何以办之。”陶督甚爱我，甚好维新，甚助我党。罗、唐两君家属特已释放，数月来曾经三次吩示地方官，奈为巡抚德寿所阻。今居然力争放之，虽托人打点，而如此大事非陶督力主不能放罗、唐家属。何领事冒认为功，可见其欺人太甚矣。从今该领事虽为难，而陶督必不肯从。已捉者犹释之，况未捉者乎？凡我会中同志，益可发愤舒放，无所牵畏矣。望遍告各埠同志，共相解慰，痛加鼓舞，扩充会事。想贵埠诸君子闻此佳音，必当同声欣慰也。回銮在即，已托人于陕西、北京照料，又大托日本，今不便详告。此问

近好。

庇言 七月初九日

### 康有为致某君<sup>②</sup>

不见复忽忽九月矣，回望故国只有神伤；东望西欧更思故人，比维使节万福。游欧十一国后，由加入美，所阅愈多。今日中国所欠缺者固多，而最要者乃物质之学。各国之强，实在汽电、工艺、兵舰、枪炮，不在乎自由、立宪等空论也。此事非一蹴可几，如欲之，亦须数年、六、七年乃七成就。而今所派学生率学空论，则与同文馆旧学何异？亦与八股何异乎？今当亟亟派生数千入学物质，一县两人，派自该县经费亦不难也。然力实不逮，就学之才亦无，则请各国名匠还国，因地开厂教之，所得才更多。请名匠之资勿吝也。如是五、六年，物质之才粗足，工商农矿兵舰之事渐兴，而国差可立矣。不此之图而终日狂行，犹之楚北行，虽勤而无当也。今中朝非不欲变，其如盲人瞎马，夜

① 陶模，字方之，1900—1902年间任两广总督。

② 此信写于1905年4月12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八日），系康有为手迹。

半临深池河。第二事则今九卿会议居然有上议院之意矣。惜法规未定耳，然合数十瞽者以扣盘论日，虽胜于数人之□行，庸有当乎？无下院而开上院其本矣，然今中国实未至立宪、开议院之时，尚须十余【年】之后也。今之计，宜先开各省府县乡议院，举行地方自治，令国民人人得出其力，以之理财举事乃始有基，不然袁、张之欲行印花税①、邮政局而付之县令，此《周礼》所不能任也，而望有效乎？故今改定官制，不从升大县令、裁道府、折督抚（今江淮巡抚已行之矣），开自治而欲有效，是航海而守绝流断港也。英先开汽机而强于大地，德经营工商学三十年而驾英矣，美经营四十年而今富冠大地甚矣。物质汽机之要也，国之存亡视之。英之苏格兰京噫颠堡②者，机汽之祖也，其博物院皆机汽之具，各国无比，宜令吾国各省会皆仿苏格兰博物院，每机置一具，而请一匠师司之，游院者即以教人。则人先知机器之妙用，而从者有所入门，不期劝学而自劝矣。此为教物质学至简易之法也。去年寄呈拙著《官制考》一书，自谓心得之言，字字实行，非同空论。若今日欲改官制而不从此下手，必不能成。中朝今亦日变，惜其不知所行耳，来日大难，恐后欲为之而瓜分不我与也。危急之心其何可言？怀抱千万不能尽之，择最要者数事言之，若承采择，望力言于当道，每一事也，万努〔弩〕发必求行之，乃至他事必有济也。若夫理财之方，仆亦有良法，但苟非其人，仆未敢言；且不行地方自治，仆之策亦未能行。爱国万端，日发日生，惟公知我敢献芥曝。

敬请

勋安不一。

三月八日由美国发

① 袁，袁世凯；张，张之洞。清政府曾几次讨论实行印花税，但均未实施。1913年民国政府正式征印花税。

② 今译作爱丁堡。

## 邝寿民致谭张孝<sup>①</sup>

张孝仁兄足下：

六月十五附来一函，内夹汇单四张，共该港银壹千零捌拾元，妥收，内有公学款一百三十元、商股款九百五十元，皆照名单注记。惟阅所列名单有舍路埠商股卢炳奇二十五元、甄想二十五元，不合股份数，又非公学款，尚在存疑，还望示复为幸。查股份商册，舍路埠<sup>②</sup>甄想兄已做商股银三千元，今欲加股，何其少也？想必有故，乞为查之。内地拒约事，已全省震动，停销美货已见之实行。省城拒约总会公举总理四人，惠伯<sup>③</sup>亦在其列，近已连日叙会商议办法，已联络七十二行盖图章签名，立誓不销美货。各学堂及许多有势力之人，亦立誓不用美货。港地为英例所压掣〔制〕，不便开会。惟宁邑旅港商人托名商务公所叙会数次，阖邑旅港商人皆响应矣，三数日内共捐拒约款二千余元，已聘两演说员分往各乡，痛陈美约之害。随后又有恩、开两县相继而起，港中渐渐有人敢言拒约事矣。中国民权发达从此始矣。余事详公函。此请

义安。

弟邝寿民顿首 七月廿二

再：足下五月十四附来一函，内夹汇票拾张，共银实收到六千五百四十元。兄前来信云六千三百二十元，今汇信亦云六千三百二十元，想必一时之误，祈查明更正为叩。

① 此信写于1905年8月22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廿二日）。

② Seattle，今译西雅图。

③ 惠伯，即叶恩。

梁应骝致谭张孝<sup>①</sup>

张孝我兄足下：

昨来手书适弟外出，家兄翰手接，旋失所在，弟不得读，怅怅而已。后遇温重庵，详述足下来函始末，想亦从同。足下备尝艰苦乃能抵埠。外人之凌辱我黄种，亦可知己。此不发愤，将来犬马奴隶不知何极。英人之于马来人，禁不得植谷；印度人不得为大官、议员；俄分波兰，言语文字不得仍其旧俗，违者戮之，可为前监〔鉴〕矣。今者中国危亡，黄种将绝，瓜分豆剖即在目前。足下深明时局，于何不知！而上有圣明乃被幽废，凡我践土泣血痛心，长者重洋远涉，痛哭秦庭。而外人视我如肉在俎，愿分杯羹，袖手旁观，亦固其所。凡事权在人者不可恃，权在我者有可凭。长者不得已，乃在加拿大特创保皇会。此间同胞兄弟各怀义愤，共成善举，所有北美英属各埠，无不应之如响近。及旧金山大埠，以函激发，亦复闻风兴起。初为领事所阻，而义愤所激，区区压力亦不能制。现接大埠义士来函，谓此间各埠均已起会，即足下所居罗生歧利埠，亦相与有成矣。加拿大创始保皇会以云咕华埠<sup>②</sup>叶恩为首总理，旧金山大埠以谭树彬为首总理，两人皆忠义性成，故能激励同志，共兴义举。又旧金山大埠列名值理者七十余，闻此处义士演说，环听者常数千人，而加拿大更不待言矣（舍路埠<sup>③</sup>华昌胡枝南最忠义，为美北三省总理，美北各属皆胡所发动者，可述我意称美之。气连拿埠<sup>④</sup>黎腾芳、猫色地埠<sup>⑤</sup>

① 此信写于1901年12月16日（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六日），发自加拿大。

② 云咕华埠（Vancouver），今译作温哥华。

③ 舍路埠（Seattle），今译作西雅图。

④ 气连拿埠（Helena），今译为海伦娜，属蒙大拿州。

⑤ 猫色地埠（Merced），今译为默塞德，属加利福尼亚州。

关国斌皆忠义愤发，大埠罗伯棠尤通达而忠义，大埠《文兴报》唐琼昌亦宜抚之）。大埠黄种十四万，归长者者已十二万有奇（其各埠尚未计）。足下夙怀忠愤，时时以救天下为心，丁此机会所当兴起乎？外地平等书生气习在所必除。足下处此，当时出大埠接见商人，如谭树彬等，当极力抚摩，极力鼓舞，时时发明大义，使我同种人人有忠君爱国之心。埠内商人时函请长者。凡人来埠，今承长命请足下肩提倡力，保皇会成，则皇上之复政在此，中国之不亡在此，黄种之不绝亦赖此矣。内地是非日明，各省城市咸知维新之好，而北京消息，所有满汉人员归维新者八九，而一二贼臣常欲废立，六月中已有意举行。是时加拿大各义士电托各国公使转□总理衙门，电请圣安并请归政，多至一日间发十四电，统南洋、日本、美洲各埠电请圣安并请归政者，已四十余电，而废立遂止，斯真回天之力也。足下为吾党热血人，作事当不在人后。至令昆季等在埠日久，素得人望，倘能再加鼓舞，联合同志，发明大义，振臂一呼，无不景从。而救皇救国，人才最重，此间忠义卓著之士，固当密与结交，其有精通西文、西语、公法、机器、格致诸学者，亦当罗以待用（政治学、理财学、海、陆军四者最要，如无人，宜劝令入学堂学之）。至有聪敏子弟亟当劝入学堂，有英锐魄强者则当令学水陆军。美例准练民兵，保皇会集有余款，则练民兵（不须款，各人以礼拜日习之，美人可许也）。至此间火器时出新式，是何名目，如何妙用，如何运法；当随时考究，赐函示知。别有汽球妙用，尤当极力考察。天下多故，内地岌岌不能无事，凡此皆必需之物，万望时时留心（并多方托人）。此间会党，弟夙已有闻，足下能否招抚？（人才当列表告我）今此势急时危，求才若渴当如水浒，不得复做雅歌赠投故事矣。大埠三邑公司先生区慈波为家君道友，其来埠时与冯萧伯（慈波亲戚最相信者，此人此埠教读）同来，此人乃弟素相信友，且又世交，别有函请面交他。尤望极力发挥

他，激励忠愤使动热血。令慈波虽未必乐意相助，或不至妄生阻力也。中国危殆！各愤忠义，勿懈勿忘，不尽所怀，诸惟心照。

专此并候

大安。

弟梁应骝上言 十一月初六

### 康有为游美诗一首<sup>①</sup>

美国大平陆，	风景无可睹。
全城遍游历，	罗生 <sup>②</sup> 第一处。
近海亦近山，	不寒又不暑。
花果既具繁，	楼阁皆新膳〔缮〕。
香橙大似拳，	卖遍全美土。
赁宅对西湖，	碧漪泻媚妩。
扶杖日行游，	板桥穿隔岛。
杂花满阪生，	携书藉芳草。
小住春两月，	养疴忘忧旅。
东方惟哈佛，	林宅差可语。
无山又畏寒，	避地非佳所。
谭生善择地，	干城学创祖。
梦游莫忘我，	故宅花能如。

罗生技利佳胜冠全美，春二三月游之，门人谭良<sup>③</sup>与保皇会众为吾赁宅西湖，日夕扶杖枕花藉草。追思故宅，示谭张孝。

① 此诗系康有为所作，原件为康有为亲笔，时间可能是1905年。

② 罗生、罗生技利，今均译为洛杉矶。

③ 谭良，即谭张孝。



徐勤致谭张孝<sup>①</sup>

张孝同学兄足下：

来示敬悉。游学事蒙大力提倡，拟再派五人，且感且佩。现已定得四人，一冯郑明、二钟宝华（即玉文）、三陈仲希、四罗敦早（即棧东之弟）。此四人上三人皆旧同学，均愿习商业银行者，诸君亦甚谨，愿他日成学，必不至倒戈相向。乞即汇学费往《新【民】从报》代收，转交四人可也。弟初欲八月往日本游学，现因《国事报》<sup>②</sup>开办，资本不足，当自经营，故不能即行。现定九月初往暹罗一行，一为开会以筹款，一为运动华人电京请派公使以收治外之权。梁庆桂适入京，彼与外部唐小川有交，先为运动，则派公使之事或可成也。有此二事，故弟迫得一行。东洋之行，来正乃去矣。《国事日报》八月初一出世，旬日间已销报三千份之多，为省中各报向来所未有。现股份仅得一万四千余元，至少亦须五千元乃可久持。内地招股最难，前数月已足三万元之股，不料因路事风潮，竟退去一万八千元。然一切铺位、机器均已定，费去万数千元矣，断无中止之理。今一出已扫一切，名誉极佳。若一旦停报，不特于弟声名扫地，即全党亦为之失色矣。乞兄极力提倡代招五千元，则此报可久支，而全省之大亦可得一机关之地。我兄为吾党龙象，故敢以此相托。明知会事为累甚，□不免竭欢尽忠之诮，然热心诚笃如兄，想不以此见责也。自前月下谕宣布宪法，严禁鸦片，举国精神为之一振。弟本欲在省开一宪政会，以为吾会侵入内地之基。独惜弟十年不学，党中通此学者亦甚少，故未能即办。故吾党急务首以派游学为第一义。梁铁君先

① 此信写于1906年10月17日（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② 《国事报》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在广州创办的日报。1906年9月18日创刊。主办人徐勤，主笔黎砚彝、李雍新等。武昌起义后停刊。

生为他人所陷，诬以革命党，故被捉。彼直认吾党人特派彼到京打探皇上消息者。或云已死，或云未死。铁公为吾党第一运动家，今遭不测，实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与荣、庆商量，请开复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赵尔巽与端方拟在京开日报，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麦孺博亦因此不往东三省。故此事之变，同人谓小戊戌，诚哉，诚哉！铁公十九被逮，十八亦有来函，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广东公学<sup>①</sup>拟在南岸购十七亩，价银一万二千三百两，此地极佳。

弟 雪三顿首 八月三十

## 何家本致谭张孝<sup>②</sup>

张孝联襟大人阁下：

献岁发春，即维元祺，鼎晋覃第，凝厘为祝。前付回信并合同，经已收妥，计五月十八、五月廿九、七月一日、七月廿九所来函，均敬悉。琼彩楼月结得阅至八月份止，惟内中又欠五六两月结，未审是否遗漏，乞补寄一份来为盼。琼楼近日生意何似，想足下竭力整顿，日有起色。弟实靠此吃饭，万望保存资本，胜造七级浮屠（或有人承受股份则即示知）。各戚友纷纷问讯，以何日能分溢利，望之若岁。敬祈将琼楼近今各情形并各月结一并赐知为祷。弟十一月十四日到北京，由广东咨送到京师法律学堂肄业。该堂专课中律、西律、东洋文、德国文，

① 广东公学是保皇会举办的学校。首倡于1901年，至1905年始开办。有学生90余人，次年增至200余人。经费来自各地保皇会捐款。

② 此信系何家本写于1908年1月5日（光绪丁未年十二月初二日）。

只造就实官人员，三年毕业。弟未能免俗，聊亦效颦耳。现寓北京海北寺街顺德会馆，请随时赐书惠教，俾当面谈，不胜欣慰。前裕源山铺票公司，三月时被卢九争承，今十一月初一又恢复批准裕源办，改名绍荣公司。弟因进京未暇兼顾也。现北京遍地冰雪，未审美国情景如何。处达弟十月时曾吐血数次，闻已痊愈，惟料其不复来美矣。宝眷想安好，弟等家人均赖平安。此贺新禧，并请禧安。

丁十二月初二日由北京发

## 黄炎培致张元济遗札

张树年 供稿 承载 陈梦熊 整理

**编者按：**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和著名职业教育家黄炎培(1876—1965)，生前“在师友之间亲密相处了几十年”。几十年间，他们除经常见面外，还通过书信往来，或谈事业，或议政治，或论学术，或叙友情。张元济的哲嗣张树年先生，至今仍保存着黄炎培从1927年到1954年间致张元济的33封信。信件的内容，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与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有关的，如黄炎培为东方图书馆核对方志目录、向张元济提供古籍线索、赠送书刊等事(第三、四、五、六、九、十六、十七、二十、二十四等札)；二是与黄炎培从事职业教育、推进乡村改革工作、编辑刊物有关的(如第一、二、八、十三、十四、二十一、二十六等札)；三是与两人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政治态度有关的，如对抗战策略的看法，对国共和谈的关切，对全国解放的拥护，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赞扬等(第十八、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至三十三等札)；还有一部分是有关问候起居、家事等情况的。在批信件，为研究黄炎培和张元济的生平、思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也是体现两人几十年亲密友谊的有力佐证。

现征得张树年先生的同意，我们将这批信件整理出来，并就其内容略作考核、说明。33封信中，27封为首次发表。另外6封，近已编入《张元济友朋书札》(商务印书馆据原件影印)，但此书印数较少，流传不广，故亦一并转录<sup>①</sup>。原件绝大部分无句读，为便于阅读，现全部加上新式标点。原件中的日期系民国纪年，均照录，编序时采用公元纪年。

<sup>①</sup> 下录各信凡序号前有“\*”者，均已编入《张元济友朋书札》。

## #— 1927年6月5日

菊翁道鉴：到此两星期，以半日读书写字，半日游览山海，颇能自乐，足以告慰垂注。吾公率岁贤劳，盍来少事休养？此间星浦、虎滩、传庄三处，消夏最宜，市政完美，盗窃不作，若将国家观念暂置不提，可云无上乐土。炎行后，《人文类辑》事仍未获安置妥当，顷来隽公讯以此事完全由炎处理，隽公势难顾及。兹拟最小限度之维持方法，留原有练习生二人，受沈信老之指导，继续选辑，合之报纸、房租诸费，月须百元。苟得此数，差可如常延续，否则戛然遂止，尽弃前功，太觉可惜。此百元筹集方法，拟集同志分任。公夙加奖掖，不知有无同志愿共维持？拟月任五元为一股，有力者酌任数股亦可。以后此物之处分，须得任费诸人之同意。商务在此时间不知有无参加之可能？现拟最小限度之需要额，较为清凝，但不敢率为提议，统乞吾公裁酌，使中赐复是荷。手此，敬颂道安。

炎培敬上 十六、六、五、

（张元济手批：“16/6/12复”；“16/7/30

又去一信，未留底，托伯俞转寄”。）

此信寄自大连。黄炎培自创办职业教育后，不求名利，苦心经营，在国内教育界深受赞誉，又得到实业界和爱国华侨的大力支持和信任，因而触犯了一些封建势力的维护者。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排除异己。是年3月，北伐军抵上海，国民党中某些当权人物竟不问是非，查封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址也一度被占，并指控黄炎培为“学阀”，下令通缉，还迫令职教社工作人员在预先写好的“黄炎培反动证明书”上签名。5月18日，黄炎培得到消息，国民党将派人暗杀他，遂偕夫人连夜离家藏身亲戚处。原拟立赴苏联，临时被阻，改去大

连，直到1927年年底才回到上海。

黄炎培在大连虽然每日以“读书写字”、“游览山海”自乐，但无时不念及职教社的事务。5月25日，他致信杨卫玉，建议职教社应开展调查社会生活标准的活动。他给张元济的这封信上提到为“《人文类辑》事”筹措经费的问题，也与职教社工作有关。《人文类辑》属“甲子社”（1924年7月成立），1925年3月别设人文类编辑部，专门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收集分类审批工作，由沈恩孚（字信卿，即信中提到的“沈信老”）负责。张元济对黄炎培提出的筹款问题作了答复，并有一段批语写在黄炎培的信上，批语中说：“军兴以来，亲故失业者多，内弟又逝，需分任教养之费。既闲居，所出反增，殊惭蚊负。所属未能遵，应怅歉万分。”张元济当时已辞去商务印书馆经理职，“不居名位，不受薪水”，所以也实因经济拮据而无力相助。

## 二 1927年8月15日

菊生先生惠鉴：七日得百俞先生转到尊示，知前此为甲子社事曾荷赐复。炎以六月十八赴津，七月五日复来大连，前信度已沉浮矣。便中倘蒙撮示前书大意，至所忻感。编辑失地及已亡新兴诸国志略事，猥承赞许，令人感奋！兹拟具体草案寄百俞先生转陈，尚乞指正。下月或秋近往朝鲜一行，此项工作于焉开始，甚愿吾公有以教我。朝鲜归来，即当取道沪上南游，届日当畅领高论也。手此，祇颂道安。

炎培敬上 十六、八、十五

此信为黄炎培收到张元济7月30日托庄百俞转寄的信后所复。黄炎培曾于6月中、下旬赴津、京，先后会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美国人孟禄博士等，并参加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7月初返大连<sup>①</sup>，张元济于6月12日给黄炎培的复信，因故

<sup>①</sup> 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在“6月28日”条中记“搭日轮再返大连”，与此信所述日期有出入。

未能收到。信中大意，或即张元济在黄炎培6月5日信上所加的一段批语，“编辑失地及已亡新兴诸国志略事”，未见《黄炎培年谱》记载。

### \*三 1927年8月29日

菊生先生道鉴：顷从孙慕老所奉到十九号手示（前托慕老转交一书，未奉到。曾于上函敬复）。先是，炎于十五日上一函，托百俞兄转致，知未入览也。炎原定九月上旬赴朝鲜，向图书馆校对志目一事，敬当遵办，恳将东方志目速邮寄下。此函预计九月一号或二号可到，三号适有“大连丸”自沪出帆，如能赶于此船带来，则五号进口，六号炎即可奉到，从事校阅。如时间促迫，可于三号午前八时，顷伤人送到“大连丸”交与三等舱茶房吴阿芳（宁波人），信面写明送海关黄伯文转交炎收（如交邮请迳寄裕长栈），面与说明，必不致误。因吴与伯文同居，炎常用此法托带信件也。万一“大连丸”赶不及，则须七号“□□丸”寄发，十号送到，炎亦当坚持以了此事。此馆馆长松崎柔父，汉学专家，曾与晤谈数度，精神颇觉投合，必可得其助力。炎此数天为友人裘君病痢甚危，奔走照料，借钞章程，未暇往询，过数日当往询得后奉闻。朝鲜之行即拟着手。前书所述调查计画，倘有指教，甚愿拜领。时事消息，此间报纸或较上海为确，且捷。盖某国方面于各地都有通讯，虽汉、浔、宁、沪，上日会议，下日即披露，其所议大略，或于利害关系处不无去取耳。炎不欲于最近时间内返沪，但鲜游归来转赴印度，必须取道上海，届时或可一聆清诲也。手复，敬颂秋祺。

炎上言 十六、八、廿九

王君培菽藏志书亦多，不知曾向之校阅异同否？

炎再白

“孙慕老”即孙宝琦(字慕韩),张元济与他时有书信往来,曾共商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事<sup>①</sup>。张元济在8月19日致黄炎培的信中,提出请黄炎培为东方图书馆校对方志目录。时黄炎培在大连蛰居“一个狭小的旅馆里,在日本特工窥伺下,长日读书于日本关东军经营的铁道图书馆”<sup>②</sup>。“裕长栈”即当时黄炎培的住处。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黄炎培处之泰然,诚如他在赴大连途中所作格言中说的:“在得意的时候,须想世上苦恼人不知多多少少,我那里忍得一个人单独快乐,——这么想就不至于放肆了;在苦恼的时候,须想世上比我更苦恼的不知多多少少,我这些苦恼算什么,——这样想心就平了。”<sup>③</sup>

东方图书馆是1926年在涵芬楼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除藏有古今中外大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外,各地方志的数量、种类之多,为其一大特色。“综二十有二行省,并边远各区计之,十有其九”<sup>④</sup>,当时这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1923至1924年间,曾据涵芬楼所藏志书编过目录。张元济在1927年4月6日致朱希祖的信中提到,“涵芬楼所藏方志目录系三四年前所印……续收有三四百种,尚未列入”<sup>⑤</sup>。托黄炎培在大连核对的志目,或即“三四年前所印”的增补本。东方图书馆藏有如此之多的方志,与张元济对方志的重视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方志中“珍贵之纪述,恐有比善本为尤重者”,因此,他“锐意收集全国方志”,“初每册值小银钱一角,后有腾至什佰者”<sup>⑥</sup>。黄炎培对张元济悉心搜藏方志的用意,深为理解,所以他欣然接受“向图书馆核对志目一事”,尽管黄炎培此时境遇艰难,但仍表示要“坚持以了此事”。

① 见《张元济书札·致孙宝琦》,商务印书馆。

② 黄炎培《八十年来》第95页,中国文史出版社。

③ 转引自《黄炎培年谱》第72—73页。

④ 张元济《续修滕县志序》,见《张元济诗文》第293页,商务印书馆。

⑤ 《张元济书札》第156页。

⑥ 张元济《涵芬楼烬余书录序》,同①第284页。



关于核对志目的详细情况，可参见下录四、五两封信的内容。

#### 四 1927年9月17日

菊生先生：承委核对志目事，已荷大连图书馆特别允许，每日别室核对，且许自由入库检阅。开工三日，直隶、山东、山西、陕、甘数省已了，发见东方所无者不少。因求工作早日完竣，故向此间中华青年会倩刘君协助，大约再经四五天可以完工。知关垂注，先闻大略，容后详陈。行期尚未确定，时以奉告。手此，敬颂道安。

炎上

此件为明信片，写信日期署于信面。

#### \*五 1927年9月21日

菊生先生道鉴：检查方志事，九月十二日访图书馆员松崎鹤雄，偕见馆长柿沼，分示以东方志目，并道来意，当允炎每日赴馆，凭前赠之特别阅览券入特别室检阅志目，并许自由就架翻阅志书。是日即开始检查，至昨日完了，所得结果具详另册（一览）。计该馆所藏省通志、府、州、厅志、县志共六百三十八种，而为东方所无有者八十四种，有而不完全者六种。两目相对，大多数为卷数同而编撰人不同，则以东方取纂修诸人之首列者入目，而大连则以主纂者入目故也（此二法似以主纂者入目为宜。因首列者大都当时高级官吏，仅任倡修或鉴定，并未负有编纂责任）。又出版年期微有不同，则以旧纂志书标明出版年月者绝鲜，不得已取其序文中之年期入目，而所取不无微异（若《临汾县志》竟全书不载年月；光绪《武进阳湖县志》竟全书无年月，并无编纂者姓名。最惬意者为《新疆图志》，民国十二年所撰，体例完整，并列参考书名。于此见晚近著作之进步）。因此种种，不得不翻阅原

书，致费时日。中间曾以一人不便核对，而馆员均系日人，虽极意招待，而大多数不通华语，乃商请此间中华青年会职员刘君协助。但就架翻阅，关系太重，只得一人担任此事，结果发见东方所无有或有而不完全者，既达九十种之多。若全付抄写，恐费时太多。鄙意第一步宜指定该书，设法觅购，或托相知友人设法。其实系无法购补（道远者、年远者当较难觅），如实系无从购补，然后审其价值较巨者抄补。至借抄手续，自昨日藏事，尚未及向馆长询商，但可豫料者，委托馆中代抄恐感困难，以馆员多系日人，恐于此不甚了了，似惟有向馆外托友雇人办此，而取得馆中之特许，此层必可办到。容俟商明再复。其间两馆均有者，标记号于东方目本，当遵即留赠此间。如尊处认为有参考之需要，不妨另备东方目本一册随时迳寄大连换取。至此间本有常出图书订期返纳之例，以持有特别阅览券者为限，限制极严。炎券仅系第三十四号，可知其不轻发，不似美国及叻岛之取携较便矣。此间所藏农村经济书及朝鲜、印度、台湾各地志略极夥，因思与其仓卒往游，不如先读其地书后游其地。决在此再住两星期，浏览大概。前述种种，如决定办法，需与此间馆中接洽，尽请开示。炎大约十月三四号以前不离此。寄上检查一览一册，图书分类表和英文各一册，刊行物综合目录一册，统乞察收。此间前周曾开“云冈写真展览会”，预约募印《云冈写真全集》，曾往观览，似于美术上、考古上不无价值。兹附上预约办法一纸，如尊处或馆中欲订购者，不妨迳向接洽，视缕上陈，伏候鉴察。此间天气新凉，尚未感冷，土人谓较往年冷得迟。年成极好，差可告慰。手此，敬颂秋祺。附四册一纸。

炎培上 十六、九、二十一

梦旦、云五、拔可诸公敬念，暇时乞致言。

如惠示在十月三四号前后到此，乞迳寄寺内通裕长栈炎收较捷。

(张元济手批：“16/9/27复。”)

前信(9月17日)提及校对志目事的进程，并将“大略”告知，此札即为黄炎培向张元济详陈全部经过，以及提出自己的看法。从信中可知，核对工作是从9月12日开始，至9月20日结束，其间既得到日方人员的协助，也有当地青年会职员的支持。但不难看出，绝大部分工作是黄炎培一人担任的。在短短八天中，黄炎培据六百余种方志详细核对张元济寄去的东方图书馆所藏方志的目录，不仅弄清了东方图书馆所藏方志的遗阙情况，还发现东方图书馆在方志编目中的某些不足。当时东方图书馆的藏书，经张元济十余年的“搜求”，“即方志一门，已有二千一百余种，虽多遗阙，要为巨观”<sup>①</sup>。因此，黄炎培核对志目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而他对张元济的事业的热诚支持也于此得见。

## 六 1927年10月3日

菊生先生惠鉴：顷得九月二十八所发手示，敬悉一一。自方志检毕，研究朝鲜问题告一段落，正研究印度、台湾、缅甸、暹罗等地。检得台湾志书，其目如下：

《台湾府志》  
《诸罗县志》  
《淡水厅志》  
《凤山县志》  
《噶罗兰厅志》  
《澎湖厅志》  
《彰化县志》  
《台湾县志》

余文仪等  
周钟瑄等  
陈培桂等  
王瑛曾等  
陈澧均等  
林豪等  
周玺等  
薛志亮等

以上八种，大正十一年铃木让实合编为《台湾全志》，由台湾《经世新报》社发行。

附备参考。青年会刘君景台襄检三天，已由炎写字送赠，似不必更酬，如荷注及，请备本馆出版书价值二三元，迳赠大

<sup>①</sup> 张元济《东方图书馆概况·缘起》，见《张元济诗文》第240页。

连浪速町中华青年会刘君收可也。刘君为中学毕业生，似赠普通书可矣。此时拟一周后去朝鲜。手复，敬颂道安。

炎上

（张元济手批：“16/11/10伯俞函，任之知余被劫，来信慰问，即去一函款谢，并寄诗一纸。”）

此件为明信片，写信日期署于信面。前信（9月21日）述及大连图书馆藏“台湾各地志略极夥”，黄炎培在阅读中，将此特意检出，记下目录，以供张元济搜集方志时参考。

张元济批语为收到黄炎培11月8日信后所加。所说“被劫”一事，详见下录1927年11月8日一信的说明。

## 七 1927年11月8日

菊生先生左右：在汉城从日本报纸得惊人之消息，不便电询，急函百俞先生探问，顷返大连，得复详悉一切。此事物质方面，姑勿具论，第精神方面受此刺激，有何影响，良以为念。或者以公练达镇定，处之泰然，此则令人心折矣。今后有无旅行计划，或者暂时跳出圈子，以资休养，亦是一法，未知尊意如何？炎此次游鲜，所得颇堪满意，拟于游印之前，将朝鲜资料整理成书，然后出发。而此项工作，以在此间较为相宜，因决继续留连二三星期，日夜并力，一俟脱稿，即返沪呈阅，藉领大教也。书不尽言，统容面罄。手此，敬颂平安。

炎培上 十六、十一、八

（张元济手批：“16/11/12复。”）

四·一二事件之后，上海社会混乱，治安情况极差，盗窃、抢劫时有发生。张元济以一埋头事业、潜心学术之人，亦未能幸免。他在1927年10月28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写道：“近日上海绑票盛行。本月十六日竟有暴客数辈，持械直入内室，挟弟而去，留居

彼中先后六日”<sup>①</sup>。这就是当时在上海轰动一时的张元济被劫案。张元济被劫持后，暴徒将他关押起来，勒索钱财，强迫他带上墨镜，并用棉花塞耳。有一天晚上不慎失火，幸得及时扑救，“否则为熏穴之鼠矣”<sup>②</sup>。暴徒以为张元济既主持商务印书馆，必早就是个大富翁了，因此开价甚高，后来张元济与他们倾心交谈，那些人才降低了条件，将张元济放出。据张元济1927年11月5日致朱希祖的信中说：“若辈初以商馆为弟一人私产，故所望甚奢，嗣经解释，亦遂恍然，并属详细调查。越日复来，自认误会，以是较易解决。所耗甚属有限，然在弟则已负担綦重矣。”<sup>③</sup>又据张元济十年后回忆此事时说：“绑我的都是在上海失业的人。……他们告诉我说，做这些事情见不得人，回到家里爹娘妻儿面前都不敢直说，只说是在外面做做小生意。其中一个据说是在商店里做过柜台上的伙计，失了业好几年才入伙的。……我劝他们能够得到些钱赶紧罢手改行，免受危险。内中只有一个人说我是无望的了，从小讨饭，一无所能，只好做一天算一天了。其余的都对我说，你的好话我们都愿意听的。说完了大家都淌了好些眼泪。”<sup>④</sup>可见这个不幸事件的发生，与当时的政局和社会经济情况极有关系。

张元济脱险归家后，对亲朋好友的慰问均一一作答，并附以被押时所作《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夜……口占十绝》酬谢。前信（10月3日）批语中提到的“附诗一纸”，即指“十绝”。黄炎培是10月21日离大连去朝鲜的，时张元济已被劫，但黄炎培尚未知道，直至在汉城日本人所办的报纸上看到报导，才急急写信给庄百俞探问。11月初，黄炎培由朝鲜返回大连，得到庄百俞的回信，悉知

① 《张元济书札》第117页。

② 参见张元济《丁卯九月二十二日夜，盗入余家，被劫而去，留居窟中凡六昼夜，口占十绝，聊以自遣》，《张元济诗文》第29—31页。

③ 同①第158页。

④ 张元济《谈绑票有感》，同②第218—219页。

详情，于是写了以上这封信。一则慰问，再则劝张元济暂时休养一阵，以调整精神、体力。殷切之情，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当然，张元济既未为“被劫”所扰，更未“跳出圈子”去“休养”，仍是躬身书海之中，孜孜不倦。他在1927年12月18日致朱希祖的信中说：“今岁自遭劫质，损失殊重，不能不节省。《毛诗》之数，苦其昂贵，如见书后令人可欲，当节衣缩食为之。近有一事堪以奉告者，则《彭茗斋诗集》中间缺去数年，借得葛氏抄本，大约可有补齐之望也。”<sup>①</sup>虽然经济受到损失，但精神并未颓丧，张元济在1927年10月28日、11月30日致傅增湘的信中，对“被劫”一事均只寥寥数语带过，而以校抄古籍、出版新书诸事为重。<sup>②</sup>

黄炎培从朝鲜考察归来后，著《朝鲜》一书，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 八 1928年4月19日

菊翁尊鉴：承假《解说西域记》一册，并由东方图书馆迳送到了谦氏《地理考证》一册，均照收。感荷！感荷！同伴王君昨夜始决定不复偕往印度，因此拟依原定方针先游台湾，已函汪衮父君。尊处如有熟悉台湾情形者，敬求介绍，俾获指导，敢以奉恳。行期虽未定，颇拟早日出发，免耗光阴，大约总在旬日之内，届时当将假观之书奉缴。下星期一日后到社之期，此时尚未能定，容到日敬以电话奉闻，炎当趋承大教。手复，祇颂道安。

炎培敬上 十七、四、十九

黄炎培避居大连时，曾在当地为准备即将赴朝鲜、印度、台湾考察而查阅了许多资料。朝鲜归来后，欲赴印度，所以向张元济借阅有关书籍，熟悉当地情况。此信提及因“同伴王君”“决

<sup>①</sup> 《张元济书札》第158页。

<sup>②</sup> 参见《张元济书札·致傅增湘》第92、93札。

定不复偕往印度”<sup>①</sup>，故拟“先游台湾”。黄炎培为考察各国教育情况，在此之前已先后到过美国、日本、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越南、朝鲜等国，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台湾属中国，但因社会风俗与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因此也是黄炎培一直想考察的对象。此次台湾之行情况如何，因《黄炎培年谱》、《黄炎培诗集》均未载此事，黄炎培的《八十年来》一书中也未提到，故不得而知。或者可能由于别的缘故，终于未能成行。原来准备要去的印度，也未去成。据黄炎培《八十年来·海外游迹》一节所列到过的国家，未见有印度。

汪衮父，张元济的朋友。查《张元济书札·致顾廷龙》第55札中说：“昨检旧文件，获有汪衮父手札三通。衮父，我故人也。睹其遗墨，不胜感怆。其子弟闻有在此者，如能宝爱其父兄之手泽，请转畀之，否则可储之馆中。衮父吴中名下士，亦有保存之价值也。”

### 九 1929年9月6日

菊生先生道鉴：庐山归来，想见精神百倍。友人昆山教育局长潘吟阁兄来述，昆邑某乡公所藏有原版明宋濂所撰《龙门子凝道记》，其版本固可贵，其内容有以阅世而增重者。如卷下“林勋微”主张耕者有田，颇合时论，特抄副本送阅。素仰吾公以保存文化为己任，属陈大览，如审为有印行之价值，而愿调取原书，或抄或影，均可照办。唯书系公物，所有权不便割让，敬乞察酌（缴还前赐书多种，复价两元，乞查收。）便中示复为幸。手此，祇颂秋祺。

炎培敬上 十八、九、六

附一册。

（张元济手批：“18/9/7复”。）

<sup>①</sup> “同伴王君”，或即职教社另一负责人王志莘（1896—1957）。

张元济庐山之行是在1929年7、8月间，于9月初返沪。黄炎培热心向张元济推荐《龙门子凝道记》一书，原因有二：一是因其版本“可贵”。张元济整理出版古籍的特点之一，是他总结了前人的校书经验教训，以“书贵初刻”为选择底本的指导思想，千方百计搜求最佳版本。黄炎培既获得《龙门子凝道记》“原版”的线索，自然要告诉张元济。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此书有些内容于当世不乏可取之处，值得出版。如黄炎培在信中所举之例，其思想正与职教社从事的农村改进工作以及职业教育事业有相合的地方。古代学者的思想而“颇合时论”，这也许是黄炎培推荐此书的根本所在。查《丛书集成初编》、《龙门子凝道记》三卷已由商务印书馆据《金华丛书》本于1927年印为一册。

#### 十 1929年10月13日

菊生先生赐鉴：奉读惠书，承以次儿敬武完婚赐贺，感谢！感谢！此次仪式简单，不欲重劳友好，概未发柬，深以为歉。新妇与适之为本家，久居浦东，故即乞适之证婚，亦以儿辈钦佩适之人格之故。敬复申谢。手颂秋安。

炎培敬复 敬儿随叩

十八、十、十三

最近游杭成四绝 呈政

一水沉沉数劫灰，几番金碧几蒿莱。梦回苦忆雷峰塔，谁是湖山再造才。

雨后狂泉响破空，清游直许捣黄龙。妙门玄牝谁能识，洞口松云十丈封。

樊榭风流二百年，交芦和梦销苍烟。文章毕竟关风会，开卷于今一惘然。

十里秋江柿子肥，村鬟八九浆如飞。词人剩有新词字，风雨幽魂归不归。



(张元济手批:“18/10/15复”。)

黄炎培的次子黄敬武(竟武),生于1902年,曾为上海中央银行职员,后积极参加民主运动,任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上海解放前夕,在地下党领导下,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抵制蒋介石阴谋将中央银行全部金银货币秘密运往台湾。后为特务侦悉,于1949年5月12日被捕,5月18日被活埋于国民党保密局监狱,年仅47岁。解放后追认为烈士。

黄炎培一贯以勤劳、省检、朴素、踏实的家风教育子女。敬武的婚礼,“仪式简单”,可为一证。但既“概未发柬”,张元济怎么知道这一消息呢?婚礼是由胡适作证婚人的,时胡适正与张元济比邻而居,“衡宇相望,时相过从”<sup>①</sup>故此事或当从胡适处得知。

所附《游杭成四绝》诗,作于1929年9月16日,后收入《苞桑集》时题为《杭州杂咏四首》,个别诗句有改动。第四首中“词人剩有新祠宇”,改作“词人何用新祠宇”;“风雨幽魂归不归”,改作“风雨幽魂那肯归!”

## 十一 1930年2月1日

菊生先生道鉴:康君修其专研方志有年,获晤于南洋中学图书馆。观其苦心辑录,为人所难,深致倾佩。谈及先生,非常景慕,特为介见,倘荷延谈,至为企幸。手此,敬颂春祺。

黄炎培上 十九、二、一

(张元济在“康君修其”旁注:“莆田人,通信处在新开河润德里恒康号”。)

① 张元济于1949年填写《履历表》“社会关系”一栏时,提到与胡适关系,中有此语。转引自宋曼瑛《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见《出版史料》1988年第1期。

当时南洋中学图书馆亦藏有大量方志，黄炎培为查阅各地史料，常去那里，得识康修其。从张元济在此信留下的地址看，他是接待了康修其的。

## 十二 1930年2月12日

菊生先生道鉴：敬启者，近悉工商部令各有限公司须请会计师查帐，想商务定当遵照办理。旧同学潘序伦君当为吾公及公司诸君子所素识。潘君深以获在全国有数大公司，如商务者服务为荣，顷来道及此意，炎想尊处对此查帐重任自必郑重人选，如潘君之富于责任心而又娴于世故，定必乐为推荐于董会。炎知潘君，深信其德性与能力均甚相当，敬为先容，即恳加以审度，转达总务处诸公为荷！专此布恳。顺颂春祺。

炎培敬启 十九、二、十二

公司诸公均此。

张元济主持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在用人问题上一贯主张“退无用之人，进有用之人”，以激励“新进之辈”，他选用有真才实学者，不拘一格。他之退休，就是要为商务的人事制度作出榜样。黄炎培热心推荐潘序伦，不仅因为潘的“德性与能力均甚相当”，还由于他有以在商务服务为荣的热情。

## 十三 1930年3月13日

菊生先生道鉴：职教社立案事想不至有问题，备承关注，心感之至。《人文月刊》，同人勉力为此，殊感心余力绌，如有此类之材料，敬求指示。秉笔者仅三四人，且皆分余晷为之，真趣所在，不知其他，愿公时时教正。手颂大安。

炎培上复 十九、三、十三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由于其鲜明的反封建倾向，加上所提倡的“劳工神圣”的口号与当局的政治相牴牾，因此始终遭到国民党政府的非难。尤其是《生活周刊》创办后，其犀利的笔锋，直指腐败、反动的政府，更使国民党不满。职教社为了生存、发展，“虽使尽技巧，求免于迫害，到底无法获得反动政府彻底谅解<sup>①</sup>，黄炎培等人就利用私人关系，拉孔祥熙、王宠惠、张群、陈布雷等入社，以暂时缓解冲突，并向政府部门申请备案，以使职教社的各项事业能“合法地”生存。因有了一批国民党要员在社中，“立案事”才得以解决。

《人文月刊》是甲子社(1931年改称人文社)在人文类辑部的基础上发行的刊物。当时还正在筹建人文图书馆。由于经费所限，人力不足，所以工作时受影响，张元济对此十分关心。黄炎培在《八十年来·人文社和鸿英图书馆》中述及《人文月刊》是“一九三〇年一月”开始“编辑发行”的，而《黄炎培年谱》记载1931年“1月，人文社创办的《人文月刊》出版”。

#### 十四 1932年12月5日

菊生先生道鉴：奉诵手示，敬承壹是，枉存失迓，深为歉然。《人文》补奉各册，知已由社中同事照办。徐公桥试验改进农村，荏苒数年，种种计划，仅现十之三四。先生肯赐驾临指导，资胜欢迎。每一二周，总有友人前去，遵当约伴同行，炎培届时敬当追陪。得闲仍拟趋前先承大教也。率复，祇颂康胜不一。

炎培敬上 二十一、十二、五

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决策人，把“富教合一”作为“大职教主义”中农村改进理论的基础。为此，于1926年秋在江

<sup>①</sup>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奋斗三十二年发见的新生命》，《社史资料选辑》之三，第103页。

苏昆山徐公桥辟农村改进区，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农民以致富为前提，提高道德水平，增长文化知识。但职教社工作人员在开展工作时，因无官方支持，故常遭当地恶势力的排挤甚至欺侮，以致许多原定计划不能顺利实施。为此，职教社广邀社会知名人士，前往视察参观，以扩大影响，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

### 十五 1933年6月26日

菊生先生道鉴：自违大教，又已旬日，每欲趋谈，卒卒未果。熊适逸兄近自欧寄到一缄，对公深致惓惓，兹将来书送奉台察。适逸有文艺天才，而兼有敦厚之天性，盖幼时所受教育如此。手此，祇颂暑安。

炎培敬上 二十二、六、二十六

### \*十六 1934年1月18日

菊生先生赐鉴：奉读手示，并领到《清史稿》十函计一百三十一册，照收无误，谨依尊指寄存鸿英图书馆。掣奉收据并规则一分，统请察存。遇需用时尽请通知送缴，感谢！感谢！《生活周刊》不知所缺为何号，候示知，炎当嘱同事检取，万一不得，有合订本当奉上也。蒋笺奉缴。吾公高义，前者邹君道及，感溯勿谖，所苦一切无从说起，只有长叹耳！汲县自治倡办者，炎所识为王怡柯君，崇柯是否怡柯之误，或其昆弟也。此间《人文》有合订本，过去一、二、三、四卷正在装订，装成容续呈（第五卷起当依次送赠）。先奉《关税史料》一册，乞赐收是幸。手此，敬颂道安。

炎培手上 二十三、一、十六

附收据一纸。

寄附规则一纸，蒋笺一纸，外《关税史料》一册。

自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毁于“一·二八”战火之后，张元济

将一部分藏书移存它处。《清史稿》一书，即寄存鸿英图书馆。

《生活周刊》自从由邹韬奋主持工作以来，除继续注重社会问题，关心青少年修养以外，又逐渐将目标转向时事政治，使之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因此，渐为当局所不容。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行文禁止各地邮局邮递《生活》，并拟议彻底封闭之，理由是该刊“言论反动，毁谤党国”，蔡元培、黄炎培等曾为此与当局交涉，均遭拒绝，邹韬奋被迫于是年10月流亡国外。以后，《生活》在杜重远、徐伯昕等主持下，采用公开和秘密的各种方法继续发行，仍保持了国内定期刊物的最高销数。1933年12月，当局下令上海市禁销《生活》，使其既无处投寄，亦无处销售，终于被迫停刊<sup>①</sup>。从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生活》因发行不正常，时有阙遗。故张元济写信给黄炎培，请他为之设法补齐。

黄炎培在信中又提到“吾公高义，前者邹君道及，感泐勿援”等语，可知张元济当时亦曾为查禁《生活》一事，与当局有过交涉。但其结果当然是不会如愿的。

### 十七 1934年1月22日

菊生先生道鉴：奉示敬悉。《人文月刊》第五卷起当奉赠，请勿必付价，容按期送呈也。《生活》八卷第七、第八、第四十九、第五十共四分，兹转嘱检呈台收，庶成合璧。手复，敬颂大安。

炎培敬复 二十三、一、二十二

附《生活》四期。

（张元济于信上“第五卷起当奉赠”旁注：“复信已于去岁订阅。”信末手批：“即复，23/1/22”）

《人文月刊》创办以来，以其资料丰富，索引便利的特色，深

<sup>①</sup> 参见《中华职业教育社史稿》第三章第二节中的“《生活周刊》始末”。

得张元济喜爱，故长期订阅之。黄炎培于前信提到“第五卷起当依次送赠”，此信又表示了这个意思，并说“请勿必付价”，说明他对张元济所热爱的事业十分关心。

随此信所附的四期《生活》中，第八卷第五十期为该刊的停刊号，除刊有编辑部的“最后的几句话”外，还发表了邹韬奋流亡前撰写的《告别词》，其中说：“空论无补时艰，徒表同情于空论亦无实效可言，因此记者个人固应勿忘上面所说的教训而应从实际方面努力，同时并以至诚希望诸君也把对于本刊言论的同情移到实际方面的努力，共同奋斗，共谋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十八 1934年2月9日

菊翁先生道鉴：前谈南阳一带民团村治之特色，兹检得旧草一篇，似前选各书未曾夹入，补奉一览，不必掷还。自彭君被害，村治未受影响，此为至可喜之一点。人生值得努力恃此耳！手此，敬颂春祺。

炎培敬上 二十三、二、九

附件

黄炎培于1933年7月中旬赴山东邹平县参加“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梁漱溟共主其事。时全国各地有以不同方式推行农村改革者，或以教育为主，或以经济为主，或以卫生为主，或以工业为主，或以保卫自治为主等等。黄炎培在会议间获知曾在南阳一带倡立民团自治的彭禹廷不幸被害，遂作诗一首以哀之。现据《黄炎培诗集》将此诗录下，以为参考：

哀彭禹廷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禹廷在其乡镇平立民团，倡自治三年，家给人足，文教大昌，匪不得入，苛捐杂税亦不得行。方承简邀往观，三月二十五夜猝遭仇害，全乡愤起，罪人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已。

大野潜龙用在乡，罡风一夕陨元良。苍生水火森千劫，青史恩仇梦一场。身可赎兮人且百，魂归来些啼之旁。汝南范子荒前约，遗札重开泪满裳。

黄炎培信中提到的“旧草一篇”，或即指此。

### 十九 1934年4月23日

菊生先生道鉴：属有浙东之游，归读四日手教，并掷还印品五种，敬领释念。藉悉夫人清恙，不审日来已否转机，代祝吉人天相，早占勿药。敬此布复，顺颂道祉。

炎培敬启

于雁荡见先生题名刻石，想见前游清兴。容以暇日趋报浙东近况也。

炎培再启 二十三、四、二十三

1934年3月29日，黄炎培应浙江建设厅邀请，赴浙东视察公路，并周览名胜，于4月中旬返沪。沿途作《过杭即景》、《柯岩》、《禹庙》、《绍兴农村所见》、《吼山》、《雪窦》、《奉化至新昌道中九首》、《新昌》、《天台》、《下雁荡过上马石村留赠胡仲侯》、《雁荡》、《永嘉中山公园所见》、《舟山半日游》等诗以纪事，诗后收入《苞桑集》。

时张元济夫人许氏患病，“日见危迫”<sup>①</sup>，黄炎培因此致信问候。许夫人于是年逝世。

### 二十 1934年6月23日

菊生先生道鉴：前谈及新昌上塘村梁姓家藏有《朱子大学注》稿一节。顷得新昌县长白君函复，访悉此稿已被毁于洪杨之役云云。如确，是大可惜事。昨检新昌康熙县志，载“朱子为梁氏写《大学》”，或即指此。知注敬闻。手颂尊安。

<sup>①</sup> 《张元济书札·致丁英桂》第61札。

炎培上 二十三、六、二十三

黄炎培视察浙东公路，于4月3日至新昌，作《新昌》诗，诗前记事谓：“新昌宝相寺前，有朱书‘南明山’三字刻石。白深松县长见告，朱晦庵昔在此注《大学》，今其手稿犹珍藏于上塘村梁姓家。”诗中有“海岳大书犹在石，考亭手稿不曾灰”之句。黄炎培自浙东返沪，将这一线索告诉张元济，再致信白深松，请其核实此事。于此亦可见黄炎培对保存祖国文化遗产的一片热忱。但白深松函复，“访悉此稿已被毁于洪杨之役”，黄炎培特地写信告诉张元济，为之一叹。

二十一 1934年7月5日

菊生先生道鉴：奉教敬悉。职教社年会并未改在庐山举行。因到会人数极盛（外省赴赣来会报到者已达三百七十人），到山上不便招待也。惟会毕上山者亦必不在少数。尊从既上山避暑，炎培俟会务定了或者亦当上山一行，图良晤也。手复，敬颂暑安。

炎培敬上 二十三、七、五

中华职业教育社年会基本上每年举行一次，以讨论社务，统一工作部署，交流工作经验等。有社内负责人以及各地代表参加，会址不定。此次年会为第十四届，于7月13日在江西南昌举行。时张元济在庐山，曾与蒋介石会晤。黄炎培于年会结束后，偕与会者分批参观了南城、南丰、广昌等原苏维埃区域，7月30日，到庐山与张元济见面。

二十二 1937年2月20日

菊翁先生道席：奉读手教，承以参加祝嘏文字，谆谆之雅，秩秩之仪，既表矜谦，又徵寿考。先曾拜诵尊著小册，



复荷以家集两种见赐，恭绎跋语，弥足珍宝，而用意深远，即古语，今有心人当能善会，惜时贤未尽可与语耳。率复，祇谢书城朱墨之劳。幸善珍摄。敬颂春祺。

去岁写《蜀道》一册，似未曾呈正，敬乞加海。

炎培肃复 二十六、二、二十

附一册。

1935年10月25日，是张元济的70寿辰。是年6月间，由胡适、蔡元培、王云五共同署名，拟定《征集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启》，分发张元济的几十位朋友，征集论文，打算编一本纪念册，作为寿礼。黄炎培曾著《二十五史篇目表》一文，参与其盛。1937年1月，商务印书馆将收集到的二十余篇论文编印出版，名为《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张元济事先不知此事，论文集出版后，他写信给撰文诸友，并附赠近印先人遗著，以示感谢。他在2月12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去岁贱辰，深自晦匿，乃蒙先生与崔（蔡元培）、岫（王云五）二兄为之征文纪念，弟未获闻知，无从阻止，致劳朋辈动笔，不胜惭悚。谨呈近印先人遗著二种”<sup>①</sup>。1946年9月，叶恭绰又有意为张元济80寿辰筹办纪念活动，张元济在复信中说：“弟马齿日增，蒙询今岁初度，有何纪念。旬年以往，王云翁阿私所好，淡及友朋，弟方引以为愧，今何敢再蹈前辙，请我兄万勿道及，认为乌有亡是可也。”<sup>②</sup>张元济不以一己私事劳累朋友，为人谦恭之情，于此可见一斑。

黄炎培的《蜀道》一书，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1月底至5月初，赴四川考察。当时黄炎培从上海乘船溯江而上，入川境后，一路所见，灾民饿殍，其状惨不忍睹，地方政府治理无方，唯以盘剥百姓为业。黄炎培返沪后，连续撰文数篇，报导川行见闻，

① 转引自宋曼瑛《新旧交替时期两位学人的探讨》之三，《出版史料》1988年第3、4期合刊。

② 见《郑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第135—136页，张元济1946年9月13日致叶恭绰信。

先后刊载于《国讯》杂志，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蜀道》一书即由此数文汇集而成。张元济一向关心社会问题，其时曾撰《农村破产之畜牧问题》（1936年）、《在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1937年2月）等文，分析农村经济情况，为农民的生活现状鸣不平，要求政府改善政策。黄炎培以《蜀道》一书相赠，说明两人忧民之心是息息相通的。

### 二十三 1937年8月2日

菊翁先生：承示教问，极感！炎所患系旧疾痿痹室，期坚卧即愈。顷已略愈，出而服务。政府悉以决定方针“打”，但不知如何打法耳。大著容细读。手颂健康。

炎培敬复 二十六、八、二

此信虽寥寥数语，但反映出黄炎培满腔的工作热情，以及对时局的看法。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全民抗战已成必然趋势。黄炎培既要开展职教社工作，又为抗战奔忙，以致旧疾复发，不得不卧床，但“略愈”即又“出而服务”。7月9日，他曾与江问渔、杨卫玉等职教社同仁，联名致电宋哲元，赞扬宋部爱国将士“奋勇抗战，捍卫国土”。8月初，他与梁漱溟、晏阳初、江问渔等见蒋介石，面陈发动群众共同抗战的意见，蒋予以首肯。此信所说“但不知如何打法”，说明黄炎培对国民党政府迟迟没有抗战的具体布署而颇感忧虑。

### 二十四 1946年9月13日

菊生先生赐鉴：奉示敬承一一。顷接通启，明晚遵当趋陪。顽体日见复原，感谢爱注。嘉定冯诚求，为今仅存之老辈（清太史公），撰有关于俗谚之著作，友人允为代索稿本（未印单行本）。至以前老辈所撰，闻以载入《嘉定县志》。上海秦氏著作已分向其后裔二人请索旧稿，统俟复到奉闻。炎

培拙著《川沙方言述》编入《川沙县志·方俗志》(此志内尚有族伯琮《川沙方言汇释》),今姑检《川沙志》第二、九两册(《方俗志》在第九册中,奉备一覽,并乞教正。如尊斋已有此书,则请阅过掷还,否则请示知,当向川沙索取志书全部(共十二册)奉赠。余明晚面尽。手颂健康。

后学黄炎培敬启

三十五、九、十三

附书两册。

黄炎培热心为张元济提供图书,前录诸信已多有述及,此信又为一例。《川沙志》为黄炎培于1934年年初主持编修,《苞桑集》卷二有《里居主修川沙县志,聚父老子弟,宿观澜小学文照堂水榭,日课一诗,得六首》,“其三”后注:“先父五十年前参与修志,列名。”“其六”后注:“先伯平斋琮、吴丈恭之福梓、蔡崧甫宗猷、艾诵劬曾恪,皆致力甚勤,未及志成,先歿。”

二十五 1947年2月19日

菊生先生左右,奉教敬悉。大文先从报端奉读,今乃始知为尊著也。此文语语贯通社会新旧信条,其有去取,皆犁然有当,诚足传之今后世界。《罗斯福见闻录》亦已购到一册矣。入春寒甚,曾患咳三旬,至不能出门,今已全愈。手复,敬颂道履康健。

后学黄炎培上

有一义似亦值得提倡,中国在今后世界不容许不民主,则对于投票选举,必须一秉大公,绝对不受威胁利诱,似不失为公民道德重要部分。尊见亦当谓然。

炎再上 三十六、二、十九

附印件乞正。

信中所称“人文”,不知指张元济的哪一篇文章,但从黄炎培

对此文的评价来看，当与社会问题有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黄炎培全力投入争取和平民主的运动，反对内战，特别是他到延安考察以后，对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逐渐明晰。1946年底，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单独召开国大，通过宪法，时黄炎培屡次被邀参加国大，但均为黄炎培拒绝。此信中对“投票选举”所发的议论，即是黄炎培对国民党政府压制民主，破坏和平的看法。

所附“印件”，指黄炎培自拟的《节约时间敬告友好》一文。此件拟定于1947年2月15日，以油印稿并亲笔署名分发友好。稿中开列节约时间四条办法，略谓：“志在力求节约时间，使各增进办事效率”，“希望共同提倡实行。”此稿未收入《黄炎培年谱》等研究资料。

#### \*二十六 1947年8月11日

菊翁先生左右：奉读手教，感承一一。见赐会费，已由社具函奉复。尊词“从今以后更艰难”，真打入吾人心坎，不知今后如何是好也。所幸同人中久病之江问公，病愈且加健。杨卫公主持全社，春秋鼎盛。职校贾、工商专校沈、比乐中学孙三校长，皆得人。其余各部同人，皆能尽职，此则差堪告慰者。只觉应付政治，不敢贪小环境之便利，而漠视大环境之要求。既求生命安全，又不忍与良知违反，此中艰苦，先生以外，知我者盖亦稀矣。敬以掬陈，尚幸随时加海。手此，敬颂尊安。

后学黄炎培敬复 三十六、八、十一

信中所称“尊词”，即张元济作于1947年4月29日的《调寄西江月·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十年纪念》。词谓：“经营费尽心机，三十年为一世，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须再试。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劝世人多发慈悲，莫尽把它捶碎。”中华职业教育

社成立三十年以来，始终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勉力奋斗，终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张元济深知其中甘苦，作此词为之呼吁。<sup>①</sup>

“江问公”，即江问渔；“杨卫公”，即杨卫玉，都是职教社的负责人，也是黄炎培在事业上值得信赖的同志。

## 二十七 1947年9月20日

菊生先生尊鉴：奉示谨当遵时趋教。前为被解聘诸教授安置问题见属一节，即托沈体兰兄斟酌开单，迳由叔通先生转致，当荷察及。附此布复。敬颂康健。

后学黄炎培谨复 三十六、九、二十

1947年6月初，因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张元济邀唐文治等70岁以上的社会知名人士，联名致信上海市长吴国桢、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表示强烈反对。是年暑假，国民党政府又大批解雇思想进步的教职员，更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不满。为解决被解雇教授的生活、工作，黄炎培、陈叔通曾于9月2日访张元济，共商安置办法。

## 二十八 1947年11月21日

菊生老先生赐鉴：大驾两度亲临，感歉交至。本拟即趋尊斋，牵于诸役，下周当奉谒领教。此次在京商洽结束，尚算干净，容更详陈。承念尤感。敬颂健康。

后学黄炎培手肃 三十六、十一、二十一

信中所称“在京商洽结束”事，指黄炎培因国民党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而代表民盟到南京与有关当局谈判。当时内战烽火四起，民盟积极参与社会各界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

<sup>①</sup> 见《张元济诗文》第89页。张元济生前填词极少，此为收入《诗文》仅有的一首词。

其间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内战阴谋，多有揭露、抨击，因此引起当局的不满。是年10月，国民党新闻局长曾公开讲民盟“偏袒中共”，未几，又以军警包围民盟在南京的办事处，上海的工商分校等处亦有警官来查视，以此威胁民盟成员。黄炎培乃于10月27日晚赴南京，代表民盟与当局交涉，意欲如政府不下令解散民盟，则声明维持现状，通告盟员停止政治活动。但国民党内政部于10月30日公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即分访张群、邵力子、吴铁城、孙科、陈立夫、司徒雷登等人，并与张群谈判，但谈判并不顺利。11月4日晚，黄炎培返沪，次日与民盟领导人会商后，发表公报，公报中说：“中国民主同盟向以民主和平团结统一为一贯之主张，不幸战火愈演愈烈，同人处此，惟有痛心，更无为国服务之余地。最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禁止活动，同人已不能活动……本盟总部同仁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黄炎培后又作《我与民盟》一文，略述民盟历年的活动情况，最后说：“请大家公正检讨民盟从创始到结束，前前后后所有文件，曾有一字一句足以构成危害国家颠覆政府的罪行否？”<sup>①</sup>

张元济对民盟的境遇十分关心，曾先后两次到黄炎培处询问情况，但都未见到他。黄炎培因此写信说明原因。

### 二十九 1948年3月16日

菊生先生尊鉴：赐示近作，读之感动。人心并未全死，诉之公众，往往发见真是非。过去社会之不公不平，实足使人发指，无怪乎攘臂而起者大有人也。炎自东归，友人为印行拙著《苞桑集》一册，敬以求正。迫于环境，多为危苦之言，盖亦无如何也。字迹太小，恐伤尊目，主臣主臣。敬候道履。

附一册

后学炎培上 三十七、三、十六

<sup>①</sup> 参见《黄炎培年谱》第208—211页。

张元济的“近作”，篇名、内容不详。

黄炎培的诗集《苞桑集》，印过两次，一次是1940年，在四川由秦光银付印，一次是1946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信中所说的诗集，当为第二次印的。此次出版，叶圣陶、傅彬然两人出力甚多。集中收入1903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前所作的七百六十七首诗，分为三卷，合为一册。

### 三十 1948年10月4日

菊生先生尊鉴：手示奉悉。细读尊论，感不绝心。清末支政经过，惟先生能详言之。此倘佛家所谓共业乎？三五年来之事变，吾人皆目睹之，炎培尤身亲之（共党已自愿解除兵柄，见三十五、二、二十五张、周、马三人签订之协约）。求双方放下屠刀，而不许闯成今日弥天惨祸，果谁为【为】之乎？长春之惨（见《大公报》），凡有人心，能无狂痛？吾人今日尚有发言之余地乎？先生正论，大众称快，惜朝凤只此一声耳。肃颂秋安。

后学黄炎培敬复 三十七、十、四

菊老再鉴：尊文《刍蕘之言》，同人传观，极为心折，如付《展望》周刊发表，不知得邀特允否？便中乞赐示。

炎培再启 三十七、十、四

信中提到的“尊论”、“《刍蕘之言》”，即为张元济于1948年9月23日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致词中回顾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的历史，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和白色恐怖，呼吁：“要保全我们的国家，要和平”；“要复兴我们的民族，要和平”；“为国家为民族要研究种种学术，更要和平”。<sup>①</sup>当时，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亦在场，闻之大为震惊。发言内容传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

黄炎培数年来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周旋于国共两党之间，

<sup>①</sup> 见《张元济诗文》第228页。

但如今内战终于爆发，而且愈演愈烈，给人民大众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为此，他痛心疾首。当看到张元济的这篇致词后，他既为之“称快”，又不无遗憾地叹道“惜朝凤只此一声”，因此在信中向张元济陈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年10月9日，《刍蕘之言》全文刊载于《展望》周刊第二卷第21期。<sup>①</sup>

### 三十一 1953年6月3日<sup>②</sup>

菊生先生：

志莘兄见告尊体健康近况，顷得五月二十七日手书附大著，想见精神充沛，大慰！大慰！

去年十月炎培忽患脑神经初步痉挛病，在会场发言时，突然失却记忆力，几乎无话可说。入院就诊一个月，赴杭易地休养两月余，回京半工作，半休息又两月，现算完全平复。承关怀，谨谢！

自杭回沪转京，满想趋访起居，不意离杭前集合友好，稍一周旋，病态复现，匆匆过沪即行，不克领教。

尊著《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十八绝句》，是极有价值的诗史，舍此殆无从觅得这些翔实之资料。第十二绝“莫须有狱”，适行篋带有《梁燕孙年谱》，检出细阅，是否项城故弄狡狴？“此中奥窔，概可想见”<sup>③</sup>，尊意付之存疑，颇有同感。

勤政殿今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固定的会所。陶然亭、贤良寺，景物非昔。颐和园为劳工劳农自由游览之地，一九四九年初度为劫后游，曾写两绝，附陈教正。

昆明湖游两绝句 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

长廊行尽晚山明，十七洞桥水底横。穿过田田人不见，

① 此信原为断句并分段，现改为新式标点。

② 此文编入《张元济诗文》时题为《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

③ 此处引号为原信所有，张元济诗中作“此中奥窔概可窥见”，见《张元济诗文》第60页。



红云涌出白波平。

黄鹂百啭燕双飞，雕栏今迎箬笠过。四十华年曾一瞬，白头官髻扭秧歌。（其时上距慈禧母子之亡，仅四十一年耳。此联殆可作为爱新觉罗朝的总结束。）

寓杭时曾写《人民西湖诗十五首》，养病中聊以自遣，并乞赐教！手复，顺致爱敬！进颂健复！

黄炎培 一九五三、六、三

附《人民西湖诗》。

当时，黄炎培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国家手工业指导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公务繁忙。1952年10月初，突然发病，遂入院诊治，以后几经休养，仍未痊愈。就在他写给张元济这封信之后不到一个月，又因健康欠佳而请假休养。

张元济是当时参加戊戌变法而硕果仅存的一人。他的《追述戊戌政变杂咏十八绝句》，作于1952年12月，以诗、记结合的形式，回忆了亲身经历过的戊戌变法的史实，诗序谓：“余羁栖沪渎，卧病有年，友朋眷念，存问不绝。谈次每以戊戌政变时事相询，睽隔多年，大半遗忘，病榻无聊，偶忆及当时闻见，或身所亲历者，随得随记，成杂咏若干，不能依次叙述敢云诗史，聊答客问而已。”<sup>①</sup>其中第十二首“莫须有狱”，对袁世凯在变法中的行为表示怀疑。

黄炎培信中抄附的《昆明湖游两绝句》，未见收入《诗集》，或为编集时删去。但《诗集》中“《苞桑集》以后诗选”部分，收有作于1952年7月5日的《颐和园今辟为人民公园了三绝句》，其中第三首与“两绝句”之二的有些诗句相同，兹转录于下，以为对照：

画梁零落燕泥多，雕栏今迎箬笠过。一代龙髯何处去，白头官髻扭秧歌。

<sup>①</sup> 《张元济诗文》第56页。

所附《人民西湖诗十五首》为油印件，因篇幅较长，故不录。这组诗收入《诗集》的“《苞桑集》以后诗选”部分时，题为《人民西湖十四首》。除诗序及记事的文字略有改动外，又删去了原作中的第12首《岳庙的门匾》。此诗因涉及黄炎培对杜月笙的评价，似有参考价值，现据油印件转录于下：

岳庙门匾，杜月笙、张啸林等题名，解放后削去了。极是，西冷桥下杜等建有武松墓，太可笑，亦宜毁去。杜在上海参加抗日作战，始终尽力，此点却值得记录。

彼侬题名削已迟，同心敌忾未应非。我从国族中兴后，泪挥设设怒雨词。

黄炎培与杜月笙的交往，始自抗日战争时期，后来黄炎培等民主党派人士在进行反独裁、反内战、争取全国解放的政治活动中，屡遭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其间，曾得到杜月笙的帮助。

### 三十二 1954年3月22日

菊生先生赐鉴：自沪回京，见恩来总理，谈及您老健谈情况，并谈及五大国会议前途，深表兴奋，恩来同志至为感佩！初归碌碌，未及函陈，乃荷先赐手书，足见过人矍铄。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略写感想，即成小本，一星期定当邮呈乞教，自谓不应畏羞藏拙，先生当有以诲之。树年兄见访失迎，尤引为歉。率复，敬祝康胜。

后学黄炎培 一九五四、三、二十二

是年2月4日，黄炎培与孙晓村、王民仲等从北京到上海向工商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及公债、爱国守法等问题，后因病住院十余日。3月3日，访张元济于病榻。3月5日晚，黄炎培经南京返北京。

全国解放以后，张元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切关心社会主义建设，更对世界和平事业寄予厚望。当时，日内瓦会

议召开在即，周恩来总理将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讨论关于印度支那恢复和平等问题，张元济对此十分关注，曾与黄炎培盛谈对会议前途的看法，所以黄炎培回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上海之行时，谈到这一情况。

黄炎培曾于1953年7、8月间因病在北戴河休养时，读《资本论》第一卷、《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等马列著作，并写有《资本论》读法及提要等笔记。1954年1月间，写成《谈谈〈资本论〉第一卷读后的感想》一文。文成，请千家驹审正后，油印成册。寄给张元济的“感想”“小本”，即为此文。

### \*三十三 1954年4月13日<sup>①</sup>

菊生先生：

赐复，至佩！再将《〈资本论〉第一卷摘要》一册另邮呈教（摘要幸勿细阅，以免劳神。）。

冒昧地想向吾老叙述一段故事：一九〇一年，我应南洋公学特班招考，笔试外继以口试，主口试者实是先生。承发一问：你信宗教么？那种宗教？我答：没有信那种教。榜发，我被列第四名。若依老的一套，应拜称吾老为受知师。还记得那天授卷者（随唱名随授）福开森，很庄严地戴着洋式礼帽，上缀一蓝顶珠。此故事到今五十三年了，那年就是《资本论》被介绍入中国的前一年。

手致，

庄敬！

后学黄炎培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

（张元济手批：“十七日夕收到”，“四月三十复”。）

《〈资本论〉第一卷摘要》，或即黄炎培读此书时所写的提要。

<sup>①</sup> 此信原件用新式标点，并分段，转录时略有调整。

黄炎培投考南洋公学特班，是在1901年。他在《八十年来·南洋公学就学》一节中写道：“中国到十九世纪末期，河山破碎了，人民受尽刀兵饥饿的威胁。一个受旧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象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可见，这段经历对黄炎培的一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张元济为南洋公学监院之一（另一为福开森），在特班招考时主持口试，但黄炎培虽然参加了口试，却不知主持口试者即是张元济。从信中用“冒昧地想向吾老叙述一段故事”这样的语气来看，黄炎培大约是在此前不久才知道张元济是他的“受知师”的。尽管如此，他们已“亲密相处了几十年”，这种关系，既体现于日常交往中，也反映在政治思想里。

##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名录

**编者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创立于1885年（明治十一年），最初采法国式，到了1892年（明治十八年），延聘德国麦克尔少校为军事顾问，改采德国军事体制。查我国选派留日陆军士官学生，系自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开始第一期，其后陆续选派，在士官学校内设中华队，迄止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前后共达三十六期，共历二十九届。总人数1,435人。兹承丁中江先生提供张柏庭先生保藏的士官学校同学录，按原件式样，特予刊布于后。

### 第 一 期

入 学——于民前十二年（光绪二十六年，明治三十三年）六月

毕 业——于民前十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

人 数——四〇人

科 别——步科22人、骑科4人、炮科9人、工科5人

陈其采	吴锡永	张显仁	吴茂节	易甲鹁	吴元泽	刘璇云
铁 良	杜淮川	张朝基	萧星恒	舒厚德	韦汝骢	张鸿达
蒋雁行	李泽均	陶澄孝	高曾会	吴绍璘	吴祖荫	李士锐
段兰芳	王廷楨	吴禄贞	华振基	杜钟岷	卢静远	唐在礼
陆 锦	张绍曾	单启鹏	刘邦骥	文 华	万廷献	章适骏
贾宾卿	邓承拔	顾 藏	徐方谦			

## 第 二 期

入 学——于民前十一年（光绪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  
六月

毕 业——毕业于民前十年（光绪二十八年，明治三十五年）  
十一月

人 数——二十五人

科 别——步科16人、骑科2人、炮科4人、工科3人

舒清阿	哈汉章	良弼	应龙翔	冯耿光	萧先胜	宝瑛
吴祐贞	敖正邦	蒋政源	余明铨	杨正坤	华承德	张长胜
张哲培	段金龙	萧开桂	蒋肇鉴	龚光明	王遇甲	沈尚廉
许崇仪	王麒	蓝天蔚				

## 第 三 期

入 学——民前九年（光绪二十九年，明治三十六年）六月

毕 业——于民前八年（光绪三十年，明治三十七年）十一月

人 数——九十五人

科 别——步科51人、骑科12人、炮科12人、工科16人、编  
重科4人

蒋方震	周道刚	许崇智	丁鸿飞	罗泽纬	曲同丰	胡景伊
张义新	岳开先	上官建勛	朱廷灿	王体瑞	卢金山	贾德耀
刘 询	刘鸿达	潘矩楹	康宗仁	王玉琳	何国华	孙树林
祝 谦	游 捷	孙宗先	刘之洁	官邦铎	赵学方	陈 蔚
张松柏	张怀斌	游寿宸	周文炳	程堃章	马廉溥	李成霖
童焕文	管云臣	崔 霏	陈正仁	韩国饶	段景勋	田书年
蒋延梓	金玉清	高有成	马凤廷	周良才	李 馨	朱文藻
陈文煜	刘景烈	高尔登	蒋尊簋	蔡 铎	陈文运	王培灯
齐 灏	程侍墀	范尚品	黄 瓚	张仲元	杨寿柱	于玉龙

章亮元	徐孝刚	柯 森	周家树	吴 晋	祁文豹	吴金声
吴光新	张树元	王汝勤	傅良佐	陈懋修	张孝準	刘荃业
金 麒	姚鸿法	徐朝宗	洪 杰	柯佐清	林调元	李振身
孙 铭	周家诚	虞克震	程干青	王光照	高景纬	齐国璜
毛继成	杨祖德	汪庆辰	方咸五			

## 第 四 期

入 学——于民前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六月

毕 业——于民国前四年(光绪三十四,明治四十一年)

十一月

人 数——八十三人

科 别——步科37人、骑科14人、炮科20人、工科9人、辎重3人

張承礼	周承燧	蔣作宾	傅一钢	钱家沅	石星川	魏 兰
李宜倜	吴祉贞	刘一清	程守箴	覃师范	杜锡钧	金永炎
徐 卓	吴经明	吴钟谿	窦洪腾	裕 冕	祺 昌	沈尚朴
吴 杰	张学龄	高佐国	张斯鹿	王家驹	何 澄	赴康时
饒景华	何佩琰	余钦翼	田应诏	张明远	李云龙	陶德瑶
刘立鳌	寿昌田	刘嗣荣	沈 纲	玉 琪	刘国祥	庆 芳
汪 莹	黎本唐	蒋四有	萧思鹤	卢牟荣	王 煦	山有升
江树璧	方声涛	李祖植	翁之穀	庄 翼	周 斌	朱兆熊
噶勒炳阿	姜明经	向瑞琮	史久光	沈郁文	熊祥生	刘维焄
曾继梧	刘燮元	邵 保	梁训勤	马祖全	童序鹏	李 造
陈据章	翁之麟	王永泉	李祖宏	张策平	陈从义	刘绳武
双 祥	那玛善	王若俨	王占海	萧鸿升	汪 标	

## 第 五 期

入 学——于民前五年(光绪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一月

毕业——于民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

人数——五十八人

科别——步科23人、骑科8人、炮科11人、工科12人、辐重科4人

王孝缜	沈同午	王凤清	黄恺元	石 铎	丁人俊	何成潜
胡百炼	黄本璞	陈 乾	李致梁	林肇民	李 浚	钟体乾
夏占奎	雷寿荣	蒋国径	陈之骥	谢武炜	舒和钧	蔡绍忠
刘保原	王文卿	袁华选	汪镐基	范熙绩	邹致权	锡 垠
张翼鹏	吴元钧	刘棣茂	谭学夔	简业敬	陈 仪	杨齐凤
全在兹	涂 永	石陶钧	叶秉甲	李实茂	春 群	沈汪度
王凯成	吴和宣	段承猷	姜登选	张炳标	杨源潜	丁 衡
庄光忠	黄结祺	危道丰	李 仁	袁宗翰	齐 琳	陈其善
高兆奎	徐定清					

## 第 六 期

入学——于民前五年(光绪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六月

毕业——于民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

人数——百九十九人

科别——步科111人、骑科23人、炮科40人、工科17人、重科8人

冯 衡	谭 瀛	孙国英	杨邦藩	厉尔康	王肇基	杨廷溥
世 铭	胡 谦	秉 钺	窝什图	尹扶一	覃鏊钦	李孔嘉
穆恩堂	谢 昭	龚维疆	朱启舜	孙传芳	沈觐恩	胡 棠
长青	黄金桂	赵士槐	张华辅	张济元	赴复祥	李根源
林 爽	张荣光	梁广谦	丁慕韩	尹昌衡	胡慕泰	志 元
刘存厚	彭道成	荣 宣	卢启泰	刘宗纪	马名骥	连城
胡学伸	宫其彬	黄国梁	刘汝赞	罗佩金	景 斌	刘祖武



车贺龙	孙 槩	吴藻华	刘 成	周 骏	杨文恺	陈 强
孔昭度	邱志龙	欧阳武	炳 炎	郑长垣	荣 焜	刘国栋
李万祥	王兆翔	李德湖	蓝任大	余英华	印 荣	卢 焕
李伯庠	戈宝琛	莫擎宇	乔 煦	孙绍基	魏国钧	张 瑜
沈 靖	崇 恭	阎锡山	王 振	黄德尊	孔 庚	李鸿祥
恩 锡	叶 荃	绍 祺	蒋荫曾	杨曾蔚	李 敏	高声振
叶佩薰	李隆中	郑开文	吴剑学	仇式匡	梅焯敏	王鉴珍
朱树藩	叶成林	左全忠	潘志岐	姚以价	程子楷	马开儒
王 璇	梅 馨	纪堪颐	陈 晋	吕祖绶	李 铎	马文骥
李乾璜	绥 生	张翔鸢	林仲翔	李显谟	王树榕	马开崧
张学蔭	许烈坛	陈 模	耿 文	傅 鑫	卢香亭	张凤翊
金凤巢	熊一弼	黄毓成	刘屏周	顾品珍	张维清	刘法坤
张国威	朱绶光	文 贵	萧奇斌	陈时彦	韩麟春	丁绪馀
马 林	秦 觉	温寿泉	谢汝翼	陈元泳	庾恩赐	彭 琦
史秉直	刘虎臣	周荫人	周家幹	杨尚志	唐继尧	金荣藩
童赐梁	李焕章	孙芳瑜	葛光廷	孙永安	道永安	钟鼎基
田遇东	周宗祥	李烈钧	程 潜	苏渔图	得 全	武滋荣
顾祥麟	张 耀	王宝善	张厚德	冯家俊	黄慕松	韩凤楼
杨志澄	陈其蔚	梁心田	林文瑛	禧 光	徐家瑤	余鹤松
罗 焜	吴乐三	成炳荣	欧阳沂	陈宏芾	王廷治	刘洪基
华世中	萧祖康	刘乃勋	汪 隽	吴友松	焦纯礼	杨集祥
谢家琛	吴炳元					

## 第 七 期

入 学——于民前四年(光绪三十四年,明治四十一年)四月

毕 业——于民前二年(宣统二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

人 数——五十五人

科 别——步科28人、骑科10人、炮科12人、工科5人

王 深	周应时	唐义彬	吴思豫	孙象宸	隆 寿	周燊儒
陈 经	孙葆容	寿 明	包述洗	关松秀	勤 伦	张鼎勋
陆光熙	姚受唐	何浩然	巨纯如	鸿 宾	徐树铮	吴观乐
张寿熙	唐之道	陆绍武	培 模	春 荣	徐 涛	朱 熙
曾承业	陈复初	李长润	金 寿	杨尽诚	张文林	尹同愈
余范传	宋邦翰	杨 翼	方日中	邓翊华	张文通	张益谦
鹏 兴	颜景宗	余维谦	张汉堂	程晋煌	宋子扬	吴景震
彭廷仪	张 宜	文 祺	江 煌	接 宗	程恒式	

## 第 八 期

入 学——于民前三年(宣统元年,明治四十二年)六月

毕 业——于民前一年(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五月

人 数——五十五人

科 别——步科28人、骑科10人、砲科12人、工科5人

戴翼翹	姜梅龄	张辉瓚	张焕相	于 珍	谢刚德	孙学渊
路孝忱	王之藩	李盛唐	张子贞	张鉴衡	应振复	干国翰
王琦昌	王兴文	彭士彬	丁澄复	王静修	泽 溥	陈嘉祐
德 山	施承凯	郑遐济	孔繁灵	李刚培	金鼎彝	延 年
刘德权	孙德馨	潘守蒸	雷崇修	熙 洽	邢士廉	田宗溟
刘浚桥	糜 都	何廷榆	张修敬	方鼎英	景 云	周炯伯
王凤鸣	张原琬	杨玉亭	宗式翥	吉 兴	尹凤鸣	陈荆玉
邹序彬	王静寿	夏尊武	赵钟奇	金 麟	赵恒惕	

## 第 九 期

入 学——于民前二年(宣统二年,明治四十三年)六月

毕 业——于民前一年(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十一月

人 数——三十七人

科 别——步科29人、骑科6人、砲科1人、工科1人

杨裕三	长 陞	吴安伯	宋鹤庚	增 荣	杨曲钦	伍毓瑞
戴作楫	李源崑	刘召荣	维 新	张惟圣	潘祖培	张 庄
彭寿恒	吕烈培	王镜彻	增 福	张子固	张宗福	郭庆藩
曾 超	田辅基	田执中	王廷藻	荫 奎	段志超	文 鉅
刘恩波	英 启	燕书春	王金钰	臧式毅	刘文明	奎 山
齐宝贤	白宝瑛					

## 第 十 期

入 学——于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六月

毕 业——于民国四年(大正四年)五月

人 数——三十六人

科 别——步兵科13人、骑科18人、砲科2人、工科3人

蒋中正	阎颖凯	黄秉衡	马登瀛	杨 杰	马晓军	杨允华
杜炳章	傅振义	李应生	刘克厚	钟 义	宣传谟	李培尧
梁志修	燕 骥	武 铭	韩树勋	石 杰	林振雄	杨文田
陈 韬	徐 播	关克勤	夏绍虞	王 烈	赵以宽	王柏龄
张 群	黄富柱	张为珊	戴师韩	唐祺锐	徐 鄂	唐芬若
周元哲						

## 第十一期

入 学——于民国三年(大正三年)六月

毕 业——于民国五年(大正五年)五月

人 数——十九人

科 别——步兵科6人、骑科3人、砲科8人、輜重科2人

许宝琮	何应钦	廖 益	王绳祖	张乃藏	陈鸿庆	方诚钺
詹振黄	胡佐清	朱绍良	徐国亨	张春浦	缪庆润	谷正伦
辜仁发	杨澄源	李毓华	贺耀组	萧其昌		

## 第十二期

入 学——于民国六年(大正六年)六月

毕 业——民国八年(大正八年)五月

人 数——二十人

科 别——步科 8 人、骑科 4 人、砲科 4 人、工科 2 人、辎重 2 人

赵 巽	杨正治	戴联奎	张述蕃	张贯一	许敬显	栾云奎
齐知政	何柱国	梁 济	马锡麟	高子振	钱大钧	史久仁
杨 诚	邹作华	郭尔珍	帅崇兴	毛福成	徐景唐	

## 第十三期

入 学——于民国九年(大正九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一年(大正十一年)七月

人 数——十八人

科 别——步科五人、骑科 2 人、砲科 7 人、工科 2 人、辎重科 2 人

胡文斗	张 卓	刘震清	李明灏	云成锦	张寿汾	赵 宣
王和华	姚北辰	徐廷瑗	张 彬	段茂淇	梁鉴堂	李德言
曹曜章	杨耀东	王嘉楠				

## 第十四期

入 学——于民国十年(大正十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二年(大正十二年)七月

人 数——十九人

科 别——步科 4 人、骑科 3 人、砲科 7 人、工科 3 人、辎重科 2 人

吴锡淇	孙树华	刘钟淇	张 轸	章鸿春	梁鸿藻	曾秉森
-----	-----	-----	-----	-----	-----	-----

唐 星 齐 愨 张季英 任青云 卢 洸 陈炳坤 景录珊  
郭宗汾 廖士翘 王 俊 李国良 林 忻

### 第十五期

入 学——于民国十一年(大正十一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三年(大正十三年)七月

人 数——二十二入

科 别——步科 7 人、骑科 3 人、砲科 7 人、工科 5 人

汲绍清 董学周 陈之毅 华世铎 杨 桢 马绍基 毛景周  
洪 澍 黄毓能 石淮嶽 李汝炯 余华沐 陈隐冀 万保邦  
叶仁基 沈毅武 区乃洲 马崇六 李增润 李卓元 尹隆举  
陈 哲

### 第十六期

入 学——于民国十二年(大正十二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四年(大正十四年)七月

人 数——二人

科 别——步科 2 人

唐绍武 唐绍骧

### 第十七期

入 学——于民国十三年(大正十三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五年

人 数——四人

科 别——步科 2 人、砲科 1 人、工科 1 人

赵懿岳 陈岚峰 刘凌泽 周永业

## 第十八期

入 学——于民国十四年(大正十四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六年(昭和二年)七月

人 数——二十四人

科 别——步科21人、骑科2人、工科1人

张宏义	方步文	秦文瀚	王惟明	王毓文	陈锡离	甘海澜
黄国伟	雷宜文	李国深	朱式勤	汤恩伯	鲁若山	韩绍钧
赵石羽	向明岐	孙必仁	薛元震	苏正铨	淳于颺诗	罗立山
罗振钺	宪 原	潘宝泰				

## 第十九期

入 学——于民国十五年(大正十五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七年(昭和三年)七月

人 数——七十九人

科 别——步科36人、骑科7人、砲科23人、工科11人、輜  
科2人

高胜峇	侯 匡	杨志渠	刘毅超	熊克禧	姚凤谦	潘封梗
贾振中	马安济	李书箴	曹利生	俞多英	陈西仲	熊积中
刘毓祺	吴三絨	甄兆芝	李芳荣	黎广诗	梁有庆	王成桂
马德尊	冯 岳	王天锐	胡行仁	高攀桂	向 的	熊 渭
储造时	傅乐群	张文心	童维纲	曹戛初	李师莲	李书盛
刘永庆	陈锡章	毕云章	宪 原	何文赞	杨兆民	彭秉离
梁俊俦	吕梦龄	陈博文	陈家珍	刘倚衡	韩绍宏	黄公华
刘德烽	曾广芬	余叔文	齐常陞	黄国书	陈国湘	李继山
杨秉离	陈启宇	马汝良	黄斌棠	熊 滨	顾树人	魏敷廉
张岚峰	李学舜	李季烈	荣子恒	秦诚至	赵凤鸣	黄新富
申麟洲	吴以容	傅克军	张思育	蒋桂楷	黄培善	王乃楷

蔡宗濂 刘嘉幹

## 第二十期

入 学——于民国十六年(昭和二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八年(昭和四年)七月

人 数——百五十五人

科 别——步科79人、骑科17人、砲科43人、工科16人

于宗谦	王铁梁	王培根	王铸印	方 范	白荣武	李宝璉
李孝诚	李元凯	朱杏芬	朱启平	朱 宏	吴邦昌	吴献瑞
吴立才	吴宏文	何镜华	余承尧	周万明	周 凯	金宪开
林春荣	孙为雨	孙学洁	孙绍曾	马恺和	马益祥	马益德
施中权	施中杰	高 逊	张祖培	张汝弼	张 杰	黄 毅
黄 瀛	舒玉璋	万祖章	董平舆	云春林	童春暄	杨国栋
杨钟秀	杨 俊	蒲贵麟	贾湘霖	纂书田	赵砚农	赵云飞
赵振功	刘锦青	刘牧禅	龙 飞	魏振铎	韩振华	聂仲文
萧端久	鄧裕杞	度学瀚	顾鸿颺	朱乃瑞	高长柱	青 简
李广荣	苏凯元	邱季良	李寿康	李树万	刘国钧	范 洪
余 材	田锦沛	符丕烈	丁 叶	吴 幹	余慈悠	齐 肃
朱显祥	周振华	于同遇	李荣熙	李铁如	伍英长	余文波
郭若霖	郭纯中	高冠三	连 组	陈荣枢	翁照垣	杨述先
熊 健	刘茂修	韩任民	李佩珩	刘文友	王景和	王德懋
王士俊	王秉仁	王梦龄	田景混	石廷宣	包钟敏	任政枢
邪 淳	吴传薪	金 镇	马维仲	马益泰	屈 端	宫毓铭
宣 坛	徐之佳	黄玉山	孙家铎	张 恒	高文卓	逢焕然
徐思平	杨仲华	畅万青	赵晋三	刘有道	金宪方	魏传庸
苏绍文	罗广文	吴佩明	冯国勋	唐 一	董致和	果常积
马存茂	邓传鼎	施质甫	李登明	金 诺	陈国英	王方烈
王凤鸣	王和璞	石楨安	李之仁	李祖望	吴怀纶	郁仁治

马维岳 唐 明 陈道衡 张远南 张昌道 马公武 何 鍾  
曹瑞麟

## 第二十一期

入 学——民国十七年(昭和三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十九年(昭和五年)七月

人 数——九十五人

科 别——步科33人、骑科8人、砲科46人、工科8人

王天任	王保纯	王家善	王丕承	曲世和	任得璽	向 隍
李毅生	吴兆钺	吴履逊	余公武	林炳坤	林 立	宣巨平
胡朝洁	高 炯	徐石铮	黄子序	陈畅威	黄冠南	麦务之
孙桂森	曾 凯	曾国光	解 方	鄔起丰	雷秀民	刘显良
刘国柱	刘彦成	谢保明	罗榕荪	于清淮	王家珩	李宝森
周国屏	柳培渐	曹 朴	汤雄勋	宪 基	苏玉麟	王显庆
王昌烈	朱文伯	余诚敏	李茂春	李洁之	李立柏	李克煌
沈立人	胡家位	洪士奇	容正平	唐雨夔	徐 恕	夏嘉富
陈冢择	常荫东	许崇耆	章 严	崔 坚	孙铭久	孙元良
雷 杰	宋人杰	张理佛	张 翼	杨贻芳	张学孟	满丰昌
雷 泽	廖汝承	赵芳城	刘士玲	刘祉叠	戴传薪	龙 韬
聂贵三	韩文彬	龚积之	张建白	孔福卿	黄永诚	叶 维
娄绍铠	李连海	欧溥时	王 毅	黄克虎	黄必勇	许开章
张祖鉴	杨鉴黎	蒋太衡	刘瑀璜			

## 第二十二期

入 学——于民国十八年(昭和四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年(昭和六年)七月

人 数——百十六人

科 别——步科68人、骑科4人、砲科32人、工科12人



千钦中	王璧中	木向东	田秀翹	古松年	任作民	伍启禎
任季辉	向明岐	吴渠轩	余天锡	余重华	余一鸣	沈梓卿
李 章	李燮坤	李林章	周 馄	范 湖	邵中复	段 武
姜锡之	姜东超	唐惠洽	凌铁铮	高家为	曾启亚	冯学宪
曹士澂	麦霞冲	张业辉	张荣瀚	张宗载	张立群	张国恒
陈统能	陈荫鸿	陈永立	陈君文	黄瑞龙	黄 健	郭允伊
彭仲陶	雷节甫	杨植之	甄毅力	邹显亨	赵书堂	贾庆章
蒋国柄	熊纪武	潘觉民	潘清洲	刘中兴	萧 敬	谭 讷
谭茹辛	罗扬谟	罗克和	顾平东	栾剑秋	石砚田	李镇亚
林 湛	周思靖	唐天德	盛世骐	郭文林	刘建义	蒋志奇
韩凤麟	韩树清	王御之	申有楷	吕登甲	李寅春	林 馥
林 凯	范学义	黄正成	黄得模	张勋亭	乔 迁	彭令颐
熊执中	刘定藩	郑冰如	卢 挺	钟之天	邝友五	韩定远
何翔迴	林 华	赵学渊	刘絜教	白茂权	林日藩	胡屏章
章泽群	郭肇祥	冯洪国	蒋公权	顾葆仁	裘震宇	梁可发
马汝骧	孙 乾	孙国桢	袁敬驹	陈利仁	张国纯	黄杰士
傅博仁	钮先铭	魏振钺	谭 伟			

## 第二十三期

入 学——于民国十九年(昭和五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七月

人 数——八十七人

科 别——步科47人、骑科9人、砲科31人

卜一鹏	王化兴	方家治	白鉅垣	朱道南	李汝舟	何长五
宋文权	宋铁汉	林 健	梅治威	林健夫	周晋汎	周荣辉
苟吉堂	胡 捷	姜鸿阶	秦文斗	马志良	徐复观	翁干城
梅治威(?)	陈文明	陈 倬	陈蔚荪	陈骏南	张柏亭	张观群
陆 振	傅 璞	区庆华	杨 诚	杨嘉琦	董殿祥	熊 桓

熊 炯	郑克非	邓圣象	刘开谱	刘寿康	刘丽生	欧阳禧
钟石磐	谢崇阶	关思唐	谭子云	萧荫民	文震一	李 志
宋增桓	吕 节	陈济南	梅 隼	袁仰山	崔 瑛	张法乾
王德容	尤凤藻	伍毓权	李 英	李振汉	何清元	邢定陶
周怀勛	周之再	施中达	胡景宏	马定波	袁定星	孙继策
孙景华	陈天侨	陈灼文	张 健	张 骧	张开曜	郭琦之
冯国藩	陶鸿钊	万蔚蕃	刘立藻	刘超伦	郑洸薰	潘竞武
龔士惠	卢积琛	魏国志				

## 第二十四期

入 学——于民国二十年(昭和六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七月

人 数——七十三人

科 别——步科36人、骑科8人、砲科16人、工科13人

李新荣	蓝华九	骆湘浦	程 璞	傅秉勋	包海明	齐鸿迈
于厚之	孙伯良	杨仲璜	冯希勃	焦其鹤	白 晔	穆寿祥
刘达光	林继伟	彭道根	陶 锺	刘至诚	胡景通	胡宗瑗
曾半亭	黑占衡	林明卿	张中汉	张文山	李 拓	马瑞祺
马旭初	黎齐俊	吴树森	刘荣深	卢惠修	林同门	郭汝槐
李 芸	陈梓新	陈子猷	承季厚	万耕尧	卢荣彰	张骈波
载家荣	赖光大	张 亨	叶开伍	刘 昉	李家本	杨 隼
骆志坚	于连文	李 昊	聂光尧	李汝康	吴鹤予	梁作荣
刘奕贤	刘维周	邓 错	宋耀华	白维义	陈一元	冯若谷
孙宝刚	张华民	余维适	汤漳郎	刘涛业	杨 元	张龙文
常 坤	海载澂	许斌元				

## 第二十五期

入 学——于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六月

人 数——二十四人

科 别——步科16人、砲科8人

万嘉熙	王庆萱	李复汉	张运超	张在超	林光华	何世统
陈少波	张国魂	张永高	傅伟民	谭宗宇	谢 溶	魏家涛
夏德崇	黄笃初	宪 东	吴仲湘	陈 英	陈宗晋	陈炎生
邓开宠	赵德树	潘仲素				

## 第二十六期

入 学——于民国二十二年(昭和八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六月

人 数——十八人

科 别——步科8人、砲科10人

冯萌东	蒋硕英	余 毅	马毅志	王 弼	冯 夔	王家让
张尚淦	李炎汉	杨阳旭	刘立藩	林秀栾	赖邵轩	张锦灿
梁劲民	张寰清	谭葆维	王启元			

## 第二十七期

入 学——民国二十三年(昭和九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六月

人 数——二十五人

科 别——步科14人、砲科11人

王 武	穆幼卿	殷心如	谢祖祺	任祖萱	严克庄	陶启文
余天民	赵玉璋	何健夫	黄连茹	易 德	廖季威	杜敬箴
缪鸿培	李鸿汉	吴必达	徐 白	徐 恒	赵隐锋	张湘泽
郑士玮	王竹渔	蒋中光				

## 第二十八期

入 学——于民国二十四年(昭和十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六月

人 数——二十八人

科 别——步科14人、炮科14人

蒋建文	刘子杰	刘方矩	吴国元	胡三馥	陈昭凯	张创艺
李 琦	陈文璠	龙佐良	杨庆杰	蓝仲津	沈 毅	鲍馨远
张济乐	倪晋培	汤国城	朱启宇	胡作健	沈 鸿	袁 行
于庆洋	祝镜蓉	赵寒星	吴镜明	赵一雪	胡 庸	刘渊武

## 第二十九期

入 学——于民国二十五年(昭和十一年)四月

毕 业——于民国二十七年(昭和十三年)六月

人 数——二十四人

科 别——步科13人、砲科11人

章沛霖	张铮石	张念尧	周声家	刘宏德	邓大纲	黄远平
云穀人	简英华	冷兆一	丁国培	张维相	房仲谋	王世镇
张 敬	陈玉堂	杨子麟	曾瑞璋	潘涤浩	黄荆璞	靳书科
邱真怀	王苦时	申凌霄				

## 近代来华新教差会综录(上)

黄 光 域

说明: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几与近代史发端同时。教会的活动,同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传教史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特殊侧面,日益受到重视。但相关基础资料,或零碎分散,或纷繁难辨,查检披览均甚不便。有鉴及此,黄光域历考中外文记载,取精用弘,撰为《综录》一稿,冀以稍减学者检索之劳。所收各会按在华开教先后顺序排列,间有年代不明者酌情插入。会名、人名不得已而自译者,皆冠以星号,以示区别。编撰者囿于识见,爬梳未遍,考订失察,疏漏讹舛,在所难免。敬祈方家不吝赐正。

### 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795年成立,本部伦敦。其会虽规定教士不分宗派,但因参与支持最力者为英澳公理宗教友,常被划归公理宗。1807年9月7日该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奉派由美航抵广州,被公认为新教来华布道之嚆矢。其后米怜(Rev.W.Milne)、麦都恩(Rev.W.H.Medhurst)、雒魏林(Dr.W.Lockhart)、合信(Dr.B.Hobson)、理雅各(James Legge)、美魏茶(Rev.W.C.Milne)及施约翰(J.Stronach)等纷至沓来。然教禁未开,举步维艰。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始得在香港、上海、厦门诸埠驻足。嗣经艾约瑟(Rev.J.Edkins)及杨格非(Rev.G.John)等锐意开拓,慕维廉(Rev.W.Muirhead)等惨淡经营,教务日益兴盛。至本世纪初,已形成粤港、福建、江浙、湖北、直隶五教区,一切均由全国顾问议会筹划。湘、川、滇、秦、晋、鲁、新、

青、藏、蒙古之地亦曾见其踪迹。1916年有香港、广州、博罗、厦门、漳州、惠安、汀州、上海、汉口、武昌、孝感、黄陂、皂市、北京、天津、萧张、沧州、通州等十数总堂，62支堂，西教士158人，华传道248人，受餐信徒11,403人，主日学校60所，小学校170所，中等学校10所，医院20所。1927年与长老宗各会合组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有教会堂350处，西教士146人，华传道172人，受餐信徒12,781人，主日学校124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香港英华男书院及英华女子中学，厦门私立英华中学，龙溪私立进德女子中学，上海私立麦伦中学及麦伦女子中学，汉口私立懿训女子中学及私立博学中学，天津私立新学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广州协和神科学院，厦门鼓浪屿闽南圣道专门学校，南京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武昌私立华中大学及华中协和神学院，汉口私立普仁高等职业助产学校及普仁护士学校，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及济南私立齐鲁大学等。所办医院则有香港雅丽氏合济医院，漳州协和医院，惠安仁世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天津马大夫纪念医院，沧县博施医院，枣强萧张萧张男女医院，武昌仁济医院，孝感仁济医院及皂市仁济医院；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汉口协和医院。全国顾问议会干事白士德（Rev. A. Baxter）及司库毕礼克（Adam Black）驻上海圆明园路办事处，粤港教区舒活（Rev. F. Short）驻香港九龙，福建教区干事唐嘉安（Miss A. T. Duncan）驻厦门鼓浪屿，华东教区干事福开生（Dr. D. Farquharson）驻上海山东路，华中教区干事鹿威理（Rev. S. W. Green）驻汉口韩家墩，华北教区陶芳兰（Rev. W. F. Dawn）驻天津英界海大道。

#### **荷兰布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 at Rotterdam)**

荷兰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不详，本部鹿特丹。1827年首派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东来，驻爪哇巴达维亚，得伦敦教会麦都思之助，肄习马来语及汉语。嗣转暹罗，从华侨习福建

方言。1831——1835年间七次巡回布道于中国沿海，散发圣经劝世文及药品，被誉为“中国之使徒”。荷兰布道会虽未能在华正式设堂，但对巴陵女布道会、巴色会、礼贤会及醒华会等来华布道的推动，实不容忽视。

### **公理会；美部会；纳纪慎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成立，本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属公理宗。1830年裨治文(Rev. E. C. Bridgman)奉派来华开教，获伦敦会马礼逊援手得以进入广州，开美国差会在华布道之先河。1832年创办《澳门月报》。翌年卫三畏(Rev. S. W. Williams)来助。1834年伯驾(Rev. Dr. Peter Parker)踵至，设眼科医局，奠华南教区之始基。1847年杨顺(Rev. S. Johnson)及弼来满(Rev. L. B. Peet)夫妇由暹罗转福建，驻南台中州尾，辟闽北教区。1860年柏亨利(Rev. H. Blodget)由沪调津设堂，渐次扩展为华北教区。惨淡经营80余年，至1917年，三教区共有广州、福州、长乐、永福、邵武、天津、北京、通州、保定、德州、临清、太谷、汾州等十数总堂，146支堂，西教士166人，华传道797人，受餐信徒13,266人，主日学校182所，小学校278所。1927年与长老宗各会合组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闽北、华北、邵武三教区有总堂16处，支堂281处，西教士130人，华传道504人，受餐信徒17,534人。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福州私立文山女子中学及私立格致中学，长乐私立培青初级中学，永泰同仁初级畜牧职业学校，天津私立究真初级中学，北京私立贝满女子中学及私立育英中学，通县私立潞河中学及私立富育女子初级中学，保定私立同仁中学，德县私立博卫中学，临清叶氏学道院，太谷私立铭贤学校，汾阳私立铭义中学及崇道神学院等；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广州私立协和女子师范学校(后改中学)，福州私立协和幼稚师范

学校及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北京私立燕京大学及协和妇女传道学校，山东私立齐鲁大学齐鲁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福州塔亭医院及圣教医院，长乐圣教医院，永泰亨通医院，邵武美部会医院，通县潞河男女医院，清苑仁济医院，定县教会医院，汾阳汾阳医院，太谷仁术男女医院，临清华美医院及德县卫氏博济医院。闽北教区司库康乐尔(Rev. R. W. McClure)驻福州，华北教区总干事柏乐五(Rev. E. H. Ballou)驻北京，邵武教区练善农(Mrs. G. A. Thelin)驻福州。

### 美国圣公会(American Church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Protestant Episcopal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20年成立，本部纽约市。属圣公宗。1835年骆武(Rev. H. Lockwood)及韩森(Rev. F. R. Hanson)奉派来华开教，抵广州而难以立足，不得已撤至爪哇巴达维亚。1837年文惠廉(Rev. W. J. Boone)抵巴达维亚，1840年转赴澳门。1842年携眷至厦门鼓浪屿设堂，势孤力单，举步维艰。1843年返美求援，翌年升主教。1845年文氏率师利(Rev. E. W. Syle)夫妇等8人至上海，以此为基地，逐渐推广到江苏全省，进而建立鄂湘皖赣教务，由上海主教遥领。1901年以教务日益发展，分立汉口主教区，殷德生(Rev. J. A. Ingle)首任主教，领鄂湘；1910年辟安庆主教区，以韩仁敦(Rev. D. T. Huntington)为主教，领皖赣。1912年与其它圣公宗教会合组中华圣公会。1917年三主教区有上海、常熟、无锡、苏州、青浦、扬州、南京、武昌、汉口、宜昌、沙市、长沙、芜湖、安庆、九江、南昌等十数总堂，47支堂，西教士204人，华传道805人，受餐信徒5,241人，主日学校146所，小学校166所。1934年有总堂16处，支堂128处，西教士148人，华传道258人，受餐信徒10,472，主日



学校172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上海私立圣约翰大学、私立圣约翰大学附属高级中学、私立圣约翰青年初级中学及私立圣马利亚女子中学，苏州私立桃坞中学，扬州圣公会美汉中学，武昌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私立文华中学及私立圣希理达女子中学，汉口私立圣罗以女子初级中学，安庆私立圣保罗中学及私立培德女子初级中学，芜湖私立广益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武昌私立华中大学及南京中央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上海同仁医院及广仁医院，武昌同仁医院，宜昌美华医院，安庆同仁医院及妇孺医院，无锡普仁医院等。司库华克（M.P.Walker）驻上海闵行路，上海主教区主教郭斐蔚（Rt.Rev.F.R.Graves）驻上海圣约翰大学，汉口主教区主教吴德施（Rt.Rev.L.H.Roots）驻汉口洞庭街，安庆主教区主教韩仁敦驻芜湖狮子山。

**美国浸礼会；大美国浸礼会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 1910年后：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14年成立，本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1836年叔末士（Rev.J.L.Shuck）奉派来华开教，驻澳门。1842年转赴香港，是为华南布道之始。1843年玛高温（Dr.D.J.Macgowan）至宁波，布道施医，颇见成效。嗣罗尔梯（Rev.E.C.Lord）及高德（Rev.J.Goddard）继至，金华、绍兴先后设堂，华东教务由是逐渐推广。1889年魏牧（Rev.G.Warner）及侯牧（Rev.W.W.Upcraft）联袂入川，开辟华西教区。1894年华中地区亦曾派教士前往开拓，因力量不足，1910年代初移交它会。1917年华南、华东、华西三教区有广州、汕头、嘉应、黄冈、潮州、揭阳、潮阳、河婆、长宁、宁波、金华、绍兴、湖州、杭州、上海、南京、叙府、嘉定、雅州、宁远、成都等21总堂，172支堂，西教士136人，华传道527人，受餐信徒8,005人，主日学校180所，小

学校235所。1935年有总堂17处，支堂158处，西教士143人，华传道1,107人，受餐信徒12,595人，主日学校152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汕头私立岩光中学，梅县私立广益女子中学，绍兴私立越材初级中学及私立浚德女子初级中学（旋合并为私立越光初级中学），金华私立成美女子初级中学及私立作新初级中学，杭州私立蕙兰中学，吴兴私立民德初级女子家事职业学校，定海私立定海初级中学（嗣改私立舟山初级中学），宜宾私立明德初级中学及私立明德女子中学，雅安私立明德初级中学及圣经学校等；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宁波私立浙东中学及私立甬江女子中学，杭州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南京私立金陵大学及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私立沪江大学、沪江浸会神学院及私立上海女子医学院，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汕头耶士谟神学校。所办医院则有汕头益世医院，揭阳真理医院，潮阳潮光医院，河婆男女医院，宁波华美医院，绍兴福康医院，金华福音男女医院，雅安仁德医院，宜宾明德女医院及明德男医院；与其它教会合办有上海西门外妇孺医院及广州美华浸信会印书局。华南教区干事彭维（Rev.A.H.Page）驻汕头，华东教区干事郝培德（Dr.L.C.Hylbert）驻上海圆明园路，华西教区干事乔安慰（Mrs.A.M.Salquist）驻成都。

### 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North）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the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838年成立，本部纽约市。属长老宗。同年即派何牧师（Rev.R.W.Orr）及宓牧师（Rev.J.A.Mitchell）夫妇东来，居新加坡，在华侨中布道，实为长老会来华布道之先声。1842年娄理华（Rev.W.M.Lowrie）首抵澳门。其后哈巴安德（Rev.Dr.A.P.Happer）、合文（Dr.J.K.Hepburn）、麦嘉缔（Dr.D.B.McCartee）、韦理哲（Rev.R.Q.Way）、克陛存（Rev.M.S.Culbert-

son)、施惠廉 (Rev. W. Speer)、花璉治 (Rev. D. B. French)、孟子元 (Rev. S. N. Martin) 及丁魁良 (Rev. W. A. P. Martin) 等纷至, 往来于广州、厦门、宁波、上海间, 寻找时机, 以图发展。长老会初无分南北,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 南长老会始行分立。北长老会在华惨淡经营60年, 至本世纪初, 终于开辟了华中、华南、华北、山东、江安、海南岛及湖南7大教区, 成为来华新教各会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差会之一。1916年与长老宗各差会联合组成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7教区有宁波、上海、杭州、苏州、广州、阳江、连州、高州、石龙、通州、北京、保定、顺德、登州、烟台、济南、潍县、沂州、济宁、青岛、峄县、滕县、南京、怀远、南宿州、海口、琼州、那大、嘉积、常德、湘潭、桃源、衡州、郴州及长沙等34总堂, 192支堂, 西教士467人, 华传道1,934人, 受餐信徒37,143人, 主日学校473所, 小学校600余所, 中等学校50所, 医院34所。1927年联合公理宗差会组成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有总堂31处, 西教士389人, 华传道1,959人。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上海私立清心中学及私立清心女子中学, 苏州私立萃英中学, 广州私立真光女子中学, 北京私立崇实中学及私立崇慈女子中学, 蓬莱私立文会初级中学, 烟台私立益文商业专科学校、私立益文商业专科学校附属中学、私立真光女子初级中学及妇女爱道院, 济南私立齐鲁中学及妇女圣经学校, 潍县私立广文中学, 临沂私立临沂中学及基督教圣道院, 济宁私立育才女子初级中学及华育证道院, 青岛私立文德女子中学, 峄县\*灵光女子初级中学及基督教自助修道院, 南京私立明德女子中学, 怀远私立淮西中学、怀远女子中学及\*培德妇女圣经学校, 宿县私立启秀女子初级中学, 琼山私立匹谨初级中学, 衡阳私立广德初级中学等20余校; 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宁波私立浙东中学及私立甬江女子中学, 上海美国学校, 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之江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及私立弘道女子中

学，广州私立夏葛医学院（附设柔济药剂学院及端拿护士学校）、私立培英中学、崇基圣经师范女子学校及协和神科学院，北京华美学校及协和妇女传道学校，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滕县华北弘道院及华北神学院，南京私立金陵大学、金陵神学院、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金陵女子神学院，长沙私立福湘女子中学及牯岭美国学校等。所办医院则有馮姚惠爱医院，苏州妇孺医院，广州柔济医院，阳江化民博济医院，连县惠爱医院，北京道济医院，保定思侯医院及思罗医院，邢台福音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济南华美女医院及德邻医院，济宁德门医院，潍县基督教医院，临沂基督教会医院，峄县瑞门德男女医院，滕县华北医院，怀远民望医院及民康女医院，寿县春华医院，宿县民爱医院，海口福音医院，那大福音医院，嘉积基督医院，常德广德医院，湘潭惠景医院，桃源问津医院，衡阳仁济男女医院，郴县惠爱医院等；此外，还开办有滕县麻风院、阳江麻风村、广州明心瞽女学校及烟台启暗馆等福利事业。总差会会长卫礼士（Dr. R. C. Wells）及副会长兼干事毕嘉乐（Rev. C. E. Patton）驻上海圆明园路，华中教区干事施明德（Rev. E. M. Smith）驻宁波，华南教区干事喜威怜（Miss G. Hill）驻广州，华北教区干事石清溪（Rev. C. C. Steinbeck）驻北京，山东教区干事阿保罗（Rev. P. R. Abbott）驻济南，江安教区干事麦斐德（Miss Anna E. Moffet）驻南京，海南岛教区干事唐玛西（Rev. D. H. Thomas）驻嘉积，湖南教区干事梅牧师（Rev. T. W. Mitchell）驻湘潭。

### **归正教会，大美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Reformed Church in America (Dutch)”。1832年旅美荷侨发起成立，本部纽约市。属长老宗。1842年来华开教，驻厦门鼓浪屿。第一位教士即前此十数年偕公理会教士裨治文同

至广州的雅俾理 (Rev. D. Abeel)。嗣波罗满 (Rev. W. J. Pohlman)、罗雷 (Rev. E. Doty) 及打马字 (Rev. J. V. N. Talmage) 等踵至，建新街会堂。一切尚赖美部会（公理会）扶掖。迨1857年始自理自立。是时闽南三教会一归正会、英长老会、伦敦会一区域不分，协和布道，堪称楷模。1862年归正会同英长老会合组漳泉大会，泉属漳属均各发展，与厦门成鼎足之势，渐次推广至内地。1892年乃划清界线。厦门、同安、安溪、漳州、琯溪、平和一带属归正教会。1916年与其它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有总堂4处，支堂26处，西教士37人，华传道291人，受餐信徒3,418人，主日学校6所，小学校10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龙溪私立寻源中学，厦门私立毓德女子中学及救世医院护士学校；与其它教会合办有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所办医院则有厦门鼓浪屿救世医院及市内分院，平和小溪救世医院及同安同安医院等。干事礼振铎 (Rev. H. P. De Pree) 驻厦门。

### **东方女子教育会 (Society for Promoting Female Education in the East)**

英国基督教新教教育宣教会。1834年受美国归正教会教士雅俾理演说影响而成立，本部伦敦。以在东方各埠兴办女学为目的。1837年阿尔德女士 (Miss M. Aldersey) 偕伦敦会教士麦都思夫妇至爪哇泗水设女塾，教育华侨女子。1842年阿氏来华，首抵香港，为入华女教士之第一人。1844年转赴宁波，开设女塾，是为西教士在华所办第一所女学校。阿氏人称马利姑娘。1857年马利姑娘因病离华赴澳州，卒于客中。1899年该会并于大英教会。

### **独立宣教师 (Independent Missionaries)**

国际基督教新教自养宣教士。不属于任何教会。1843年即来华布道，分布甚广。少则数人，多则数十百人。有时参与其它教会活动。1935年有西教士100人，分布于闽、冀、鄂、热、赣、苏、粤、晋、鲁、川、滇诸省及港九地区。

**大英教会；大英教会安立甘；英行教会；英国圣公会**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for Africa and the East”。1799年成立，本部伦敦。属圣公宗。1843年四美(Rev.G.Smith)抵香港调查情况，为英圣公会来华布道先行。1844年麦克开拉启(Rev.T.McClatchie)至上海开教。1848年哥伯播义(戈柏，Rev.R.H.Cobbold)及陆赐(Rev.W.A.Russell)等继至，驻宁波。嗣好不生(Rev.J.Hobson)、岳斐迪(Rev.F.F.Gough)、温敦(韦尔唐，Rev.W.Welt-on)、札成(霍克孙，Rev.R.D.Jackson)、包尔腾(Rev.J.S.Burdon)、方理(Rev.M.Fearnly)、慕稼谷(Rev.G.E.Moule)等纷至沓来，渐成气候。惨淡经营60年，至本世纪初，先后形成港粤、四川、福建、浙江、桂湘诸主教区。1912年联合美、加圣公会合组为中华圣公会。1917年5辖境有香港、九龙、北海、广州、廉州、鹤山、中坝、安县、绵州、绵竹、新都、石泉、保宁、德阳、中江、重庆、茂州、龙安、成都、汉州、云南府、福州、福宁、古田、罗源、建阳、兴化、建宁、福清、江头、宁德、高山、连江、仙游、霍童、都巡、松溪、崇安、福安、宁波、杭州、绍兴、诸暨、台州、桐庐、桂林、南宁、永州、衡州、湘潭及上海等50余总堂，128支堂，西教士316人，华传道588人，受餐信徒10,045人，主日学校175所，小学校330所。1935年有总堂62处，支堂495处，西教士192人，华传道1,041人，受餐信徒15,271人，主日学校228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香港私立圣保罗书院、圣

士提反学校、圣士提反女学校、\*圣凯瑟琳女学校及飞利女子中学，广州私立圣三一中学，绵阳私立育德初级中学，宁波私立三一初级中学，绍兴私立承天初级中学，福州私立三一中学、私立陶淑女子中学及私立寻珍女子初级中学，古田私立史莘伯初级中学，建瓯私立培汉初级中学及崇安私立真光女子中学等；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福州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杭州私立冯氏女子初级中学及私立弘道女子中学，南京中央神学院及广州协和神科学院。所办医院则有宁波仁泽医院，慈溪保黎医院，杭州广济男女医院，临海恩泽医院，北海普仁医院，福州柴井医院，连江妇孺医院，福清惠爱医院及普爱女医院，霞浦圣教医院，连江妇孺医院，宁德妇幼医院，福安德济医院，建瓯基督教男医院，莆田圣路加医院及圣路加女医院，仙游圣路加医院，建宁妇幼医院，桂林道生医院，绵竹仁泽医院及昆明惠滇医院等。总司库何德惠 (Rev. E. J. Ottewell) 驻上海圆明园路；浙江主教区会督高德斯 (Rt. Rev. J. Curtis) 驻杭州，干事贝约翰 (Rev. J. G. Bird) 驻绍兴；福建主教区会督兼干事\*恒约翰 (Rt. Rev. J. Hind)、协理会督陈永恩及司库来必翰 (Rev. W. P. W. Williams) 驻福州，桂湘主教区会督兼干事司博习 (Rt. Rev. P. Stevens) 驻永州，四川主教区会督侯礼敦 (Rt. Rev. J. Holden) 及协理会督宋诚之驻成都，干事董宜笃 (Rev. V. H. Donnithorne) 驻汉州，港粤主教区会督何明华 (Rt. Rev. R. O. Hall) 驻香港，协理会督莫寿增及干事郑伯士 (Rev. P. Jenkins) 驻广州白鹤洞。

### 大英浸礼会 (English General Baptist, 1870年后: English Baptist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育教会。母会原称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成立，本部伦敦。属浸礼宗。1845年胡德逊 (Rev. T. H. Hudson) 及\*耶伦 (Rev. W. Jarrom) 奉派来华开教，驻宁

波。仅十数年即告中断。1859年夏礼医生(Dr.C.J.Hall)及丹籍大英浸礼会教士古路吉(Rev.H.Z.Klockers)至烟台另辟蹊径,艰苦备尝,未见显效。迨1875年李提摩太(Rev.T.Richard)放弃烟台转至青州,会务始见转机。翌年得仲钧安(Rev.A.G.Jones)相助,从事赈务,教事日益兴盛。至本世纪初,已辟有山东、山西、陕西三教区。1915年有青州、周村、潍县、济南、太原、忻州、代州、寿阳、三原、西安、延安等十数总堂,283支堂,西教士129人,华传道201人,受餐信徒7,875人,主日学校83所,小学校162所,中学校7所。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有总堂9处,支堂390处,西教士98人,华传道372人,受餐信徒9,782人,主日学校50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太原私立尊德女子初级中学,西安私立尊德女子中学,\*周村圣经学校及\*三原妇女圣经学校;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所办医院则有益都广德医院,周村复育医院,西安广仁医院,太原亚斯顿福音医院及博爱医院;忻县、代县及三原福音村设施诊所。此外,在西安及太原开办有孤儿院。总会干事魏礼模(Rev.H.R.Williamson)驻济南,司库毕礼克(Adam Black)驻上海;山东教区干事潘亨利(Rev.H.Payne)驻济南,山西教区干事罗尔德(Rev.T.E.Lower)驻太原,陕西教区干事武德逊(Rev.J.Watson)驻西安。

**美国南浸信传道部; 美国南浸信传道会; 美国南浸礼会**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1845年成立,本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同年咖笠顿(高立敦,Rev.S.C.Clopton)及啤士(Rev.G.Pearcy)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驻广州。咖氏1847年病逝,啤士及其后继者在华南举步维艰。直到1854年基律(Rev.C.W.Gail-



lard) 夫妇至, 始有好转。几与华南开拓同时, 1847年晏马太(Rev. M. T. Yates) 夫妇抵上海另辟新区, 建老北门礼拜堂, 是为华中教区之始。1860年花雅各(Rev. J. L. Holmer) 夫妇及海雅西(Rev. J. B. Hartwell) 赴烟台开拓山东教务, 为后之华北教区奠基。1904年复有陆德恩(Rev. W. W. Lawton) 夫妇及施爱理(Rev. E. Sallee) 至郑州, 所谓华内区教务得以推广。南浸信会四大教区由是逐渐形成。1917年有总堂21处, 支堂142处, 西教士153人, 华传道1,029人, 受餐信徒20,899人, 主日学校298所, 小学校340所, 中学校26所, 医院10所。1934年华南、华中、华北、华内4教区有广州、澳门、高要、曲江、江门、惠阳、桂林、梧州、上海、苏州、镇江、扬州、无锡、昆山、烟台、蓬莱、黄县、平度、掖县、莱阳、青岛、济南、济宁、大连、哈尔滨、郑州、开封、归德、亳县等20余总堂, 221支堂, 西教士203人, 华传道523人, 受餐信徒41,450人, 主日学校228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广州私立培正中学、私立培道女子中学、神道学校及培贤妇女圣经学校, 梧州私立培正初级中学, 上海私立晏摩氏女校、私立明强中学及私立崇德女子中学, 黄县私立崇实学院及怀麟医院护士学校, 平度崇真学社及私立新华文社初中女校, 苏州私立晏城中学及私立慧灵女子中学, 开封私立济汴中学及施育妇女圣经学校, 曲江客属圣经学院等; 与其它教会合办有上海私立沪江大学及沪江浸会神学院,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医学院。所办医院则有广州东山两广浸信会医院, 桂林浸信会医院, 梧州思达公医院, 扬州浸会医院, 黄县怀麟医院, 掖县梅铁男医院及爱怜女医院, 平度怀阿医院, 亳县福音济生医院及开封济汴医院。此外, 在广东赤溪开办有大襟岛麻风院。司库威林士(Dr. J. T. Williams) 驻上海圆明园路, 华南区干事时俊光(Rev. H. H. Snuggs) 驻广州, 华中区干事包牧师(Rev. E. M. Bostick) 驻无锡, 华内区干事邵士德(Rev. G. W. Strother) 驻郑州, 华北区干事明俊德(Miss B. Smith) 驻天

津。

### 巴色会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瑞士及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Evangel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 Zu Basel”。1815年成立，本部瑞士巴色（今译巴塞尔）。瑞方属长老宗，德方属信义宗及长老宗。1846年黎力基（Rev. R. Lechler）及韩山文（Rev. T. Hamberg）奉派来华开教，翌年抵香港，学习客家语。因获荷兰布道会教士郭实腊援手，教务逐步展开。1851年首在香港设堂。嗣渐推广至李朗、布吉。天津条约订立后，巴色会务在梅、东两江地区日益兴盛。1918年有总堂17处，支堂131处，西教士65人，华传道324人，受餐信徒8,088人，主日学校7所，小学校103所。1922年起华人渐操教权，次年实行自立者4会，改巴色会为崇真会，亦归属信义宗。1935年有香港、李朗、古竹、浪口、梅县、荷树湾、鹤市下、坪塘、梅林、罗岗、河源、长乐、和平、连平、老隆及广州等十数总堂，124支堂，西教士53人，受餐信徒7,501人。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梅县私立乐育中学，紫金古竹市集义乡私立乐育初级中学，五华黄塘岭私立乐育初级中学及妇女圣经学校，兴宁坪塘乐育神科学院。所办医院则有梅县德济医院及河源仁济医院等。会长萧琼华（Rev. Ernst Seizer）驻龙川老隆，司库李达源（Rev. Arthur Rizzi）驻香港。

### 大英长老会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1847年成立，本部伦敦。属长老宗。同年宾惠廉（Rev. W. C. Burns）奉派来华开教，驻香港。嗣得养医生（用雅各，Dr. James H. Young）之助力，布道于香港、广州间。1850年移驻厦门，与先期到达的归

正教会及伦敦会协和布道。1853年认信 (Rev. J. Johnston) 夫妇继至。1856年宾氏游行至汕头，接办巴色会黎力基始创的教务，开辟新区。1865年台湾开教。嗣更推广至客家居地。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教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厦门、汕头、五经富、台湾4教区有厦门、漳浦、泉州、永春、上杭、汕头、潮州、汕尾、五经富、台南、打狗、彰化诸总堂，91支堂，西教士108人，华传道430人，受餐信徒13,041人，小学校200所。1927年中华基督教会成立，为发起会员之一。1934年厦门、汕头、五经富3教区有总堂8处，支堂367处，西教士53人，华传道321人，主日学校28所(统计不全)。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厦门私立怀仁女子初级中学及私立怀德幼稚师范学校，晋江私立培元中学及私立培英女子中学，永春私立崇实初级中学，汕头私立聿怀中学等；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厦门私立英华中学及闽南圣道专门学校，汕头贝理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汕头福音医院，汕尾福音医院，上杭福音医院，揭阳五经富福音男女医院，潮安念宾男女医院，晋江惠世总医院，漳浦源梁医院及永春圣教医院。厦门教区干事洪显理 (H. J. P. Anderson) 驻鼓浪屿，汕头教区干事华河力 (Rev. H. F. Wallace) 驻汕头，五经富教区穆华德 (Rev. G. F. Mobbs) 驻五经富。

### 安息浸礼会 (Seventh Day Baptist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The Seventh Day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1842年成立，本部罗得岛阿舍韦 (后迁韦斯特利)。属浸礼宗。1847年贾本德 (Rev. S. Carpenter) 及华牧师 (Rev. N. Wardner) 夫妇奉派来华开教，驻上海。翌年即开始布道，并设男塾。1850年教堂落成，嗣以战事而几度播迁。1857年及1864年华、贾二氏先后因病回国，教务交由华牧主持。1873年贾氏返沪，1876年退休，教事赖其它差会相助勉强维持。

1880年台物史 (Rev. D. H. Davis) 夫妇等到来后始见转机, 相继设女塾及男塾, 以辅布道。1902年至浏河行医施药, 试图推广。1910年西门外斜桥新堂建成。1917年有教会堂2处, 西教士9人, 华传道20人, 受餐信徒121人, 主日学校3所, 小学校3所。1935年有教会堂2处, 西教士8人, 华传道29人, 受餐信徒200人, 主日学校3所。开办有上海私立惠中中学及私立惠中女子初级中学, 宝山浏河惠中男女医院及药房等文教卫生事业。监督费牧师 (Rev. H. E. Davis) 驻上海徐家汇路。

### 礼贤会; 巴冕会 (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Rheinische Missionsgesellschaft”。1828年成立, 本部伍珀塔尔—巴冕(今译巴门)。属信义宗。1847年叶纳清 (Rev. F. Genach) 及柯士德 (Rev. W. Koester) 奉派来华开教, 首抵香港。未几柯氏在江门染病身亡, 叶纳清乃只身赴东莞虎门镇口村设堂布道, 施医兴学, 颇得华人王元深助力。嗣罗存德 (Rev. W. Lobscheid) 及高怀义 (Rev. R. Krone) 踵至, 渐次推广至福永、荷坳、西乡、石龙诸地, 并于荷坳开办神道学校, 注重训练华籍传道人才。1864年叶纳清染霍乱病死。1866年花之安 (Rev. E. Faber) 来助, 设虎门道学院。1872年与德华教会合作设堂于广州油栏门。1882年与德华教会分工。次年叶纳清之子叶道胜 (Rev. I. Gendach) 自德来, 设神学院于福永。1899年分设教会于香港, 会务日益发展。1914年欧战爆发前有西教士35人, 受餐信徒1,743人, 主日学校3所, 小学校30所。战时, 粤港教务一度由华牧负责。1920年参加信义宗大会于鸡公山, 谋与信义会联合。1932年有广州—大良、塘头厦、东莞、虎门—太平、迳贝5总堂, 19支堂, 西教士22人, 华传道26人, 受餐信徒2,075人。在东莞开办有普济医院、结核病院及麻风院; 与巴陵信义会合办有广州下芳村专门神道大学。总牧金璞坚 (Rev.

W. Kempgen) 驻广州下芳村。

### 美以美会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19年成立，本部纽约市。属卫斯理宗。初无南北之分。1844年南北分裂，北方袭用旧称。1847年柯林 (Rev. J. D. Collins) 及怀德 (Rev. M. C. White) 夫妇奉派来华开教，于9月4日抵福州，驻南台中洲。嗣麦利和 (Rev. R. S. Maclay)、喜谷 (Rev. H. Hickok)、怀礼 (Dr. I. W. Wiley)、高礼 (Rev. J. Colder)、基顺 (Rev. O. Gibson) 及万为 (Dr. E. Wentworth) 等接踵而至，或布道、或兴学、或施医、或著述，各司其职。1856年8月于茶亭建成亚洲美以美会第一堂，称“真神堂”。翌年第一个华信徒陈安在仓前山天安堂领洗进教。1877年正式成立福州布道年议会，教务日益发展。至1917年已成立福州、兴化、延平、江西、华中、华北、华西7年议会(教区)，包括福州、古田、海坛、闽清、福清、兴化、仙游、永春、黄石、延平、永安、渔溪、九江、南昌、芜湖、屯溪、镇江、南京、上海、北京、天津、山海关、昌黎、泰安、重庆、成都、遂宁、资州、合川等近30总堂，330支堂，西教士363人，华传道3,095人，受餐信徒32,951人，主日学校842所，小学校上千所。其后华西年议会分为成都及重庆两年议会，华北年议会别立山东年议会。1935年9年议会有总堂23处，支堂490处，西教士223人，华传道1,026人，受餐信徒41,272人，主日学校539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福州私立鹤龄英华中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私立进德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毓英女子初级中学、基督教女子神学院及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莆田私立哲理中学及私立咸益女子中学，南平私立剑津中学，平潭私立岚华初级中学，古田私立超古初级中学及私立毓馨初级中学，闽清私立天儒初级中学

及私立毓真女子初级中学, 福清私立明义初级中学、私立毓真女子初级中学及龙田区私立融美初级中学, 仙游私立陶德女子初级中学及私立仙游模范学校, 黄石私立农工学堂及私立蒲星中学, 九江私立同文中学及私立儒励女子中学, 南昌私立豫章中学及私立葆灵中学, 宣城私立皖南初级中学, 镇江私立崇实女子中学, 南京私立汇文女子中学, 北京私立慕贞女子中学、私立汇文中学及私立汇文神学院, 天津私立天津汇文中学及私立中西女子中学, 滦县私立滦县汇文中学, 昌黎私立汇文中学, 泰安私立德贞初级中学及私立萃英初级中学, 重庆私立淑德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求精中学及私立重庆初级中学, 成都私立华美女子中学及私立高琦初级中学, 遂宁私立精一初级中学及私立涪江女子初级中学, 资中私立进德女子中学及私立磐石初级中学等40余校; 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私立华西协合中学及协合女子师范学校,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 上海私立上海女子医学院, 福州私立福建协和大学、福建协和神学院及私立协和幼稚师范学校, 南京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金陵神学院, 北京燕京大学及华文学校等。所办医院则有南平吐吡哩医院, 闽清善牧女医院, 福清惠乐生医院, 福清龙田和新田医院, 莆田涵江兴仁医院, 仙游美以美会女医院, 古田怀礼医院, 沙县美以美会医馆, 平潭基督教西医院, 九江但德福医院及生命活水医院, 南昌南昌医院及康成妇幼医院, 芜湖芜湖医院, 镇江保黎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及妇婴医院, 天津妇婴医院, 昌黎广济医院, 遵化同仁医院, 山海关普济医院, 重庆宽仁医院及宽仁女医院, 成都存仁医院, 资中宏仁医院及泰安博济医院等, 且多半附设有护士学校; 与其它教会合办有福州基督教协和医院及南京鼓楼医院。此外, 在莆田尚兴办有涵江麻风村、利百加孤子院及美兴印书局等慈善文化事业。出版有英文月刊《美以美会教报》(China Christian Advocate) 及中文周刊《兴华报》。东亚中央议会设于上海

圆明园路，高智会督（Bishop John Gowdy）及韦励士会督（Bishop Herbert Welch）主其事。1939年美以美会与监理会及美普会合并，改称卫理公会。

### 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1846年成立，本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属卫斯理宗。1848年戴医生（Dr. C. Taylor）及秦右（Rev. J. Jenkins）夫妇奉派来华开教，先后抵上海。翌年即在郑家木桥建造礼拜堂，附设学塾，教员刘竹松首先进教。1852年后耿惠廉（Rev. W. G. Cunnynggham）、唐雅谷（J. S. Belton）、雷大卫（D. Kelly）、蓝柏（Rev. J. W. Lambeth）及林乐知（Rev. Young J. Allen）等纷至沓来。布道活动渐次推广至苏州、嘉定、青浦一带。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派遣教士事中断15年。1875年潘慎文（Rev. A. P. Parker）等至苏州，兴学设医以辅布道。1885年成立中国年议会。1917年有上海、苏州、松江、常州、南京、湖州诸总堂，37支堂，西教士108人，华传道706人，受餐信徒7,899人，主日学校145所，小学校43所。1923年发起关东布道，在哈尔滨成立卫斯理堂。1927年组成中央议会。1935年上海、苏州、湖州、常州、南翔、松江6教区有教会堂77处，西教士89人，华传道286人，受餐信徒12,991人，主日学校209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苏州私立东吴大学、私立振声初级中学、私立英华女子初级中学、私立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及私立东吴大学苏州附属中学，上海私立中西女子中学及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吴兴私立东吴大学吴兴附属中学及私立湖郡女子中学，松江慕卫女子初级中学等十数校；与其它教会合办有上海私立上海女子医学院，南京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及金陵女子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苏州博习医院，吴兴福音医院及常州武进医院，与

其它教会合办有上海西门外妇孺医院。慕雅德会 督 ( Bishop A. J. Moore ) 驻上海景林庐房子。1939年与美以美会及美普会合并为卫理公会。

#### **瑞典布道会 ( Missionary Society at Lund, Sweden )**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Missionsgesellschaft in Lund, Schweden”。成立年代不详，本部隆德。1849年来华开教，艾吉士 ( Rev. A. Elgquist ) 及法士 ( Rev. C. J. Fast ) 首抵香港，嗣转福州。不数年即无所闻。

#### **卡塞尔布道会\* ( Cassel Missionary Society )**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Casseler Missionsgesellschaft”。成立年代不详，本部卡塞尔。1850年乌牧师 ( Rev. C. Vogel ) 奉派来华开教，驻香港。1852年乌氏离港后即无所闻。

#### **巴陵女书院 ( Berlin Women's Missionary Society for China )**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Berliner Frauen-Missionsverein für China”。1849年在荷兰布道会教士郭实腊影响下成立，本部柏林。实为德华教会之女公会。属信义宗。1851年来华开教，于香港东部设育婴堂，收容华人弃婴。1860年迁西营盘新堂。1896年所办警女部交由喜迪堪会接办，专办普通育婴堂及女学校，迄1914年已累计收养1,200余人。其时书院有西教士6人，各级在校学生132人。书院一切活动均与德华教会及接办德华教会会务的巴陵信义会密切相关。

#### **循道会；惠师礼会 ( 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 )**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于18世纪，本部伦敦。属卫斯理宗。1852年来华开教。第一个抵达广州的，是初为自养教士后被惠师礼会接纳的俾士(Rev.G.Piercy)。翌年郭修理(柯克私，Rev.J.Cox)等踵至，教务渐次推广。1854年俾士夫人首设女塾于广州。1862年郭氏接受伦敦会教士杨格非建议，转赴汉口开辟湖北教区。阅40年始扩展至湖南。至1916年已辟有两广、湖北、湖南三教区，广州、香港、佛山、四邑、香山、北江、西江、武昌、汉口、汉阳、汉川、德安、随州、安陆、广济、武穴、大冶、崇阳、长沙、浏阳、益阳、平江、湘阴、宝庆、永州、郴州26监区。有教会堂121处，西教士120人，华传道360人，受餐信徒5,364人，主日学校27所，小学校112所，孤儿院1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广州增沙(淑正)女书院，佛山华英学校，武昌博文书院(附设基督教协和师范学校及神学校)，汉阳训女书院，随县中学，德安中学及长沙神道学校等。所办医院则有佛山文昌沙新西医院，韶关惠师礼医院，梧州惠师礼医院，汉口普爱医院，永州普爱男女医院，大冶普爱医院，安陆普爱医院等12所。1932年与循道合会等合并，是为循道公会。

### **醒华会 (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50年前后受荷兰布道会教士郭实腊宣传影响而成立，立意对华布道。1853年祝恩赐(Rev.J.Jones)奉派来华开教，驻宁波。翌年戴德生(Dr.J.H.Taylor)等踵至，活动于上海、汕头、宁波、香港等地。1865年戴氏在英伦创立内地会，不数年醒华会即湮没无闻。

### **德华教会；中华传道会；德国中国传道会 (Berlin Mission Association for China)**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erliner Missionsverein

für China”。1840年代在荷兰布道会教士郭实腊影响下成立，本部柏林。属信义宗。1850年吴教士（Rev. R. Neumann）夫妇等奉派来华开教，驻香港，布道于九龙境内。1854年吴氏夫妇因病归国，本部复派韩仕伯（Rev. A. Hanspach）及郭念三（Dr. H. Goecking）至港继其工。1862年何必烈（Rev. F. Hubrig）来助，转惠州及淡水布道，并入广州兴学。1870年韩氏因病归国，何氏独当一面，将广州油栏门让出，转花县、狮岭、赤埔一带布道。1882年并入巴陵信义会。其时西教士仅何氏1人，受餐信徒450人，有中学校及神学校各1所。

### **圣道堂（Methodist New Connex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10年代由微斯理老会分立组成，本部未详。属卫斯理宗。1860年来华开教。首批教士英约翰（殷森德，Rev. J. Innocent）及郝赅廉（Rev. W. H. Hall）抵天津适逢英法联军陷大沽攻北京，遂转赴苏州。不意苏州太平军战事犹酣，乃于1861年遄返天津，在娘娘宫购地设堂。1871年设神学校。至本世纪初，唐山、永平、乐陵、武定相继开通，有大小教堂近百所，西教士18人，受餐信徒3,000余人，小学校20余所。在乐陵、永平、唐山开办有施医院。1907年与偕我会及圣经基督徒会合并为循道合会，更西名。华名旧称与新名并用。

### **安立甘会，圣公会安立甘堂；华北圣公会（Church of England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in Foreign Parts”。1701年成立，本部伦敦威斯敏斯特。属圣公宗。1863年施约瑟（Dr. J. A. Stewart）奉派来华开教，驻北京。为安立甘会华北布道之始。未几中辍。1874年复派史嘉乐（Rev. C. P. Scott）及林披基（Rev. M. Green-

wood)至山东烟台,游行布道于内地,由大英教会中部会督督理。1878年推广至泰安,次年至平阴。1880年设华北主教区,史氏为首任主教,统辖直、鲁、晋、豫、秦、陇诸省教务。1903年别设山东主教区。1909年分河南为一辖境,交坎圣公会主持。1912年与在华圣公宗诸会合组中华圣公会,辖华北及山东两主教区,是为北部中华圣公会。1917年有烟台、泰安、威海卫、潍县、兖州、东昌、北京、河间、永清、天津、安国、牛庄、大连、奉天诸总堂,西教士47人,华传道185人,受餐信徒1,628人,主日学校11所,小学校63所。嗣大同及唐县增设新堂。1934年有16总堂,35支堂,西教士76人,华传道105人,受餐信徒4,702人,主日学校31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北京私立崇德中学、私立培华女子中学及私立笃志女子中学,泰安私立育英初级中学及威海卫私立育华初级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南京中央神学院及上海私立上海女子医学院。所办医院则有河间圣安德烈男女医院,永清圣司提反男女医院,安国圣巴拿巴男女医院,平阴广仁男女医院,滋阳广仁医院及大同首善医院。华北主教区主教鄂方智(Rt.Rev.F.L.Norris)及司库毕雅德(Rev.A.J.D.Britland)驻北京,山东主教区主教史多马(Rt.Rev.T.A.Scott)驻泰安。

### 偕我公会 (Methodist Free Church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10年代源出于微斯理老会,本部未详。属卫斯理宗。1864年来华开教,初驻烟台,旋转宁波。首抵宁波者为富牧师(Rev.W.R.Fuller)。翌年梅牧师(Rev.J.Mara)来助,设施诊所辅布道。不数年二氏因健康状况不佳告退返国。1868年阚斐迪(Rev.F.Galpin)继至,独力布道5年,始有燕乐拔(Rev.R.Swallow)援手。自是教务日兴。1878年温州设堂。1882年苏慧廉(Rev.W.E.Soothill)适瓯主持。复经海和德(Rev.

J.W.Heywood)及烈德理(Rev.W.Lyttle)等惨淡经营,渐次推广至奉化、象山、上虞各县属。本世纪初宁波及温州两区有大小教会堂百余处,西教士19人,受餐信徒及慕道者数以千计。宁波开办有斐迪学校及普仁医院,温州开办有艺文学校及白累德医院。1907年与圣道堂及圣经基督徒会合并为循道合会。

### 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

国际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65年6月25日前英国醒华会教士戴德生(Dr.J.H.Taylor)创立,旨在深入中国内地布道。本部伦敦。无特定宗派关系。1866年戴氏率倪来义(L.Nicol)、童跟福(G.Duncan)、蔡文才(J.A.Jackson)、史洪道(J.R.Sell)、路惠理(W.D.Rudland)及韦雅各(J.Williamson)等男女同工16人及妻子儿女来华开教,驻杭州。谋以浙江为基地,逐步推广。1867年即传至南京。嗣皖、赣、鄂、晋、陇、蜀、秦、鲁、滇、黔、豫、直、湘、新诸省相继开通。除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及威尔士教士外,从1887年开始,先后有瑞典的瑞华会、圣洁会及瑞华盟会,挪威的挪威会及挪华盟会,德国的德华盟会、立本责信义会、德女公会及女执事会,芬兰的自由会,美国的北美瑞挪会等,以及意大利、加拿大、瑞士、澳大利亚教士来华参加内地会工作。内地会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布道团体。它不仅普及于发达各省,同时注意边疆地区。中国议会设于上海,戴氏自任总理。除伦敦总会给予援助外,尚有苏格兰、瑞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各议会(或分会)及德国、瑞典、挪威、芬兰诸国相关母会支持。1903年戴德生因病辞职,何斯德(Rev.D.E.Hoste)继任总理。1917年有231总堂,914支堂,西教士940人,华传道1,893人,受餐信徒44,374人,主日学校149所,小学校451所,中学校5所,师范学校17所,神学校6所,实业学校4所,孤儿院6所,医院14所。1935年有359总堂,1281支堂,西

教士1,037人,华传道3,810人,受餐信徒85,345人,主日学校464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杭州浙江圣经学院,烟台私立焕文学校及私立培真女子初级中学,洪洞私立普润中学及洪洞道学院等。此外,在南昌设有一所圣经学校,在邵阳及兴平设有两所妇女圣经学校。所办医院则有长沙德生医院,洪江爱怜医院,临海普济医院,龙泉路加男女医院,平阳教会医院,兰州博德恩纪念医院,平凉教会医院,烟台体仁医院,南充教会医院,鄱阳教会医院,萨拉齐教会医院,长治鸿恩医院,临汾善胜医院,开封福音医院,安顺福音医院,元江哲理医院,迪化内地会医院等。此外,在兰州及毕节设有麻风院;在长沙、芷江、新安、阆中、南充、梁山、仪陇及大定设有孤儿院;在邵阳、保德、临县设有工艺学校;在萨拉齐设有戒烟局。中国议会总理唐进贤(Rev.G.W.Gibb)、协理万守阶(Rev.W.H.Warren)、司库安选三(W.J.Embery)及干事师学文(J.Stark)、署干事纪律芬(H.M.Griffin)驻上海新闻路。1945年以东川圣经学院为基础创办重庆神学院,蒲若立、陶秉文、陈崇桂主其事。\*

### 美国南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South)

美国基督教新教育教会。母会原称“Executive Committee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1861年成立,本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属长老宗。1867年来华开教。前北长老会教士应思理(Rev.E.B.Inslee)首在杭州设堂。嗣经郝理美、吴思敦、贝恩德(Rev.G.W.Painter)、司徒尔(Rev.J.L.Stuart)、杜步西(Dr.H.C.Du Bose)、裴来仪(Rev.J.M.Blain)、毕来思(Rev.P.F.Price)、花第生(Rev.W.H.Hudson)、李满(Rev.C.Leaman)、海敦(Rev.R.A.Hoden)、李德理(Rev.L.L.Little)、吴板桥(Rev.S.I.Woodbridge)、柏雅各(Rev.J.E.Bear)及赛兆祥(Rev.A.Sydenstricker)诸教士锐意

开拓，惨淡经营，至本世纪初，始发展为华中及江北两大教区。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也就是南长老会来华50周年时，有杭州、桐乡、嘉兴、苏州、江阴、上海、南京、济南、镇江、清江浦、宿迁、徐州、淮安、海州、泰州、盐城等十数总堂，45支堂，西教士142人，华传道514人，受餐信徒4,805人，主日学校97所，小学校155所。1920年代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有总堂17处，支堂78处，西教士143人，华传道321人，受餐信徒13,548人，主日学校161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嘉兴私立秀州中学，江阴妇女圣经训练学校、私立辅实女子中学及励实中学，宿迁私立培贤女子中学，徐州私立培正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杭州私立之江文理学院、私立之江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及私立弘道女子中学，济南私立齐鲁大学，滕县华北弘道院及华北神学院，南京金陵神学院及金陵女子神学院。所办医院则有嘉兴福音男女医院，苏州福音医院，江阴福音医院，镇江基督医院，淮阴仁慈男女医院，宿迁仁济医院，徐州基督医院及坤维女医院，东海义德男女医院，泰县福音医院及盐城普爱医院等，且多半附设有护士学校。中央司库兼华中教区干事必志仁（Rev. H. M. Smith）驻上海圆明园路，江北教区干事家雅各（Rev. J. R. Graham）驻淮阴。

### 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Woma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1860年成立，本部纽约市。为跨宗派妇女联合布道团体。1868年来华开教，在美国圣公会支持下活动。初在北京开办女子寄宿学校。1881年转移至上海，兼办走读学校。1885年于西门外开办妇孺医院。1891年开始直接布道。1893年开办美国女公会学道院。1917年有西教士11人，华传道36人，受餐信徒242人，主日学校2所，小学校1所。1936年西教

士减为4人，主日学校3所。除与其它公会联合经营西门外妇孺医院及西门外妇孺医院协和高级职业护士学校外，主要经营方斜路私立裨文女子中学。明美丽（Miss M.J.Irvine）驻上海法界辣斐德路。

### **爱尔兰长老会；哀长老会（Irish Presbyterian Church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Ireland”。成立年代不详。本部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属长老宗。1869年很德（Rev.J.M.Hunter）及万特（Rev.H.Waddell）奉派来华开教，驻牛庄，以继承英长老会宾惠廉教士未竟之业。嗣与苏长老会默契，以关东西北部为哀会布道区域。无何盖雅各（Rev.J.Carson）等踵至，教务渐次推广至锦州、新民、奉天、广宁、法库及宽城子、吉林、榆树厅等地。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有9总堂，15支堂，西教士33人，华传道408人，受餐信徒9,188人，主日学校74所，小学校99所。所属中等学校有营口基督教中学，锦县育三中学及育英女中学，新民文会中学及崇实女中学，吉林省城育才中学，长春博文中学及纯粹女子中学（纯粹女子师范学校），榆树文华中学等；与其它教会在奉天合办有文会书院及神道学院、医学堂。所办医院则有营口施医院，锦县仁济医院及惠济医院，新民普爱施医院，长春施疗医院及耶苏教女医院，吉林医院，广宁及法库女医院等，共有病床242张。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5年有西教士40人。

### **加拿大长老会；坎阿大长老会（Canadian Presbyterian Mission）**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oard of For-

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Canada”。1843年成立，本部安大略省多伦多。属长老宗。1871年偕睿理（马偕，Rev. G. L. Mackay）奉派来华开教，驻台湾淡水。施医布道，创办淡水神学校及偕医馆。嗣渐推广至台北，是为台湾教区。1888年古约翰（Rev. J. Goforth）等奉派至河南开辟布道新区，以彰德为基地，逐渐推广至卫辉、怀庆、道口、武安、修武、开封及直隶磁县，是为豫北教区。1902年\*马牧师（Rev. W. R. Mackay）夫妇至澳门，1907年转江门，合原台湾教区而成华南教区。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有9总堂，西教士86人，华传道209人，受餐信徒3,733人，主日学校36所，小学校79所。1925年母会与卫斯理宗及公理宗数会合组为加拿大联合会，在华相关差会亦随之结合。坎长老会辖境成为加拿大联合会之河南教区及华南教区。嗣两教区先后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统计（不含淡水及台北），有西教士94人，受餐信徒6,814人（不包括华南教区）。所办医院有安阳广生医院，汲县惠民医院，沁阳恩赐医院，道口民惠医院，龙井村济昌病院，新会江门仁济医院及仁济妇幼医院。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无统计，仅见安阳广生医院护士学校，汲县惠民医院护士学校，新会江门仁济医院护士学校、江门仁济妇幼医院护士学校及启德女证道所而已。此外，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广州协和神科学院及崇基圣经师范女子学校。河南教区会长王卓如（Rev. George K. King）驻汲县卫辉，干事葛文德（Rev. W. H. Grant）驻安阳，司库柯恩慈（Hugh Mackenzie）驻天津，华南教区波多马（Rev. T. A. Broadfoot）驻江门。

**美以美会女布道会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Wome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美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1869年成立，为美以美会之女部。



1871年来华开教。初驻华南及华北，翌年至华中，最后推广到华西。一切均附属美以美会。1917年有西教士156人。1928年女会成为独立组织，与美以美会的关系从附属变为协作。但所有统计资料仍在美以美会名下。上海圆明园路设办事处，司库吴贝玺（Miss B.A.Hollows）及署理司库单路得（Miss R.Danner）1930年代后期尝主其事。

### **苏格兰长老会；苏革兰长老会（United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教会。16世纪中叶诺克斯（John Knox）创立，西名原称“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Mission”，本部爱丁堡。1567年被定为苏格兰国教。属长老宗。1872年罗约翰（Rev. J.Ross）奉派来华开教。初驻牛庄学习汉语。1874年于太平山设堂。翌年马钦泰（Rev.J.Macintyre）来助，至海城立会，渐次推广至盛京。1882年司督阁医生（Dr.D.Christie）及魏雅各（Rev. J.Webster）继至，即以医务辅助布道，辽阳、铁岭、开原相继开通。1890年始与哀长老会协和。1903年共有堂会42处，学校54所。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差会合组全国长老会总会。1917年有奉天、海城、辽阳、永陵、开原、铁岭、朝阳、阿什河、三姓及呼兰10总堂，33支堂，西教士64人，华传道411人，受餐信徒10,334人，小学校108所。所属中等学校有阿城敬业中学，呼兰广育中学，朝阳成达中学，开原文源中学及开原女子中学，铁岭文航女中学，奉天文华中学及淑德女师范学校，辽阳文德中学及育才女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奉天文会书院及神道学院、医学堂。所办医院则有奉天盛京施医院、开原仁爱医院、辽阳基督教医院、铁岭基督教医院等9所。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29年10月，与苏格兰福音会在分裂86年后重新结合，西名统称“Church of Scotland”，各布道区华名仍其旧。1935年有西教士

66人。

**浸礼会女公会 (Woman's American Baptist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1871年成立，本部纽约市。1873年来华开教，附属大美国浸礼会真神堂。

**监理会女公会 (Women's Missionary Council of 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

美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1875年来华开教，附属监理会。

**苏格兰福音会 (Church of Scotland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Church of Scotland Foreign Mission Committee”。1843年前后成立，本部爱丁堡。属长老宗。1878年郭布伦（谷克本，Rev. G. Cockburn）奉派偕苏格兰圣经会三人来华开教，驻湖北宜昌。嗣得丁慰宁（Rev. W. Deans）等及女会来助，教务渐次推广至宜都、董市、双莲寺一带。对医务及教育事业注意尤多。1916年与其它在华长老宗差会共立全国长老会总会。翌年有西教士15人，华传道40人，受餐信徒585人，主日学校3所，小学校14所，工艺学校1所，孤儿院1所。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受宜昌评议会节制。1929年10月，与苏格兰长老会在分裂86年之后重新结合，西名统称“Church of Scotland”。各布道区华名仍其旧。1934年有总堂1处，支堂6处，西教士10人，华传道87人，受餐信徒514人。在宜昌开办有私立哀欧拿女子初级中学、私立华英初级中学、仁济女医院及普济男医院等文教卫生事业。干事杜辅世（Rev. F. Tocher）驻宜昌。

### 巴陵信义会；巴陵会（Berlin Missionary Society）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1824年成立，本部巴陵（今译柏林）。属信义宗。1882年郭宜坚（Rev. A. Kollerker）奉派来华接办德华教会（中华传道会）事业。嗣得和士谦（Rev. C. J. Voskamp）及昆祚（Rev. A. Kunze）相助，教务渐在惠州、湖尾、南雄、修仁一带展开，于惠州永湖设总堂。1898年德国强租胶州湾后即派和世谦及昆祚北上，开辟青岛、即墨、胶州等新区。1917年加入中华信义会，为选民会员。其时有14总堂，145支堂，西教士33人，华传道237人，受餐信徒5,979人，小学校54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殃及巴陵会务，教事进行，诸多窒碍。1935年1月1日将山东教区转让美国鲁东信义会接办，专致于广东教区。计有广州、遇塘凹、南雄-修仁，石角-鹿坑、始兴、曲江-仁化-乐昌、惠阳、英德、新会、清远10区会，西教士29人，华传道129人，受餐信徒4,474人，主日学校14所。开办有广州私立中德中学及曲江私立德华女子初级中学；与礼贤会合办有广州下芳村信义神学校。总牧蔼道盛（Rev. A. Oelke）及司库明启华（E. Minkner）驻广州。

### 大英教会女公会\*（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Church of England Zenana Missionary Society”。1880年成立，本部伦敦。属圣公宗。1884年\*高姑娘（Miss Gough，后为霍约瑟夫人）奉派来华开教，驻福州，与大英教会协和布道。主要活动于福建及桂湘辖境。1912年随大英教会加入中华圣公会。1917年有福州、古田、罗源、西洋、杉洋、上堡、建宁、屏南、松溪、浦城、福宁、衡州、湘潭、永州诸总堂，西教士40人。嗣增设桂林总堂。1934年有总堂9处，西教士24人，华传道68人。在罗源及浦城开办有两所女学校；与其它教会合办有福州私立协和幼稚师范学校。所办

医院则有罗源圣教女医院及屏南棠口潘美颐女医院。此外，在福州南台及建瓯开办有两所盲哑残疾人学校及1所孤儿院。

### 公谊会 (Friends' Foreign Mission, England)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riends'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1865年成立，本部伦敦。属公谊宗。1884年，葛姑娘 (Miss H. Green) 奉派来华开教。初驻汉口，稍后即前往四川。1886年因病脱离差会。翌年陶维新 (R. J. Davidson) 夫妇踵至，驻陕西汉中。1888年进入四川。1889年首在潼川设堂，逐渐推广至重庆、射洪、成都、遂宁、铜梁诸地。1914年传至上海。1917年有5总堂，32支堂，西教士31人，华传道132人，受餐信徒386人，主日学校20所，小学校35所，中学校9所。且在重庆、潼川、遂宁与当地政商各界合办有中西德育社，提倡和平主义，增进德育、智育、体育。1928年母会改组，更西名为“Friends' Service Council”。1929年派员至北京参与燕京大学校务。1935年有6总堂，11支堂，西教士18人，华传道6人，主日学校10所。在重庆开办有私立广益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成都私立华西大学及私立华西协合中学。所办医院则有潼川公谊仁慈医院及遂宁博济男女医院。干事陶维廉 (W. H. Davidson) 驻遂宁。

### 同善会 (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ary Society; Weimar Mission; East Asia Mission)

德国瑞士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1884年成立于魏玛，本部柏林。初无特定宗派关系，嗣归属正宗派。1885年来华开教，吸收先期在华的前礼贤会教士、著名汉学家花之安入会，派赴上海从事文字工作。1892年有安牧师 (Pastor P. Kranz) 来助。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同善会即将活动重心移往山东。1898年

花之安、卫礼贤 (Pastor R. Wilhelm) 奉派至青岛,翌年花氏谢世。同善会宣教士人数不多,疏于播道,而偏重于文教及慈善事业。主要活动于青岛及高密一带。1901年创办青岛礼贤书院及费柏 (福柏) 医院。1905年开办淑范学校。1925年济宁设堂。1934年有总堂2处,西教士8人,华传道4人。经营有青岛私立礼贤中学、福柏医院、华德医院及济宁一所医院。出版发行有会刊。会正苏保志 (Dr. W. Seufert) 驻青岛上海路。

### **圣经基督徒会 (Bible Christian Church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成立年代及本部未详。1885年来华开教,驻云南昭通。与内地会关系至密。嗣渐推广至东川府及贵州石门坎、四方井一带,多在苗、彝少数民族中布道。本世纪初有大小教堂数十处,西教士10余人,受餐信徒数以千计。有柏格理牧师 (Rev. S. Pollard) 为苗家造文字一种,并将圣经译成新造苗文,交成都华英书局印行。在昭通开办有宣道学校、神学校及医院。1907年与偕我会及圣道堂合并为循道合会。

### **水手会馆 (Missions to Seame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5年来华开教,以水手为布道对象。在香港设西营盘圣彼得水手人礼拜堂,在上海设水手拜经堂。与大英教会安立甘关系至密。1940年代尚见于记载。

### **基督会 (Foreign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27年坎伯尔 (A. Campbell) 父子创立,西名通称 "Disciples of Christ",本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属使徒派。1875年成立差会,启用现名。1886年加拿大传教医师马林 (Dr. W. E. Macklin) 奉派来华开教。初驻上海,旋转南京,设医院及药局,建鼓楼堂。嗣\*肖牧师 (Rev. A. F. H. Shaw)、美

在中(Rev.F.E.Meigs)、惠雅各(Rev.J.Ware)、高诚身(Rev.F.Garrett)、洪明道(Rev.W.R.Hunt)、师顾德(Dr.E.Osgood)等纷至沓来,教务渐次推广至滁州、芜湖、上海、南通、庐州、无为以及四川巴塘诸地。1917年有9总堂,15支堂,西教士55人,华传道126人,受餐信徒1,337人,主日学校30所,小学校52所。同年上海一区让与自立会。1919年母会改组,更西名为“United Christian Missionary Society”,迁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1935年华中及藏边两教区有5总堂,16支堂,西教士38人,华传道238人,受餐信徒2,127人,主日学校37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南京私立中华女子中学,南通私立崇英女子初级中学,合肥私立三育女子中学;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南京私立金陵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私立金陵大学附属中学、金陵神学院及金陵女子神学院,芜湖私立萃文中学。所办医院则有合肥基督医院及南通基督医院;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南京鼓楼医院。干事兼司库马轲(Rev.E.Marx)驻南京鼓楼,署干事麦克伦(Rev.J.H.McCallum)驻南京汉口路,署司库溥尔祺(Rev.C.A.Burch)驻南通。

### 贵格会(American Friends'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Friend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Ohio Yearly Meeting”。成立年代未详,本部俄亥俄州阿莱恩斯芒特吉利阿德。属公谊宗。1887年义白礼(Miss E.H.Butler)奉派来华开教。初居南京,充美以美会金陵医院护士。1890年以其外祖母遗产在五台山购地建堂布道。嗣得安得烈(Miss L.M.Stanley)相助,兴学设医,教务渐兴。1898年推广至六合。1917年有西教士9人,华传道20人,受餐信徒440人,主日学校2所,小学校8所。1935年两会堂有西教士8人,华传道2人,受餐信徒925人,主日学校7所。所办社会文

化福利事业有限，见诸记载者有南京培珍女学校及贵格医院，六合益智学校、光明女学及和平医院等。会长慕德 (Rev. C. A. Marti) 驻南京，干事棣慕华 (Rev. C. E. De Vol) 驻六合。

### 瑞华会 (Swedish Mission in China)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7年为支持符励恺 (Rev. E. Folke) 及其同工在华布道而成立，西名原称 “Svenska Missionen I Kina”，本部斯德哥尔摩。同年至山西运城开教，归属内地会系统。历尽艰苦，始渐推广。19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金斯堡设分本部，加意支持。1910年代得以拓展至晋、秦、豫三省黄河沿岸38县属，有13总堂，支堂及布道所97处，西教士56人，华传道132人，受餐信徒近3,000人。1935年有运城、猗氏、解县、永济、芮城、大荔、韩城、郃阳、蒲城、潼关、新安、洛阳、陕县诸总堂，西教士34人。所有相关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 美瑞丹会；瑞美会 (Swedish American Mission)

美国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Swedish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North America”。1884年旅美瑞典、丹麦、挪威侨民组织成立，本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属正宗派。1887年宽倚(夸)伦奉派来华开教。初设福音堂于广州河南洲头咀，嗣则以福音船向蛋户传道，设学施医，遍历佛山、番禺、顺德、香山、增城、东莞、花县、三水、新会、肇庆、博罗诸地。1911年后遽改布道方针，转向陆地，渐次推广至小榄、市桥一带。1927年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有大小教堂13处，西教士7人，华传道22人，受餐信徒940人，主日学校7所。出版有中文布道季刊。干事梁贵民 (Rev. A. G. Lindquist) 驻广州。1938年10月21日日军占领广州，会务转向港九地区，称“基督教播道会”。

**西北江西教会 (North West Kiangsi Mission)**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7年独立宣教士创立于江西吴城，渐次推广至靖安、武宁、牯岭、宜宁一带。1917年有西教士15人。1930年代尚见于记载。与弟兄会有相当关系。

**宣道会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 1897年后: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87年成立，西名原称“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Alliance”，本部纽约市。无特定宗派关系，以宣教于“未闻主道之邦”为宗旨。1888年来华开教，初以西藏为目标。1891年首设总堂于芜湖。阅两载而转至武昌，谋以之为基地进湖南入西藏。嗣江爱德(E.D.Chapin)等继至，先后于常德、长沙、汉寿开堂布道，渐次形成中部教区。1892年有李牧师(C.H.Rieves)由广州溯西江而上，泛舟水面，调查沿江村镇，游行布道达于梧州，是为南部教区之始。1895年克省悟及席儒珍联袂至陇，选定甘南为布道新区。先居临潭旧城，继向洮、岷、狄道各州展开，并组织甘南布道团，游行全省，进入拉卜楞，向藏民布道。此即西部教区。北部教区，包括晋北、蒙边、北京、天津，1890年代亦曾相当活跃。庚子之变元气大伤，晋北各堂移归内地会，北京道姑娘(Miss D.M.Douw)返美后去世，天津伍约翰(Rev.J.Woodberry)夫妇转赴上海，整个北部教区即告瓦解。1915年中、南、西三部有教会堂58处，西教士92人，华传道163人，受餐信徒2,014人，主日学校30所，小学校43所。中部及南部产业约值银213,540元。1920年代更推广至川黔两省及藏边。1934年中部、南部、上海、甘肃藏边及川黔5年议会有芜湖、南陵、庐江、太平、祁门、常德、汉寿、澧县、武昌、汉口、梧州、庆远、百色、福祿、上海、洮州、临洮、河州、岷县、陇西、循化、巩昌、松桃、龙潭、彭水、秀山等30余总堂，受餐信徒4,864



人，主日学校73所。1912年始建于梧州的宣道书局迁上海经营，刊印各种解经书报及教外书刊，出版发行《圣经报》。中部议会会长雅学诗 (Rev. B. H. Alexander) 驻武昌，南部议会会长陈法言 (Rev. W. H. Oldfield) 驻梧州，上海议会会长伍约翰驻上海北四川路，甘肃藏边议会会长莫有为 (Rev. T. Moseley) 驻临洮，川黔议会会长·巴特尔 (Rev. P. H. Bartel) 驻龙潭。

### 圣洁会，瑞典圣洁会 (Swedish Holiness Un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Helgelse Förbundet”。1885年成立，本部库拉姆托普。1888年（或作1890年）高乐生 (Rev. A. Karlsson) 奉派来华开教，驻山西浑源。属内地会系统。几经磨难，始得数十信徒。庚子事起，教士教徒或死或散。1902年教务恢复，添庄窝、西沟、蔡沟、红花沟、王庄堡5支会。1916年有西教士31人。至1935年，已辟有大同西、右玉、左云、浑源、天镇、灵邱、朔县、阳高、怀仁、广灵、岱岳、大同东及四川巴中、新店子等10余会堂，西教士36人。所有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 弟兄会 (Christian Missions in Many Lands, Plymouth Brethren Missions, Unconnected)

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36年成立于普利茅斯，本部英格兰巴思及苏格兰格拉斯哥。属弟兄派。教士间关系松散，以“弟兄”相称。1889年·斯蒂芬 (R. Stephens) 首先来华开教，驻山东石岛。嗣江西、内蒙、关东相继开通。1934年有石岛、威海卫、文登、九江、德安、南昌、涂家埠、奉新、安义、高安、宜丰、上高、修水、靖安、铜鼓、牯岭、天宝、平泉、承德、赤峰、凌原、朝阳等20余会堂，西教士81人。胡布思 (F. J. Hopkins) 主其事，驻南昌。

**基督同寅会；同寅会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00年成立于马里兰州，注重基督徒团契，相呼为“弟兄”，属长老宗。1889年应旅美华商梅林之请派加色古及二女教士来华开教，驻广州河南。嗣逐渐推广至新塘、小榄、大杭、九洲、基古镇诸地。1905年设差会，西名原称“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United Brethren in Christ”，本部俄亥俄州代顿。1916年有西教士16人。其后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有2总堂，8支堂，西教士10人，华传道22人，受餐信徒903人，主日学校3所，小学校10余所。开办有小榄私立美理女子初级中学及同寅医院，与其它教会合办有广州博济医院。监督苏维新 (Rev. C. W. Shoop) 驻广州白鹤洞。

**挪威会 (Norwegian Mission in China)**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Norske Kinamisjon”。1889年成立，本部兰斯菲尤尔。同年来华开教，奉派至晋西北山区布道。属内地会系统，一切活动均附于内地会。1910年后始自立会堂，仍与内地会协作。嗣本部迁奥斯陆。至1928年，先后设邕宁州(离石)、介休、临县、岚县、静乐、兴县、河曲、岢岚、保德诸会堂。烟台、扬州亦曾见其踪迹。1935年有西教士20人。所有事业统计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美瑞路德会；豫南信义会 (United Norwegian Evangelica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Synod of the Norwegian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1823年旅美挪威侨民组织成立，本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属信义宗。1890年李立生 (Rev. D. Nelson) 奉派来华开教。初居汉口学习华语，择定樊城为布道区。几经周折，始得于次年赁屋布道。嗣鸿恩会穰福林

由美至樊，李乃转往河南信阳。遂以之为基地，渐次推广至汝宁、确山、罗山、遂平、正阳及鸡公山。1916年有西教士49人，华传道170人，受餐信徒1,478人，主日学校17所，小学校32所。开办有信阳信义中学及信义女中学，确山仁慈医院等文教卫生事业。与其它同宗差会合办有淅口信义神学院。1917年与鸿恩会及光州信义会合并为豫鄂信义会。

**南行道会；瑞典行道会；行道会 (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venska Missionsförbundet”。1878年成立，本部斯德哥尔摩。属信义宗。1890年韩宗盛、任大德 (Rev. F. Rydgård)、梅宝善 (Rev. A. D. Johansson) 及乐传道 (Rev. O. F. Wickholm) 等奉派来华开教，驻武昌，首设布道所于武胜门。1892年瑞典行道会传至新疆喀什噶尔，疏附、疏勒、莎东、英吉沙尔先后设堂。湖北方面，1893年因梅宝善及乐传道游行布道至麻城宋埠郝家铺被杀，麻城教务一度中断。但宜昌、沙市、黄州进展如初。1906年麻城正式设堂。1908年与北行道会合办神道学堂于荆州。教务由是推广至荆州、监利、圻水一带，武昌乡间村镇各设支堂。1917年鄂、新两区有西教士62人。1933年两区有会堂10处，西教士53人，不计新疆教区，有华传道112人，受餐信徒2,102人，主日学校19所。开办有黄冈鄂东医院，监利瑞华医院，麻城福音男女医院及沙市康生医院等。此外，与北行道会合办有荆州神道学校。会长文明盛 (Rev. F. A. Wennborg) 驻宜昌，干事能守仁 (Rev. I. Ehne) 驻黄冈。

**德华盟会；传福音会 (Alliance China Mission, German China Alliance Mission)**

德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Allianz-China Mission

in Barmen”。1889年成立，本部巴门。1890年奔德（Rev.J.Bender）等奉派来华开教，归属内地会系统。初抵上海，旋被分配至浙江处州。称“德华盟会”，寓德国瑞士中华共同合作之意。教务逐渐推广，龙泉、云和、缙云、松阳，以及江西抚州、建昌、南丰、宁都、崇仁相继设堂。1913年有西教士35人，华传道104人，受餐信徒1,360人，小学校18所。嗣因甲地称“德华盟会”，乙地称“内地会”，殊觉不便，遂改称“传福音会”。所办文教卫生事业见于记载者有处州崇德学校、松阳养正学校、龙泉养真学校及松阳博爱医院等。1934年有教会堂10处，西教士38人。所有统计资料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 北行道会；行道会；瑞美行道会（Covenant Missionary Society）

美国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wedish Evangelical Mission Covenant of America”，或“Svenska Evangeliska Missionsförbundet i America”。1885年旅美瑞典侨民组织成立，本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属信义宗。1890年马德盛（Rev.P.Matsson）奉派来华开教，驻湖北襄阳。教务逐渐推广至樊城、南漳、荆门、荆州一带。施医兴学，以辅布道。1917年有西教士27人。嗣宜城、沙市、汉口相继设堂。1934年有8总堂，68支堂，西教士27人，华传道64人，受餐信徒2,101人，主日学校39所。在荆州与南行道会合办有荆州神道学校，在襄阳开办有同济男女医院。会长雅国成（Rev.I.W.Jacobson）驻南漳，副会长毕德深（Rev.J.Peterson）驻荆州，干事古淑良（Mrs.A.C.Conradson）驻襄阳，司库孙景福（Miss H.M.Johnson）驻汉口。

#### 喜迪堪会（Hildesheim Mission for the Blind）

德国基督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Hildesheimer Verein für

die Deutsche Blinden Mission in China",或"Hildesheimer China Blinden Mission"。1890年成立,本部喜迪堪(今译希尔德斯海姆)。无特定宗派关系。同年即来华开教,驻香港。1896年接办巴陵女书院所设育婴堂瞽女部,从事盲人救济工作。扩而大之,是为九龙心光书院(心光盲女织艺院)及香港朴湖林道以便以设瞽女院。盲女盲婴一概收留,由幼稚园至高小。所教音乐,首屈一指,织造亦极精美。此外,与巴色会合作在嘉应开办有心光女学校,与巴陵信义会合作在韶州开办有瞽女学校。1916年有西教士7人,华传道8人,在校学生114人。1920年于香山设以便以设瞽女分院。1930年九龙之地归还港英当局,继续经营朴湖林道、梅县(嘉应)及中山(香山)盲女教育事业。其时主其事者为慕姑娘(Miss S.Moritz),驻香港朴湖林道。

### 英美会：美道会 (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英国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 "The Missionary Society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Canada"。1824年成立,本部安大略省多伦多。属卫斯理宗。1891年原美以美会华中年议会会督赫斐秋率启迓德 (Rev.Dr.O.L.Kilborn) 及何牧师 (Rev.G.E.Hartwell) 等8人来华开教,拟在四川设堂布道。因长江流域发生教案而滞留上海数月,翌年春始抵成都。由成都渐次推广至嘉定、仁寿、荣县、彭县、自流井、泸州、重庆、忠州、涪州等地。布道辅以医务及教育,为英美会一大特色,会堂所在均设医院及学校。1917年有10总堂,81支堂,西教士178人,华传道339人,受餐信徒1,863人,主日学校88所,小学校140所。1925年母会与长老宗及公理宗数公会合组为加拿大联合会,在华相关差会亦随之结合。英美会辖境为加拿大联合会华西教区。嗣后加入中华基督教会。1934年有西教士137人,华传道111人,受餐信徒3,438人,主日学校87所。所属中等以上学校有成都私立华英女

子初级中学及私立华英女子高级中学,仁寿私立华英初级中学、荣县私立华英初级中学,彭县私立英年初级中学,富顺自流井私立培德初级中学及私立培德女子初级中学,重庆私立精一初级中学及私立文德女子初级中学等。与美以美等五会合办有成都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及私立华西协合中学。所办医院则有成都仁济男医院、仁济女医院及牙症医院,乐山仁济男女病院,仁寿仁济医院,荣县仁济男女病院,自流井仁济男女医院,泸县仁济男女病院,重庆仁济医院,忠县教会医院及涪陵仁济男女医院等。所经营的成都华英书局始建于1897年,为西南第一家现代印刷出版企业,服务于川滇黔所有教会客户。干事钟明(Rev.G.S.Bell)及司库海布德(Rev.E.Hibbard)驻成都。

#### 自由会(Finnish Free Church Mission)

芬兰基督教新教女宣教会。母会原称“Fria Mission i Finland”。成立年代未详,本部奥布。1891年来华开教,驻浙江。属内地会系统。1899年转江西,永新及永丰相继设堂。1916年有西教士7人。1921年母会改组。从1922年起在华教务改由新分立的教会支持。该会西文原称“Fria Missionforbundets Expedition”,本部埃克奈斯。1935年仅余西教士4人。所有相关统计均包括在内地会项内。

#### 鸿恩会(Hauge's Synod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he Hauge Evangelical Lutheran Synod of America”。1846年旅美挪威瑞典侨民组织成立,会名源出于瑞挪联盟著名实业家及传教士豪盖(Hans Nielsen Hauge)的姓氏,本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属信义宗。1891年来华开教,首批教士3人,初驻汉口学习汉语,嗣转樊城设堂,穰福林(Rev.H.N.Ronning)主其事。起初虽遭官府反对,

教务仍见进展。至1916年已有樊城、太平店、新野、鸡公山、邓州等6处会堂，西教士22人。在樊城开办有鸿文书院、育婴堂、医院及女学校。与其它同宗教会合办有淅口信义神学院。1917年与光州信义会及美瑯路德会合并为豫鄂信义会。

### **瑞国浸信会；山东瑞华浸信会 (Swedish Baptist Mission)**

瑞典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Sällskapet Svenska Baptistmissionen”。1881年成立，本部斯德哥尔摩。属浸礼宗。因受内地会总理戴德生鼓动，1890年前曾派员来华调查，择定山东为其布道区。1891年首派先期在安庆内地会华语学校习华语的教士温道慎 (Rev. K. Wingren) 赴胶州开教。翌年得令约翰 (Rev. J. E. Lindberg) 来助。1894年温氏因病归国，又有任其美 (Rev. J. A. Rinell) 夫妇及师德顺 (Rev. J. H. Swordson) 等继至。注重逐家布道，教务渐次推广至诸城、高密、黄台、日照一带。1916年有西教士15人，受餐信徒860人，小学校近40所，中学校1所。布道范围扩大为7县7000余村。1935年有教会堂10处，西教士23人，华传道89人，受餐信徒4,204人，主日学校64所。举办有胶县私立瑞华初级中学及诸城孤儿院等文教福利事业。此外，在亳县、归德、郑州、开封诸地与英美浸会合作开办有学校及孤儿院。会长任其斐 (任其美)、干事司大卫 (Rev. E. Strutz) 及司库任为霖 (Rev. O. H. Rinell) 驻胶州。

### **北直隶会 (North Chihli Mission)**

挪威基督教新教宣教会。母会原称“Tsjilimissionen”。成立年代未详，本部斯塔拜克。无特定宗派关系。1891年爱教士奉派来华开教，游行布道于北直隶龙门、保安、张家口、赤城、多伦一带。后得七位男女教士相助，始得于1912年在保安建堂。嗣龙门、多伦、张家口、下花园等地相继立会施医兴学，以辅布道。

尝开设张家口博爱医院。1920年代后期渐无所闻。

### **山西寿阳教会 (Shou Yang Mission)**

山西寿阳英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92年原内地会教士毕翰道 (T.W.Piggot) 夫妇创立。毕氏富有家资, 为布道事不吝钱财, 很快即有13人前来相助。庚子之变死11人, 元气大伤。寿阳教务遂由英浸礼会接办, 剩余人员亦随之加入英浸礼会。

### **美国浸礼福音会 (American Baptist Gospel Mission; American Gospel Baptist Mission; Gospel Mission)**

美国基督教新教宣教会。1893年美国南浸信传道部七名驻鲁教士脱离本部组织成立。以泰安及济宁为基地, 谋向豫北及皖北发展, 专以宣讲福音为事。1902年主要发起人谢世, 其势渐衰。据记, 1916年尚有西教士10人, 1917年仅剩白泰理 (Rev.T.L. Blalock) 等2人。1920年白泰理转直接浸信会, 浸礼福音会即告结束。



## 藏园笔记二篇

傅增湘 著 王会庵 整理

说明：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晚号藏园居士，四川江安人，光绪戊戌科进士，选庶吉士。一九〇五年起，先后创办天津女子公学、高等女校、北洋女学师范学堂三所，开北方女子入学风气之先。一九〇九年署直隶提学使；北洋政府时一度任教育总长等职。一九二二年退隐居家，校勘古籍，研究目录版本之学，过目珍本极多，有独到见解。著有《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邵亭知见传本增补》、《藏园游记》、《清代殿试考略》、《日记》、《文集》、《诗集》等。为现代有名之藏书家及教育家。笔记二篇系从一九三三年北平出版的《艺林旬刊》中《游山专号》中辑出，以供近代史研究者参考。记光绪帝及慈禧后逝世前情况，写于宣统年间。另一文则写于洪述祖伏法之后。

### 戊申十月勤政殿召对恭记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余奉旨简授直隶提学使，时方开办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往江浙招考学生。初十日在西湖白云巷，始奉电传谕旨。十月初五日，入京具折谢恩，诣宫门请安，未蒙召见。十六日请训，早五时赴西苑<sup>①</sup>门外商部公所。七时半折下有起<sup>②</sup>，苏拉<sup>③</sup>导入西苑门内朝房，小坐片刻，再引过长桥，入勤政殿侧小院内朝房静候。军机朝房，即在对楹，遇礼亲王世铎、溥玉岑师良二公，自盛京送玉牒回，是日亦有起也。晤内务

① 今中南海。

② 召见入覲谓之起。

③ 苏拉官名，满语指内廷担任勤务的人员，多以太监任之。

府大臣奎俊、增崇二公，又御医三人，言圣躬近日病势见剧，座上陈脉案一纸，述烦闷焦灼，饮食不进，虚怯不眠。御笔朱批，有“病势如此，不胜焦急”之语。少顷见军机大臣入，一刻即下。九时半即由太监传入，行径墙角，遇军机班下，项城宫保<sup>①</sup>见余即微语曰：“今日皇上圣体极不适，奏对时勿多言。”敬诺而行，导入勤政殿中少立。太监揭帘微窥，手召令前，至东暖阁，余手掀帘入，跪于军机垫下，叩谢太后、皇上天恩，两次拜跪毕，瞻仰天颜。窃见圣容癯削，两颧耸露微赤，目光炯然，面色晦滞，临座似有不安之状。余跪伏良久，上垂问曰：“汝是翰林出身，在衙门当差几年？”对曰：“在翰林院六年。”太后问曰：“汝曾办女学堂，究竟如何？闻成绩颇好。”对曰：“在天津创办女学三处，又办女小学八处，一切管理，规矩从严，尚无流弊。学生亦多知向学，成绩颇佳。”太后曰：“女学生规矩最要紧，以后当益加奋勉，务要整齐严肃。”又问：“学堂科目如何？”对曰：“学堂以造就人才，定章中西并重，然女学初兴，臣于中学尤为注重，以期保存中国旧德，免使沾染新学习气。”太后曰：“学科自以中国学问为重，其洋文算学等，不过稍求新知识，并未尝有大用处。”又问：“直隶学务情况如何？”对曰：“直隶学务，经严修、卢靖<sup>②</sup>等，先后经营，规模颇具，在各省中，自得风气之先。”太后曰：“汝到任后，务宜切实整顿，学生固宜管理得法，教员尤须加意选择，学务是现今最要政事。汝在北洋多年，情形熟习，此去好好襄助杨士骧<sup>③</sup>办理。”又问：“汝曾劝募直隶公债票，其情形如何，有无流弊？”对曰：“此事是袁世凯在任时所办，初时民

① 指袁世凯。

② 严修(1860—1929)字范孙，原籍浙江慈溪。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直隶学务处总办等职，久居天津，为南开大学创办人之一。卢靖(1856—1948)原籍湖北沔阳，字勉之，号木斋。光绪举人。曾任直隶、奉天等省提学使等职，久居天津，以藏书捐赠兴学，1928年南开大学图书馆落成，曾以“木斋图书馆”命名。

③ 杨士骧时署直隶总督。

闻不知其利，不免稍有观望，故臣亦帮同劝募，现时还本付息，不爽限期，人民已知其有利无害，以后推行，自然容易，请释圣怀。”语至此，皇上似有不能久支之势，俯案宣谕曰：“汝可跪安。”谨遵谕拜谢而退。太后垂询时，音吐极清，语气尤从容安定，若惟恐臣下震越者；惟言次时作咳嗽，初无病态也。至翌日即传太后病作罢朝。十九日内庭消息益恶。知两宫病已垂危。二十一日余赴津接印任事，夜得京电，皇上于本日酉正二刻宾天，次日未正三刻太后亦相继上崩。计余觐见之时，相距庵五六日，盖临朝召见臣工，以小臣为最后之人，真可谓末命矣。时以二日之中，连遭大丧，宫闱禁秘，传闻异词，外议因之藉藉。以余为末次召对之人，争就详询当时情状，因追忆玉音问答，敬志于册，庶异时言史事者，有所考焉。

## 记洪述祖遗事

颖之名述祖<sup>①</sup>，为北江先生<sup>②</sup>之裔孙。少年有才，好谈经世之学，兼览百家之书，旁及占卜星相奇遁之术，靡不通晓，议论豪放，嵌奇目喜。然挟术任智，敢为大言，行多不轨于正。为诸生时，即冒职官冠带，通谒刘忠诚坤一，上书言时事。后入台湾刘中丞铭传幕府，以采购军火侵冒事发，刘怒置之狱。在狱三年，饮酒读书，扬扬如平时。后释出，再入浙抚余联沅(品三)幕中。把持浙政，声势赫奕，有二巡抚之称。光宣之交，以道员待补于津门，与余相谘，颇至倾挹，文宴过从，月必数集，狂言怪

① 洪述祖(1895—1919)江苏常州人，字萌之，笔名观川。清末附生，捐官知县，后捐道台。1912年，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赵秉钧秘书。次年参与暗杀宋教仁案，后化名匿居青岛、上海。1917年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发现，在沪被捕，几经审判，被处绞刑于北京。

② 洪亮吉(1746—1809)清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字稚存，号北江、更生。乾隆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贵州学政。嘉庆初以直言被遣戍伊犁，旋遇赦归。通经史、音韵、训诂、舆地之学。曾提出人口增加与粮食产量相矛盾问题。著有《春秋左传诂》、《卷施阁集》等。

论，恒惊座人。性嗜奢华，精治肴饌，厨夫月给，等于幕宾。尝谓生我者父母，养我者厨子，虽置之五伦之一可也。治第于河北车驿之右，与颜韵伯<sup>①</sup>望衡而居。高楼华厦，陈设精丽，曾导余周览内外，庖湑皆列，咸有思致。家有四妾，惧其逸也，设为重门，出则严扃，携钥而去，令其竹戏<sup>②</sup>以遣日。楼巅有平台，而高其垣及肩，谓以便家人凭眺，而御者不得窥其姝丽，以内楼正对车室也。此皆其亲以语余者。然亦多雅嗜，书画文籍、鉴别殊精。今篋中所藏钞本《楚杓机》、《忠烈事实》二书，犹君所持赠，云居闽中时得之傅节子<sup>③</sup>家，知余好明季野史，谓此君家物，可传刻之。后以管井陘矿局，擅贷外债，为陈督部筱石（夔龙）所劾罢。余往慰之，君曰：“吾自推命运，今岁当得奇祸，兹以官事褫职，殊可喜也。”君赤面露目，于相法为凶，沪上有小说述君事者，谓其面多横肉，目露凶光，信然。尝免冠抚首示余曰：“子视吾状貌，不类重囚耶！”是其不免刑戮，固自知之，然终于凶狡不悛，自婴法纲，岂知之而无术以自免耶，盖亦嗜利忘身，倒行逆施，而不恤耳。闻临刑前夕，从容草遗书甚详悉，翊晨易僧服，整冠理须，而后就刑，斯亦异矣。

① 颜韵伯，清末天津画家。

② 竹戏即麻将牌。

③ 傅节子为福建藏书家。

## 丙申黑龙江矿案原委

袁大化 著 魏长洪 整理

**说明：**《袁氏宗谱》为袁大化于1909年（宣统元年）出银3000两主持纂修的。在该书的卷8附记中录存了《丙申黑龙江矿案原委》一文（以下简称“原委”）。此文为袁大化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之作，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大化在江苏徐州道任内，聘请秦世铨与凌钧荣编辑《漠矿录》，成书6卷，不知何故，却未收录“原委”一文。

“原委”不加标点符号，全文约1800多字，其内容可弥补《漠矿录》之不足。诸如袁大化何时到漠河金矿局提调任上，被拘的具体时间，软禁在何处，《漠矿录》的文字不明确，在此文中可得以解决。关于袁大杰、袁大信与袁广平的遇害与郝兴虹剃手案的细节，此文也较《漠矿录》清楚。故“原委”可作《漠矿录》的综合补充史料，供研究中国矿业史与评价袁大化等人参考。“原委”与《漠矿录》的面世，不仅对研究清末三大冤案（四川盐案、漠河矿案、绥远荒案）是个贡献，对近人以讹传讹，作文说袁大化办漠河金矿贪污巨款，以其中的30万两白银买得新疆巡抚的高官，也作了澄清。当然，此文为袁大化之作，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个人恩怨，引用时当为注意。

予自光绪十五年十二月至黑龙江漠河任矿局提调事。十六年八月，道员李金镛以病卒<sup>①</sup>，北洋大臣李文忠公<sup>②</sup>飞电飭予代理局务，经奏派接办<sup>③</sup>。二十一年，因病请假，接办者为知府

① 李金镛，字秋亭，江苏无锡人。光绪十三年（1887），以吉林知府被李鸿章奏派创办漠河金矿。

② 李文忠公：李鸿章。

③ 袁大化于光绪十五年（1889）六月，经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调漠河矿局差委。翌年十一月，充漠河矿局总办，报捐同知、知府。光绪十八年（1892），授道员加二品衔。

周冕<sup>①</sup>。部臣令延星使茂查办矿局<sup>②</sup>。二十二年二月，星使奏褫予职，归案审讯。十一月，黑龙江将军恩公泽<sup>③</sup>奏请免议。二十三年五月，北洋大臣王公文韶，奏陈金矿著有成效，恳恩飭部带领引见。七月十三日，奉旨开复原官，交北洋差委。当时星使罗织无稽，上章弹劾，是非失实，无以信后。爰追录之，名曰：矿案原委。

漠矿仿外洋公司办法定章<sup>④</sup>，年终将金数收支款项，详晰呈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而于部中只造送收支总数备查。乃部臣则屡驳报册，北洋则力持。无以部例烦，苛责漠矿，相持断断。盖款出于商，与公家用财有间也。部中未审边地艰苦，又惑于护将军增公祺观厂出金奇旺之言<sup>⑤</sup>，遂以大化办矿有名无实入奏，而令延星使查办。二十一年冬，有瑞委员安者，奉檄而之观音山<sup>⑥</sup>。初，观音山聚金匪，大吏以兵逐之。再其地产金富，匪驱复屯，未能封禁。予虑其有妨于漠矿后路也，力争而得。江省官绅之昧昧者，欲借封禁而暗享其利。其明者，则不欲以利为人与闻，此所以衔予也。二十一年春，东事未了<sup>⑦</sup>，俄人生心。增公祺护军篆，授意于钟元懋<sup>⑧</sup>，令报效军饷三万金。予以矿厂

① 周冕，浙江嘉兴人。湖南京候补知府，光绪二十一年（1895）接任漠河矿局总办，升授候补道。光绪二十四年（1898），周冕被撤职，由直隶候补道徐杰接任总办。

② 延茂，杜氏，字松岩，汉军正白旗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光绪二十一年（1895）署吉林将军。

③ 恩泽，噶奇特氏，字雨三，蒙古镶蓝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十月，任黑龙江将军。

④ 光绪十三年（1887）九月十三日，李金镛拟呈漠河金厂公司章程16条，与十二月初五日李鸿章奏折的文字略异，见《黑龙江矿务招商章程》与李之奏稿。《漠矿录》与《皇朝掌故汇编》外编24卷，仅录存13条。

⑤ 增祺，伊拉里氏，字瑞堂，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署黑龙江将军。

⑥ 观音山：黑龙江六大金厂之一，距齐齐哈尔720里。另有漠河、奇乾河、库玛尔河、余庆沟、都鲁河等金厂，以漠河最著。

⑦ 东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

⑧ 原注钟元懋“曾当矿局委员”。

危如垒卵，款多阻于沪上，未之许也，亦衔之。于是，积毁销金〔骨〕，而患害至。

星使之乘传过市也，扬言金厂积弊。瑞委员之莅观音山也，吹求者再吹求，不得乃悚以危言，且所欲甚奢。予以在矿言矿，乌知其他，未有以应之也。有复媒孽其间者，于是星使遂以委员藉差挟带私金，畏罪潜逃，请褫大杰职<sup>①</sup>，归案审讯。并以“知情故纵”四字，褫予之职。郝兴虹剃手一案，乃后搜寻而得者。二月十五日，有旨严拿袁大杰。

大杰，予仲弟也，创办观音厂有效，于二十一年冬假旋。时解金员弁袁如兰等，由爱启行<sup>②</sup>，大杰尾其后。有刘吉春者，悍而黠，初充漠厂把头，因事被责，谋乱未遂，继赴观音山，冀紊局章，以逞其私，为大杰怨逐。吉春积恨<sup>③</sup>，遂以鲸吞舞弊控大杰于星使。周冕又以大杰带金三千两电告。谣诼纷起，三人成虎。星使亦幸有词之可措也，据以入奏。并以员司买金存爱局者，牵涉大杰。于是，拦截解金员弁十余人于省垣。而于德聘等由津解饷者，亦邀而留之。缇骑四出，声势汹汹。大杰闻信，不知所为，竟以出亡。嗣经恩将军<sup>④</sup>复奏：袁大杰挈金三千两逃走一语，实本周冕首发。今周冕再三面称，此金早入交代，此外有无挈逃之金，周冕又不能再指，竟欲归之莫须有之类。呜呼！事经昭雪，而大杰不归，愤死何地，骸骨莫返，冤哉！痛哉！

袁如兰之拘留也，予从弟大信、族孙广平，解饷过省，亦被拘囚。于是委协领庆祺查核簿册矣。爱局委员、游击欧阳锦爵、把总曹国琛，则解任提案矣。驳查不已，则将司事刘奎璧、周化鲤解省提讯矣。知县张敬勇、谭承先、冯仲贤，赍册赴省讯核

① 袁大杰，字汉三，袁大化的大弟。他以监生援例县丞，随袁大化在漠河三年，初充护矿营官，继办观音山金厂，收效较大，升知县加同知衔。

② 爱：爱晖。

③ 吉春：刘吉春。

④ 恩将军：黑龙江省将军恩泽。

矣。数月之中，员司络绎于道，奔命不遑。卒之，弊无可指，隙无可乘。而大信以刑讯毙于途，广平以幽羁卒于狱，是可忍，孰不可忍。

郝兴虹者，以护勇隶哨长王槐林。光绪十八年二月，在马札兰沟查苗，郝勇性懒被责，持锹转击槐林仆地，伤其首几死。讯实剝其手，所以贷其死也。其捏控于星使，非出于郝勇之心，积怨于予者唆之也。恩将军复奏，所谓深山旷野，若照军法而论，固当正法，业已贷其一死，法漏余网，尚有何言。日后供认，捏控以结案。而星使去，不之顾，复以周冕言，去官留钱。终虑反手，又片参大化分得二十年花红银三万六千两，为贪鄙取巧，迫出充饷。查二十年矿利花红银七万二千两，总办照章应得半数，当经造册详明，与军饷股利一并派分。二十一年八月初三、九月十六日，奉黑龙江将军、北洋大臣批饬照提，又系奏定章程。星使此奏，殆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乎。卒以二十一年余利提剩之款拨抵，始得无事。

矿局金银粮货出入，各有专司，层层钳制，定章綦严，无私可图也。而筹办之艰苦，自知之，而自喻之。江省北洋公款十三万，前人之私亏，矿丁之欠款，俄则时为牵制，岌岌可危。予以不才承乏，六年之中，苦志经营，还公款，弥积亏，报效饷需八十五万余两，保守沿边四千余里，事成速退，私谓可告无罪。何意事患之来，有匪夷所思者。

予于二十二年正月交卸局事，星使百般为难，困于漠河者七月，羁于省垣者五月。迨北洋大臣复奏确情，乃得入关。而冤毙三命，痛悼无穷。其后，星使为吉省将军，以贪解职回京。庚子拳乱，阖门焚毙<sup>①</sup>。或谓火起时，星使尚手持七十万银券云。

<sup>①</sup> 吉林将军延茂，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奉旨开缺来京，另候简用。翌年补黑龙江将军，未赴任，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与全家自焚死。



噫！附录拘中自慰语：

事若办坏，人知不好；事要办好，吾未尝坏，天实之，  
达观自爱。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大化自述



## 近代史资料总第81期要目预告

- 近世百家大洋行志……………黄光域
- 太平军攻怀庆实录……………田桂林 小山
- 归田杂咏(并引)……………张集馨
- 戊戌己亥见闻录……………陈庆年
- 辛丙秘苑……………袁寒云
- 朱执信重要佚文……………黄毅整理
- 天津爱国布商标综览……………蒋原寰
- 李鼎铭思想资料……………林哲整理
- 戊戌纪略序跋及题辞……………姚伟整理
- 《陈公博狱中日记》质疑……………韶华
- 袁世凯丁巳赴登州……………张黎辉

## 奉郭战争重要日志

王贵忠 译

**编者按：**郭松龄反奉期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庶务部调查课（即满铁调查部）广泛搜集情报，又在奉天专设一个“时局事务所”，由满铁会社理事梅野兼任时局事务该所所长，指派职员中山四郎执笔编写《奉郭战争重要日志》一书。该书由调查课于1926年1月铅印。该书“凡例”中指出：本书是以调查情报为依据写成，按时间顺序排列历史事实；自1925年11月23日郭松龄滦州通电起，至12月27日止，共计34天间的大事记。每日又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简明清晰。

这部大事记系统记述奉郭双方的各项活动、国内各方面的反映，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事实。其中有日本谍报人员报告、奉军战报等资料。对于研究郭松龄反奉事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史料和线索。本文在刊出时对原文部分内容作了删节。

### 11月23日

郭松龄从滦州发出通电，与张作霖断绝关系，理由是排斥杨宇霆。

安徽督办姜登选被郭松龄枪杀。

根据李景林和冯玉祥的代表意见，郭松龄在滦州召开了军事会议。

### 11月24日

杨宇霆与专程来到奉天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会见。

杨宇霆发出通告对郭松龄反奉事变承担全部责任，并且辞去现有职务离开奉天。当日晚由奉天去大连。

据报告，李景林的态度可疑，他将要与郭松龄采取共同行动。

北戴河至秦皇岛之间电线被切断，山海关附近的铁路桥梁被破坏，京奉铁路中断。

在山海关，郭军与张作相军队发生冲突，郭军突破山海关之后进军绥中。

#### 11月25日

杨宇霆到达大连。

奉天省长王永江招集省议会以下各机关委员开会，指示各方劝告郭松龄停止反奉行动。

本日早上出现由奉天城内向满铁附属地避难的人群。

李景林脱离奉天派，将部下奉天派军官免职。

据传闻，郭松龄有反奉的军事计划。

本日段祺瑞执政发布命令，免去江苏督办杨宇霆、安徽督办姜登选的职务。

由北京、天津发往满洲的邮件，全部改为经由大连转运。

#### 11月26日

奉军发布奉天城内戒严令。

郭松龄及其部下联合发出的要求张作霖下野的电报到达奉天督办公署，张作霖大怒。

段祺瑞执政府内部的反奉派声援郭松龄反奉，使张作霖陷入困境。

王正廷在北京透露郭松龄反奉内幕，并且对冯玉祥参与反奉予以充分谅解。

许兰洲去天津，目的是将奉系干部对郭松龄叛乱的态度，传达给李景林和段祺瑞执政。

据报告，奉军以海军加强联系驻关内外的各部队，在葫芦岛集结船舶。

据传闻，郭松龄是听从孙洪伊等人的劝说，在取得冯玉祥的谅解之后举兵反奉的。

吉林第23团到奉天。为了加强防守绥中的兵力，吉林驻军第26旅派往该地。

张学良乘军舰镇海号到达秦皇岛，提出与郭松龄会见，被郭松龄拒绝。

据报告，张作相军退却到绥中附近，形势极其危急。

奉军采取最后手段，由张学良携带75万元，着手收买郭军将领。

目前，京奉铁路自奉天至绥中仍在运行。

为了维持南满洲治安秩序，日本驻奉天省的军事当局作出部署方案，报请陆军省批示。

### 11月27日

黑龙江督办吴俊陞发表声明，坚决支持张作霖。

吉林城内发布戒严令。

滨江道尹蔡运升接到张作霖关于极力维持北满治安的密电。

吉林模范监狱一千名囚犯免刑，被送往铁路战地。

奉军用飞机向郭军阵地撒传单，使其官兵了解郭松龄反奉真相，因此有许多人从绥中逃出来，有十架飞机脱离郭军飞出。

传闻郭军劫夺了由奉天送往热河的40万元。

据报告，阚朝玺、汤玉麟两军行动可疑，不久可能投降郭军。

郭松龄监禁了不遵从其反奉的全部官兵，改编军队，称为东北国民军。

郭松龄虽在昌黎会见关东军浦参谋、奉军仪我顾问，但他仍不反省。两人离开昌黎。

据观测，李景林目前持中立态度，若国民军借口援助郭军调动军队，欲攻占天津时，李景林将努力阻止国民军进兵。

北京至天津间火车，一日运行一次或二次。

日本政府坚持严守中立的态度，执行慎重对满政策。

在长春，为应付危急情况迅速组织日本居民义勇队。

在铁岭，日本居民也组织了义勇警备团。

归国途中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行经由奉天来大连。

#### 11月28日

张学良下决心最后一战，乘军舰镇海号由秦皇岛到旅顺港，即夜与杨宇霆、松井顾问、仪我顾问等三人共同返回奉天。

张作霖向有关各方面通电，表示将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驻热河奉军开始向锦州方向移动。

盛传郭松龄反奉内幕，系有苏联的阴谋活动。

郭松龄一再为巩固内部团结而努力。

郭军在山海关附近与张作相军对峙，滦州方面情况不明。

据报告，郭、奉两军在秦皇岛及锦州开始抢掠民间财物。

奉天城内人心动摇，日本居民商讨避难方法。

日本政府关于增派军队的声明书，由陆军省与外务省联合协商写成。

为了奉天市区警戒，关东军向奉天调动驻辽阳步兵第39联队、第2大队及工兵一个中队。

考虑今后形势恶化奉天治安将遭受破坏，日本关东厅、驻奉天总领事馆、关东军司令部三方一致同意用军队力量保护居民。

#### 11月29日

张学良肩负奉军安危的重任，特带仪我、荒木两位顾问向绥中前线进发。

张作霖致电段执政表示：此次奉系内讧系小事，请其放心。

在山海关方面，向奉军投降的郭军士兵400余人，乘京奉列车到奉天。

奉军反复宣传郭松龄患重病，反奉态度有所动摇，意志消沉。

郭松龄通电东三省军政首要，阐述自己举兵返奉的理由。

传说郭军已经占领绥中。

冯玉祥与郭松龄密约已经暴露，报刊揭载密约内容有三条。

态度始终暧昧的李景林，见山东与河南战局对张宗昌有利，多少已出现动摇的迹象。

11月30日

张学良到达义县。

有消息说，在山海关郭松龄有与奉军妥协的企图，奉天派对此绝对不会同意，决心全力消灭郭军。

营口公布戒严令。

吴俊陞急速离奉归任，决定调兵援奉。

奉天城内大官家属开始到满铁附属地避难。

由奉天城内向满铁附属地避难的官绅日益增多，顿时旅馆客满，人数已达千人。

郭松龄与李景林联盟已经破裂，郭松龄一怒之下决心直攻奉天。

郭军前锋进军绥中，郭松龄到达山海关。

被郭松龄监禁的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位师长，由天津经海路到达大连。

郭松龄的刘秘书由海路来大连。

徐树铮从日本向段执政、张作霖、冯玉祥三方面发出和平解决通电。

京奉铁路由奉天至锦州客货运输仍在进行。

中东铁路管理局极力阻挠黑龙江军队乘车南下。

奉天省国粹会主持召开要求出兵大会。

为保护长春满铁附属地，中日居民联合组成自卫团。

12月1日

黑龙江军队开始南下，中东路管理局拒绝运送，黑省方面决定由洮昂铁路运兵。

哈尔滨公布戒严令。

师长高维岳等四人今日早上回到奉天，立即与杨总参议会面，据说一、二日内即赴前线。

郭军主力集中绥中。

郭松龄派遣的五名暗杀团人员被逮捕。

据情报，郭军有一列车军队运往天津，国民军第二军之一部已进驻廊坊。

郭松龄枪毙在秦皇岛掠劫民财之其部下官兵，一再整肃军纪。

据说，郭军缺乏武器弹药，以致影响其军事行动。

冯玉祥、郭松龄要求段执政将张作霖撤职，段执政正在考虑之中。

山东督办张宗昌向大连政记轮船公司借汽船四只，得到关东厅允许。据观测，他准备在济南战局一旦陷入不利，就准备由青岛经海路逃往满洲。

据报导，日本阁议决定不出兵。

宪政会要求日本政府确保日本帝国在满洲的特殊地位。

关东厅警务局第二次派出增援警官队十余名至内地。

12月2日

高维岳等四师长再次去锦州前线。

据报告，驻昌黎飞行队得知郭松龄反奉真相之后，十三架飞机逃归锦州。

郭松龄发出通电，要求日本中立。

12月3日

本日兴城一带降大雪。

据说奉军以连山为中心集中锦西一线，张学良司令部由锦州移向高桥。

吴俊陞在督办公署招集各机关代表，说明时局状况，并表示与张作霖采取一致行动，生死与共，表示自己亲自带兵出征的决心。

郭松龄要求北京外交使团严守中立。

今日早上在兴城发生小冲突，传说郭军有200余人投降奉军。

传说形势对郭军不利，投降奉军的部队有第40、第50两个团之外，还有原张学良的副官高纪毅所率之一个旅也不稳。

在本月2日冲突中，奉军骑兵由兴城败退，奉天城内顿时紧张起来。

#### 12月4日

张学良撤退到锦州，奉郭两军前锋仅距五英里。

奉军飞机侦察郭军阵地。

农商部次长莫德惠突然从天津来大连。

张作相于2日从奉天致电吉林家属设法避难，因此造成吉林城内人心恐慌。张作相来奉天与各方面协议，结果占上风的意见是：“大势已定，若双方均无决战之意，而给人民带来苦难，此乃毫无意义之举”。决定采取和平的内部授受政权的方式解决。

目前，正在准备由省议会、省商务总会派遣代表。

郭松龄把防备李景林的一个师调往连山前线。

郭军总攻准备于本日已就绪。

由于郭松龄的电请，林长民就任秘书长，并赴郭军阵地。

郭松龄的秘书殷汝耕从天津出发赴大连。

冯玉祥经李景林同意派遣使者携带密信前往协商，但双方意见不一致，李之态度已经明朗。

在北京的东三省籍国民党员决议，劝告张作霖下野，支持郭松龄。



## 12月5日

张学良今天驻新民屯附近。

据报告，从早上起奉郭两军大战，形势对奉军不利。

从正午起，在奉军中日本顾问极为紧张而忙碌。

据报告，午后奉军在兴城的战线被突破，奉军将领汲金纯率第9师溃逃，奉军陷入难以收拾状态。

兴城战败的消息传到奉天城内，人心惊慌。张作霖准备向奉天满铁公所避难。据说兴城附近战役，郭军投入炮48门、步兵11个团，对面奉军仅有炮4门、步兵8个团，兵力不足致使奉军惨遭失败，故决定退却。

调动驻长春的奉军南下的命令下达之后，人心发生动摇。

郭松龄对日本及国内外人士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主张。

郭松龄对部下许诺，迫张作霖下野之后，立即把张作霖所有金银财宝平均分给将士，并给与土地，以此来激励将士。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出动军队，以武力阻止郭松龄进军奉天。

为防止人心动摇，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警察人员等禁止发表对奉军不利的消息。

居住奉天的日本人召开要求政府出兵大会，决定向政府当局递交请愿书。

## 12月6日

在昨天战斗中，汲金纯率第九师溃退，奉军其他部队也都败退到锦州。

在昨天连山战场，汲金纯军队正在解除部分郭军投降兵武装的同时，遭到郭军从背后冲击，奉军左翼最先陷入混乱状态，汲金纯被迫退到丰乐镇。

张作霖陷入困境，准备让出奉天省。

张作霖处境狼狈，把现金数百万元及家财隐匿于日本附属地

某处。

据报告，奉军不断地把武器送往吉林，以备今后使用。

本日从奉天城向附属地避难的人数激增，马车、汽车络绎不绝。至本日避难者约一万人，其中有七千人乘汽车向辽阳、鞍山等地。

长春城内公布戒严令。

据报告，从热河撤出之后态度一向不明的阎朝玺于5日带兵进到山海关以东的郭军背后。

据报告，赤化宣传员已经进入满铁附属地。

郭军外交主任殷汝耕从天津来大连。

郭松龄发表对张作霖的六项要求。

李景林对冯玉祥的态度已明，以杨村为中心修筑长数英里的战壕两道，并且已经在马厂发生冲突。

四平街的日本人招开大会，请求关东军司令官增派一个师以上的军队。

驻在大石桥的日本守备队将派出48名士兵到营口担任警戒。

12月7日

顾虑治安紊乱，张作霖没有发表下野声明。

张作霖的态度趋于强硬，把败兵集中到辽河防线阻击郭军，自认为会转败为胜。当时，张学良率领炮兵一个联队（野炮24门，外加36门，重炮15门）、步兵三个旅为主力，把从前线退却的部队集中辽河防线，正在制定最后决战计划，奉军处于紧张状态，尚有一线希望。

杨宇霆、王永江联名电召驻盘山的汲金纯紧急回奉，并把兵力集中之后开往巨流河。

奉军大势已去，犹如落日余辉，一般来说奉军没有多少取胜把握。

奉军交通团长为炸大凌河铁桥带队西进，与郭军前锋发生冲

突，未能达到目的。但在归途将新民以西的铁路桥梁和给水塔全部破坏，使郭军进入新民至少延误一周时间。

因铁桥、轨道、电线已被破坏，白旗堡以西的情况完全不明。

张作霖电复郭松龄表示他可以宣布下野，但断然拒绝交出杨宇霆。

吉林军队方面战斗意识不高，张作霖等主战派对张作相难以有所期待。

郭军前锋占领沟帮子，郭军司令部进驻锦州，准备向辽河防线发动总攻击。

郭松龄的秘书蔡多祥从天津出发赴日本。

殷汝耕于午后在大连大和旅馆招待各界名流，就反奉问题与各方交换意见。

驻奉天各国外交官照会日本吉田总领事，要求日本维护今后的治安。

日本南满驻屯军开始向奉天集中。

从本日起，日本兵进入奉天城内担任警戒，城市秩序平稳。

日本出兵消息传出，南满洲排日风潮有再起的征兆。

#### 12月8日

在连山战败的师长汲金纯从营口经南满路于午后三时半紧急回奉天。

奉军在辽河东岸修筑一日里长的大战壕。

张作霖已决然放弃下野的打算，若在辽河战败，即退守吉林再图恢复，因而极力把兵力集中在巨流河。

李景林通电表示绝对服从张作霖。

郭松龄通电奉天省各机关，表明进入奉天之后的施政方针。

昨天说要去奉天的殷汝耕，因病中止北上，今日早上访问满铁会社干部。

国民军下达命令对李景林军队发起全面进攻，从午后起京津之间铁路运输中断。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向奉、郭两军提出警告，如果战乱危及日本利益，日军就要动用武力。

日本政府为了严守中立，特决定不出兵，但声明授给关东军随机措置的全权。

日本政府决定在各驻在领事向奉、郭双方递交警告书的同时，对双方再行进行调停。

满铁会在奉天铁道事务所内特设临时时局事务所，满铁理事梅野兼时局事务所所长。

#### 12月9日

吉林军1100名返回吉林。

午后十时，郭松龄进入锦州城，市民表示欢迎和拥戴郭松龄。郭军纪律严明。

马厂之战，李景林得胜，国民中普遍反对冯玉祥的赤化主义的气氛渐浓。

#### 12月10日

张作霖对日本的警告书给予答复。

郭松龄接到白川司令官所发的警告书，立即派使者向冯玉祥征求意见。

郭军对营口的中国官署发出通告，“务必把河北站列车编组送往沟帮子。如果不遵照执行，即炮击营口”。

据报告，在双台子附近出现郭军骑兵300人。

午后四时，郭军十余人乘渔船漂到复州娘娘宫，声称因不堪忍受饥寒而逃亡。

据闻中国方面对日本出兵持疑惑态度，国民军首脑就此事质问日本公使芳泽。

据报告，苏联在北满的威胁逐渐暴露。

守田福松氏为进行调停，从旅顺经海路去锦州。

据报导，关于日本在南满洲特权地域的范围是指整个南满，还是条约所限地点，日本政府与政友会意见不一致，南满洲动乱引起日本国内政治斗争。

据报告，为了补充满洲驻屯军，由久留米师团派出混成大队去满洲。

### 12月11日

奉军内部意见尚未完全统一。张作霖身心疲劳。城内极为混乱。

以北陵为中心修筑南北长约六英里的弓字形战壕。

奉军以巨流河为中心修筑防御阵地，约七千名民工昼夜不停地施工。

第12师长裴春生在新民以西招募马贼，不知被何人枪杀了。

驻镇东的骑兵第三营向通辽方向出动，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借口防马贼而迟迟不出兵。

传闻郭军从高桥进入锦州，攻击奉军侧面。

据确报，对于奉郭战局有很大影响的天津战局对李景林有利。以前，经李景林之手救出奉军四个师长和两个旅长，据说他以此为交换条件要求奉军援助军饷、武器和弹药。

本日激战，国民军损失数千士兵，从杨村退却，李景林军进至张庄。

国民军第二军的一部不肯服从冯玉祥、岳维峻的调遣，擅自进入山西。传说山西督办阎锡山击退这股国民军。

日本政府对满洲动乱持傍观态度，陆军对此感到不满。

日本陆军已做好增兵准备，态度颇强硬。

### 12月12日

奉军在奉天城内招募民工五千人送往辽河阵地。

张作相接到张作霖电报，带卫兵120人赴奉，林顾问同行。

吴俊陞一行于午后到洮南，连夜向四平街进发。

黑龙江军拟于13、14、15日连续三天运兵1380人、马90匹沿四洮线南下。

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及其部队迅速经由郑家屯向通辽方向前进。

郭军的一部从沟帮子右折进兵营口。

郭军集中在沟帮子。

郭松龄针对白川司令官所发警告，公布复照文书的内容。

日本公使芳泽发表声明，否认奉军中有日本兵。

据报，山西督办阎锡山准备进攻国民军。

日本陆军准备就绪，对某师团下达出动的密令。

#### 12月13日

奉军在辽河、新民屯附近大量集结军队。

奉军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郭军没有进攻之前首先向郭军发动总攻击。

吴俊陞午后四时半到达奉天。

据报告，郭军的一部集中在田庄台。

郭军向营口道尹发出征调米面的命令。

营口佟道尹向郭军提出条件，希望维持治安。

郭军一部渡过辽河出现在牛庄村，威胁海城。

郭军炮兵到营口辽河北岸，市内陷入混乱。因为辽河有浮冰，炮兵渡河困难。

郭军路经之绥中、兴城等四县，将县知事斩首，任命自己人担任县知事。

郭军一部由盘山北进，在巨流河的奉军左翼受到威胁。

郭松龄通过守田福松大夫之手致函吉田总领事：“在完全接收东北政权之际，当然保护张作霖及张学良的生命财产，并把各部队收容在北大营，等到城内秩序恢复之后，再进入奉天城”。

殷汝耕致函日本外务省次官出渊，希望日本严守中立。

国民军与李景林军各以五、六万之兵力对峙，在杨村南部大约一日里地点，拂晓开战。

到达营口辽河北岸的郭军1500人准备渡过辽河进入市内。日本守备队队长安河接着司令官白川的指示，把坚决不准郭军在距离铁道及附属地30公里之内渡河的警告传达给郭军马旅长。

营口代理领事棚谷警告郭军维持治安。

辽阳师团迅速派出一部去营口。

12月14日

本日张作霖对营口道尹及各机关发出关于维持营口治安的训电。

郭军对日军根据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阻止其渡河的警告仍未予回答。

阚朝玺态度仍然可疑。还有，汤玉麟、张九卿两军之一部向公主屯、新民屯方面退却。

在白旗堡东方，奉郭两军前锋发生冲突，郭军占领白旗堡。

奉天日本记者团电请关东军司令官出兵。

营口因有日本守备兵警戒，人心趋向稳定。

12月15日

本日据奉军飞机侦察，郭军主力仍集中在沟帮子，先头的一个旅已到达新民屯东南的白旗堡，从饶阳河到沟帮子现在运行和停站的列车共计21列。

今晚，奉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张作霖任总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张学良任前敌第一军司令，张作相任前敌第二军（右翼）司令，吴俊陞任前敌第三军（左翼）司令。

吴俊陞与张作相两军共同向兴隆店进兵。吴俊陞特选定从辽中方面进兵。

热河地方军一万名在石门镇攻击国民军一个旅，还有热河地

方军一万名南下山海关。

郭松龄表示如果张作霖不下野就绝对不能和平解决。

郭军为了运兵，派遣工兵队加紧修理已被炸坏的大凌河东岸至新民屯之间铁桥和给水塔。

郭军总司令部移到沟帮子，由于奉军奉命撤退，陆续向辽河左岸最后阵地退却。

郭军的使者蔡多祥在东京访问各知名人士，开始争取日本谅解和支持。

今晚，国民军猛攻驻在杨村的李景林军，附近村民多避难到天津。

在德州，山东军向河南军开战，击退河南军。山东军一旅到达距马厂120华里的地点。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第二次向奉、郭两军发出警告：“不准在距离南满铁道附属地及铁道终端约20华里（约12公里）以内地区直接作战；禁止任何危及日本附属地治安的军事行动”。

为了维持治安，关东军从大石桥驻军派出一个大队到营口。辽阳师团的一部也向营口出动。

鉴于时局变化，日本陆军决定向满洲增兵。河合参谋长上奏宫廷，得到摄政殿下批准。

陆军省发公告说，为了维持广大地区警备安全，向满洲增兵，只不过是补充已经减少半数兵员的满洲驻军。

下达动员令，第12、第20两个师团由日本出发。

12月16日

据奉军飞机侦察，郭军主力二万人向新民屯方向移动。

在柳河沟两军骑兵前锋部队发生小冲突。

郭松龄认为进入奉天城为时不远，不断地表露自己夙愿与设想。

郭军将至白旗堡铁路抢修完毕。



郭松龄认为吞并奉天指日可待。据说他准备尊重日军所发第二次警告的主旨，整肃军容，预计从北大营方面，全军有秩序地进入奉天城。

关于日军阻挡郭军进入营口市内一事，郭松龄通告北京外交使团。

在营口辽河北岸的郭军1,500名，除了炮兵一连、步兵一营及马旅长仍留原地之外，其余部队于今日上午八时四十分乘列车至田庄台下车。

为了正式交付第二次警告书，关东军大内参谋、营口代理领事棚谷到田庄台，把警告书与有关地图十余幅一同交给马旅长，会见三十分钟后，大内等一行返回。

日本陆军决定向满洲增兵3,500人，其中由朝鲜调1,000人，日本内地调2,500人。

驻平壤步兵第77联队的一个大队已于午前十一时四十分经过安东向北行。又命令驻汉城第78联队的一个大队于今晚、野炮兵一个中队于明早必须准时出发。

居住锦州的日本人由于感到郭军态度突变会发生危险，电请关东厅采取临机措置。

12月17日

盛传为了维护张作霖的面子，圆满地完成奉天政权的授受，某方面人士正在从中斡旋。

据情报，阎朝玺向驻锦州的郭松龄提出他于10日拟定的妥协条件十二条。

张作霖向东三省民众发表声明书，承认自己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是错误的。

赵恩臻师长收买进兵营口的郭军旅长马忠诚的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东三省公民团发表所谓对关东军司令官的声明书。实际这是

郭松龄的宣传手段。

十五日占领白旗堡的郭军为等待后续部队到达，今日尚无前进的迹象。

郭松龄收到冯玉祥援助的40万元，据说这是苏联大使加拉罕支付的。

集结在饶阳河附近的郭军从本日开始相继开始战斗布置。

郭军在山海关外修筑堑壕。

在营口辽河北岸的郭军700人（有迫击炮两门）、机关枪一个连及留守部队全部撤走。

郭军为了监视辽河北岸日本电话分局，通知局长已派二名士兵来局，被局长严词拒绝。

北京政府着手调查日本政府出兵的真相。

驻营口日本领事馆馆员为向郭军代表送交日本出兵的解释书而赴田庄台。

出兵满洲的日本旅团司令部出发。

关东军浦参谋解释所谓20华里内限制战斗，是根据炮弹射程计算出来的。

### 12月18日

许兰洲带着会见李景林的重大使命经大连赴天津。

据报告，吉林、黑龙江两军于本日大部分到达前线。

吴俊陞在奉天督办公署誓言必胜，遂赴前线。

吴俊陞所率南下军队至本日全部到达，计有官兵6,380人，马450匹，炮2门，马车119辆。

针对郭军派蔡多祥去日本游说，张作霖派遣丁鉴修赴日。

如果郭军到20日为止，还不发动进攻，其内部有可能瓦解，奉军前景可望乐观。

郭军马旅长所部于午前向沟帮子撤退，途中在田庄台西方村落开始大肆抢劫财物，许多村民逃往营口。

郭军向营口官民征用军饷，命令当地提供奉票三万元、面粉三千袋。营口官民惧而应诺。

郭松龄对日本第二次警告的复文送到关东军司令部。

日本军队把禁战区域略图出示给奉、郭两军。

12月19日

奉军阵地逐渐加强，以巨流河为中心的防线南北约长100华里。

奉军募集新炮手送往前线。

曾由奉天方面拟派往日本游说的丁鉴修取消日本之行。

据奉军飞机侦察，郭军主力在饶阳河、唐家窝堡。

据报告，汤玉麟军队在黑山县西部与郭军冲突，夺取郭军炮四门和许多武器。

因为天气寒冷，奉郭两军都遇到困难。

王永江说：郭军实力意外软弱，奉军必获大胜。

郭军占领柳河沟，奉军尚在新民屯。

日本派往南满的久留米师团和福冈师团的两个联队“选拔队”已经到达奉天。

夜十时，郭军强烈要求移交辽河北岸日本电话分局，日本代理领事对此提出强烈抗议。

12月20日

奉军由退缩防守方针一变为在饶阳河附近大举进攻的计划。

奉军骑兵一团在柳河沟附近与郭军前鋒约两个营发生冲突之后，郭军同时还击退拥有迫击炮和机枪的奉军增援的一个骑兵团。

闾朝玺自锦州陷落以来一直驻在义县附近，迟疑不向巨流河防线集中，最近向张作霖报告，已向驻在公主屯的张作相军靠拢。

据观测：郭军主力有炮70门、兵员17,000人，本日到达刘家

屯，沿铁路线前进；郭军另有携带炮30门的10,000名部队向大民屯进军，攻击奉军的左翼。

殷汝耕赴田庄台。

据报告，今晚又有郭军500人到达营口河北站。

驻日本汪公使强烈谴责日本出兵满洲。

由于陆军省电召，松井少将连夜起程赴东京。

关东军情报部在奉天东洋拓殖会社内新设“情报收容所”，从今日起开始办公。

### 12月21日

目前，奉军兵力六万以上，相当于在前线郭军的两倍，可是素质却比郭军大为逊色。如果奉军在指挥联络方面做得好，充分利用地理和其他有利条件，双方胜败一时尚难逆料。

吴俊陞率领500骑兵、10,000步兵，向大民屯进兵。

战地及其附近一带早上降雪。午前九时，郭军突然开始进攻，占领新民屯。

郭军在新民屯入城之际，还有第40、41、57各团步兵，骑兵第5团的一个营（有机枪16挺、迫击炮8门）陆续到达。

新民屯的中国人持国旗以表欢迎郭军之意。

郭军入城对居住在新民屯的日本人特别加以保护，部队继续向辽河右岸前进。

传说郭军于24日发动总攻。

晚上，郭军约一个旅兵力在公主屯附近遭到张作相奉军猛烈阻击而退到树林子。

郭军在奉军左翼增加兵力。

留守营口辽河北岸的郭军300人向沟帮子撤退。

据说段执政在家宅召开特别会议，商议将张作霖、李景林免职，任命郭松龄为奉天督办、孙岳为山东督办。

守卫营口的日本辽阳师团所属全部官兵共计53人撤回原驻

地。

在锦州居住的日本人感到处境危险，在领事分馆召开会议。

12月22日

奉天方面以都统张景惠、顾问范锡麟作为劝降使者，劝告郭军投降奉军。

从拂晓起，张作相军进攻郭军，夜里攻占树林子之后，继续追击，占领了距新民城北约一日里的腰高台子。

张学良军乘势前进渡过辽河，进驻巨流河附近。

夜十时半，在巨流河附近响起枪声。

郭松龄为对曾来访的日本新民领事分馆主任之回拜，特派高级副官来馆问候，并且询问：“日前，吉田总领事曾为我方与张作霖之间进行和平斡旋而奔走，但不知结果如何”。

日本政府内部出现对张、郭进行调停的主张。

12月23日

张作霖训令吉、黑两省省长，防止赤化。

从拂晓到十时半的战斗中，吴俊陞军步兵在大民屯方面取得胜利。

吴俊陞于午前二时率骑兵两个师从老达房出发，进军白旗堡，目的是切断郭军退路而全部占领白旗堡。

郭军前锋步兵三个团渡辽河进军大民屯，突然遭到奉军猛攻，退回辽河右岸，奉军追击之。

郭军主力部队步兵约两万人、炮队大炮百门，从白旗堡向大民屯进军。

巨流河方面的郭军亦为张学良军击败，退到新民屯。

奉军飞机猛烈轰炸新民屯，致各处起火。

奉军左翼汲金纯部队在汤玉麟率领第11师增援之下，击退对面郭军，俘获许多官兵及迫击炮、机枪和野炮等。

白旗堡被吴俊陞的骑兵包围，在该地的郭军司令部于午后四

时燃起大火。吴俊陞在电报中表示要逮捕郭松龄，正在搜索中。

郭军被包围在新民屯，大势已定。正午，郭军陷入大混乱状态。

拂晓，在巨流河战线的郭军迫于奉军右翼的优势暂缓进攻。

入夜，郭军高纪毅旅长与幕僚共同访问日本领事分馆，提出以保证郭松龄的生命财产为唯一条件，愿意和平解决，希望日本方面调停。

夜半，在郭军司令部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由于主张妥协者占多数，郭松龄命各将领采取自由行动。

奉军今夜开始发动猛烈的总攻，郭军被迫向西总退却。

#### 12月24日

拂晓，在奉天城听到从前线不断传来如远方雷鸣一般的炮声。

奉军用装甲车协助左翼军占领平安堡。

吴俊陞军占领柳河沟。

奉军仍然没有停止进攻，继续向西进军。

新民屯被奉军占领，邹作华率领郭军全部投降，电请张作霖指示处置办法。

奉军于午后大批进入新民屯。

午后一时半，张作霖接到郭军代表联名投降的电报。

郭松龄于正午在辽中县苏家窝棚被吴俊陞部下逮捕，午后被枪杀。

据报告，作为郭军叛乱的煽动者和参与者的林长民，还有黎元洪秘书饶汉祥被迫击炮弹击中而死亡。

殷汝耕、齐世英等人逃入新民屯日本领事分馆。

日本方面主张立即出面调停。晚上，内山领事等数人乘临时列车赴前线。

据报告，因为天津被国民军占领，李景林逃入日本租界。

### 12月25日

张作霖派参谋长于国翰到奉天满铁公所，对关于军事运输及其他事项给满铁会社增添麻烦，对此深表谢意。

阚朝玺部下的混成旅三千人、马300匹到达八面城附近。

准备在东京继续游说的郭松龄使者蔡多祥，今日早上悄悄离开东京。

今晚十一时，用汽车把郭松龄夫妻的尸体运到奉天，接受张作霖检验。

据报告，企图东山再起的李景林今晚从天津出发去大连。

日本方面警备会议决定，增援的日军部队和警察官已经完成任务，应迅速返回原地。

### 12月26日

奉军劝告在山海关的郭军魏益三部队归降。

张学良要求新民屯日本领事分馆引渡殷汝耕、齐世英等人。

郭松龄夫妻的尸体从午前九时起在奉天大东门外小河沿公园一角暴尸，前来观看者人山人海。

吴佩孚的使者吴天民来旅顺访问关东厅。

鉴于奉郭战争结束，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声明，日本军队撤回原驻地。

### 12月27日

奉军司令部设在新民屯，着手处理善后。

日本增派到满洲的军队陆续撤退，朝鲜派遣军最先撤回。

# 大 江 会

侯菊坤 整理

说明：大江会是1924年夏一些清华学校赴美国留学生在芝加哥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声称信奉“大江的国家主义”，以有别于历史上与当时流行的诸种国家主义。他们以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鼓励民气为主要任务，在海外做了不少宣传方面的工作，是留学生中较有影响并能量较大的一个组织。但是，它的会员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缺乏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在大革命前夕，他们一面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面又与国家主义派联合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因为在他们眼中，中东铁路、外蒙古独立等都是“赤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英、日没有两样。这些都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大江会人员不多，据梁实秋讲，最多时不过四五十人。可是这些人素质很不一般，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学者、教授。抗战以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抗战，有的还投入民主阵营，甚至为中国革命献出生命。无论他们走上哪条道路，都能从“大江的国家主义”中找到其思想上的痕迹。近年来，大江会在海外不时被人提及，但由于资料过于缺乏，以至多语焉不详。这里发表的有《大江宣言》、《大江会章程》、《大江会细则》、《大江会会员一览表》四篇资料，均系该会基本文献，得之不易，是研究近代社团历史的珍贵史料。《大江会宣言》是在会员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由罗隆基、何浩若执笔起草。大江会的组织实际长期处于松散状态，并非如章程和细则规定的那样严密。而1925年6月以后加入的会员名单，也未能在会员一览表上表现出来。这里一齐把它们刊登出来，是为了说明该会建立之始的设想，以及其组织成员的一般情况。



## 大江会宣言

### 一、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

近代国际史，乃帝国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互相冲突之历史。而近三百年来，此项冲突，更已达最剧烈最惨酷之程度。经此百年剧烈惨酷之战斗，我辈得一显明真确之公例。公例唯何？即任何国家，其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换言之，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

自存与侵占，皆人类之惯习。人群结合之动机，或在图自存，或在谋侵占，盖非此不足以适应生存于物竞天择之世界。诚如此者，一国家挟其政治、经济及文化之力，向外发展，亦人群惯习中极自然之行为也。故唯能自卫之国家，方能自存。此不必远古事，近代国际史即足明证比例也。

以世界全部论，挟政治、经济及文化之力以从事侵略者，最初为白种人。白人初与红人战，其次与黑人战，其次与黄人战。其间存亡胜败之绩，则均以各民族国家观念之厚薄为重要之标准。

最初遭白人帝国侵略主义之劫运者，为美洲红人。一四九二年欧人发现新大陆后，于是而殖民，于是而经商，于是而宗教宣传，于是而政治发展。美洲红人，固无所谓国家观念者，其结果红人完全失其自卫力，而为被征服之民族。

十八世纪中叶，一般移殖美洲之白人，前日以歼灭红人而得势者，今又畏后来者之侵略而失其势。同时代议主义与自由主义猛然发展。所谓代议主义与自由主义者，其根源在民约之说。准民约之义，盖谓一切政治团体，乃由自由，平等，且独立之份子经契约之手续而集合者。此项团体当时又称之曰民众，民众之目

的：对内谋团体之自治；对外拒强敌之侵略。此种团体自觉观念之发生即近代国家主义之起源也。

国家自觉观念既发达于美洲移殖之民众，其结果为一七七六年之独立战争。故一七七六年之战，谓之为自卫与侵略之冲突可也，谓之为近世国家思想与殖民运动之冲突亦可也。

国家观念经一七八九年法国政治革命及十九世纪初年之工业革命，其势愈近。其在美洲方面，则南美各邦谋脱离西班牙之统治而独立，即国家主义发达极端后与帝国侵略主义互相冲突之证也。美洲国家主义之势既日形膨胀，结果为一八二三年“孟罗主义”之出现。“孟罗主义”之重要条件，即欧人须绝对终止其在美之殖民事业，换言之，即欧人须绝对放弃其在美之侵略政策也。

欧人帝国侵略主义，既受美洲“孟罗主义”之打击，同时欧洲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顿然增加，向外发展之势更猛，于是欧人之侵略主义至是不得不转而他向。故一八二三年后，非洲之劫运开矣。

欧人之于非洲，其最初侵入者为葡萄牙、西班牙人，继之者为英人、法人、荷兰人。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之际，欧人势力之所及，不过非洲之边地耳。一八二三年后，欧人既受挫折于“孟罗主义”，乃不得不竭其全力以求非洲之开拓。从一八二三年至一八七九年乃欧人经营非洲之时期也。至一八八〇年非洲瓜分之局大致已定。英之于南部，法之于北部，西班牙之于西北，葡萄牙之于东南，其始也蚕食，沿边以入，其继也棋奕，严疆以守。非洲之黑人，美洲红人之类耳。国家观念，极其薄弱，其结果非洲黑人蹈红人之复辙而永堕万劫不复之境矣。

欧人之从事侵略非洲者德人独后。至一八八〇年德人在非洲独无立足之地。于是利益均沾之论，门户开放之论，国际共管之论顿出于德人之口。一八八四年柏林会议，谋其事者德意志，

主其事者毕斯麦。会议之结果，德人既如愿以偿，达其“均沾”“共管”之目的，而黑人最后之死刑即于柏林会议中执行。

一八八四年执行非洲最后死刑之日，瓜分中国之判词，虽未宣读，确已内定矣。

欧人之入中国，其开端远在一千年前。以宗教论，景教之流入，乃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天主教之流入，乃在元成宗大德年间，新教之流入，乃在前清嘉庆年间。以商业论，与葡萄牙人之互市在明正德年间；与西班牙人、荷兰人、法人、英人之互市，在明万历年间，然此不过欧亚交通之迹，尚不得认为欧人侵略中国之事实。

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以后，欧人侵略之端虽开，然以经营非洲之故，欧人尚未能竭尽全力以谋我。一八八五年以后，非洲瓜分之局已定，欧人乃席卷而东，而中国劫运乃真开始矣。

欧人之侵略亚洲也，其初固欲掠全洲而有之。其视黄人固不啻美洲之红人；非洲之黑人，盖欲一网打尽。于亚洲诸小邦外，中国本部，日本三岛欲一概占而有之。方传教师与商人侵略入广东澳门之际，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人、法人在九洲，四国之足迹盖亦殆遍。在十九世纪中叶当日情形，非亚二洲，盖有同归于尽之势耳。

与欧洲传教师及商人俱趋而东者，有十八世纪之政治革命思想及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思想。而此二种思潮，即近世国家主义之原动力。日本于一八六五年实行维新政策，对欧人之新智识尽量采用之。欧人以帝国侵略主义谋人者，同时以反帝国侵略主义武器授人，故日人三十年内，由被侵略者一跃而为侵略者。此又非欧人预料所不及也。

欧人帝国侵略主义既不得逞于日本，于是转其全力以谋中国。同时日本内力既已充实，乃渐图向外发展，一方面拒外力之侵入，一方面谋己国之扩充，前者为欧西势力所迫，后者为西方文化所

诱。因是同治十三年日本强占琉球，宣统二年，日本并吞朝鲜。在中国方面，除欧人之侵略外，又多一日本。

一八八五年后，中国大局，乃帝国侵略主义纷争之局耳。欧人与欧人争，日人复与欧人争。甲午之役日本得势，即欧人之失势也。故德、俄、法联名干涉远东割让，欧人非有爱于正义，更非有爱于中国，乃帝国侵略主义纷争上不得不然之举耳。

一八九九年之中国即一八八一年之非洲也。列强以均势主义为避免竞争之唯一政策。日人既割台湾，德即借口占胶州，俄夺大连、旅顺，英据威海卫，法取广州湾。凡此等等，均欧人瓜分非洲之故技也。

一九〇〇年，美国在中国之地位，等于一八八〇年德国之在非洲。以言土地，则尺寸无所据，以言贸易，则左右掣于人，故一九〇〇年美人之门户开放论即一八八〇年德人之门户开放论也。一九〇〇年美人之利益均沾论，即一八八〇年德人之利益均沾论也。所谓门户开放，所谓利益均沾，亦美国帝国侵略主义发展上不得不如此耳。所谓门户开放，所谓利益均沾者，亦美人向列强求得侵略上之均等机会耳。

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盖一八八四年之柏林会议也。柏林会议之前，英之于埃及与南非洲，法之于亚吉利亚，意之于屈里波里，盖早已握政治经济上之实权。柏林之会，特以完成国际共管之仪式耳。中国之被治，殆将八十年矣。税则之协定，税务司之组织，经济上之被治也；内河之贸易，铁路之管理，交通上之被治也；领事裁判权，政治上之被治也；租界驻兵，军备上之被治也。华盛顿会议特不过完成国际共管之仪式耳。由竞争而均势，由均势而开放，由开放而共管，此帝国侵略主义进行之自然步骤也。

故以世界全部而论，美洲红人以无国家观念而败，移殖之民以有国家思想而存，非洲黑人以无国家观念而败，日本民族以有

国家思想而存。中国今日则以缺乏国家思想之故已陷于日暮途穷之境。故曰：“任何国家，苟不託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

以欧洲近百年历史而论，亦复如是。欧洲在十九世纪之初，拿破仑拥百万之乘，北灭荷兰，南并意大利诸邦，东败普奥，西压西班牙、葡萄牙，且远侵英格兰、俄罗斯，盖欲以法兰西之帝国侵略主义称霸全欧。唯时被压各国，国家观念勃然振发，一八一五年之结局，谓之为国家主义战胜帝国侵略主义可也。不幸维也纳会议席上，梅特涅辈忘其战胜之由，反其战胜之道，竟欲以奥代法，而继续帝国侵略主义之事业。唯时意大利、荷兰、瑞士、波兰、土耳其等国，固全在奥、英、俄其势力范围之下。而诸弱国恃以与帝国抗者，国民之国家观念耳。一八四八年梅特涅出亡，奥国几不可收拾，英、俄、普亦慄惧万状，此又国家主义战胜帝国侵略主义纪念也。一八四八年后，所谓意大利者，地图上名称耳，实际上仍全受外来势力之支配。马志尼、加富尔、加里波里的三志士日以国家思想鼓吹，于十二年间，意大利竟能驱逐奥人而为统一国者，国家主义有以致之也。一八四八年后，所谓德意志者尚稽首听命于奥人。毕斯麦执政提倡国家思想，二十年间，居然统一诸邦，一败丹麦，再败奥国，三败法兰西，此又国家主义战败帝国侵略主义之事绩也。

一八七〇年后欧洲之意德，乃一八六五年后亚洲之日本，均由被侵略者一跃而为侵略者。若巴尔干诸国，若波兰，若土耳其，则仍在帝国侵略主义之下。然五十年来，欧洲之无时或息者，即弱国之国家主义与强国之帝国侵略主义继续冲突之悲剧也。大战以后，若波兰，若土耳其，若捷克，若南斯拉夫，若芬兰，得复兴而为独立自主之国家者，又国家思想之成功也。准是以观，则欧洲近百年之历史，其间盛衰兴败之绩，固皆以国家主义为转移也。故曰：“任何国家，苟其国民之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

侵略主义所歼灭。任何国家，苟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

## 二、中国目前变乱之原因

前文既已证明“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今且进而推论中国目前变乱之原因，以求挽救之道。

中国目前之变乱，盲目者谓为起于教育不普及，又其甚者谓为起于商业不发达，又其甚者谓为起于政客之播弄，又其甚者谓为起于军阀之专横。凡此皆倒果为因，不符逻辑之论也。中国目前之变乱，其要因如何？曰：“外人之阴谋耳。进言之，外人帝国侵略主义之阴谋耳。”凡以帝国侵略主义为政策者，其待弱国也，利其乱，而不利其治；利其分，而不利其合；利其保守，而不利其进步。故强国之于弱国也，始终包藏祸心，始终图谋煽惑，以离间为长技，以播弄为法术，处心积虑，诡计多端，其目的始终在把持弱国之政治，操纵弱国之经济，毁灭弱国之文化。前此列强之波兰，之于印度，之于土耳其，之于非洲各民族，皆明证也。

中国自道光以后，国内一切变乱，每次皆有外人离间播弄于其间，换言之，即无一次无外人之阴谋也。此固非空词嫁祸，历史事迹，彰彰可考也。

洪杨之乱，洪秀全一村学究耳，其举事也，称太平天国，天父天兄，耶稣教徒鼓动播弄之色彩，昭然若揭矣。岂宁如是，西人暗中之协助洪杨，史迹上固亦历历可考也。当时曾国藩复毛寄云中丞函云：“去岁两湖江西，虽非上熟，亦非凶年，而旱荒如此，实缘洋人采买太多，接济贼粮，各处华洋杂处，无可查集……”此固西人助长中国内乱之铁证也。洪杨乱成，于是英利其机而割缅甸；俄利其机而订璦琿条约；法利其机而入交趾；日利

其机而入琉球。不仅如此，英法乘中国自顾不暇之际，藉端启衅，攻破大沽，入掠京津，缔天津条约，攘夺重要主权以去。利人之乱而不利人之治，利人之分而不利人之合利，人之保守而不利人之进步，此彰彰然也。其后洪秀全入据南京，建最新朝，太平天国之气象且有取满清而代之势。西人恐洪杨革命成功，维新图治，将有大造于中国，而为帝国侵略主义之障碍，于是前日之祖洪杨者，今祖曾左；前日之助天国者，今又助满清；博格温、华德、戈登之流也。南京既破，洪杨瓦解，汉人改革精神，因是挫折，满清末弊政，因是而延长。道光后六十年间，中国变乱相循，迄无宁日者，帝国侵略主义者处心积虑，诡计多端有促成之也。

义和团之变，吾先民排外手段，固甚愚笨，而推原祸始，亦外人陷阱钩饵之策有以激之也。自鸦片战争以后，外人在中国者，为非作歹，越轨犯规之事，盖已无所不为。自一八四八年后，中国洋教案之事，层见叠出，抱帝国侵略主义者，固亦乐于此而得有所藉口也。一八七四年日本船员为台湾生番所杀，日本藉口侵入台湾。一八七六年英译员被匪戕害，英人藉口订烟台条约；山东曹州德教士被杀，德人藉口促据胶州。故中国多一次排外运动，外人即多一次攘夺机会，排外运动范围越大，则外人可藉口之题目亦愈多，而外人侵略之机会亦愈大。庚子之役，使馆驻兵、关税割让外，且得四万五千万之赔款。由是以观，庚子之变，固外人馨香顶祝而不可得者也。

辛亥革命之役，某氏述其事曰：“辛亥江苏独立时，作者正从程督于南京。一日，某国领事来谒程，屏左右言。是夕，都督密语余，‘明日将往沪请黄大元帅。’余曰，‘何也？’答曰，‘今日某国领事来，以某公使密电余，谓南京非另立政府，不足以推倒满清，故余必往促克强来宁。’次日，都督即行。……暨余次年入京，闻某使以清廷亲贵不足与谋，故劝项城自为之。合前后所闻，则

民国成立，由南京政府让与项城为元首，则某国全权公使某为之也。”

彼外人之劝革命党建设南京政府者，非助革命也，利中国之乱也，利中国之分也。其后拥袁，非真拥袁也，惧革命之成功也，惧中国之进步也。果也，革命之功半途而废，袁氏之祸至今未已。外人之操持计算，盖亦可谓穷极能事矣。

其后癸丑二次革命，某氏复述其事曰：“癸丑之役，长江七省同盟，由湖口独立，以致皖、苏、粤、赣、川、湘同时并举，固以宋案与大借款为导火线，而与日本亦未尝不有蛛丝马迹之可寻。……张勋、冯国璋攻南京时，日本兵舰横亘江中，牵制炮线，某国以兵缀其后，盖日人袒南，而某国袒北。袁政府以四十八日而平长江之乱，实由某国人主持大借款，与以充分之准备。癸丑之役，亦日本与某国为之也。”

其后洪宪变政，某氏复述其事曰：“丙辰之役，自四年夏筹安会后，继以请愿团正在举国若狂之日，适云南宣告独立，蔡锷起义于毕节，继之以黔桂独立，至次年三月二十一日召余起草取消帝制之令，人以为是国民反对则然耳。以余所闻，则外交之影响为大。其事甚隐，人罕知之。初政事堂参议往谒某使，某使其不赞成。其说帖余亲见之。及十月二日，某使忽覲见，是日问答笔记，无一词反对，与前件如出两人。盖某使已闻某要人言，日本业已赞成，某国如不然，恐中国商务必受损。于是阳为赞成，而阴诃中日间之秘事……是帝制之失败，亦某使为之也。……”

某氏之记述，特就其私人所知癸丑、丙辰二役以言耳。其后护法之战、直皖之战、奉直之战，列强鼓惑、播弄之迹，固亦公开之秘密也。即以民国十四年江浙奉直战争而论，日俄兵卒，甘作奉张先锋，英美侨众群效曹吴奔走。其后冯玉祥之变，事未发，而日本报纸先露其端倪，苟无阴谋于其间者，又焉能先悉人隐？军装也，战具也，源源接济；逃囚也，逋客也，随类收留。



彼外人者，胡为为之？亦曰利人之乱而不利人之治，利人之分而不利人之合，利人之保守而不利人之进步也。善夫某氏之言曰：“吾国经一次变乱，则外交权利亦损失一度，外人势力又增高一层。痛夫，哀哉！吾国民方日堕三涂而不自知也！”

此特就内政一方面立言耳。以近八十年来中国之外交史观之，则列强操纵中国之外交，其祸更烈于操纵内政也。国家之生命，一方面在内政之自由发展，一方面在外交之自由措置。今日中国之内政，其被人鼓惑、播弄，固已若是矣；而外交之被人束缚、桎梏、宰割、支配者，其惨祸更不堪问也！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之外交，非中国与列强之外交，乃列强与列强之外交。中国外交政策，固可由列强与列强代订定之；中国外交问题，固可由列强与列强代解决之。一八九八年英德伦敦条约，一九〇二年日英同盟条约，一九〇五年日俄和约，一九〇七年日法条约，一九〇七年英俄关于西藏之协定，一九〇八年日美鲁脱高平约，一九一七年蓝辛石井条约，凡此皆举不胜举之证例也，凡此皆列强间直接解决中国问题之证例也。即以一九二一年华盛顿会议时所订之九国公约而论，名则尊重中国主权，保持中国独立，实则束缚、桎梏、宰割、支配中国之凭据也。一国之主权，必待外人之公约而始得尊重，则国家之主权已失落矣；一国之独立，必待外人之公约而始得保全，则国家之独立已损伤矣。易地而居，使英日法共订公约，以尊重美国主权维持美国独立者，美国人民对此当如何耶？使英法美共订公约，以尊重日本主权维持日本独立者，日本人民对此又当如何耶？我国人民则对此束缚、桎梏、宰割、支配、损害独立、丧失主权之条约，视为国家主权上之保障，认为国家外交上之胜利，噫，不亦谬哉！

以外交政策而言，中国百年来无外交政策之可言。有之，亦列强间代为订定之政策耳。庚子以前中国之外交政策，为维持“利益均沾”；庚子以后中国之外交政策，为保守“门户开放”。所谓

利益均沾者，列强志在瓜分；所谓门户开放者，列强志在共管。瓜分之弊，以中国一部分土地人民，为其他一国之奴隶。共管之弊，则以全中国之土地人民，为列强公共之奴隶也。利弊得失，可以见矣。以列强论，则共管优于瓜分，盖由自由竞争之侵略，而入于列强互助之侵略也。以中国论，则共管之祸，甚于瓜分，盖在自由竞争之侵略政策下，外交上尚有纵横离间之机。若在列强互助侵略之下，则侵略者彼此有充分之谅解，有妥协之计划，有公订之条约，而被侵略者无噍类矣。此则今日中国之外交政策也。无耻者流，于门户开放主义，且歌功颂德，噫，不亦谬哉！

近百年来之外交，合纵连横，云翻雨覆，极变幻阴谋之能事，而中国则一切被人束缚、桎梏、宰割、支配，其直接影响于国家内政，间接影响于国民心理者，当何如耶？故曰中国之乱，在外人之阴谋！

前此特就政治、外交而言耳。以八十年来中国之经济状况考之，则列强操纵中国之经济，其祸更烈于操纵内政与外交也！自工业革命以后，帝国侵略主义已由政治的进而为经济的。而目前中国之紊乱，与其谓之为政治上之分裂，亦毋宁谓之为经济上之破产。中国经济破产之原因，则列强经济的帝国侵略主义实负其责也。

工业革命以后，欧人生产力增高，于是凭恃武力，强求开辟商埠，以畅销其余货，鸦片战争其明例也。通商以后，贩贱卖贵，取土货以去，运洋货以来，辗转筹划，以事剥削。同时西人以为欲在贸易上操必胜之券，则非把持中国之关税不可，盖关税自主，则中国保护工商业之工具尚在，一切利用得方，尚足以制西人经济侵略之死命。故从一八四二年以后，西人渐次谋中国海关权之攘得者，盖亦深有意也。

海关税既归西人掌握，国之利器实已授人。一方面中国幼稚之工商业失其护卫，一方面国库之收入被其限制，由是国

家经济，不得不仰给于外债。外债协定，必有极重要之担保品及交换利益。而列强所要求以为担保品者又均为赋税、山林、矿地、交通等产业，赋税、山林、矿地、交通等产业，既归外人掌握，则国之财源愈竭。财源愈竭，则债务愈重，债务愈重，则担保品愈多，如是循环演进，全国产业非尽归外人掌握不止，而国家破产矣。

所谓外债者，其来源既出诸洋资本家，洋资本家为保全其权利计，势不得将资本主义移植中国。于是洋资本家利用中国之土商富户及洋化之留学生，在中国从事大规模之工商业计划，以剥削一切中国贫民。同时中国之土商富户及洋化之留学生，财力上复不能独树一帜，以与洋资本家抗衡，久之亦流为被压迫之贫民。其结果一切大工商业完全操诸外人之手。其结果外人为中国之资本阶级，而中国人为世界之劳动阶级。至是，则中国全体沦为经济之奴隶矣。试观今日中国商埠之现象，足证此说之非虚也。

列强既成为中国之资本家，则不得不充实其在中国之武力，以图资本上之保护。租界驻兵、使馆驻兵、军舰之调集、戍伍之扩充，相因而至。至是，中国内政之变迁，与外人资本之安全，有密切关系，外人更不得不操持中国之内政以维持其资本之安全。故前此武力及政治为经济的帝国侵略之先驱者，今则为经济的帝国侵略之后盾矣！

列强即成为中国之资本阶级，则列强为保全公共利益起见，不得不放弃前此自由竞争之手段，而采互助之政策，六国银行团及九国远东公约即其明证也。列强在中国之侵略政策，果能互助，则侵略之势力愈牢不可破，而中国之祸更切矣。

中国财源既入外人掌握，本国工商业又失其护卫而不能发达，是以经济益困，民生益艰。由是，仓廩虚而不知礼义，衣食乏而不识荣辱，盗贼蜂起，内乱相寻，故曰，今日中国之紊乱，

外人阴谋有以成之也。

前此特就政治、外交、经济而言耳。既以数十年来中国之文化情形考之，则外人之毁灭中国文化，其祸更烈于操纵政治外交及经济也。一国之文化，为一国之国性，国性丧失则国亡矣。

文化的帝国侵略主义之事迹，其彰明较著者为教会教育，教会教育在欧西各国几已成历史上之陈迹，稍有常识者，既能洞悉其流毒，以洋教会而侵入中国教育范围内，其流毒更当何如耶？

以中国现状而论，教会教育之范围极广，其势力极大，其流毒亦极深。凡教会势力所及处，即有教会式之小学。在小学教育中，彼传教师者，即以新旧约教导儿童，在中国儿童心理上植一牢不可破之惧外、媚外且祖外之思想。更进而至于教会教育之中学大学。于是强迫礼拜，强迫读经，以完成其所谓洋化教育之程序。最后择其洋化最深甘作利用者，资送留学以惑其心，代课职差以固其信，而后驱使之，指挥之，以作宣传洋教之奴隶。数十年来教会教育之结果，类皆如是也。

黑暗教育，其毒甚于无教育；洋化教育，其毒又甚于黑暗教育。此有识者所公认也。彼为教会教育辩护者，谓十年来教会教育之结果，确已使数十万不识字者识字，使数十万不读书者读书，而今日中国留学界中，其受教会教育之培植者亦不少。虽然，此片面之论也，实则数典忘祖，出主入奴，为中国前途莫大之隐忧者，即此识字读书，洋其衣服，洋其饮食，洋其论言，洋其文字，洋其眼光，洋其见解之奴隶也。此又非过甚之词也。今日之从教会教育出身者，其曾诵读中国经典者几人？其能明晓中国史事者几人？又其甚者，其能认识中国字者几人？其能应用中国语言者几人？为中国人矣，不识中文，而识洋文，不懂国语，而懂洋语，此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者也，而造此妖孽者而又谁之赐耶？

吾辈固亦承认今日中国社会中有少数聪明漂亮之人物矣，而此类人物又为教会教育出类拔萃之人才。然今日中国之卑污下

贱、蝇营苟狗、冯道孔光辈者又为谁耶？不识中国伦理为何物，不知中国节操为何事，内政之紊乱，外交之屈辱，类皆此一班人物之功绩耳。故曰，无教育胜于黑暗教育，黑暗教育胜于洋化教育也。

文化之侵略，固不止一端也。窃收古器，盗买宝藏，偷换名迹，暗运珍品，此则通商传教以后公开之秘密也。迩来且明目张胆，借退还赔款之名，而图操纵中国之教育事业、中国之出版事业、中国之图书事业矣。噫，是直欲火中华之书，庐中华之居，其阴谋诡计，抑何其可畏也！

夫一国之文化，乃一国土气民风之所系，国性藉以寄托，人性藉以安息，今则中国文化受人之摧残也若是，人心失常，国事变态，此亦情势所必然也。故曰，今日中国紊乱，外人阴谋有以成之也。

一国之政治为人把持，一国之外交为人操纵，一国之经济为人掌管，一国之文化为人摧残，则一国之社会仓皇失措阽隍不安之现象亦自然之势耳。而帝国侵略者尚不肯甘心焉。有土匪起，则利用土匪之机而要挟，有灾荒起，则利用灾荒之机而宣传。国中一小变故，则帝国侵略者之报纸及通信机关从而张大其词，铺饰其事，发电通函，派将遣兵，内以惶惑人心，外以假造舆论，一方面向中国政府抗议，一方面与土匪流寇通声气，甚或高谈中立，假充调人，阳为局外，实乃罪魁。愚民见洋势力如是其重要，于是更有所凭藉而为乱，洋势力见愚民如是可利用，于是更有所凭藉而侵略，愚民与洋人交相为用，而国事不堪问矣。故曰：今日中国之紊乱，外人阴谋有以成之也。

前此诸端，均足以证明中国乱源，在外人之阴谋。虽然，设中国国民之国家观念发达者，设国民能以国家主义自卫者，则外人亦无所用其技矣，故就反而言，则今日中国紊乱之原因，谓之为缺乏国家主义亦可也。

中国国民之乏国家观念，非中国人有亡国之天性也，特历史事迹使然耳。某氏昔论其事曰：“昔者吾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非不能为国民也，势使然也。吾国夙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耳目所接触，脑经所濡染，圣哲所训示，祖宗所遗传，皆使之有可以为一个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家人之资格，有可以为一乡人之资格，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为一国国民之资格。”

准是以谈，则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特历史、地理及文化之关系使耳。唯其背景如此也，故中国人之弊有二：（1）有天下主义而无国家主义；（2）有个人主义而无国家主义。中国有天下主义而无国家主义，其原因在于误认中国为天下，前说已备论之。唯其认中国为天下也，故今日世界和平之说得以乘之。夫所谓世界和平者，人类社会之最后目的地，苟非癫狂残暴之流，无能悖此义者。唯达此世界和平之目的，固亦有一定之途径耳。孔子曰：“国治然后天下平”。乃谬谬者流，于鸡犬不宁，干戈未宁之中国，而高谈世界和平，其不识时务，抑可谓极矣。又何其愚陋而不自量耶？

其次则有个人主义而无国家主义。独善其身此中国圣哲持以教育也，其弊流于极端之个人主义。然近数十年来，所谓独善其身之道者，盖亦已成迂阔而不切事实之说矣。今之所谓个人主义者，家奴走狗式之个人主义耳。某氏昔论此事曰：“家奴走狗于一姓而自诩为忠者，为一己爵禄也，势利所在，趋之若蚁，而更自造一种道德，以饰其丑而美其名也。……然试观刘渊、石勒以来，各种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无汉人以为之佐命元勋者乎？昔嵇绍生于魏，晋人篡君而戮其父，绍靦颜事两重不共戴天之仇敌，且为之死，而自以为忠。后世盲史家，且或以忠许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尚之忠德，将为此辈污蔑以尽也，无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愿为之吮痛，有能贵我者，吾愿为之

叩头，其来历如何，岂必问耶？……不见联军入京，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呜呼，痛哉！言念及此，无眦可裂，无发可竖，吾唯胆战，吾唯肉麻，忠云忠云，忠于势云耳！忠于利云耳！……”

某氏之说，发于数十年前君主时代耳。君主时代，家奴走狗之个人主义，犹有说也，孰谓至民国十四年之今日，而家奴走狗之主义，犹牢不可破，此真可仰天捶胸而泣血者也。媚外之事且勿论，洪宪之役，袁世凯之家奴走狗为之也；复辟之役，满清之家走狗为之也。直派也，奉派也，皖派也，此皆一班家奴走狗拥戴之名目也。此家奴走狗皆知有主子，而不知有中国也，皆知有主子之成败荣辱，而不知有中国之胜衰存亡也。人心之颠倒，至是而极，士气之衰颓，至是而极。欲国之不乱，乌可□耶？外人之阴谋也如彼，中国人之乏爱国思想也又如此，内外患忧以成今日中国万劫不复之象。此则中国紊乱之原因。据此，且以讨论挽救之方。

### 三、大江的国家主义

我辈前文既已证明“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者，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复次，更证明今日中国紊乱之原，一方面由于外人之阴谋播弄，一方面由于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准此，今且从事推论挽救中国之术。吾辈认为挽救中国之术，一言以蔽之提倡国家主义而已。“国家主义”四字释义甚泛，且其定义复因时因地而异。从学理论，国家主义之说，有以种族为根据者，有以语言为根据者，有以地理为根据者，有以文化为根据者，有以政治历史为根据者，有以心理意志为根据者，有合上列各根据为根据者，有离上列各根据而另为根据者。从国家主义之过去历史论，有意大利之国家主义，有德意志之国家主义，有匈牙利之国家主义，有波兰之国家主义，有印度之国家主义，有土耳其之国家主义，

家主义，有其他各国之国家主义。再进之，八十年前意大利之国家主义，复不同于八十年前匈牙利之国家主义；马志尼之国家主义复不同于葛苏士之国家主义。再进之，昔日意大利之国家主义，复不同于今日意大利之国家主义，马志尼之国家主义复不同于穆叔林里之国家主义。准此，则“国家主义”四字之释无抄袭之必要，更无抄袭之可能也。准此，更知中国人所提倡之国家主义，除以中国为根据外，更无抄袭之余地也。准此，更知在国家主义之定义上，而欲引外来之学说及事实，以作根据者，即为违背国家主义自身之信条，盖忘却本国一切现象，即已忘却国家，忘却国家即无以为国家主义矣。

我辈大江同人所信仰且誓将实践之国家主义，乃中国人对中国之国家主义也。大江的国家主义其定义为：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

所谓“中华人民”者乃对外与美国人民、日本人民、意大利人民、俄罗斯人民、英吉利人民等等相对之名词也。中华人民内部虽有汉满蒙回藏五种族之分，而精神上历史上，此五种族已团结成为中华国家，中华国家之生命其表现于外者，为中华人民全体的一切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之自由活动。保护中华人民一切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之自由活动者，为中华人民所组织之中华民国，代表中华民国以行使职权者，为中华民国政府。

中华民国政府与世界其他各国之政府，若英国政府若美国政府若日本政府若法国政府若意国政府处同等之地位，且享有领土上及统治上同样之权利。凡有侵犯中华国民政府领土上及统治上之独立者，是即侵犯中华民国之主权。凡有侵犯中华民国之主权者，是即侵犯中华人民政治上经济上及文化上之自由。进之，是即摧残中华人民全体之生命。凡有摧残中华人民之生命者，即为中华人民全体之公敌，中华人民全体即当起而一致之抗御，此即大江的国家主义之基本原则也。



所谓谋政治上之自由发展者，即谋中华民国领土上之保全，且谋政治上之完全独立。

所谓领土保全者，厥有二义：其一，则谋近百年来中华领土被人割据者及租借者之恢复；其二，则谋现在领土之安全。台湾、香港、九龙、旅顺、大连、广州湾、威海卫等等，以形势论，中华之锁钥，以富源论，中华之宝藏。中华人民守之，足以拒外敌之侵入；外人得之，足以制中华之死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盗入内室，病侵膏肓，此中华人民为保全生命计，不得不谋恢复者。此所谓领土之保全者一也，满州、外蒙、青海、西藏此领土之名存实亡者也；内地辟租界，首都驻外兵，掌握邮电特权，盘据交通孔道，此领土半存半亡者也。阴谋未已，隐忧方深，早不为计，贻患无穷。此我中华人民为保全生命计，亦不得不谋拱御者也。此所谓保全领土者又一也。

政治上完全独立，其义亦有二：其一，政策之自由；其二，统治上之自由。近八十年来中国之内政与外交，无一定之政策，亦绝对不容有一定之政策。庚子以前，中国之内政与外交为“势力范围”所羁缚；庚子以后为“门户开放”所牵制。吾辈信仰国家主义者，以为中国政治中国人之政治也，一切政策当由中华人民全体意志决定之。势力范围也，门户开放也，凡此皆侵越我中华民族政治上之自由者也，皆吾辈之所当反对者也。所谓统治之自由者，以立法言，海关税则不得自由订定；以行政言，税务局司不得自由管理；以司法言，租界罪犯不得自由审判。是中国统治上实已等于被治国矣。此又吾辈信仰国家主义者认为中华民族史上之奇耻大辱也。

所谓谋中华经济的自由决择者，其义有二：其一，则中华经济政策之自由决择；其二，则中华经济事业之自由决择。鸦片战后，中华经济上之束缚，远过于政治上之束缚。经济上之束缚其因，政治之束缚其果也。故欲求中华政治上自由，必先求中华经

济上之自由。中华经济政策上之最大障碍，莫大于势力范围与门户开放二原则。维有势力范围，故中华不能有统一之经济政策；维有门户开放，故中华不能有自由之经济政策，所谓势力范围者，即某国于中国之某部分有经济上之独占权及优先权也。由是政治上，中国为四分五裂之政治；经济上，中国复为四分五裂之经济。诚使中国欲统一中国之铁路也，维势力范围故，实际上即感莫大之困难。铁路之在西藏东三省者中国政府必秉承英日之意志以行，其在云南者又必秉法人之意志而行。铁路事业如是也，航行事业如是也，矿产事业如是也，其他工商业皆如是也。中华人民欲自订定一经济政策，以求国家经济之发展，痴人说梦耳。庚子以后，门户开放之原则成立，中华举一外债也，前日可商之任何国者，今则必请命于银行团；订一约也，前日可商之任何国者，今则必请命于公使团。凡此一切经济发展，前日由列强各就势力范围以代中华决择者，今则由列强公开协议代中华决择之。而决择之原则，又不能违背“当用彼等之势力，以期有效确立并维持各国人民在中国全领土之工商业机会均等主义”（九国远东公约）。至是求中华经济上发展无望也，求中华生命之保全，更无望也。故曰谋中华人民生命之保全，当谋中华经济政策之自由决择。

复次，手工工业制度，不足与机器工业制度相抗衡，已成为不可掩盖之事实。在最近期内，中国必经一次之工业革命，以机器制度代替手工制度，亦将为无可疑义之事实。实际观察，则工业革命之在中国实已发其端倪。惟在此工业革命过渡期中，中华国家应有一种国家的经济政策，以顺导其势，始不至蹈欧西各国工业革命后阶级战争之故辙。而以现势论，此又万难实现之希望也。今日之势其弊有二：其一，外人利用其资本以开发中华之工商业，其结果则列强为资本阶级而中国人为劳动阶级。其二，列强利用中国之土商富豪，更及一班无识之东西洋留学生，以开发

中国之工商业，其结果，则将中国之土商富豪及少数东西洋留学生养成中国未来之资本阶级，而西洋之资本家仍占其太上资本家之地位。而中国资本家以利害关系，故又不得不与一班太上资本家联合一气，以保全其地位。二者有一于此，中华大多数人民之生计绝矣。故曰：欲求中华人民生命之保全，当求经济政策之自由决择也。

今且舍经济政策而论经济事业。中国今日之破产，非中华自作孽之破产，外人迫之，不得不破产也。以海关而论，在美国法国日本其抽货之税率，在百分以上者，比比皆是，中国则何如者；即舍主权而不论，今日中国财政濒于破产者又谁为之耶？此就直接影响于国家财政直接收入者而言耳。以商业论，中国近数年来输入超乎输出者三万万以上。即此一端，长此以往，即足以制中华人民之死命。推其远因，则又中华人民经济事业上失其自由决择权所致也。复次，则列强利用其在中华路矿交通上之特权，而剥削中华人民者其数目每年又在数万万。以南满铁道而论，每年所获纯利已达五千万。此特就外人自筑之铁道而言耳。以国有铁道而论，其修筑费皆仰资外债，外人从债权上所取得利息已不少矣；外债之合同，债权国又每每有材料及工程师之优先权。债权国复得利用优先权以取回其债值。故列强之视外债，亦犹取之内厩而藏之外厩耳。复次，列强资本家拥其财力在中国创立大银行、大工厂、大公司，以压倒中华人民一切小本营业，且以操纵中华全国之金融，此其祸更不知伊于胡底。凡此均足以制中华人民之死命。故曰：欲求中华人民生命之保全，必谋中华经济事业之自由决择也。

所谓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者，即谋中华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同时且反抗一切以西方文化笼统的代替东方文化运动。一国文化，乃民族历史上之产物，一国典章文物纲纪法度之所出也。故文化即为国性，梁任公之论国性也，其言曰：“国性果为何物耶？以何

因缘而成，以何因缘而坏耶？如何而为隆，如何而为污耶？国性无具体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类共栖一地域中，缘血统之吻合，群交之渐磨，共同利害之密切，语言思想之感通，积之不知其几千百岁也，不知不识，而养成各种无形之信条，深入乎人心，其信条具有大威德，如物理上之摄力搏抟全国民而不使离折也。……就其具象言，则一曰国语，二曰国教，三曰国俗，三者合而国性可得而见矣。”由是以言，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文化之自由演进，即国家生命之自由演进也。

文化无绝对之美恶，特随环境以为变迁，随环境以为应用。世界各民族有不同之环境，故有不同之文化，而世界各文化，应听其自由交接，自由取舍，自由调和，自由变化，此则人类求进化之正当轨道，亦我辈所谓文化自由演进之义也。而帝国侵略主义者谓白种人之文化远胜于黄种人之文化，谓西方文化远胜于中国文化，谓欧美文化远胜于中国文化。又其甚者，谓白种人之文化必起而代替黄种人之文化，西方文化必起而代替东方文化，欧美文化必起而代替中国文化。于是从鼓吹之，宣传之，威迫之，利诱之，以冀中国文化之毁灭，欧美文化之传播。诚如是者，此非中华文化生命问题，乃中华全国生命问题也。苟中华人民不欲自绝其国于生命也则已矣，不然者又安得不起而防御？故曰：欲求中华全国生命之保全，必谋中华文化之自由演进。

由是以观，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决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乃中华人民生命问题之所必要，亦即我大江会同人所谓之国家主义也。

#### 四、大江会宗旨

大江宗旨，简单言之，即：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

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

大江所谓内部改造运动者，非统一问题，非制宪问题，非单一制与联省制问题，非裁兵废督问题。凡此皆政治改造上之末节，十余年来国人所奔走之歧途也。大江之所谓改造运动者，在促进中国人民对国家之一种自觉心。在提倡中国人民一种成仁取义死节赴难为国牺牲之气节耳。

中国人民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知有个人而不知有国，我辈已备论之矣。故中国一切内乱之现象，亦果而非因；而改造运动，亦不得舍因以求果也。

昔日梁任公批评中国人也，其言曰：“闻他人之议瓜分我也，则嗷然以啼；闻他人之议保全我也，则輶然以笑。君相官吏，伺外国人之颜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伺父母。士农工商，仰外人之鼻息，趋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梁氏之论，发于民国以前，而近年以来，国人之“先意承志”有加无已，国人之“趋承奔走”有加无已。人心如是，则内部分裂，固亡也，统一，亦亡也；单一制，亡也，联邦制，亦亡也；裁兵，亡也，废督，亦亡也；盖中国人民已具此亡国气象，亡国心理，亡国志愿，则虽不求亡而不可得矣。

苟中国人民尚有一些之国家观念者，则官僚以文乱法，军阀以武犯禁之罪孽，不至若斯之极。苟中国人民尚有一些之国家观念者，则文官要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之怪象，亦不至若斯之极。事已至此，是士大夫已具亡国志愿，国民已具亡国心理，而国家已呈亡国现象矣。

为今之计，在此黑暗昏沉之中国，必须有一次绝大之改革运动，在人民精神上作一次掀动，以斩绝当道亡国之志愿，涤洗国民亡国之心理，扫除中华亡国之气象。而此项精神改革运动，即我辈大江同志认为中国内部改革之初步，而大江同人誓死以从事者也。

复次，内部改革运动之第二步，即在打破此老朽顽固之政局，而求政治之革新。凡信仰国家主义者，即信仰国家之功用，盖欲抗御强敌之侵略，必内部具组织完备之政治机关，有精明干练之政治人才。今日中国现状，适与此相反也。国省州县之政治组织，已成陈锈残缺之机器；十、百、千、万之政治人才，已成顽固迂腐之人物。前者当全盘刷新，后者当一律撤换，故吾辈深信今日中国之内部改造运动，即在吾辈有血性有志气之青年，奋起成仁取义死节赴难为国牺牲之精神，以求治法治人之完全更张。换言之，即求中国政治上彻底之革命也。

政治革命之第一条件，即在驱除一班老腐愚顽为民害之政治人物。民国以来，一切当道若袁世凯，若徐世昌，若冯国璋，若段祺瑞，以及今日遗老官僚，皆退院之僧，闭房之妇，穷途之过客，落日之游人，此皆宜安逸闲乐，终老余年，其精力，其知识，绝不宜主持中国政治者；而国人拥之以入政治，故十余年来中国政治频于老腐之象。民国以来，一切当道若曹锟，若张勋，若吴佩孚，若张作霖，以及今日一般政客武人，皆周之鼎，汉之彝，唐宋之画品，元明之墨宝，是皆不识时务，不谙潮流之古董也。绝不宜参与二十世纪之政治，而国人听其参与政治，故十余年来中国之政治频于愚顽之象，此今日中国政治之大病也。

今日中国，青年人之中国也。故政治亦应为青年人之政治。我辈青年人，与此国为缘之日正长，国兴，我辈躬享其荣，国亡，我辈躬受其辱，国之衰败沦亡，我辈青年人切身之痛苦也。故一切国事，我辈青年人当出而自任其全责。青年人共起以代替一班老腐愚顽之执政，此即内部革新运动开端也。

老朽顽固之政治人物既去而后拥戴有智识有道德有才能之政治领袖，根据二十世纪之政治原则，组织适合二十世纪之青年政府。强有力之政府既产生，而后利用政府之力量以求教育之整顿，工商之发展，国防之建设，社会之改善，终而及于帝国侵略

主义之撞击。

教育方面，吾辈确认无教育胜于黑暗教育；黑暗教育胜于洋化教育。故今日中华教育之改造：第一，即扫除一切宗教式的洋化教育；其次，则当以国家主义为教旨；其三，则求强迫教育之实现；其四，则求高等及大学教育之改良。今日中国之高等及大学教育，其惨毒甚于无教育也。教会教育无论矣，国人之办之大学，类皆残缺不完，有名无实之教育机关，养成游手好闲之士绅，造就一无所长之流氓，中国宦途充塞，政局污秽，皆十余年腐败黑暗之高等及中学教育所作之孽也。此又我辈大江同志，认为内部改造运动上必须清洗者也。

手工制度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之生活，已无疑义。故促进中华之工业革命，以求中华工商业之新发展，殆已为不可迟缓之事实。唯我辈国家主义者确认此等发展工商之计划，由中华政府进行之，其能率其利益当千百倍于私人之竞争与活动。诚如此者，则国家为将来唯一之资本家，而工业革命后经济上阶级战争，或可避免也。同时我辈公认在工业革命过渡期中，政府应制定一切社会立法，以为劳动者之保护，而为机器工业制度流弊之预防。

国防政策，尤为吾辈信仰国家主义者所注重。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公例，在今日尚未失其效用；武装和平尚为世界各强国普遍之政策。在此大势中，弱国而不注重国防，其政策实等于自杀。

国防之初步，即为举行强迫征兵制，我辈国家主义之信徒，认为凡为国民者，已享受国家之权利，即有护卫国家之义务。至若中国国防海军之建设，中华国防航空军之建设，以及一切学校及其他运动团体以尚武及爱国精神训练国民，则均刻不容缓者也。

复次，社会改造一端政府亦应负完全责任。社会改造治本之法，我辈认为应从人口问题着手。鼓励积极的优生，以求优秀分

子之增益；提倡消极的节育，以免愚劣分子之充斥，实为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其次残废痼疾之养护，低能疯痛之隔离，妾婢娼妓之废除，乞丐游民之处置，烟毒赌博之禁绝，凡属与公共卫生有关之事，亦政府责任攸归也。以上问题不解决，则中国即不能有健全之人民，即不能有健全之社会，即不能有健全之国家，而同人等提倡之国家主义亦即不能收久长之效用。凡此诸端皆大江对内之宗旨也。

我辈对内改造运动之目标即在抗拒帝国侵略主义之残暴。三百万方里之面积是中华民族之产业，誓不能供帝国侵略主义者之霸占。四万万自由之民众，是中华民族之嫡嗣，誓不能为帝国侵略主义者之奴隶。主权完全独立，领土完全归还，修正一切不平等条约，解除一切不平等待遇。此则大江对外之宗旨也。

我辈相信所谓帝国侵略主义者，乃目前少数暴民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之现象，若非洲全部民族，若中美南美各民族，若欧洲近东各民族，若亚洲之印度民族朝鲜民族等等，此皆与我中华民族在少数暴民专制之帝国侵略主义下受同样之压迫也。凡此皆与二十世纪真正民治精神相背驰之现象也。我辈大江国家主义者，将于民族自决主义下求被压迫诸民族之互助。以打倒少数暴民专制之帝国侵略主义。此亦大江对外宗旨也。

我辈更相信所谓帝国侵略主义者，乃列强间少数资本家，乃资本家豢养之军阀政客之政策。此种政策，实与列强大多数国民之意见相背驰。故我辈大江国家主义者，所反对者，乃列强主持帝国侵略主义之阶级，而非列强之大多数民众。我辈且愿与列强之民众联合打倒帝国侵略主义以求国际间开诚布公之合作，以达到“国治而后天下平”之目的。此亦大江对外之宗旨也。

最后，我辈大江国家主义者，愿郑重向世界申明：和平，乃中华民族之天性，今已成侵略者国交上之骗术；亲善，乃中华民族之规律，今已成侵略者口头上之诈语。八十年来，历受压迫。



往者已矣，后患堪忧。我中华民族爱和平，我中华民族更爱人道；我中华民族主亲善，我中华民族更主正义。为人道而奋斗，我辈不惜杀身以成仁，为正义而拒争，我辈不惜舍生而取义。先国家而后一切，舍国家外愿牺牲一切，以求中华民国之自由独立与统一。是则我辈之所愿也。

大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大江国家主义者谨宣言

## 大江会章程

### 第一章

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大江会。

### 第二章 宗旨

第二条 本会宗旨为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

第三条 大江的国家主义，乃中华人民谋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及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

### 第三章 会员

第四条 凡中华民国国民赞成本会宗旨，经本会法定手续之通过，皆得为会员。

第五条 本会会员须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

第六条 本会会员须绝对服从大江章程、细则及多数通过之议案。

第七条 本会会员入会时须行宣誓典礼。

第八条 本会会员有创议权、复决权及罢免权。

第九条 本会会员非经法定手续不得退出。

### 第四章 组织

第十条 本会设理事会，以理事长一人，理事四人组织之。

第十一条 本会理事会为本会最高立法机关。

第十二条 本会执行机关由理事会产生之。

第十三条 本会执行机关暂设文书、理财、宣传、研究四部。

第十四条 本会执行机关各部部长，由理事长提出，经理事会之同意产生之。

第十五条 本会理事长及理事任期一年。

### 第五章 选举

第十六条 本会理事长及理事由会员分期互选之。

第十七条 本会理事长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如无得票过半数者，则取得票数最高者之二人再选之。

第十八条 本会理事以得票数最高者四人为当选。

### 第六章 开会

第十九条 本会每年举行通常大会一次。

第二十条 本会遇有紧急事故发生，得由理事会召集临时大会。

第二十一条 本会大会以全体会员过半数之出席为法定人数。

### 第七章 修正

第二十二条 本会章程得由全体会员十分之一之提议，投票人三分之二之通过修正之。

###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本会进行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方面。

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第二章第二条及第八章第二十四条不得修改。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自通过之日起发生效力。

## 大 江 会 细 则

第一条 新会员入会时须得会员三人以上之介绍及理事会三

人以上之通过

第二条 会员出会时须向理事会申明理由并经理事会之通过。

第三条 会员如有违犯章程或细则时须受相当之惩罚。

第四条 本会理事会有惩罚会员之权。

第五条 本会会员在美时期中每月须缴纳会费美金二元。

第六条 本会会员回国后应照每年所得依累进法缴纳会费若干。凡每年所得在千元以上千五百元以下者，每年应缴纳其百分之二，其余按照六百元与千分之五之比例依次累进，至百分之五十为最高限度。

第七条 本会遇有特别事故时，除通常会费外，得征收特别费。

第八条 本会文书部设部长一人，记录、中文文牒、英文文牒若干人。

第九条 本会理财部设部长一人，会计若干人。

第十条 本会宣传部设部长一人，其组织由部长随时规定之。

第十一条 本会研究部设部长一人，其组织由部长随时规定之。

第十二条 本会各部属员皆由部长指派之。

第十三条 本会审计员在每次年会中由会员互选之，并在该年会中报告其审计结果。

第十四条 本会通常大会及临时大会之时间地点，皆由理事长规定之。

第十五条 会员不能到会者得请其他会员代表，但代表人所代表者以一人有限。

第十六条 本会会员接到开会通告后，非经理事长或开会负责人之特别允许不得规避。

第十七条 本会会员得由全体人数五分之一以上之提议行使提议，复决及罢免权。

第十八条 罢免案须经投票人三分之二之通过方为有效。

第十九条 本会会员在美时凡有三人以上之地点，得由理事长指派一人负责在该地组织支部。

第二十条 本会规定入会誓词如下：“我誓以我的名誉发誓，愿绝对实践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章程细则，服从多数，为中华民国牺牲一切。此誓。”

第二十一条 本会会员被选举或委派为任何职员或任务时，非经选举人或委派人之许可不得规避。

### 大江会会员一览表<sup>①</sup>

孔繁祁	何浩若	吴文藻	沈有乾	沈宗濂	吴景超	吴泽霖
沈镇南	胡 毅	胡竞铭	徐宗溇	时昭沅	梁治华 <sup>②</sup>	浦薛凤
陈钦仁	陈华寅	张继忠	黄荫普	闻一多	翟 桓	熊祖同
蔡公椿	潘光旦	刘聪强	薛祖康	魏毓贤	罗隆基	顾毓琇

① 此名单为1925年6月以前入会者，后来又发表过一些，但未见文字记载。

② 梁实秋。

## 重光葵手记——缪斌事件

郑 基 译

**编者按：**《重光葵手记》于1986年在日本发现，主要内容是重光担任日本外相及其它要职时的工作笔记，涉及战前日本政治、外交不少核心机密。《缪斌事件》一文详细记述了日本首相小矶国昭召声称代表重庆的缪斌赴日进行“和平谈判”的始末。这篇史料的价值在于：一、它暴露了日本帝国覆灭前夜统治集团核心在战略上意见分歧，步调紊乱，激烈勾心斗角的内幕；二、重光葵以“局内人”的身份揭示出缪斌其人蒋介石“布在日占领区的一着棋子”，其任务是向重庆提供情报，离间日汪关系。战后，小矶对他同缪斌“和平谈判”供认不讳；江苏省高等法院则对缪斌判处死刑，以表示国民党政府与缪及小矶—缪斌谈判无涉。这篇史料对这一历史疑团提供了一则释疑的佐证，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原文见东京中央公论社出版的《重光葵手记》（1986年11月版）第461—475页。

缪斌事件如实地反映了小矶内阁的面貌，说明了这届内阁自行垮台的内幕。从这个材料可以察觉日本政治的根本毛病是多么深刻啊。

缪斌<sup>①</sup>（周彬）是曾在日本私立大学求过学、能讲流利日语的

① 缪斌：1895年生，江苏无锡人。北伐时期在蒋介石嫡系第一军任师党代表。1929年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1929年——1935年为国民党第三、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炮制伪“临时政府”，缪任新民会副会长。1940年以后，任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立法院副院长、伪考试院副院长。1945年8、4月间，缪应日首相小矶国昭之召赴东京，代表重庆与日方讨论“中日全面和平”（本文注释为译者所注）。

五十岁左右的男子。他在中国蒋介石政权之下作为国民党党员，过着政治商人的生活，同重庆政权的情报组织戴笠等人保持着关系。

可以认为，缪斌其人是蒋介石退却重庆之后布在日军占领地区进行活动的一着棋子。他在表面上同日军合作，而实际上是一个手腕毒辣的人，目的是搅乱和削弱日本在“和平地区”的（指日本控制下的沦陷区——译者）的力量。在中国这样的人一向是不少的。当日军在北京组织新民会以取代国民党的时候，他成为新民会的一名首脑，从新民会内部为重庆工作。当南京新政府宣告成立，汪精卫任主席“还都”之际，日本军方主张不准汪精卫一派实行国民党一党专制。于是，非汪系分子缪斌作为立法院副院长参加了政府。他在上海拥有无线电台，不断地同重庆通讯。日本方面则想尽力利用他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搞重庆方面的情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缪斌充分地加以利用并达到了目的。这主要是，向重庆准确无误地反映日本方面在“和平地区”的内幕；其次，离间汪精卫南京政府同日本方面的关系，搅乱日本方面的行动，进而全面按照中国方面所期望的那样解决日华事变<sup>①</sup>，予以结束。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深深地打入了日本方面。

笔者在南京任职<sup>②</sup>（1942年1月到1943年4月）期间，有一天（大使馆）参赞中村（丰一）飞跑着来找我，说发生了重大事件。他说，按照汪主席的命令，缪斌被逮捕了。其理由是缪斌一伙人暗通重庆的事被发觉。笔者反问中村道，对通敌者处刑，这不是政府主席当然采取的措施吗？经中村参赞解释，我才明白原来日本方面也在试图利用缪斌搞到重庆方面的情报。笔者就去劝说汪主席，结果总算把缪斌释放，左迁为考试院副院长了。

① 指卢沟桥事变后的日本侵华战争。

② 重光葵当时任日本驻汪伪大使。

## 二

要使南京和上海同心同德，即使是同志也是有困难的。要在南京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必须先把上海牢牢地掌握在手里。

在日军颐指气使之下，南京政府要控制住上海这个复杂的国际都市，极为困难。上海这个地方即使在日本占领之下，共产党、国民党的代表、情报员都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方面，在中国问题上乱设机关，政策混乱纷歧，中国人要想搅乱日本方面的内部，那是轻而易举之事。

缪斌在上海设有办事处，以对重庆和平为钓饵，引诱日本，实际上用无线电同重庆方面联络，提供情报，暴露南京政府的内幕，以求一举达到解散南京政府和搅乱日本方面内部的目的。

日本方面为取得情报而可被缪斌利用者，为数不少。南满铁道公司驻沪调查机关就是其中之一。小川爱次郎的调查机关也是。政治掮客且同大谷光瑞关系密切的相内(重太郎)之流，当然也属此类。他们这些人推动同南京对抗的日本海军，在侨居上海的日本人当中制造舆论，还利用陆军的一部分人。这些人都会被共产党和重庆方面的人操纵过。

为收集情报而成为缪斌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朝日新闻》驻沪通讯员田村(真作)，一个职业情报员。他是极为单纯的热血汉子，是感人的民间有识人士。他为日本军方一部分人所宠爱。与东亚联盟派的《朝日新闻》社社会部记者出身的御(美)、土路(昌一)等属同一类型的人。田村依靠缪斌搞到反对南京的特大情报，更进一步对重庆工作发生了兴趣。当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主持《朝日新闻》的时候(绪方入阁前为《朝日新闻》社副社长——译者)，他前往南洋旅行路过上海，经田村介绍会晤过缪斌。缪设筵招待绪方，大事欢迎。《朝日新闻》同支持南京的一派《每日新闻》相对抗，愈益成为“上海派”，遂被缪斌所利用。

## 三

小矶内阁成立后，小矶想着手搞的就是他生性喜好的谋略外交。他一直没有从三月事件①、十月事件②乃至满洲事件③的恶梦中苏醒过来。他所谈的外交以及在最高会议④上提出的，都是些不合道理的计谋权术。陆相杉山(元)多次提醒笔者说：小矶对谋略很有兴趣，在本人担任陆军次官时小矶任军务局长，他玩弄权术计谋，我感到非常头痛。要加以提防。

小矶对重庆工作表示异常关心，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其策划的谋略之一就是缪斌事件。小矶在听了绪方的谈话之后，表示有意使用缪斌开展重庆工作。但笔者和陆相、海相都表示反对。小矶多次说：“如果今天不专心致志地搞重庆工作，必将遗憾百年！”

## 四

小矶及其左右任意插手外交事务，试图推行其谋略外交。内阁中的二宫(治重)⑤、绪方当然是这样，其它还有小矶私设的秘书长本间(雅晴)等人，为数不少。为了实现对华谋略外交之目的，他们将东亚外交机关随意支配，(小矶)企图改组内阁，让二宫出任大东亚大臣，但终未成功。此后，小矶的谋略无法实施。在今年昭和20年⑥2月中旬，小矶突然对笔者说：总之要叫缪斌到东

① 三月事件：1931年陆军青年军官法西斯组织“樱会”桥本欣五郎等策划于3月发动武装政变，谋推翻政党内阁，拥陆相宇垣一成组成“军部内阁”。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参与这一阴谋。但因宇垣变卦而未遂。

② 十月事件：桥本一伙策划于1931年10月下旬发动的又一次未遂的武装政变，拟推举陆军皇道派头子荒木贞夫为首相兼陆相。后因“樱会”内部分歧而未发动。

③ 即“九·一八”事变。

④ 应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1944年8月设置。负责策划决定指导战争的根本方针，调整政略和战略。

⑤ 二宫治重当时任小矶内阁文部大臣。

⑥ 即1945年。



京来一趟。笔者回答说：这需要考虑。请你征求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意见。因为我认为陆海两相不可能赞同。但到了3月21日，小矶首相突然召集只有最高会议成员参加的会议，提出了缪斌问题。绪方国务大臣也特别列席这次会议。

小矶首相就重庆工作叙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为了积极推行这项工作，与绪方国务大臣协商之后，考虑邀请缪斌到东京来，想听听外相、陆海两相的意见。他们虽不感兴趣，但认为邀请缪斌到东京来，听听情况是可以的。因此，邀请他来了。缪斌在四、五天之前已由相内陪同来到东京，但因为没有带无线电机和无线电技师，不能同重庆直接通讯，因此想让他从上海把无线电机和技术人员都弄来，同重庆直接通讯，搞清楚重庆的意图，进行工作。据绪方国务大臣同他会谈的结果（——据缪斌后来亲口透露，他已经同小矶首相会晤，交换了意见<sup>①</sup>。这一点尽管已经清楚了，但小矶在会上特别秘而不宣），缪斌说蒋介石不信赖日本方面，特别是日本军部的话，因此日本方面必须先解散南京政府，单方面从中国撤兵，这样才能承认日本方面的诚意，才能接受同日本的协商。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要搞清楚这是不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如果搞清楚这是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就通过这一渠道进行工作。为此认为让缪斌把他所使用的无线电机和技师弄到东京来，用以同重庆直接通讯，这是适宜的。希望有关部门支持。小矶提出这样内容的文件，要求最高会议讨论。

绪方国务大臣补充了首相的说明，谈了他在《朝日新闻》社时期在上海同缪斌晤谈的经过。

杉山陆军大臣对此表示反对。他说，不清楚缪斌同重庆的关系如何就着手此项计划是危险的。本来缪就被看作是重庆派来

① 缪斌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一、关于处理满洲问题，另行协商；二、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三、重庆政府暂在南京设置看守府，三个月内还都南京；四、现南京政权要人由日本政府收容；五、日本与英美讲和。

的间谍。

接着，外相说，战局发展到了今天的阶段，当然外交上的施策有缺欠，但是对丧失大义名分的做法必须充分注意，本人对首相刚才的说明因事关过分重大，对其影响之深刻感到不安。即使这样，也有必要将自己的立场明确一下：我对邀请缪斌一事一贯反对。而且最高会议已经决定，重庆工作必须由首相同外相商议进行。但首相今天邀请缪斌进行如此重大活动的提案，必须明确说明：迄今为止我没有参加任何协商，从辅弼天皇的责任出发，必须明确指出以上情况。（外相）又朗读了日本驻华大使谷正之拍来的三封有关重庆工作的电报。

其中第一件，乃小矶内阁成立之初决定通过南京政府进行重庆工作，趁柴山（兼四郎）就任陆军次官之际，以卸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告别致意的名义访问了南京。当时他按照政府的意图，向南京提出了和平意图及条件<sup>①</sup>。当时南京政府秉承其示意，派遣一名叫做周文隆的人前往重庆。这份电报就是蒋介石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报告的日期是1月6日。蒋介石的回答是：他同美国之间已缔结盟约，事到如今已不可能同日本媾和。

其中第二封电报是汇报（日本驻华大使馆）秘书清水（董三）在上海会晤缪斌（周彬）的谈话要点，如实地披露了缪斌的见解。第三封电报是反映谷大使从大局着眼的意见书，缕缕陈述这样搞“重庆工作”，不要为日本和中国的政治掮客所乘。

外相谈完“重庆工作”后，（小矶）首相讲歪理说：重光君所说怪矣，并借此又说：最高会议是决定“重庆工作”由首相同外相商量进行，但我也明确表过态，关于收集重庆的情报，我自己也搞。外相因为要讲的话已经说了，就没有回答。

<sup>①</sup> 柴山于1944年9月14日向陈公博、周佛海传达了日本的“和平条件”，一、中国宣布中立，使美英撤军；二、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汪蒋直接谈判；三、废除日汪同盟条约；四、如美英撤兵，日本也撤兵；五、不改变满洲国的现状。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说:既然是一国的首相,竟同这样的人为对手谈重要大事,这是什么问题?对方可就此得到有力的情报。但就我方而言,再没有比这样做更危险的了。接着,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反对说:现在一撤兵,美国军队当然要跟踪追击,其后果不堪设想。军令部总长及川(古志郎)未表达意见。

首相因有它事退席,只剩下外、陆、海三相,大家都为小矶的过于轻率而感到吃惊。大家认为:作为一国首相如此无谋;实在令人不安。陆相补充说,缪斌对柴山次官泄露说,他除了已同绪方国务大臣会晤之外,还会见过首相。小矶却特别隐瞒了这一情况。

外相质问究竟什么人提供了飞机。杉山陆相说,小矶不好向他提出,屡次托柴山次官。柴山没有办法,只好从中协助。柴山后来解释说,他听首相讲,外相、陆相、海相都是赞同的。

日本议会重新召开。在议会议事堂里,外相同陆、海两相就缪斌问题作了交谈。大家意见一致,尽快将缪斌送回上海。内阁书记官长石渡(庄太郎)和绪方情报局总裁就此共同达成协议。绪方在我们有关四人面前明确回答说:在二十六、七日用飞机把缪斌送回去。为此笔者也就放心了。

## 五

4月3日是神武天皇的祭日。好久没有休息,我在三番町家中静静独坐在书斋里思索。忽然有宫中召见之事,心想不知为了何事。进入吹上御苑的防空室,俟侍从长到来询问,始知陛下对缪斌问题感到特别担心。圣上日理万机今日连这类事情都要烦扰圣聪过问,实惶恐之至,亦对首相的态度为之叹息。

拜谒时,陛下赐坐。

陛下说:别无他事,是那个缪斌的事情。

我将谷正之大使大约一周前报告从事“重庆工作”的政治掮客

名叫周彬者来日的电报呈请御览。上次觐见时，陛下垂询周彬系何许人。我答称恐怕就是缪斌，并说明缪斌的来历，附带表示：首相邀请这种人来日实属轻率之举。但对最高会议情况以及和首相的关系，我什么也没有讲。然而此次陛下忽然问及我缪斌的事。

陛下说：究竟把认为是重庆间谍的人找来干什么呢？无论日本军队怎样忠诚，在目前没有船舶的情况下，要在三个月之内从中国撤兵是不可能办到的。而且取消南京政府、上海市长，有违国际信义，必须从大义名分上考虑。昨天已经见到小矶首相，谈了这件事。首相竟敢顶撞，说就此把缪斌送回去太可惜了。于是，今天(上午)召见了陆、海军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陆军大臣说利用缪斌这种人，真是岂有此理，表示强烈反对。海军大臣说一国首相竟会邀请这种人进行重要谈判，实乃无谋之甚。天皇垂询：外相是怎么考虑的？意见如何？

外相说：关于缪斌的事，据重光所知，此事已作处理。在议会将闭幕时，大家已经谈好，把他送回上海。小矶首相也已同意。绪方国务大臣也知道。尽快使其(缪斌)回国。

陛下说：事情并非如此。据海军大臣说，在四、五天以前(小矶)又犹豫起来。

外相说：是这样吗？那就知道了。臣诚惶诚恐。重光认为，本来对外问题必须一致，否则一定要失败。对陆、海军其它方面都已联系，正在采取统制的方针。邀请缪斌问题，原来是小矶内阁成立之初提出的，由于了解其为人，故一直表示反对，遂决定通过南京政府进行“重庆工作”。尽管如此，缪斌不知何时到了东京。

如果战局进一步恶化，结果不得不解散南京政府并从中国撤兵，届时也应仪态大度地按正常途径进行，为了国家的未来应该如此。今天如为缪斌等人的阴谋活动所乘，丧失国际信义，不顾

大义名分，我认为终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局面。

陛下说：很清楚了。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召见首相，强硬地同他谈一谈，或者由三大臣（陆海外三相——译注）同首相谈，促其反省，怎么样？

外相：重光已经明确拜聆陛下的意向。我立刻去见首相，使其按照陛下的意志处理此事。

在重光退出之际，内大臣<sup>①</sup>木户（幸一）等待觐见前，同侍从长藤田（尚德）一起在候见室走廊交谈。藤田说，内大臣今天的觐见是第三次了。事情未如圣上所期望的那样发展，真是遗憾。小矶首相是经常玩弄小权术的谋略家。（缪斌）这桩事据说是《朝日新闻》社田村牵的线，听说同宇垣（一成）大将间接也有关系。小矶首相在宇垣大将从中国考察归国之际，曾提出请陛下听取他的考察报告<sup>②</sup>。我（藤田）作为御使曾去征求内大臣的意见，结果没有召见宇垣。今天发生冲绳决战这样的事态，觉得太让陛下担心了。在木户内大臣觐见前于候见室的一席谈中，我大体掌握了缪斌一事之全貌。综合起来，其来龙去脉如下：

据缪斌说，蒋介石无论对日本军部，或者对日本政治家，都不予信赖。因此必须由日本方面先表示出诚意。为此日本方面须先解散南京政府，并单方面开始撤军。进而说，蒋介石所信赖的唯有天皇陛下。关于以此为基础进行谈判之事，想听听陛下的想法。由于正面有陆、海、外三相的反对，小矶首相想从侧面进行，遂派遣绪方去找东久迩宫殿下<sup>③</sup>，想说服殿下。殿下应其请求接见了缪斌，详细地听取了他的陈述。即使身为皇族也不能直接去

① 内大臣：宫中辅弼天皇的首席政治顾问。

② 宇垣一成：曾任陆相、外相。1944年9月，他假借考察为名旅行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试探同重庆进行谈判。无结果而归。他向小矶内阁提出建议：重庆工作需开辟新渠道，南京政府的存在对该项工作有妨碍。

③ 东久迩稔彦：皇族，日本天皇裕仁皇后的叔父，娶明治天皇第九女为妻。本人为陆军大将。

打听圣上的意图。因此他召见了木户内大臣，说明事情经过。木户内大臣听后大吃一惊。内大臣告诫东久迩宫说，不仅殿下不能这样做，内大臣也不行，殿下反驳道：“假如叫首相用恶劣的情绪去处理此事，于事不利。究竟是谁给了缪斌旅行的便利呢？还不是政府吗？”这些话一般说似无可厚非，却于大局无所裨益。今天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有终结战争的决心，并为此而采取相应措施。但对整个形势不作任何判断，想赢得战争，战斗到底，并为此搞“重庆工作”。这样却为敌方捣乱开其端，真仅是玩弄无聊的小聪明。所谓自动撤消南京政府，从大陆撤兵等，既不考虑战争如何，又不决定基本政策，是不会有结果的。关于战争终结问题，笔者为之日夜苦心焦虑。对此，小矶首相既不进行磋商，也没有正确的判断，对国际动向毫无认识，仅听凭一浮浪之人所说，竟然以主动撤兵为基础，通过无线电把谈判公开披露，这种态度真意味着日本的崩溃。如有披露这种会谈的决心，就应该直接同主要敌人去谈判，而不应当同重庆这样的从属者，或其间谍去会谈。仅凭灵机一动就玩弄国际谈判，再没有比干这种事更危险的了。事到如今，终于到了最后的阶段。

陛下经过一一了解，于是4月2日在首相觐见时作了严肃的批评。首相同绪方一道似乎在与缪斌进行谈判。在4月2日觐见天皇之际尽管受到陛下的批评，但首相仍然说就这样让缪斌回去太可惜了。陛下向内大臣和重光讲，对首相抗言争辩极为不快。木户内大臣说：陛下说有人对其抗言争辩，尚属首次。陛下认为田中义一首相、宇垣外相和这次的小矶首相是同一类型的人，不能信任，而以此次最为严重。

木户4月3日同笔者在皇宫走廊的候见室会晤时，听说我马上就去同首相谈判，促使其遵从陛下的意思行事。木户说，此事无论如何也必须请陛下对小矶予以严厉的训示。我判断，木户同

重臣<sup>①</sup>一样，认为小矶不行，决定让小矶下台。

4月3日傍晚，笔者去访问小矶首相，劝其对缪斌问题不可以那样办，应该立刻把他送回去。小矶答道，上午陆、海两相来访，得知天皇垂询的经过，我已经打电话给陆军次官柴山，商定4月6日用飞机把他送回去。

翌日，4月4日，陛下召见首相，对陛下的再次垂询，小矶答称缪斌已送回去了。由于他对此事件以极其轻率地态度处理之，圣上神色为之愕然。

## 六

4月3日奉答天皇垂询之后，笔者在思考。这样使陛下担心是谁之罪过？不言而喻，这是由于小矶和绪方的轻率之举。作为外务兼大东亚大臣，我始终努力于防止此类事态的出现。然而事情终于发生，有劳陛下操心。尽管这是小矶擅自行事所致，重光亦难脱无能之责？国家处于危局，出现此种事态烦陛下忧虑，身为有关大臣有辅弼之责，岂能默然处之。就笔者而言，此际如求推卸责任而自保，非笔者愿为。自己只顾个人而不顾国家，如何能谈得上大臣的辅弼责任？道不立无政治可言，有狎君恩，非为臣之道。缪斌之事左思右想，必须遵循为政之道。我认为军人时时有狎君宠，不惧天意，我绝对不能持此态度。因此我想按照自己的决心促使小矶反省走上正路。于是写了如下措辞的辞表：

臣葵龔拜承大命，当辅弼重任，以期报效于万一，直至今日。然最近中国人缪斌之来日事件，有烦圣虑，而拢宸襟，作为主管大臣，实臣无能所致，惶恐之至。兹谢罪于阙下，并乞赐骸骨，望圣上解除臣之重任。诚惶诚恐，谨奏。

昭和二十年四月 日

① 重臣：自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望逝世之后日本废除元老制，以担任过内阁首相者组成重臣团，以供天皇咨询重大政务。

## 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 重光葵

4月4日，经同内阁书记官长石渡国务大臣相商，定于5日召开仅限会议成员参加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常会，公开事件的经过，明确大义名分所在。在宫中枢密院走廊见到米内海相，我把自己的决心告诉了他，得到赞同。

4日傍晚，小矶决定内阁总辞职。其表面理由是同陆军的关系不融洽。其真实原因则为上下积累下来的对他的不信任，关于缪斌问题又触怒了陛下，终于引咎辞职。

## 七

缪斌事件是有力说明满洲事变以来日华关系内幕的一桩事件。如果研究一下缪斌的存在和活动，可以了解清楚很多事情，特别是日华事变爆发以来的秘史。

小矶是颇为得意以所谓谋略搞政治外交的人物，与田中义一、宇垣一成一脉相承。小矶一伙人是三月事件、十月事件的首要人物，属二宫、建川(美次)雨中将以及陆军其它人“樱会”一派。小矶是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在陆军中这个系统的军官大多属于“革新活动派”，其人数不少。所以说，他们实际上是最近使日本军部动荡不定的因素。

如果为缪斌的活动所乘，日本势必立即取消南京政府和撤兵。这样，由于敌人的谋略国际信义和大义名分两者尽丧。笔者奉旨制定对华新政策以来所树立以国际信义为基础的大义外交就完全崩溃了。日本想要履行或履行的道义原则将完全为之颠覆。不，由于缪斌事件与我国最高负责人有关，致使我国的大义为之毁灭过半。前内阁书记官长广濑(前厚生大臣)主张：必须指出之处，即小矶内阁系此而倒台，以阐明我国的信义。这是完全正确的。

小矶同绪方一直与缪斌进行谈判，直到最后。最近在邀请缪斌访日起作用之人有一个是小矶在陆军士官学校同期毕业的山县



初男(陆军预备役大佐)。小矶派他去上海,由于他的关系才促使缪斌访日。

最近(4月15日)竹内夏积君来访,谈了事件的经过。据他说,相内从鎌仓到东京来寻找缪斌,缪斌已经同田村一起被宪兵送往一个保密的地方,无法找到。

我读过这样一段历史:在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的时候,明朝有位名为沈惟敬<sup>①</sup>的民间志士谋略家,他往来于明朝、朝鲜和日本之间,任意摆布小西行长等人,搞了民间外交<sup>②</sup>。缪斌就是今天的沈惟敬。

缪斌其人曾在黄埔军官学校受过教育,到日本约一年左右时间顺便学习日语,是国民党党员,在蒋介石时代曾任江苏民政厅长,旋被免职,随后成了投机的政治商人。(卢沟桥事变后)做为新民会副会长的缪受特务机关总务课长根元(根本博)大佐的利用,同日本方面发生了关系。

### 缪斌事件的补充记述

综合石渡书记官长和木户内大臣的谈话。

到3月24、25日,小矶首相明确下决心让缪斌回去,但又觉得特别召之来日又令其返回甚为可惜,遂改变了主意。在同绪方商议后,似乎决定说服东久迩宫殿下去纠缠圣上。于是殿下会见了缪斌。

原来缪斌提出:蒋介石不信赖日本军人和政治家,所信赖者惟有天皇。因此日本首先表示诚意的做法就是着手撤兵(在三个

① 沈惟敬:明万历嘉兴人。1592年日本丰臣秀吉侵朝鲜,明朝军队援朝失利,兵部尚书石星遣沈惟敬赴平壤,沈与日将小西行长会晤,协议停战。石星授沈游击将军衔。1593年初,明派大军,大捷于平壤,旋又兵败。石星、沈惟敬主和。1595年,这一主张为朝廷所采纳,加沈惟敬神机营衔为册封副使辅正使赴日,因丰臣秀吉悔而未成。中国史籍所载史实与重光葵所称沈惟敬实行“民间外交”提法不符。

月内撤兵)和取消南京政府,想听听陛下意向。于是小矶首相决定烦劳东久迩殿下。

东久迩殿下对缪斌说,他虽不能直接向天皇陛下反映,但一定采取可行的方法为之转达。因此立刻召见内大臣谈及此事。

对此,内大臣缕缕陈述,殿下不可参预这样的政治问题,并指出这项活动乃轻率之举,应予退出。

殿下认为:特地邀请来的人,如伤了感情让他返回,恐非是宜。

以上是4月3日陛下向我垂询的背景。

四月六号

## 《中苏外交文件》选译(下)

李 玉 贞 译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

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

(1937年3月11日)

大使对我邀他明日去我别墅表示谢忱,然后开始说他的政府对于同我国合作的途径很感兴趣。有人转告他说,我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谈过太平洋地区公约。

我回答说我国政府也在寻求合作的途径并准备给16日要到中国去的鲍格莫洛夫同志一些必要的指令。我昨天的确向记者们阐述了太平洋地区公约的想法,那并不是为了让报界发表。我坚信,只有这样的公约才能最终制止日本侵略和保障远东和平。日本不可能也不敢与其他太平洋国家的联盟对垒,它迟早自己也要参加这个联盟。我们肯定这个想法,现在该做的就是要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英美。而中国的和我国的外交则应该为此做出努力。

大使问我是否认为先以中苏协定的形式建立某个核心,让其他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也可以参加,这样会好一些。

我回答说 I 不同意这个看法,我的看法恰好相反。如果说有极小的可能性建立太平洋联盟,那么这一极小的可能性就会被苏中双边协定化为乌有。英国和美国即令现在这样也很不愿意承担任何新的义务,他们会很乐意从远处观望苏中单独缔约发生作用,希望靠这个条约就足以挡住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是这个希望也许会落空的。必须象我们为保障欧洲和平而做的那样,完全从另一个方面入手。我们是从地区公约着手的,参与缔约的可能

不仅仅是苏联、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而且还有德国、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在确有把握使英国和意大利持同情态度后,我们就这个题目进行了长期谈判。直到最终看清德国和波兰不愿参与这样的公约时,我们才转而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双边条约,不过同时还为德国和波兰参加这些条约保存了可能性。这样一来我们就没有受到诸如我们搞集团或军事联盟一类的指责。我认为,我们在远东也应该用这样的办法采取行动。罗斯福总统本人不象希特勒或贝克那样从根本上反对地区性公约,但是他要在国内克服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舆论都赞成孤立主义。英国的行动也很缓慢,它几乎已花费了约近两年的时间去规劝希特勒,但毫无结果,直到现在才相信不可能说服他,于是英国才转而谋求实际保障——武装戒备和宣传地区公约的想法。要争取英美接受太平洋公约的想法,还需费一番功夫。只有最终确信不能缔结这样的公约时,才能考虑比较有限的条约。

大使听我讲完,未表示反对。后来我说,我不太清楚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sup>①</sup>。大使听了笑着回答说,《消息报》和《真理报》对这些决议的评论是非常灵活的,不过对这些决议不应只从字面上去理解。我说我们关注的主要是全中国真正统一起来。

我问大使,中国军队里的德国专家是否还剩很多,是否值得担心,通过与日本友好的德国会把中国军事秘密告诉日本,据不久签署的日德协定德国好象承担了这样的义务<sup>②</sup>。大使回答说,他本人对此也考虑再三并在动身前与蒋介石谈过。蒋对他说,第一,与德国人签定的是个人合同,期限各不相同,所以可以丝毫不动声色地逐渐撤销这些合同;第二,德国专家的任务是训练士兵或视察个别地段的筑垒工事,这些专家中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中国总的军事

① 参见1937年2月27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指国民党中央三中全会——译者)。

② 见《苏联对外政策文件》第19卷第40号文件。

计划。这些专家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应邀来华的。

大使告诉我说中国实业家和银行家中间现在讨论到苏联考察我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可能掌握的国有化的方法的想法。大使问我们对此事的态度。我回答说，他们应去找鲍格洛莫夫同志，与他讨论此次访问，我们无疑定将欢迎此行。

第20卷第117—118页

###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3月11日)

今天王宠惠<sup>①</sup>接见我，先是彼此互致寒暄，接着部长介绍了他途经苏联旅行和我国成就的情况。他说中国的第一个国际条约是同苏联签定的，并表示他将致力于加强和巩固两国间的友谊。我也表示同样意愿。

(据档案刊印)

第121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4月3日)

因为孔一意要在他去伦敦之前见我一面，我遂于4月1日晚同他会晤。我据你们的指令精神向他阐述了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具体建议。孔没有与我讨论，说他定向蒋介石报告同我的谈话。他只就两个问题谈了看法。1.他担心中国若建议日本参加太平洋公约，这个建议会被说成是对满洲国的承认；2.他再三详细询问和记录了我国关于供货的建议。此外，孔非常感谢我们对蒋公子回国旅途给予的帮助。昨天孔已动身去伦敦。看得出来，我们婉言谢绝他赴苏一行使他失望，但他说他非常想同李维诺夫在伦敦

<sup>①</sup> 1937年3月8日王任外交部长。

叙谈。

张冲偕同中国当局的其他代表一道在码头上迎接我，张当即告诉我，陈立夫想尽快见到我，昨天我已会见他。我象对孔一样，向他阐述了我国的观点。陈立夫则象孔一样，不想与我讨论，只把我们的观点打听清楚便说将向蒋介石详细报告同我的谈话。晤谈结束时陈立夫对谈判结果表示满意，并再三感谢我们对蒋公子归国旅途给予的协助。与孔和陈立夫会见后我形成这样一个印象：他们的派系之间正为与我们谈判进行着一场独特的争夺战。

今天我在法租界蒋夫人宅邸会见蒋介石。蒋仍感身体状况相当不佳，步履艰难。互致寒暄后，蒋介石告诉我，孔近向他详细报告了同我会谈的情况。他为我向中国政府提出的那些建议对苏联政府表示感谢。但是因为他身体尚欠佳，请我同现在代理他在行政院工作的王宠惠谈判。一俟他〔蒋〕本人复元，他会告知我，我们将再次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我问我是否应同王宠惠讨论技术合作事，蒋介石请我只同王谈外交问题。至于技术合作事，则由他本人全面考虑这个问题，下次我们谈判时再议。

蒋介石主动请我就西安事变期间苏联报刊所持的态度向苏联政府转达他的谢忱<sup>①</sup>。他说他极为珍视这种态度并向我保证他本人一定想尽一切办法改善苏中关系。他再次特别请我转达他本人向苏联各族人民的领袖斯大林同志的谢意和问候。

我同蒋介石谈话时，只有他的夫人在座，担任翻译。甚至在会晤蒋介石这种事上也能看出陈立夫和孔的派系间的互相竞争：张冲陪送我去见蒋，但来接迎的是孔的公子，他当即说蒋介石想同我单独谈，不要目击者。

我的结论是：1.我国拒绝互助条约并未使中国政府感到意外，所以我国允诺支持太平洋公约并对未来签定双边条约寄以希望，便为下一步谈判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气氛；2.我国关于技术合

<sup>①</sup> 见1936年12月14日《消息报》，以及本书第19卷第413、415号文件。

作的建议，因能证明我国对苏中接近一事的真诚愿望，所以引起蒋介石的兴趣。不过，我很清楚，蒋介石在就这个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之所以称病，是想再赢得一些时间；3.从各次谈话中都看出，蒋介石为我国在西安事变时所持的立场而真心感激我们。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155—157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与  
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话记录  
（1937年4月12日）**

王宠惠邀我相见。早饭后，我到外交部长处与之会谈。

我根据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和说明，向他讲述了我们太平洋公约的看法，同时强调就互不侵犯条约立即开始谈判是必要的和适当的。我说，且不说我们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给中国的具体好处，这个条约必定为进一步加强苏中关系创造一个有利的气氛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未来可能就互助条约进行的谈判。

我提出以下建议：

1.我们建议中国政府率先提议太平洋国家参加太平洋区域性互助公约的谈判，如果中国政府做到这一点，那我们：a)定将对这个建议做出肯定的答复；b)定将全力促成中国政府办理此事。

2.如果太平洋公约不能签署，那我们准备以后重新考虑缔结苏中双边互助条约可能性的问题，然而我强调说：我们说的不单是中国政府同其它政府间照会的往还，而是认真的、持续的、共同致力于实现太平洋公约的外交工作。只有弄清根本不可能签署太平洋公约之后，我们才会重新讨论双边互助条约的问题。

3.我建议立即开始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我说，我国政

府无论如何闹不明白,究竟为什么中国政府对这一问题持否定态度,我强调说,姑不论不侵犯条约对中国政府的具体好处,这个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将有利于今后可能进行的双边(互助)条约的谈判。

王宠惠向我提了几个有关条约细节的问题,我遵照对东欧条约草案总指示的精神做了答复。王宠惠问,我们是否认为中国政府最好向九国条约的所有成员国包括象荷兰、葡萄牙这样的国家提出这个建议。

我答道:我们认为不必把太平洋公约与九国公约联系起来,我们说的只是最主要的国家比如中国、英国、苏联、日本、美国和法国。

看来,王宠惠对我们的建议很感兴趣,他说,他会把这些建议提交政府讨论,也会同蒋介石讨论。至于他个人,他想说,他很赞同太平洋公约的想法。

因为蒋介石对我说过,他本人会仔细考虑我提及的另外一些具体问题并将在下次会谈时再同我讨论这些问题,所以关于这些内容,我对王宠惠只是一谈而过,权作证明苏联政府对中国的友好态度。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167—168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与中国立法院

#### 院长孙科的谈话记录<sup>①</sup>

(1937年7月13日 上海)

孙科通过新任外交部驻沪全权代表于敏邀请我去俱乐部同他谈话。孙科向我展示了王宠惠给他的私人信件。王在信中请孙同

<sup>①</sup> 此件取自鲍格莫洛夫1937年6月18日至7月14日期间的日记。



我会晤并将昨日中国外交部给驻伦敦、巴黎、华盛顿的中国公使的电文(附英文电文)转交给我。①孙科补充说,据外交部告知,中国大使蒋廷黻眼下不在莫斯科,所以他请我把上述电报内容告知苏联政府。

在就华北现状交换意见时,②孙科对我说,中国政府认为形势极为严峻;他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本月9日,冲突刚开始时,他离开了桂林。他同蒋介石谈论过冲突事,蒋当时表示坚信,冲突只不过是地方性的,不久便将消除。但是,孙科说,近来事态表明,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可能引出大的麻烦。他个人认为,冲突可能发展为中日间的公开战争。中国政府决定不再退让领土并已向河北以及保定派兵。孙科问我:“日中战争会对苏满交界处的局势产生什么影响,阁下有何想法?”我回答说:“眼下本代表尚难以就此问题发表看法”。

孙科的问题可做两种理解:1.一旦爆发中日大战,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或2.日本是否会同时兴兵反苏。当然,我认为第一种解释更加准确,可是因为问题提得模棱两可,所以我也认为应该模棱两可未置可否地回答。

进一步交换看法时,我说我推断英日伦敦谈判③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在华北的活动更加自由。孙科同意这一点。

谈到苏中关系时,孙科说,蒋介石对苏政策过于拘谨,而他(孙)本人和冯玉祥则愿意促使苏中接近。他当即指出,现任外交总长王宠惠当然是没有蒋介石命令绝不越雷池一步的。我指出,如果有人应因对发展苏中关系持消极态度而受到指责,那么被指责的只能是中国方面。

① 该电未曾公布。

② 参见《消息报》1937年7月9日、12日、14日。

③ 见1937年6月8日苏联副外交人员致苏驻华代表的电报。

孙科问我是否已同王宠惠谈过我过去提出的问题<sup>①</sup>。我答道，自从我们在冯玉祥处共进午宴后，我未同王宠惠谈过话，尽管王当时告诉我说他将“尽快”回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补充说我们难以相信中国政府真心实意想同苏联缔结亲密友谊，因为中国检查机关正想方设法不让中国舆论界了解苏联情况和苏联人民的生活。

孙科原拟到华南去，但鉴于华北发生冲突，他可能要留在上海。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375—376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7月16日 急电)

孙科再次邀我前去他处。他刚才与王宠惠通了电话，王请他与我谈判。孙科问我是否已就我关于中国政府声明一事的电报收到莫斯科的回电。我说没有并补充道，我也没想得到我国政府的任何直接指令，因为正式声明只是发表于华盛顿、巴黎和伦敦。至于说我国，我的理解是，中国政府通过我向苏联政府报告了中国对英、美、法三国政府发表的声明。孙科没有对我的话做出反应，他说他想同我谈的第二个问题是转告中国政府的答复：中国同意就稳定远东和平一事与我们开始谈判。我回答说我不明白他的声明。我提请他注意，我们谈过的三个具体问题是：

1. 中国政府提出太平洋地区公约；
2. 苏中互不侵犯条约；

<sup>①</sup> 见本年4月12日鲍格莫洛夫同王宠惠的谈话和5月7日鲍致苏联外交部的电报。  
——译者

3. 作为第一项的结果和在第二项实行之后，谈判双边条约。

我请他确切回答，对这些建议中的哪一个他给予肯定答复。

孙科重谈我们过去与王宠惠的争论，开始长篇大论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承担太平洋公约的发起——因为日本反正不会同意，即便会同意，那日本就会要求承认满洲国等等。最后他说他现在指的是苏中双边互助条约。我答道，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并且我又重复了我们的观点。孙科自言自语地归纳了我的话后告诉我，他懂我的意思并将向王转达。他说，鉴于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他请我向我政府转达中国政府的建议。我回答说，我当然会通过电报把我同他的谈判内容告知我国政府，不过他的建议并没有任何新内容，而我所阐述的观点则是我国政府的观点。

我问孙科华北有何新动向，有消息说冀察政务委员会7月11日已同日本草签了协定，此说属实否。孙科回答说，据南京政府所知，未曾签署任何协定。他倒是同意，认为天津市长可能已对此做出口头允诺。孙科认为，中国政府正采取一切措施保卫国家，中央政府军的部队已驻扎在保定了。据宋哲元报告，目前长城以南有15,000日军，有两个师正从日本本土向那里调集。据宋哲元估算，日本向华北派的兵力不会超过50,000人，据他看，第29军一个军就能对付这些人。

孙科告诉我说，他已问过王宠惠是否愿我去南京。王回答说最好再等一等。我告诉孙科不管怎样下星期我打算去南京。

中国政府看来已焦头烂额，忽东忽西，不知所措。据各方消息，中国政府已向河北派出军队（例如，蒋介石的第一、二师已调往保定以南的正定、石家庄一带）。然而我认为，蒋介石会想尽办法与日本人达成协议，甚至不惜多少丢点脸面。宋哲元也根本不想打日军。中国政府派兵赴河北具有很大威慑性并为今日开始的天津谈判助威。谈判的结局会因日本的立场而遇到麻烦。如果日

本人此次决定仅限于取得包括石家庄铁路等在内的经济租让权和改善其战略地位,那么他们肯定会达到目的,中国政府也会同意签署这样的协议,那显然就会让宋哲元去签署。如果日本人决定马上就援殷汝耕之例建立事实上的冀察自治区,并且这也不排除同时调集大量日军,那么蒋介石也只好背水一战,起而抵抗。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384—386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副外交  
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函 发自上海  
(1937年7月17日)

尊敬的鲍里斯·斯皮里敦诺维奇:

华北事态豹变,形势炽热,极难得出定论。不过我在本函内尽力对下述诸问题做出预测性不完全的回答:1.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新行径由何而起;2.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3.事态可能有何结局。

我认为,英日协定无疑是日本加强侵华的基本原因。如上月8日尊函所述,日本在伦敦提出的建议主旨在从根本上承认日本在华北的“特权”。依我看,承认这些特权就不折不扣地向日本表示无限信任,至少是在冀察两省。另一方面,任命广田为日本外务相则同样意味着日本政府至少在华北各省恢复了广田三原则的政策。

目前我们看到,日本已开始实施其华北“自治”的计划。据日方消息,天津市长张自忠已经同意履行四项原则中的纲目,其中之一是臭名昭著的在华北各省“共同防共”。尽人皆知,这一条等于承认日本有权在冀察任何地点部署军队。中国官方否认这个消息,但是孙科同我谈话时承认张自忠可能已口头接受上述条款。

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们是日本侵占华北新行径的见证人，这一行径的后果显然是将冀察政务委员会变为类似殷汝耕政府一类的名堂。宋哲元无路可走，只能变成日本的傀儡。

南京政府的政策仍然是樽俎应付。尽管蒋介石确实已为增扩国防能力(指抗日)做了大量工作，而他的一切作为则说明他当前不会接受挑战。为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可从蒋的对内政策中见到其基本论据。

每个小孩子都懂得，只有当抗日战争真正成为中国的全民战争，只有当中国政府在全国掀起爱国主义浪潮并保证得到各政党和各阶层人民支持时，中国才能顺利抗战。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则与此相反。中国人民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仍被囚押在狱。有消息说近期他们无论如何要获释了，因为第一，在日本侵略日甚一日的情况下，在以孙中山的遗孀为首的大规模营救运动的气氛中，这件事正成为败坏政府威信의丑闻；第二，因为政府打算把这场运动导入由政府的代言人的领导轨道之中。但是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冀察脱离之后。而暂时抗日运动尽管受到的阻力会比以前小些，其发展仍将受到压制。

中国政府已派了几个师赴保定，当然，如果日本人试图继续南下，政府军是会抵抗的。不过因为日本眼下显然不会满足于侵占冀察，而把保定留给南京，所以在日军与撤退中的忠于南京的第37师之间，除了小的冲突之外，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蒋介石的赌注依然固定地压在日苏战争上。他在不久前与列平同志<sup>①</sup>的谈话中再次表达自己的意见，认为从日本的观点看，根本问题不是中国问题，而是苏联问题。蒋介石同我们谈判中持消极态度的原因盖出于此，其对外政策的根本失误也在于此，因为不管日本政客们的理论准则如何，他们在做出实际决策时都必须依据实际的想法：他们不可能不考虑我国红军的强大威力，这

<sup>①</sup> 当时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武官。

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考虑到华北诸省几乎未有防卫的状况。因为日本军阀想维持其政权就必须在国内煽动好战情绪，他们不得不走对外冒险的道路。但是铤而走险来打我国——这可是一场大战，吉凶未卜，而劫取华北丰厚的资源则比较容易也不会有大的损失。

我认为，直到冀察独立成为事实之后，蒋介石才会走上彻底地全心全意地组织抗战的道路，或被迫下台。中国最大的几个金融家，昨天我与之谈话的杜月笙、王晓籁和虞洽卿都坚决主张组织武装抗日并决意解囊。

至于官方去解决冲突，那还会再拖延一段时间，要寻求妥协，然后则按殷汝耕的方式或象他那样以建立一个新的过渡政权（包括宋哲元或把他抛开）而告终，以便为华北各省同满洲国的密切合作准备条件——这是一项艰难而相当费时的任务。

我认为，这一次（同样也为了不触怒英国人）日本会满足于冀察地区，不覬觎别的省分，特别是山东。至于上海，日本人则根本不会触动。

致同志般的问候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388—390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7月19日 急电）

陈立夫今天来访。他说他刚从桂林来，应蒋介石之命想同我谈话。他首先问我，针对时局变化，涉及同王宠惠的谈判是否有什么新的指示。我回答说，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我只是提出了建议，现在正等候中国政府的回音。

陈立夫开始连篇累牍地解释中国的观点，说明究竟为什么中国政府不能承担首倡太平洋公约一事(与过去王宠惠的话一样)。我回答说，相反，我认为现在的局势对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表示主动是极为有利的。如果中国政府认为有可能向其他国家提起九国公约，那么中国政府提出比九国公约更加激进的新建议就应该是更加合适的。

陈立夫说他不干预我同王宠惠的谈判，只不过是发表个人的意见。他认为太平洋公约的意义在于回击日本侵略。在这方面中苏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中国是日本进攻首当其冲的目标，而苏联是第二个目标。其他国家与这个公约的关系不太大，因为它们只有在中苏被打败之后才会受到威胁。因此中苏最好马上开始谈判互助条约。

我说，苏联政策的主旨完全不同。我们只能根据自己的力量制定我国的整个政策。我们完全相信，日本不可能对苏单独开战，因为现今苏联在军事方面已经比日本强大，日本人现在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只有考虑到苏联在西方也将被卷入战争时，才会制定进攻苏联的计划。但是我们毫无条件地反对日本侵华，因为这威胁着远东和平，而远东和平则与苏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愿意帮助中国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希望提出太平洋公约的建议也因此而来。

陈立夫声明他谅解苏联的政策。他也谅解我提出的谈判方法符合苏联的利益。但他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从第三条——互助条约开始谈判，那将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他受蒋介石委托正式向我说明，中国政府愿随时签署互助条约并请我向苏联政府报告这个情况。我回答说，我当然会立即把他的话报告我国政府，不过我应重申，我国政府的意见是太平洋公约为当务之急，同时还有互不侵犯条约，然后才能谈到双方互助条约。

接着陈立夫声明他前来会晤我主要是转达蒋介石对我关于军

火订货建议的回答。他说我国建议原则上是适当的,是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但蒋介石希望把款额扩充至一亿五千至二亿中国圆。军火交货期限应缩短,哪怕到一年。还债(以货相抵)期应从5年后算起,10年还清。同时,中国政府想从我国得到以下武器:1.飞机(待看过我国飞机一览表后定出明细表);2.坦克;3.口径为3.7厘米的反坦克高射炮;4.口径为2厘米的同样用途的大炮;5.7.5厘米的高射炮。我提请他注意我国的建议。陈立夫重申自己的建议并要求我将其转告莫斯科,我答允照办。

我提醒陈立夫注意,关于互不侵犯条约事他尚未置一语。我强调说,苏联政府认为这个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说有其他一些意义深远的协定,那就更加必要立即就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谈判。陈立夫说下次我们会晤时他回答这个问题。他恳请苏联政府就蒋介石要求尽快答复他的建议一事给予回音。

我的结论是:中国政府重提过去关于互助条约的建议只不过表明它在日本侵略的压力下不知所措。我认为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建议。至于蒋介石要求扩大定货款额,我认为可予赞同,把总款额增至一亿五千万或至少一亿墨西哥元。我认为可以把我们供货的期限缩短为一年,而付款期限定为3至8年。不过我同时还认为应坚持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为此可提出一个理由,说我们必须得到保证,使我们的武器不被用来对付我们。

请将您的指示速寄南京。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392—394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7月23日)

显然是中国人知道我今天拟赴上海，王宠惠便邀我去他处。我申明今天我到上海去，因为我们收到中国总参谋部的情报，说俄国白卫分子正在策谋对我国总领事馆寻衅滋事，所以我想亲自指示我使馆工作人员对付挑衅。另外，我的阿明巴痢疾好象复发了，我要去求医。王宠惠说他想同我谈三个问题。

1. 蒋介石通过陈立夫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增加军事贷款至一亿五千万墨西哥元的问题。他问我是否已得到苏联政府的答复。我回答说尚未接到，但一俟接奉答复，我会立即告诉他。

2. 中国政府请求再次询问苏联政府，后者是否认为可能立即开始谈判双边互助条约，陈立夫已同我谈及此事。我答道，我知道我国政府的观点，我可以声明，苏联政府认为目前不可能就互助条约开始任何谈判。我们的观点依然如故，对此，他从我们过去的历次谈话中也很了解。

3. 王宠惠说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大使馆的报告做何看法。现在已昭然若揭，日本的目的在于割占华北诸省。他认为当前这对中国是个威胁，但是很清楚，将来日本会利用华北作为反苏战争的基地。中国政府非常珍视苏联报刊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这一状况。他想知道，苏联政府能否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帮助中国。我回答说，苏联舆论过去和将来都一贯反对任何侵略者和破坏和平的人。至于说具体措施，据我所知，中国驻苏大使曾同斯托莫尼亚科夫<sup>①</sup>谈过一次话，对斯氏所说我没有什么可补充之处。

我问王宠惠华北局势如何。他回答说中国政府得悉宋哲元和

<sup>①</sup> 显然有失实之处。所述问题是在1937年7月15日李维诺夫与蒋廷黻谈话时提及的。

日本的谈判仍在继续。<sup>②</sup>中国政府不知道谈判详情。我更加确切地提出了问题，问他是否认为宋哲元会背着中国政府与日本达成协议。王宠惠回答说不知道。王说，不管当前这场误会怎样收场，反正冲突的消除只能是暂时的，一年之后新的冲突势必还会发生，因为现在已很清楚，日本的政策旨在征服亚洲。虽然日本人说的是“亚洲人的亚洲”，可想的却是：“日本人的亚洲”。这既威胁着中国，也威胁着苏联，因此他希望两国最终还是会找到共同语言。我回答说，苏联的立场一向是旨在力求改善苏中关系并为其奠定雄厚的基础。他本人当然也知道，如果说苏中关系发展过于缓慢，那这绝不是苏联方面的过错。王宠惠痛心地说：“我们总是对英美寄以过多的希望，现在我要想尽一切方法改善苏中关系”。王宠惠说他还没有收到关于英国居中调停的最后回答。他仍然希望调停会有一定结果。他也听说，英国政府正就这个问题同苏联商洽。因我对此毫无所知，我未开口。

今天我已动身赴沪，请往沪上寄发电报。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00—401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7月26日)

张冲来见。他说，昨天他曾与蒋会晤，现奉蒋之命前来。蒋介石请我催促关于军事供货问题的答复。蒋介石认为，任何政治问题的解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要求把军事供货问题与一切政治问题分开，单独解决。蒋介石说，因为现在中日之战势不可避免，所以中国不可能再指望从德国得到订货，因德国是日本的盟

<sup>②</sup> 见1937年7月21、22日《消息报》。

国。中国本国的储备只够六七个月用。唯一可能为中国供货的来源就是苏联了。蒋介石要求把这个问题看作纯商务性的。苏联方面不承担任何政治义务。待我得到答复后，蒋介石想与我相见。我回答说我会向我国政府报告这次谈话的内容。

我在谈话快结束时说，只要中国不把策谋对领馆寻衅的白匪团伙清除，我就难以赴南京一行。张冲说，他将向蒋介石报告此事，中国政府定会立即采取相应措施。

我认为应改变我原来的建议，鉴于华北事态的迅速发展，更妥善的办法是不把军事供货同互不侵犯条约搅在一起，从商务方面入手解决这个问题。祈予指示。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20卷第405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7月28日）

张冲来见麦拉麦德<sup>①</sup>，打听我是否收到莫斯科的答复。他（张）说，德国正在日中两国间斡旋。如果中国采纳广田关于反“赤”的第三点建议，德国似乎可保证日本撤军。在谈判中居间调解的是法根豪森<sup>②</sup>和克里贝尔。<sup>③</sup>

我认为不排除德国将尽力调解，因为日中战争对它不利。德国在远东的基本方针是把中国拉入日德联盟。然而，目前中国人

①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团一等秘书。

② 亚历山·冯·法根豪森，德国陆军大将。1935年来华，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1938年回德。1940年任德驻比利时总司令。——译者

③ 德国驻沪总领事。

把德国的调解行动告诉我们,是期望我方尽快回答。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20卷第412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信**

(1937年7月29日)

尊敬的同志:

我今天正想针对华北事态的发展给您口授一封交代政策的信。但是我们被召至克里姆林宫,那里正在讨论您关于中国政府最近所提建议的报告。这样一来,我的打算就不能实现了,现只能写一封短信。

1.据各方材料看,英国虽然为日本侵略华北而感不安,我坚信英国为这一侵略行径负相当大的责任。近几个月来,特别是上年广田内阁垮台之后,日本采取了相当缓和的对华方针。如果它现在就决心利用对它有利的国际形势,特别是因西班牙事变在欧洲出现的局势,那么我想,它此举的原因则在于它同英国政府的伦敦谈判有了把握,知英国不抵制它对华北的新侵略行径。英国保守党的报刊和官方人士直到艾登对华北事态至今的反应便可证明这一点。然而,很清楚,英国人自己也没想到事态发展会如此之快,仅最近几天已真相大白。因此我想,近两天来英国明显的担忧与其说是由日本对华北侵略进入新阶段引起的,莫如说是由侵略规模出人意料之大引起的。

2.美法尽管也为华北事态而不安,但是除了做一些柏拉图式的姿态,避免当真触及日本之外,目前是不会有作为的。

3.一些大国,特别是英国的行为在日本占领平津之后当然会有改变。

4.因华北事态而在柏林呈现的惊慌值得注意。这种情绪自然纯粹是由下述原因引起的：德国担心日本在中国作茧自缚从而在一定时期内丧失它作为德国盟友的价值。

5.从您处得到的关于事态的报告太少。除了塔斯社的电报之外，我们实际上没有收到您的任何电文，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出现的特别重要同时又特别复杂的局势。

我知道您人手太少，但是鉴于已发生的事变格外重要，还望您动员现有的一切力量向我们提供更多的情报。

请随每次邮班特别寄送说明中国国内状况尤其是能描绘动员中国舆论进行抗日的材料。

（据档案刊印）

副外交人民委员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13—414页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7月31日 特急）

主管部门批准了向南京提出的建议。与过去相比，目前时机更加不宜签署互助条约，因为这样的条约会意味着我们立即对日宣战。武器的订货拟增至一亿中国圆，一年内交货。至于清帐的期限和条件，则过去的建议仍然有效，不予改变。在供货帐目下可给200架飞机带装备和200辆坦克。拟向南京派一个小的团组，去了解中国的军事需求。准备招收中国飞行员和坦克手接受培训。提供军事物资务必以先签署互不侵犯条约为先决条件。

回答7月29日电报。拟允准中国军官从满洲里过境。

（据档案刊印）

李维诺夫

第430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日 特急)

外交部副部长徐谟通过电话邀请我到王宠惠处吃茶点。参与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和我。王宠惠问我孙科是否已向我转达中国政府请苏联政府在东北边界调动苏军以“把日本注意力从中国吸引过去”的要求。我回答说,孙科的确对我说过此事,但我对孙科的回答与我现在要说的是一样的话。他应该明白,我不能对此问题做出任何答复。我说,关于我同孙科就此问题的谈话,我当然已向莫斯科报告过了。

因为我定于晚上同蒋介石谈判,所以我不想同王宠惠详谈。我简告他,关于军事订货事我已收到莫斯科令人满意的答复,我打算同蒋介石谈判苏中关系的所有问题。我又一次申明,苏联政府认为当前关于互助条约的任何谈判都是不合时宜的。

我有一个印象,王宠惠和孙科都被事变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所措。两人异口同声地让我相信日本人打算占领的不只是保定,还有石家庄,再接着——陕西、甘肃和整个西北。他们证实,日本飞机已是第三天轰炸保定了,并说他们十分担心日本会在青岛登陆。

我问,列强持何态度。王宠惠回答如下:

1. 美国——完全不干预,拒绝任何集体行动;

2. 英国在设法阻止日本进一步侵华。英国在东京向日本政府做了“友好”表示。不管怎样,英国已对日声明,两国之间暂时停止任何谈判。中国政府相信,英国会尽可能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超过“一定的界限”。我问这“一定的界限”指什么。王宠惠只是耸了耸肩膀,什么也没说。据他的看法,英国本想在东京采取集体行动,可是因美国不同意,遂将问题搁置下来。

3.法国对中国态度最为友好，可是它不敢撇开美国采取任何行动。

我问，德国态度如何，王宠惠答道，德国在东京向日本政府做了“友好”表示。德国关心的是发展对华贸易，所以愿意和平。但是日本在履行自己的计划方面已走得太远，乃至任何人的话都听不进去。

王宠惠说日本在华北已有30,000军队而且一直在增调军队。他相信日本准备在华北集结大量军队，不仅要对中国而且要对苏联造成威胁。

我认为，笼统地回答王宠惠关于我国在东北边界“调动”军队的询问没有任何意义。中国人自己应该明白这类调动是毫无道理的。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36—437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日 特急）

今天我同蒋介石谈过话，他的夫人担任翻译，但安排此次会晤的张群在场。

我据指示精神向蒋介石转达了我们的答复。我肯定地说明苏联政府认为不可能在目前就互助条约进行任何谈判。蒋介石先谈的是供货的总款额和飞机的数量。他说他希望款额再大一些，飞机的数量也不是200，而是500架。关于协定的条件和期限，他未提任何意见，对于我国关于派飞行员和坦克手来苏联接受培训的建议，他也没有做出反应。可是他对我提的派我国军事专家到中国了解中国军事需求的建议做出了反应，表示愿意。他说，让

我国专家就地了解中国的需要，查明我国制造的哪种武器最合中国使用这是十分必要的。

主要争论是围绕互不侵犯条约问题展开的。蒋介石斩钉截铁地声明，他不能同意把军事供货和互不侵犯条约用任何形式联系起来。他说明，如果与苏联签定的互不侵犯条约中不会有任何招致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他原则上同意立即签约。如果把这样一个互不侵犯条约说成是为军事援助协定而付的报酬，那他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回答说，首先，互不侵犯条约的实质在于双方承担互不进攻的义务，十分清楚，不进攻另一方这个义务绝不可能被说成为某事物而付出的报酬。第二，中国政府应该了解我们的处境：我们如果不能以互不侵犯条约的形式作为起码的保证，让中国不致用我们的武器来打我们，那我们是不能向中国提供武器。蒋介石回答说，中国绝不会进攻苏联，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日本的基本要求恰恰就是要结成反苏军事同盟，为实现这一要求，日本愿做出很大的让步。然而中国政府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任何时候也绝不会同意这个要求。

我说我很满意地聆听了他的说明，不过日中谈判时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则再次证明我们务必坚持签定互不侵犯条约。我说明苏联政府认为在提供军事定货之前签定互不侵犯是十分必要的。

蒋介石于是开始详细揣摩我的看法，并向我提出了我们是否认为有可能在签定互不侵犯条约之前先签署军事供货协定，尽管履行供货是在签约之后。我回答说这样的界限我不清楚。我谈了履行供货的事。但是不言而喻，如果没有互不侵犯条约，那么签署供货协定就毫无意义。至少两个条约应该同时签署。蒋介石说我使他左右为难，因为这样一来，互不侵犯条约看起来就会象是对于军事供货协定而付的报酬。

蒋介石的夫人说，我的思维逻辑完全是西方式的，而蒋介石



是东方式的，应该了解这种情况。蒋介石愿意无条件地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做得看起来象是为军事供货条约而付出的报酬。他原则上同意签署条约而不要求我们对军事供货承担任何义务。

她当即翻译了蒋介石的话，说 he 不想请其他任何国家援助，一旦需要，他定会用自己的力量反击日寇侵略。我说，由此可见，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越早越好。至于说军事供货，那么这是我们自己遵照有利于增强中国军事实力的愿望提出的建议，不过我们应该得到保证，使我们的武器不致被用来打击我们，所以我们不得不坚持先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蒋介石问，我们认为互不侵犯条约应该揭载于世抑或保守秘密。我回答说，我没有考虑此事，但我想，这样一个无害于任何人的文件可予立即公布。我们对所有其他类似的条约一贯也是这么办的。我认为把这样一个条约保守秘密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如果他愿这样做，我可以把他的意向报告苏联政府。蒋介石对我的话未做任何回答。

我总结谈话情况时问蒋介石：“我能不能向我国政府报告，说中国政府同意立即就互不侵犯条约开始谈判？”蒋介石回答：“是的，务必使是条约中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内容”。

后来他说，他想尽快见到我们的草案。我答复说我会呈请我国政府把我们的草案用电报拍来。如果中国方面愿意，它也可以拟定一个自己的对案。接着我们约定，待收到我国草案时，我会将其转交王宠惠，下一步会谈将在我同王之间进行。<sup>①</sup>我试图总结我们关于军事供货的谈话，便问蒋介石，我究竟能向莫斯科转达他的哪些想法。他回答：1. 希望再增加贷款数额；2. 把飞机数目增加至500架；3. 得到我国关于国产飞机型号和质量的详尽资料

① 鲍格莫洛夫于1937年8月5日把苏联方面的草案交与王宠惠，8月8日陈立夫把中国的草案交给全权代表（鲍）。

(载重量、速度等); 4. 派遣我国专家前来熟悉地方情况。我问蒋介石, 我是否应同王宠惠把军事供货再谈一谈。他回答说, 他请我把我们原则上同意的事告诉王宠惠, 下一步他会派专人办理此事。如果我近期得到莫斯科的回答, 他请我面告他本人。

蒋介石问及列平的来华。我说, 因为中国发生事变, 列平已回到中国, 他只来得及到哈巴罗夫斯克去。蒋介石问我, 列平是否同布留赫尔谈过话。我给予肯定的回答。蒋介石说, 他非常想面晤布留赫尔, 如果布留赫尔能到中国来, 他将是非常高兴的。我允诺说, 尽管布留赫尔可能在远东日理万机, 但我一定把蒋的要求转达给莫斯科。

我的结论: 我国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显然出乎蒋介石的预料, 也是他不愿为之的。从他妻子的表现我得出一个印象, 她非常希望我们达成协议, 对蒋介石的拖延很不满意。蒋介石尚未放弃为对日妥协而在樽俎上下的功夫。如果他认为近期内对日作战必不可免, 那他就理应更加具体地关心军事供货。蒋夫人在蒋介石来会谈之前对我说, 他打算马上再赴桂林一行。这说明他还想再得到喘息时间。

我认为, 关于军事供货应对蒋介石具体回答的问题有以下几个: 1. 选定并尽快向中国派遣军事专家; 2. 电告我国产飞机和坦克型号与质量的情报; 3. 回答陈立夫关于反坦克和高射炮的问题。货款数额当然与前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问题, 请把我国草案用电报拍发给我。我不知道条约草案的内容, 但我想, 它越是精悍短小, 我们就越能顺利而迅速地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我想条约中最好包括下列问题: 1. 互不侵犯的义务; 2. 和平解决一切争端的义务。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37—440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8月9日)

据我国现有可靠情报，德意已与日本协议向各该国在华军事教练员和飞行员下达指令不得以任何形式帮助中国抗日。甚至已在讨论从中国召回军事教练员的问题。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53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发自上海**  
(1937年8月9日 特急电报)

陈立夫今天同我谈话时又提起苏中直通航线事。他说他已同交通部彭副部长谈过这个问题。彭副部长意，开辟新航线或放弃叶夫拉齐亚公司的协定一事都相当复杂。为苏中联合公司新开谈判也同样颇费时光。他认为最妥善的办法还是由新疆省政府自行安排经新疆上空的飞行。叶夫拉齐亚公司的飞机可飞至哈密，塔城以远则由苏联飞机运行。祈告决定。<sup>①</sup>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53页

---

① 见第291号文件。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18日 特急电报)

今天我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去见他。出席会谈的有他的妻子，王宠惠和徐谟。谈话伊始即交换了对近几天战绩的看法。据蒋夫人说，到今天为止日本共损伤32架飞机，而中国的损失则只有10架飞机(列平今天同美国武官会谈时证实了这个数字)。中国人因战事顺利而情绪高昂。

蒋介石问我是否已就军事供货协定问题得有什么回音。我回答说近日可到。蒋介石请我们告诉他我们想怎样把飞机和武器送来，是否可将飞机空运来华。我说我不是专家，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以为飞机可以空运过来。蒋介石说鉴于急需飞机，他非常想尽快把飞机运到。由于他相信我们提供的机器的质量和眼下处于战争时期，他认为不便向莫斯科派遣接机小组，他想在甘肃省的某个地方接收我国飞机，飞机可途经新疆飞抵那里。我回答说我会向苏联政府报告他的想法。蒋介石说他对我国的重型轰炸机和歼击机特别感兴趣。

关于互不侵犯条约，我故意缄口不语，因为王宠惠应该把中国政府的答复告诉我。蒋介石临走时说，中国政府愿意签约，但在等待中国驻莫斯科大使的说明，因后者曾打电报说，据苏联法律好象条约尚需批准。一俟接到他的说明，中国政府会立即签约。

遗憾的是尽管我已两次请示，可至今还没收到您的答复，不知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向中国大使说过关于批准手续的事。

请尽快回答。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63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  
苏联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  
(1937年8月20日)**

大使说中国政府决定请求国际联盟审理中日冲突问题并用国联盟约第17条对付日本。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在国联讨论上述问题时支持中国。

我回答说我一定把大使的话转告苏联政府。苏联政府始终不渝地积极为和平而奋斗，主张集体安全体系，反对破坏和平的任何图谋。不过我指出，在我个人看来，现在的国际局势未必有利于中国采取上述行动。

我援引国际联盟某些有影响的成员国特别是英法目前采取的立场作为证明。我补充说，不管怎样，在向国联提出要求之前，中国应该在一些国家的首都做一番探测。

大使回答，我发表的意见与一个多月前他从李维诺夫处听到的话精神一致。对于部分国联的成员国例如英法所持的立场是什么，大使心中有数。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我建议的探测，现在已经最后决定向国联提出要求。遗憾的是英国的政策矛盾百出。大使举了一个例子作为说明：蒋介石同李滋罗斯爵士<sup>①</sup>谈话时他在场并充任他们的译员。李滋罗斯向蒋介石论证中国抗日和同苏联保持政治联系的必要性。现在，英国自己在同日本谈判而且最不喜欢中苏接近。

在后来的谈话中大使提到在他昨天接到的全权委托书复本中他看出有些提法与最初的文本不同：过去这些复本是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给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同志的，而现在则是

<sup>①</sup> 英文名弗雷德里克·威廉(1887—1968)。英财政专家。1935年9月率英财政考察团来华调查中国财政情况，建议禁用银元，使用法币。1936年6月回英。

——译者

以苏联人民委员部的名义。于是大使提出了一个问题: 根据苏联宪法, 关涉国际条约的全权委托书是否应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

我向大使解释说, 在前一种情况下全权委托书是由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的, 因为当时考虑到苏中条约的批准手续。现在批准手续取消了, 条约一经签署便立即生效。所以据1925年的法律, 鲍格莫洛夫同志的全权委托书是由人民委员部颁发的。

我把萨巴宁<sup>①</sup>同志叫来, 他向大使诵读并解释了我提到的1925年的法律。大使对向他做的说明表示满意, 并说没有疑问明天即将签约。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65—466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8月21日 特急电报)**

中国大使今天拜访科兹洛夫斯基并对他说已收到南京电报, 谓前来莫斯科的上校沈德燮受南京政府委托接收200架歼击机, 100架轰炸机和30名飞行员。飞机将经甘肃送到, 南京派人至乌鲁木齐安排就地给飞机加燃料。

科兹洛夫斯基回答说, 我们对沈的出使毫无所知, 过去中国使馆是把他作为代表团成员象为翁文灏申请签证那样为他申请的, 而且沈的名字在尚未结束的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也竟一次都没有提及。科兹洛夫斯基回避谈问题的实质, 说明会谈仍在南京进行, 而他并不知会谈详情, 只知道尚未签协定, 所以谈什么沈

<sup>①</sup>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法律处处长。

的出使也为时尚早。

尽快去见蒋介石或您认为应找的人，告诉他，我们对派沈一事感到惊奇，因根本没有谈及过他；我们担心这样处理问题会把我们的会谈张扬开去，这是绝然不许的，并且会严重影响我们的谈判。请要求他们采取措施保守谈判的秘密。您的谈话有何结果望尽快电告。

沈上校从德国前来我国，此事也令我们难堪。但愿他不致透露谈判情况。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68—469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1日 特急电报）

我今天22点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我做了书面声明。我们商定8月29日交报界，以便使条约文字在30日晨掲載报端。

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之前我会见了蒋介石。他同意我提出的一切建议，特别是关于军事供货协定将在莫斯科签署的建议。王叔铭小组近日乘飞机出境。然而无论蒋还是他的妻子都恳请不必等王叔铭一行抵达莫斯科，现在就把我们的飞机（歼击机）和教练员按订数空远来华。我认为最好能满足蒋的要求，如我请求过的，把50架我们的歼击机尽快空远前来。请尽快告知如你们的决定。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69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8月22日急电)

现补充8月21日电报,再通知以下内容:中国驻巴黎使馆为杨虎城将军和两名随从人员申请外交签证,说明杨将军是中国陆军部的代表,赴苏执行特殊使命。

由此可见,还在您同中国人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就已经从欧洲各地向我们派人接收将来才能买到的武器了。未经我们同意即派人,此事本身就是不能容许的。但最重要的乃在于从各地抽人组团派遣接收者前来的过程中会增加过早暴露的危险性。

同时,关于我们可能向中国运送武器的问题看来一些大国也在讨论中,因为今天法国代办已来问询,苏联对于下一步向日本和中国出售武器的问题持何种态度。他说明,法国驻其他国家的代表也领受了相同的任务。

在您同蒋介石或他的亲信谈判时请坚决指出,泄露我们的谈判可能引出因受日本及其友国其中可能也包括英国的影响,说不定会出现类似对付西班牙的情况即提出停止向日本和中国出售及运送武器的问题。要求他们对此事的进行严守秘密。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70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8月11日<sup>①</sup> 急电)

现答复18、19日二电。

<sup>①</sup> 全权代表团收电日期为8月23日。



1. 请告知中国政府，经再次讨论后，我政府已决定同意中国的要求并同意中国政府收到货物后延迟一年开始偿还向它提供的贷款，以便在后五年内每年偿还同样数额的借款。贷款总期限为接货后六年。

2. 签约币别应使用美元或英镑

3. 对8月17日电文做出更改，请通知中国，我们只能向它提供150—200架飞机，不能再多。

4. 告诉他们，我们正据蒋介石的愿望讨论尽快通过甘肃向中国运送飞机的问题，如果通过肯定的决议，我们则希望中国方面同意我们的要求，立即向我们提供几百吨锡和锑，因为我们急需这些金属。

5. 事先告诉他们，作为我们提供的武器的等价物，我们想得到相当贷款总额 $\frac{3}{4}$ 的金属（锡、钨、锑、钼）和 $\frac{1}{4}$ 的茶及其他中国货物，货物种类和数量应另签协定。最好立即得到中国政府能向我们提供的每种金属数量的资料。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提供相当于总贷款额 $\frac{3}{4}$ 的金属，那么我们也愿意收受美元或英镑的外币以补齐欠缺的部分。

互相提供的货物明细表、交货日期和送货方式的确定等等，以及条约的拟定与签字均应在莫斯科进行。

6. 事先发报告知王叔铭一行拟到达的日期，以便我们如期向哈密派出一架我国飞机。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71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8月22日)

我们想在兰州(甘肃)开一个领事馆。请就此事与中国政府达成协议,指出据您现有资料,在1925—1926年间我国与中国已原则上谈妥了这个问题,而目前开设这个领馆已属必要,因为我国与南京政府联系的主要干线将经过兰州,特别是因为新开的苏中航线将经过这个地点。最好尽快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72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2日 急电)

现将昨日谈判经过呈报如下备考。

很明显,在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动摇了。还在清晨徐谟即给我打电话,我们约定晚上签署条约。过了几个小时他来找我说中国政府坚持同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供货协定。我对蒋介石态度的改变表示惊诧,因早些时候是他本人再三说明不把这两个条约联在一起,于是我请徐以我的名义转达,就说我担心蒋的态度会在莫斯科造成极不愉快的印象并把整个事情拖延下去。一天内我几次会见孙科,向他直言我们对中国政府模棱两可政策的意见并直率地说中国政府据我们看来是在玩火,我根本不明白中国政府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是要飞机抗日抑或只不过要一个目的不明的书面担保。孙科显然是很快就见了蒋介石并向蒋施加了相应的压力,因为蒋介石请我晚八点半钟前去。蒋同我的谈话是从徐谟因误会

而把两个条约的签署联在一起开始的，他已吩咐王宠惠立即签约，他相信即使不同时签约，苏联政府也会把我对他说过的事办成。同蒋介石谈话后，我驱车去找王宠惠，他那里已准备了条约的文本。

这一切说明在最后时刻亲日派对蒋介石施加了强大压力以拖延条约的签署。然而蒋介石同抗日团体已联系甚为密切，所以应对后者让步。我认为应该指出，现任航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蒋夫人是很愿抗日的。

再重复一遍，我认为最好尽快把我们的飞机空运来华，因为这一定会特别加强抗日派的地位。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72—473页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

### 苏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

（1937年8月25日）

中国政府前曾将它向国际联盟提出中日冲突问题的决定和中国政府要求得悉它能否在国际联盟讨论上述问题指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一事，告知苏联政府。为此我请中国大使前来向他转达苏联政府关于上面问题的回答。

大使听说苏联代表团会在研究中日冲突时支持中国，便向我表示谢意，说我通报的情况对他是一大幸事。他今天就向南京报告谈话内容。

接着大使问我是否知道，从巴黎前来的沈德燮到莫斯科已五天，他奉全权委托同我们谈判向中国提供飞机一事。

我回答说，我知道近日内将有以总参谋部部长助理为首的权威代表团离中国来苏联具体谈判同一个问题。至于沈德燮，我们

没有收到南京方面关于赋与他如大使所说的使命的任何消息。

大使回答说，沈德燮就是我提及的代表团成员。近日内他的全权身份将得到正式确认。

临分手时我问大使，他对本国政府对日作战的胜败做何估计。大使回答说，在上海地区作战的是中国军队的精锐部队。日军已在此地区遭到最坚决抵抗。北方形势比较严峻，那里的战斗行动因国军离主要基地较远，黄河上的桥梁全部被毁而遇到麻烦。不过大使坚信，以国民党为核心组织起来的国民运动一定会战胜日本侵略者。大使的印象是，国际舆论对中国有利。例如，在这方面连英国的态度似乎也有所变化。

（据档案刊印）

波乔姆金

第478—479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7日 特急电报）

今天我同陈立夫就军事供货问题达成协议如下：

1. 贷款总额——一亿中国圆。
2. 用英镑结算。
3. 贷款应在货到后六年还清，但第一年中国政府不还债，债务分五年还清。
4. 供货细目内我们答允给予200架飞机和200辆坦克。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的明细表将同杨杰在莫斯科商定。
5. 我声明，我们坚持得到相当贷款额3/4的金属和相当于1/4的茶叶及其他日用品。中国政府答允近日内将自己的想法和每种金属它能提供的数量告知我们。
6. 详细条约在莫斯科签署。

7. 委员会主任杨杰及其副手我们已认识的张群今晨飞往西安。代表团其他成员已经前往西安。中国政府要求派飞机赴乌鲁木齐接他们前来。为避免拖宕,我已发给他们入境签证。代表团拟在29或30日抵乌鲁木齐。我认为代表团的人员是十分满意的。

关于从巴黎来的杨虎城将军,陈立夫不知详情。确实打算把从柏林来的沈氏纳入代表团之中,但是因为杨杰本人将来莫斯科,在他抵达之前不要给其他人签证。他是中国政府唯一的全权代表。

8. 近几日内陈立夫将回答我,他们何时能给我们多少吨锡和锑(按您8月22日电报中所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在公布条约之后,最好运50架飞机和我国飞行教员(记在供货帐目之下)到甘肃去。这会使中国士气大振。

9. 陈立夫说,他对中国驻巴黎使馆人员不谨慎的行动感到愤怒,因为他本人懂得,事情的成败与保守秘密极有关系。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79—480页

###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8月28日 特急电报)

昨天我同蒋介石就国际政治的共同问题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特别关心我国对其他大国在中日战争长期延续的情况下可能采取什么立场。当时只有他的夫人在场。这次会晤的主要意图看来是他想向我们说明他对中日冲突的立场。他请我转达苏联政府,不管能否得到外国援助,中国政府已决定抗战“到底”。蒋介石强调,即使抗战失败,他也要抗战到底。谈话中他几次说明,中日未曾进行也不会进行任何谈判。

蒋介石提出了两个具体问题:

1. 据他所知, 我们不久前从美国得到了100架可当轰炸机用的高速飞机。他问, 我们能否让给他一部分, 用以顶替马上按定货提供的飞机。

2. 他能否指望, 如果不是现在, 那么稍晚些时候, 苏联政府将允许苏联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中国军队。

同时, 蒋介石要求尽快解决立即派遣部分我国飞机和飞行教员前往甘肃的问题。

昨天我还同白崇禧谈过话, 他被任命为野战司令部主任。白崇禧阐述了他对中日冲突和国际局势的看法。他的观点是: 1. 抗战到底。只有长期顽强抗战中国才能保持独立。对日无协商可言; 2. 中国唯一可行的对外政策方针是法苏联盟。

白崇禧自己说, 据他看, 中国没有任何资料能说明可期望苏联干预中日战争。不过他希望在中日长期持久的战争后, 苏联将起到类似美国在上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中所起的作用。白崇禧说, 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抗战到底, 没有别的路可走。他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 所有亲日派都将被撤离领导岗位。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480—481页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  
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  
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波  
兰、中国、日本全权代表的电报  
(1937年8月29日)**

兹据政府今日即29日指示, 本委员已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已签署之事通知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土耳其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条约将在30日公布。本委员为向上述各国代表说明该条约的

意义，愿指出以下几点：一、签订苏中条约的谈判已进行了不止一年；二、谈判有所拖延是由中国方面受国内和外交的某些因素影响而引起的；三、近来，由于中国广大人民对苏联的同情急趋高涨，由于远东国际局势复杂化而自然引起中国政府同其他国家首先是同苏联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所以中国对条约的签署表示积极关注；四、苏联政府认为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是苏联在一贯的和平政策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是一次国际性的宣言，这个宣言面对远东冲突具有及时雨的意义并能对保卫普遍和平事业起促进作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真正意义更加详尽的解释将见于《消息报》和《真理报》的有关文章。<sup>①</sup>

（据档案刊印）

波乔姆金

第481—482页

###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致苏联驻华

### 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的电报

（1937年9月2日）

现转告下列情况，仅供参考。据我们收到的消息，王宠惠还在条约公布之前就把条约事告诉了法、英、美、德和意大利公使，并同时向他们保证，说这个条约是公式化的，条约除了中国实现了同所有邻邦和睦相处的目的外，没有任何新内容。王宠惠说，条约并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传统的“反共”政策，条约第三条强调北京条约第六条仍然有效。王宠惠说，中国并未因条约而承担任何秘密义务，中国也准备同日本签署同样的条约。

（据档案刊印）

斯托莫尼亚科夫

第486—487页

<sup>①</sup> 见1937年8月30日的《消息报》和《真理报》。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同中国驻  
苏联大使蒋廷黻的谈话记录  
(1937年9月23日)**

1. 蒋廷黻说, 他昨天从德国回来, 在德曾去巴德豪根会见孔祥熙。他从杨杰将军处得知杨对谈判的精神和结果十分满意, 中国从谈判中的所得比他预料的要多。因此大使认为他有责任前来向苏联政府表示感谢。他言词间情感丰富。

2. 大使援引中国政府的训令问道, 报刊有消息说外蒙因日军沿蒙边界西行而认为自己受到威胁, 正准备对日作战, 此说确否。

我回答说, 我们对此毫无所知。大使问, 我是否认为这类报道可信。我说, 如果报道属实, 我们自然会收到我国驻乌兰巴托代表的报告。

3. 然后大使说, 他很想开诚布公地向我提一个问题, 他虽然没有就这个问题接到南京政府的指令, 但是这个问题极关重要。中国对于我们给予的物质援助非常满意, 不过中国存有更大希望: 我们能否给予它武装支持?

我说, 没有我国政府的特别指示我不能回答这类重要问题。大使知道, 我们的同情在中国方面, 苏联人个个都希望中国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获胜。大使还明白, 日本也威胁着我们。所以很可能未来我们也要对日作战。不过, 现在预言苏联将来的立场如何还为时尚早。一切取决于国际局势, 而且大使不应该忘记, 我们的处境比中国更为复杂, 中国只有一个敌人。

大使问, 他能否呈报说对他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同情中国, 我们的立场将取决于国际局势。

我请大使不要向南京报告任何内容, 因为他是未奉指令向我提问题, 而我则未奉全权对他做了回答。我劝大使, 若无实际需



要不要就微妙的问题拍发电报，因为应考虑到中国外交部的官员可能做不了主或者密码可能丢失。况且我对大使说的话，南京那里已从鲍格莫洛夫同志之口有了很好的了解。

大使说，除了我就外蒙问题所做的回答外，他不呈报任何内容。他补充说，据他所知前去日内瓦的孔祥熙也准备向李维诺夫同志提出同样的关于我国武装援助中国的问题。

4.大使回答我的问题说，孔祥熙十月初途径意大利乘意大利船回南京。

（据档案刊印）

鲍格莫洛夫

第520—522页

####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10月2日）

我同交通部长张嘉璈晤谈。他告诉我，早在中日交战之前他就奉蒋介石之命把铺设西安至乌鲁木齐铁路的可能性调查清楚，目前，铺设该路的必要性已显而易见了。张请我说明苏联政府对这个方案有多大兴趣。如果持肯定意见，那么他认为苏联和中国应该同时动工筑路：我们——从国境至乌鲁木齐或以远，中国从西安开始。西安至兰州地段已调查清楚，方案已拟就。筑路费用——三亿中国圆，筑路期限——五年。如果苏联因某种原因认为不能参与该工程，那么苏联政府对于修筑兰州至我国国境的公路持何态度？如果苏联政府基本同意这些方案中的一个，他将提供更详细的意见。

（据档案刊印）

麦拉麦德

第529—530页

##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致苏联外交

### 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13日 急电)

王宠惠邀我和德拉特文<sup>①</sup>谈话。王说,此次对日战争的基本原因如下。

1.过去张群任外交部长时,因中国拒绝日本的要求,不加入反共公约,对日谈判破裂。接受这个要求就意味着今后反苏,这是中国政府不愿为之的。

2.日本经济代表团因要求抛开政治问题去解决经济问题而使出使失败。中国政府不能不解决同日本的根本政治问题而接受这些要求。因此,对日战争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明确态度有关。中国政府有确切情报说明7月份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人预谋用以对付中国拒绝日本要求而发生的。交战六个月后中国现在正处于歧路上。中国政府应该解决下一步做什么的问题,因为没有外来援助,中国无力继续抗战。中国政府决意抗战,但是资金已枯竭。中国政府随时面临着抗战能坚持到几时的问题。中国政府仍希望得到欧美和苏联的援助。但是运送物资十分困难。中国政府有情报,知日本打算占领广州,从而拦截经香港运送的物资。至于关于陶德曼所提和平建议的传闻,原委是这样的:中国政府早在布鲁塞尔会议之前就已通知各大国,说中国愿意接受布鲁塞尔会议以及其他任何一国的居间调停。既然德愿主动效力,那么中国政府就不能拒绝,条件是所提建议中国能够接受。王说,陶德曼只提出德国愿调停,可是还没有提出具体建议。王接着说,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就会把中国变为反苏基地,利用中国的一切资源,人力物力去打苏联。王认为,苏联不能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眼看中国失败。

①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团武官。

我说全权代表近日可到，届时他可同他〔王〕讨论这些问题。

（据档案刊印）

麦拉麦德

第654—655页

###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与中国驻苏

#### 大使蒋廷黻谈话记录

（1937年12月21日）

蒋廷黻交给我一份关于北平新政府的照会。我说照会并不要求我们回答，对我说的看法大使表示反对，说恰好相反，他希望得到我们的回音。

蒋廷黻说他打算明天经新疆回国，后来问，他能向中国政府转达我哪些话。我回答说，请他转达，我们密切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的斗争，我们会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许诺。

大使问，我国曾声明说如果美国有松动，我们给的援助会更多，此话是否仍有效。我纠正大使的话，说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这样的公式，只是说过我们准备采取集体行动，指出来自美国方面的对这种行动的主要障碍。为防止蒋廷黻再提出一些调衅性的问题，我补充说，我们在等待孙科，据我们所知，他近日内动身乘飞机前来。我把我们现有关于日本在国内以及满洲和华北遇到的巨大困难的资料告诉了蒋廷黻。

（据档案刊印）

李维诺夫

第679—680页

**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卢甘茨—奥列尔斯基  
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电报  
(1937年12月29日)**

12月28日我在武昌同蒋介石有过一次谈话。在互致问候和礼节性的寒暄之后，蒋介石起初要求把谈话推至下次会晤，可是接着又决定通报一些情况让立即转达苏联政府（此时他让所有的人都走开，只留下张冲）。蒋介石说，12月27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再次拜访他并说他陶德曼，未承担任何责任，也未从德国政府方面承担任何责任，接受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建议中国按下列四个条件媾和：1. 中国应该放弃抗日、联共和反满政策，中日满应共同采取措施防共；2. “得到承认必须成为非军事区”的地区的非军事化和“成立专门组织”（德国大使没有确切说明这种组织的性质和地点）；3. 中日满经济合作；4. 中国给予日本相应的赔偿。

我问，蒋介石和中国政府对所提建议的实质有何看法，蒋介石说明，“中国对这个建议不予回答，中国将抗战到底”。在我阐述了苏联政府对中日战争和中苏关系的观点后，蒋介石又请我把以下的话补告苏联政府：“现状是，如果苏联不公开用武力援助中国，那么中国必败。现在日本已在华北建了一个伪政府，另外又力图以廉价条件向中国提出停战媾和。因此，中国舆论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情绪开始日盛一日：既然希望苏联出兵是没有根据的，那么中国败局已定，最好还是支持亲日派政府”。

接着，在持续约近两小时半的谈话中，蒋介石阐述了“苏联不出兵中国必败”的想法，关于在当前时机苏联出兵既及时又有利，关于舆论界甚至军队内（因日本提出的‘软条件’而与日俱增的）失败主义情绪等。他指出，现在急需苏联的参谋部军官和专家。蒋介石特别请我传达他关于派军队工作人员补充参谋部军官职务的请求。此外，蒋介石告诉我，他新组建了廿个师，按计划

六个月后应准备就绪。因此，他请求向苏联政府提出关于保证（指提供技术援助）这些师的武装、参谋部军官、汽车运输、炮和其他技术设施的建议。他急需在三个月内得到这一切，以便半年后这几个师组建完毕。

（据档案刊印）

全权代表

第689—690页

## 附录 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1月20日）

鉴于中国国内外形势突变，特别是日本侵略咄咄逼人，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割据的地区放弃苏维埃制度转而在民主的基础上采取人民革命的管理制度是适应的、及时的？

这首先意味着：1.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革命政府；2.把红军改为人民革命军；3.只在城市中心保留苏维埃，但不将其作为政权机关，而作为群众组织；4.放弃普遍没收土地的做法。

在方针上做这样的改变是否会有助于中国人民一切力量联合救国的事业和建立全中国的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事业？

请你们极其认真地考虑和讨论这个问题，将你们的意见报来，尔后在这里也要仔细讨论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6年莫斯科版 第272页）

## 附录 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2月5日)**

我们觉得,你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sup>①</sup>最好仅限于申明共产党和红军的决心:支持国民党和南京政府一切旨在停止内战,集中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措施。说明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签署协定,以便本着民主原则改组苏区的体制,在承认南京政府为全中国的政府的基础上调整南京中央政府和苏区政府的关系。

建议你们暂时不要就我们在苏区政策上的根本改变做具体声明。这个问题要予以认真讨论,要求各党派接近我们的人士和人民群众对我们政策的急剧转折做好最充分的准备。请速告为此而采取的措施。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73页)

## 附录 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就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事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  
(1937年3月5日)**

我们觉得,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决议大致可用以下形式给予回答:本着中国人民渴望国内和平团结抗日的心愿,中国共产党愿意以三中全会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为调整两党相互关系和两党

<sup>①</sup> 该电报于2月10日发出。——译者

合作以准备与实施共御外侮而开始具体的谈判。红军和苏维埃改名并受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统一指挥等，前已在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全会的电报中做出规定。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过去也没有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并且现在愿意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的实施而奋斗。至于阶级斗争问题，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证明本党真诚渴望与中国各阶层人民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侮，为此目的，中国共产党已不止一次地呼吁停止内战，自愿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等等。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73—274页）

（续完）

# 国立清华大学

## 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史料

陈兆玲 整理

说明：1935年12月，北平爆发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得到全国各地各界的响应，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为充实自身力量，以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北平学联于1936年2月7日发出《复课宣言》。《宣言》指出：“我们复课，决不是单纯地恢复以前的各项课程，在这种国难日深的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应该完全同国难的现状配合起来。”我们“制定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我们一方面愿意努力地去推行，一方面愿意接受一切善意的指导，希望一切站在真正抗日救国立场的师长们和同胞们能够给我们以指正和鼓励”<sup>①</sup>。实施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由于北平学联所制定的“非常时期教育方案”中、小学部份订得较具体，而大学部份订得较笼统，所以当时大学要真正实施非常时期教育，必须订出适合本校情况的教育方案。从下面公布的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国立清华大学爱国师生密切配合，经过国难教育委员会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审慎、周密的筹划以及校方的支持，较好地制订并实施了非常时期教育方案。“方案”中特别演讲的实施，不仅当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实践表明，第三组“实用工程”的特种演讲为以后西南联合大学增设的几门军事工程性课程打下了初步基础。例如：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施嘉炀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开设的《堡垒工程》、《要塞工程》课程，就是在特种演讲时的“防御及运输工程—防御原则、壕垒构造、掩蔽工程”和“军械应用—防空常识及构造物”等四次演讲基础上充实后开出的。土木工程学系教授李谟炽和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庄前鼎在西南

<sup>①</sup> 北平《学联日报》，1936年2月8日。



联大时期开设的《军事运输》和《兵器学》课程，也都是在特种演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本史料根据清华大学档案室档案和报刊中有关记载整理而成。

2月3日

敬启者：兹订于二月四日(星期二)晚八时，在新南院十一号潘宅开筹划适应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第二次集会<sup>①</sup>。

潘光旦<sup>②</sup>谨启

廿五年<sup>③</sup>貳月叁日

2月4日

出席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第二次集会的有：冯芝生<sup>④</sup>、叶企孙<sup>⑤</sup>、陈岱孙<sup>⑥</sup>、刘寿民<sup>⑦</sup>、吴正之<sup>⑧</sup>、施嘉炆<sup>⑨</sup>、庄前鼎<sup>⑩</sup>、张子高<sup>⑪</sup>。因出差而缺席的有：顾一樵<sup>⑫</sup>、浦逊生<sup>⑬</sup>。

2月6、7日

敬启者：昨订于今晚(七日)八时在第一院楼上会议室召集系主任会，听取筹划适应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报告，并加讨论取

① 该课程委员会第一次集会未查到。

②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教务长。

③ 为民國廿五年，即1936年。

④ 即冯友兰，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兼主任。

⑤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系教授。

⑥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经济学系教授兼主任。

⑦ 即刘崇铨，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

⑧ 即吴有训，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兼主任。

⑨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兼主任。

⑩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主任。

⑪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主任。

⑫ 即顾毓琇，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⑬ 即浦薛凤，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主任。

决。届时敬请各位委员列席以备咨询是盼， 尚此即颂台绥。

潘光旦谨启

廿五年貳月柒日

院系主任会议记录

时间 二月七日晚八时

报告事项：

一、筹划适应非常时期课程委员会报告集议经过。

二、筹划委员会第一小组委员会（国情及国际关系）报告所拟演讲大纲。

三、筹划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欧战史略）报告所拟演讲大纲。

四、筹划委员会第三小组委员会（实用工程）报告所拟演讲大纲。

议决事项：

一、三组报告大体上通过采纳，其细节目仍请各组斟酌确定，不必再提付取决。

二、演讲实施办法，对筹划委员会原定之各条，略有损益，通过如左：

a. 每组演讲每周两小时，以十五周计，共三十小时。b. 每组当两学分，照普通学程办理。c. 学生每人至少须选一组。d. 一年级学生选一组或一组以上时，得退选第一年共同必修课程一门或一门以上。但拟入文法学院者，只准退选自然科学之学程；拟入理工学院者，只准退选社会科学之学程。e. 二、三、四年级学生选一组或一组以上时，得退选相当学分之学程一门或一门以上，惟须先得系主任之同意。f. 无论何年级学生，如退选之学程为学年学程时，其上学期所已得之学分照计，下学期不计。

三、筹划委员会所拟其它关于添设新学程，充实原有学程，扩充早训，恢复早操等办法，议决如所拟办理。

院系主任会议议决适应非常时期课程办法若干则

一、非常时期课程应就下列五种原因筹划：

甲、添设特殊讲演；乙、添设新学程；丙、充实现有学程；  
丁、扩充军训；戊、恢复早操。

二、关于演讲之实施订定如下之办法

甲、演讲分为三组：第一组 国情及国际关系；第二组 欧战史略；第三组 实用工程。

乙、每组分题，另行公布。

丙、每组演讲以十五星期计，每星期两小时，共三十小时。

丁、每组当两学分，照普通学程办理。

戊、学生每人至少须选一组。

己、一年级学生选一组或一组以上时，得退选第一年共同必修学程一门或一门以上，但拟入文法学院者，只准退选自然科学之学程；拟入理工学院者，只准退选社会科学之学程。

庚、二、三、四年级学生选一组或一组以上时，得退选相当学分之学程一门或一门以上，惟须先得系主任之同意。

辛、无论何年级学生，如退选之学程为学年学程时，其上学期所已得之学分照计，下学期不计。

壬、此种演讲于二十四年度<sup>①</sup>下学期开始时实行。

——添设新学程，由各院系自行斟酌办理。

——充实现有课程，由各教师自由酌办。

——扩充军训，另组委员会筹拟办法公布。

——恢复早操，由军体部拟办。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二号登载：校 闻  
院系主任会议记录

时间 二月七日晚八时

<sup>①</sup> 为学年度，即1936年的春季学期

地点 会议室

出席 朱佩弦<sup>①</sup> 熊迪之<sup>②</sup> 冯淮西<sup>③</sup> 孙小孟<sup>④</sup> 倪孟杰<sup>⑤</sup>  
冯芝生 叶企孙 陈岱孙 刘寿民 吴正之 施嘉炀 庄前鼎  
张子高 潘光旦

报告事项

(内容与上述会议记录完全相同,略之)

决议事项

(内容与上述会议记录完全相同,略之)

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会缄给教师国难教育委员会的一封信

敬启者:

前经全体大会决议,由本会聘请各院系同学组织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现该委员会已正式成立。为以后工作进行方便计,应贵委员会联络,以后该委员会开会时当通知贵会,请派人列席。

贵会开会时,亦请通知该会(该会负责人为沈海清<sup>⑥</sup>君),由该会派人列席。相应函达,敬希查照为荷。此致 国难教育委员会

救国委员会启

二月七日

2月12日

学生自治会救国会非常时期实施委员会公布该会拟定的方案

- ① 即朱自清,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兼主任。
- ② 即熊庆来,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算学系教授兼主任。
- ③ 即冯景兰,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学系教授兼主任。
- ④ 即孙国华,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主任。
- ⑤ 即倪俊,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兼主任。
- ⑥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学生。

## 国立清华大学非常时期教育方案

### 非 常 时 期

现在我们所处的是非常时期，因为我们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

#### 在非常时期中我们的特殊处境

在这样民族危亡的时期中，每个同学都感到了客观环境严重的压迫，华北五省三市的傀儡组织在最近又要成立了，冀察政委会的教育委员会就要来接收华北的大中小学校，今天我们在教室上课，说不定明天就要直接受到傀儡官吏和敌人的摧残和侮辱。处在这种环境中，我们上课还应该遵从过去死读书的原则吗？同时最近几个月来的事实和一般的需要，更证明了过去死读书教育的失败，现在我们应该死读书和读死书。

#### 我们应该作什么？——工作和认识

我们该作实际救亡的工作，该作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工作。这种实际工作，需要我们认清了客观环境，需要认清了实际行动中的正确路线。旧的教育不但不能使我们作实际工作、使我们认清正确路线，反倒阻碍了我们的工作和行动。

#### 废除旧教育制度争取非常时期的教育

繁重的死书和无理的考试制度，压迫了我们的工作，混乱了我们的认识。旧的教育既然不能适合非常时期的需要，当然我们要新的教育，适合于非常时期所需要的教育。

#### 新的教育是什么？

新的教育是什么呢？新教育要使同学们的有用时间用在实际工作上，用在求得必需的知识上，新教育要使同学们明白了现在

国际的复杂局面，新教育要给同学们应付这严重局面的办法，新教育要使同学和大众打成一片。因此，在我们的方案里，我们要增添适合于非常时期所需的课程，削减读死书的旧课程，减少现行的学分和上课时间，改革现行教材的内容，设立课外自由研究，民众教育。

#### 本会所拟定的方案

本会是救国会根据全体大会的议决案，按系聘请同学组织成的。经过多方面的考虑，综合许多同学的建议，我们草定了以下的方案。

#### 方 案

##### 甲. 课程

###### 据据原则

(一)增加新课程，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二)削减旧课程，以便利同学参加实际救国工作及新教育之施行。

###### 办法

(一)减少学分：每学年应修之学分总数减少三分之一。

(二)缩减上课时间：每周上课在三小时以上之课程，减少一小时，实习总数次数亦减少三分之一。

(三)削减原有必修课程：1.大一大二英文除外国语文学系同学外，改为选修课程。2.大一国文除中国文学系外，改为选修课程。3.文法学院同学可以完全不修自然科学学程。4.理工学院同学应修之社会科学学程，可以非常时期增设之课程代替。5.除外国语文系同学，其他院系同学必修之第二外国语完全改为选修。6.大四毕业论文，可以非常时期所增设之同样学分之学程代替。

(四)减轻并改善一般课程之内容。

(五)增设适应非常时期需要之公共学程:

1.政治教育:国际现势——公共必修;社会进化史——公共选修;民众运动方法论——公共选修;欧洲大战史——公共选修。2.军事教育:国防工程——公共选修。

乙、课外研究

根据原则

研究现实问题,以增进对非常时期之认识及应付之才能。

办法

(一)设立学术研究会。

(二)设立时事问题讨论会。

(三)设立演讲会,练习演讲,并举行定期特约演讲。

丙、民众教育

根据原则

扫除文盲,唤醒民众参加救亡运动。

办法

(一)设立民众识字班。

(二)出版民众教育刊物。

(三)实施民众军事教育。

(四)改革本校民众学校教材,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丁、考试

关于考试这个问题,我们考虑了许久,顾及到各方面的利害及事实上的困难,虽然大家一致以废除现行考试制度是必需的,不过废除了以后怎样办?我们几十个人的力量和才能不能想出一个完善的办法。因此,只好暂缺。我们希望全体同学给我们建议,我们再综合各方面的意见作最后的决定。

华北、全中国、全世界的局面愈益严重了,华北第二个包括了五省三市的傀儡组织就要成立了,冀察政委会的教育委员会就要来接收华北的大中小学校,客观环境的严重,同时也加重了非

常时期教育的需要。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消除一切个人的意见，团结在一起，用全体同学的力量来实行我们这个方案。

国立清华大学非常时期  
教育实施委员会印  
二月十二日

2月20日

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再次公布方案

## 国立清华大学非常时期教育方案

### 甲、课程

根据原则

(一)增加新课程，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二)削减旧课程，以便利同学参加实际救国工作及新教育之施行。

办法

(一)减少学分：每学年应修之学分总数减少三分之一。

(二)缩减上课时间：每周上课在三小时以上之课程，减少一小时，实习总次数亦减少三分之一。

(三)削减原有必修学程：1.大一大二英文除外国语文学系同学外，改为选修课程。2.大一国文除中国文学系外，改为选修课程。3.文法学院同学可以完全不修自然科学学程。4.理工学院同学应修之社会科学学程，可以非常时期增设之课程代替。5.除外国语文学系同学，其他院系同学必修之第二外国语完全改为选修。6.大四毕业论文，可以非常时期所增设之同样学分之学程代替。

(四)减轻并改善一般课程之内容。

(五)增设适应非常时期需要之公共学程：

1.政治教育：国际现势——公共必修；社会进化史——公共选修；民众运动方法论——公共选修；欧洲大战史——公共选修。2.军



事教育：A.设国防工程为公共必修学程。B.改革军训内容。办法：a.实施战斗教练与技术教练。b.军训学科改为自修。c.每月至少举行野外演习一次。C.军训实施计划及教材，应由干部会议决定之。干部会议由教官及同学自选之连排班长组成之。D.实施军事救护训练。E.女同学及三四年级同学其已受过救护训练或军事训练者，得自由参加现有军事训练。

#### 乙、成绩考核方法

原则：废除考试制度，施行合理的成绩考核方法。

办法：取消月考、期考、学年考试等，以论文、报告、习题及实习为成绩考核根据。

#### 丙、课外研究

根据原则

研究现实问题，以增进非常时期之认识及应付之才能。

办法

(一)设立学术研究会。

(二)设立时事问题讨论会。

(三)设立演讲会，练习演讲，并举行定期特约演讲。

#### 丁、民众教育

根据原则

扫除文盲，唤醒民众参加救亡运动。

办法：

(一)设立民众识字班。

(二)出版民众教育刊物。

(三)实施民众军事教育。

(四)改革本校民众学校教材，以适应非常时期之需要。

国立清华大学救国委员会非常时期教育实施委员会印

二月廿日

3月2日

## 教授会会议

时间 三月二日下午四时

地点 后工字厅

主席 梅校长①

记录 周培源②

出席者：

吴韞珍	陈 桢	王化成	萨本铁	余肇池	李辑祥	陈福田
赵访熊	史久荣	曾远荣	吴 宓	赵凤喈	周培源	熊庆来
任之恭	潘光旦	殷文友	陈之迈	施嘉炆	庄前鼎	刘仙洲
张席禔	冯景兰	王 力	俞平伯	张大煜	孔繁霁	陈寅恪
殷祖澜	刘崇鋮	孙国华	张泽熙	张印堂	张 任	朱自清
陶葆楷	Arma M Bille	赵友民	李郁荣	高崇熙	李谟炽	
袁复礼	张奚若	冯友兰	雷海宗	倪 俊	章名涛	萧 遽
洪思齐	顾毓琇	赵忠尧	叶企孙	张润田	金岳霖	吴正之
梅贻琦	周光庚					

报告事项：

潘教务长在教授会上报告了筹划特种演讲委员会所拟本学期特种演讲③之方案。“特殊演讲”具体实施方案表列如下：

① 即梅贻琦

② 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教授。

③ 后附的特种演讲计划表抄自全宗号1、目录号2—2、案卷号8的档案。时间栏中被划去的讲演钟点实为教授会议上报告时的原计划时间，所更改的讲演时间与校刊登载的注册部有关通知相符。表中有八讲未标明讲员，从档案中难以查考出这八讲的实际讲员。

## 第一组国情与国际关系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	冯友兰	中国现代民族活动之总动向	3月9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2	冯友兰	中国现代民族活动之总动向	3月13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3	冯景兰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地理的背景	3月16日 (星期一)	晚8:30—9:30 7:00—8:00	大礼堂
4	陈之迈 <sup>①</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政治及社会运动问题——近年来之政治改革 (注重制度改革)	3月20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5	李景汉 <sup>②</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政治及社会运动问题——近年来之民众运动,如村治乡治运动等	3月23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6	潘光旦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政治及社会运动问题——人口问题	3月27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7	张印堂 <sup>③</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政治及社会运动问题——食粮问题	3月30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8	吴俊升 <sup>④</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教育文化问题——非常时期之教育问题	4月3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①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②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

③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学系教授。

④时为北京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教授兼主任。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9	王 力 <sup>①</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教育文化问题——文字改革问题(文言、白话、大众语、简字、罗马字、拉丁字)	4月6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10	陈岱孙 麦健曾 <sup>②</sup> 先生代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财政及经济问题——中国之财政	4月10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11	赵守愚 <sup>③</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财政及经济问题——中国之金融及商业	4月13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12	洪 绂 <sup>④</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财政及经济问题——中国之工业	4月17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13	冯景兰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财政及经济问题——中国之矿业	4月20日 (星期一)	晚8:30—9:30 7:00—8:00	大礼堂
14	李景汉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财政及经济问题——中国之农业	4月24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15	袁复礼 <sup>⑤</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交通问题——中国之铁路与公路	4月27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16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交通问题——中国之轮航、航空及邮电等交通	5月1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①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②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讲师。

③即赵人儁，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④⑤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地学系教授。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7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中之军事问题 ——中国军队之精神（以近年历 次战事范围为例）	5月4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18	王芸生 <sup>①</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日本——总 论中日关系	5月8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19	何海秋 <sup>②</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日本——日 本之政治	5月11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0	刘鸿万 <sup>③</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日本——日 本之经济	5月15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21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日本、帝俄 及苏联——日本与苏联之军备	5月18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2	张忠绶 <sup>④</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帝俄及苏联 ——总论中国与帝俄及苏联之关 系	5月22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23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帝俄及苏联 ——苏联之政治与经济	5月25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4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帝俄及苏联 ——苏联之政治与经济	5月29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①②均从校外聘请的。

③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经济学系讲师。

④时为北京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兼主任。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25	张忠绖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欧美——总论中国与英美关系	6月1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6	沈乃正 <sup>①</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欧美——英 美之政治	6月5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27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欧美——英 美之经济	6月8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8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欧美——英 美之军备	6月12日 (星期五)	晚 9:00—10:00	大礼堂
29	王化成 <sup>②</sup>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与欧美——欧 洲与国联	6月15日 (星期一)	晚8:30—9:30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①②时为国立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 第二组欧战史中之战时各种问题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	刘崇铨	绪 论	3月12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2	刘崇铨	绪 论	3月14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3	刘崇铨	绪 论	3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4	刘崇铨	绪 论	3月21日 (星期六)	下午 1:00—2:00	同方部
5	张忠绂	战时之外交	3月26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6	张忠绂	战时之外交	3月28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7	王化成	战时之国际公法	4月2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8	王化成	战时之国际公法	4月4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9	陈之迈	战时之内政	4月9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10	陈之迈	战时之内政	4月11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11	陈之迈	战时之内政	4月16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2	陈之迈	战时之内政	4月18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13	梁士纯 <sup>①</sup>	战时之舆论	4月23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14	梁士纯	战时之舆论	4月30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15	陈岱孙	战时之经济	5月2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16	陈岱孙	战时之经济	5月7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17	麦健曾	战时之财政	5月9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18	麦健曾	战时之财政	5月14日 (星期四)	下午 4:00—5:00	同方部
19	麦健曾	战时之财政	5月16日 (星期六)	下午 2:00—3:00	同方部
		战时之交通运输			
		战时之人民			

①从校外聘请的。



## 第三组实用工程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	施嘉场	防御及运输工程——防御原则	3月9日 (星期一)	上午 11:00—12:00	大礼堂
2	施嘉场	防御及运输工程——壕垒构造	3月12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3	施嘉场	防御及运输工程——掩蔽工程	3月16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4	李谟炽 <sup>①</sup>	防御及运输工程——道路工程	3月19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5	李谟炽	防御及运输工程——道路工程	3月23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6	张润田 <sup>②</sup>	防御及运输工程——桥梁工程	3月26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7	张润田	防御及运输工程——桥梁工程	3月30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8	陶葆楷 <sup>③</sup>	防御及运输工程——卫生工程	4月2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9	陈福田 <sup>④</sup>	射击方法——步枪及手枪	4月6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10	张锦宏 <sup>⑤</sup>	射击方法——机关枪	4月9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①②③时均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教授。

④⑤时均为国立清华大学文学院外国语文系教授。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11	周培源	射击方法——防空炮	4月13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12	施嘉炆	射击方法——野炮	4月16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13	赵友民 <sup>①</sup>	军用通讯——军用电话及电报	4月20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14	任之恭 <sup>②</sup>	军用通讯——军用无线电	4月23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15	任之恭	军用通讯——军用无线电	4月27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16	张大煜 <sup>③</sup>	军用化学——毒气战争	4月30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17	庄前鼎	军用化学——毒气防御	5月4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18	曾昭抡 <sup>④</sup>	军用化学——毒气制造	5月7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19		军械及应用——步枪机关枪及野 炮构造	5月11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①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②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物理学系、兼工学院电机工程学系教授。

③时为国立清华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教授。

④时为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教授兼主任。

续表

次 数	讲 员	题 目	日 期	时 间	地 点
20		军械及应用——步枪机关枪及野 炮构造	5月14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21	张大煜	军械及应用——弹药构造	5月21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22	冯桂连 <sup>①</sup>	军械及应用——飞机分类及战斗 法	5月25日 (星期一)	晚 7:00—8:00	大礼堂
23	冯桂连	军械及应用——飞机分类及战斗 法	5月28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24	史久荣 <sup>②</sup>	军械及应用——军用机车	6月1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25	施嘉扬	军械及应用——防空常识及构造 物	6月4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26	吴有训	军械及应用——侦测仪器	6月8日 (星期一)	晚 8:30—9:30	大礼堂
27		军械及应用——实习	6月11日 (星期四)	晚 7:00—8:00	大礼堂

①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专任讲师。

②时为国立清华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教授。

3月6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六号登载：

注册部通告第三六〇号

查本学期实施特种演讲分甲（国情与国际关系）、乙（欧战史略）、丙（实用工程）三组，兹将各组演讲时间、地点公布如左，凡选修学生须来本部登记，以凭上课。此布。

甲组：星期一晚8：30—9：30，星期五晚9：00—10：00，地点：大礼堂。

乙组：星期四下午4：00—5：00，星期六下午2：00—3：00，地点：大礼堂。

丙组：星期一上午11：00—12：00，星期四晚7：00—8：00，地点：大礼堂。

3月13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七号登载：

注册部通告第三九三号

兹将特种演讲调动上课时间及关于登记、改造或退选其它课程等限制办法公布于左，望各知照为要。此布。

一、丙组领讲需用幻灯，星期一上午时间，与甲组星期一晚时间对调（即甲组每星期一演讲改上午11时至12时，丙组星期一演讲改晚八时半至九时半），其余时间仍旧。

二、凡已登记选修各组演讲学生，均由本部填发登记证，每组一纸，送由宿舍、办公室转发，备呈系主任察核。其未登记各生，须于登记时由本部随时填发。

三、补登及改选或因加选各组演讲而退选全年学程之下半年部分者，统限于三月廿一日以前办理完竣。

3月13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七号登载：

注册部通告第三九四号

准刘寿民先生通知，乙组特种演讲自即日起，改在同方部上课等因。特此通告，望各知照为要。此布。

3月14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八号登载：

注册部通告第三九八号

特种演讲甲组三月十六日（星期一）及四月二十日（星期一）因需用幻灯照片，均改同日晚七点至八点在大礼堂举行，望各知照为要。此布。

3月19日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七二九号登载：

注册部通告第四一一号

准刘寿民先生通知，本星期六下午乙组特种演讲临时改为同日下午一至二时在原地点举行等因。特此通告。望各知照为要，此布。

## 近代史料考证述要

祁 龙 威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推顾炎武为一代宗师。梁氏言：“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方法而已。”对顾炎武的治学方法，梁氏“约举有三”：“一曰贵创”，即能推陈出新。“二曰博证”，即注重考证。“三曰致用”，即为时代服务。三者之中的核心是考证。其后吴皖、扬州等学派先后继起，考证之功大著，以故梁氏又言：“夫无考证学则无清学也。”顾炎武在其名著《音学五书》中，提出了考证的方法：“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其例见于五书之一的《诗本音》。如《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坏人，置彼周行。”按“行”字，今有二音，一在《广韵》十一唐，一在十二庚。顾氏从《诗经》及其他古籍所用“行”字得出结论，谓古代只有一音，按《广韵》分类，当属十一唐。顾氏云：“考行字，《诗》凡三十二见，《书》三见，《易》四十四见，《左传》一见，《礼记》三见，《孟子》一见，《楚词》十三见，并户朗反。其行列之行，行止之行，五行之行，同是一音。”顾氏研究古音，识古代语言文字之目的，是为了读经。其后，戴震推衍此理，提出“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之法。同时，汪中等用此法研究古代的典章制度，人物，如释三九，考明老子、墨子的生平等。钱大昕用此法判别史籍记载的同异。使考证之法，伸展及于史学。其未流脱离了经世致用，于是使考据学失去了生命力。以故“乾嘉余唾”遭到了维新思想家的诋议。到了清末，章炳麟等发扬乾嘉考据学，使之为辛亥革命服务。其后，章门大弟子吴承仕又跨前了一大步，他借助考据，

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考据学达到了新的高峰。当代如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家，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考证历史。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的史料考证才能实事求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否则就会失误。兹举数事为例。

不接受马克思主义，为旧中国效劳的历史学家，尽管经过考证，搜集了大量有关史料，却得出“农民战争破坏论。”更有甚者，有的史家，扩展而为“革命战争破坏论。”从而否定了近代我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按战争造成破坏，确是有大量史料可考的。但关键在于判断谁负责任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战争应区别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性质。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是正义战争；压迫阶级和压迫民族所进行的是非正义的战争。“官逼民反”，造成破坏的，不是农民阶级的正义战争，而是地主阶级的非正义战争。一切破坏，应由封建地主阶级负责。怎能颠倒是非，归罪于被迫自卫的农民群众呢？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搞“影射史学”。他们用唯心的主观主义对待史料考证，即对凡是和他们预定结论相反的材料，他们一概抹煞。例如，他们为了证明洪秀全“反孔”而引证《太平天日》中有关斥责孔子的记载，但对其中赞扬孔子的地方，却一笔勾销掉了。这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准则，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用形而上学进行史料考证，也不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近年有的文章歌颂左宗棠击败外国侵略者的走狗阿古柏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却由此而归功在此以前左宗棠在浙江为镇压太平军而接受了外国侵略者提供的一批洋枪洋炮，这无疑是错误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看问题，左宗棠勾结外国侵略者，用洋枪洋炮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起义军，都是坏事。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化为好事。之后，左宗棠使用这批武器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事物便走向它的反面，坏事便变成了好事。

我们怎能把后来的好事，归功于以前的坏事，从而为外国侵略者唱赞歌呢！

以上事例，集中说明了一点，即必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问题，史料考证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内当权者公布的记载往往虚伪，而不当权的私家著作却保留真相。如我在前文曾提到，清朝官书夸张华尔及其“洋枪队”于一八六〇年攻陷松江的赫赫“战绩”，冯桂芬据以写入《松江府志》。曾亲历此役的原苏州知府吴云致书驳正说：“第一次收复松江，弟与应敏斋、俞乃舟在豆腐浜炮船上者匝月，克复之时，仅有洋人四十余名，余皆炮船上水手与新募勇丁数百名耳。时贼倾巢而出，暗袭上海，城中止留老弱数百名，城门不闭。附近居民到弟舟次通信，于是弟与乃舟诸君商定，派令洋人居前，水陆勇丁居后，潜入其城，各门城垛上俱派洋人数名，协同水陆勇丁把守，枪炮之声不绝。贼闻松江已失，又闻有洋人帮助，恐归路截断，遂急折回，踉跄遁去。是役也，若非松江从无意中收复，则上海即不失守，其附城一带亦必蹂躏无孑遗矢，此中殆有天也。鄙人奉札持令督队，开复原官，应敏斋之超擢直刺，皆见之章奏，贪天之功以为己有，殊属可愧，而当日之实在情形如此。大著谓华尔率中西勇各数百攻松江克之，其时华尔为英、法所制，不欲出面，所带西人仅八十名耳（常往来松沪之间，克复时正在上海，得信赶回，帮华尔约束西人者，人皆呼为黄胡子，事犹历历在目。）记事贵简，原不能详叙，惟此事弟身在行间，知之最悉，华尔亦同倖获，并未有西兵叙百之多也。”（《两樞轩尺牍》卷二）当时松江人姚济所记与吴云所说大略吻合。咸丰十年五月廿八日，“黎明，城中被掳之人纷纷东下，传言郡城于昨夜回鼓经夷兵水勇攻进南门，赋势甚孤，连夜出北门逃去，城门现为夷兵把守，城上已插官兵俞字旗帜。乡人皆呼天称庆。”（《小沧桑记》上）可见，此役未经剧战是实。“俞”即吴云信中所说的俞



乃舟，游击俞斌。

同是清政府的官书，也有原始档案与加工产品的区别。江地同志在《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一文里曾说：“就是在《钦定剿平捻匪方略》这部著作所引用的‘上谕’里，编辑者有意删去了一些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相勾结的史实，这是祁龙威同志把这部书和《东华续录》、《清穆宗实录》等书所引‘上谕’详细勘对之后发现的，我觉得这一点发现很重要，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以免上了反动统治者所写史料的当。”（《捻军史论丛》346页）

对待出自革命阵营的史料，也不能一律盲从，必须进行考证。例如，从常熟发现的《报恩牌坊碑》，所记当地繁荣的景象，以往人们都据以论证李秀成的政绩。但自从龚又村的《自怡日记》等大量资料被发现后，人们才看到当时常熟被一个叛徒集团所控制，已是满目创夷，与碑文所记不合。而此碑也是出自叛徒集团之手，他们用以掩护谋叛真象，所记都是虚假的。

以上史料考证三例，也必须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才能得到圆满解释。

当然，大量单纯的史料考证，在确凿的根据面前，可以弄清某一事实或校正某一版本等，不一定涉及立场，观点问题。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史家都能解决的问题。例如，现在国内流传的太平天国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有两种版本：一是甲寅四年本，一是庚申十年以后本。我们从所附：“旨准颁行诏书是总目”的差异来判别两本的先后，并校勘出两本所记官制的差异，这里都不涉及到立场、观点问题。但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一步，必须进而把前后官制的变化，作为太平天国兴衰的一个折射来研究。这就不能够孤立地观察官制的从简到繁，而要以之与太平天国前后期的政局联系起来，作出结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教导的，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使考证的结果升华成为科学的论断。

对待史料考证，必须严肃，做到言必有据，丝毫不能杂以假设。例如，不能借口某些太平军将领有养子，如左宗棠奏李秀成有养子李士贵，便随意断言洪仁玕也有一个养子在外带兵打仗。这种推测，没有根据，连清代的考据家也所不取。为什么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被后学当作考证的典范，而毛奇龄的《古文尚书冤词》不为人所信服呢？就是因为前者凭确据立论，后者不过是逞词锋强辩而已。

史料考证使用推理，也是必要的，但必须有确凿根据。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六册的《清朝官员书牍》中，有《国瑞致口口书》一题。文中说：“岱岳功高，云霓望慰，引瞻笏旒，盼颂交殷。弟权摄戎机，材惭浅陋，所幸光分东壁，即堪指示南鍼。查逆匪自四月廿四日我军挫败之后，逆焰益张，围城攻圩，肆行无忌，弟迭次接奉寄谕，仰见圣明，深以此股发捻为忧。今幸中堂顾全大局，迅遣雄师入东，刘军门少年英勇，足见知人善任，钦佩奚如。”显然这是一八六五年“督办剿捻军务”的清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于山东后，他的“帮办”国瑞暂署“钦差大臣”，写给新任“剿捻”统帅曾国藩的。“中堂”即曾国藩，协办大学士。刘军门，提督刘铭传。原函无上款，但从内容可以断定是曾国藩。这样的推论，是成立的。

戴震尝言：学者应当“不以人蔽己，”也“不以己自蔽。”我们从事考证，既不能苟同他人的失误，也不应回护自己的过错。还在五十年代我公布了扬州出现的“赖文光藏硯拓本”，承蒙荣孟源前辈撰文严肃指出，这是贗品。此事使我深受教育，我终身感激荣氏教诲。我经常告知青年一代，要他们引以为戒。总之，从事考证，难免失误，只要不固执己见，拒绝批评，失误是可以克服的。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8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JINDAI WEN  
ZILIAO

近代史資料

中國近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  
近代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京)新登字030号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王增寅

版式设计：刘建光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80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主编 章伯锋 副主编 庄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朝阳区东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1千字

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5004-1010-7/K·138 定价：4.80元